

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志丹文史

主编 边志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志丹县委员会

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志丹文史

主编 边志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志丹县委员会

编 委 会

顾 问：白小平 张晓玲 杨东平

主 编：边志银

副 主 编：李俊海 任改兰 高 峰

单福荣

编 辑：杨世贵 李 敏

成 员：赵国瑞 周 林 尚鹏荣

高海生 同小建 张思君

工作人员：纪小艳 何 华 金 妮

王 伟



九吾山（马头山）道观



原延安市政协主席韩焘视察九吾山



九吾山风景区



炮楼山



老崖窑



修复后的旦八寨子



旦八镇全景



原楼子沟旧居



维修后的楼子沟旧居



刘景儒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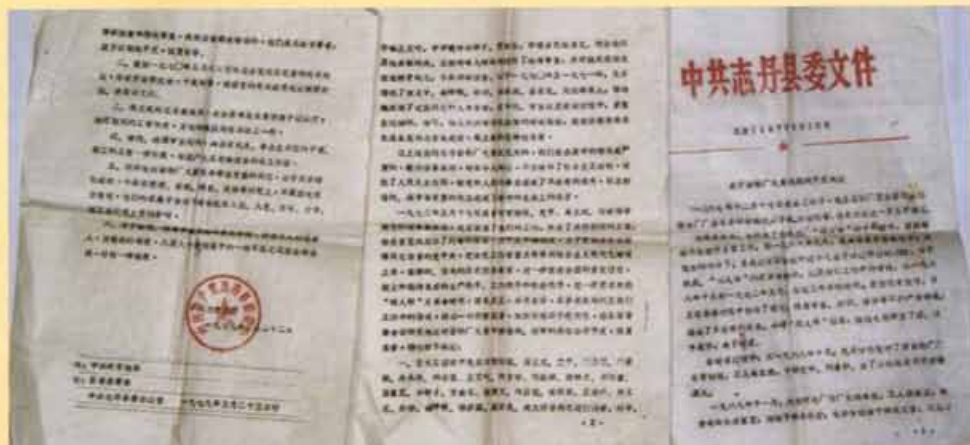


任骑兵连长的刘景儒



刘景儒在延安政协会上发言

中共丹县委关于对 面粉厂火案的平反决定



刘景儒的棉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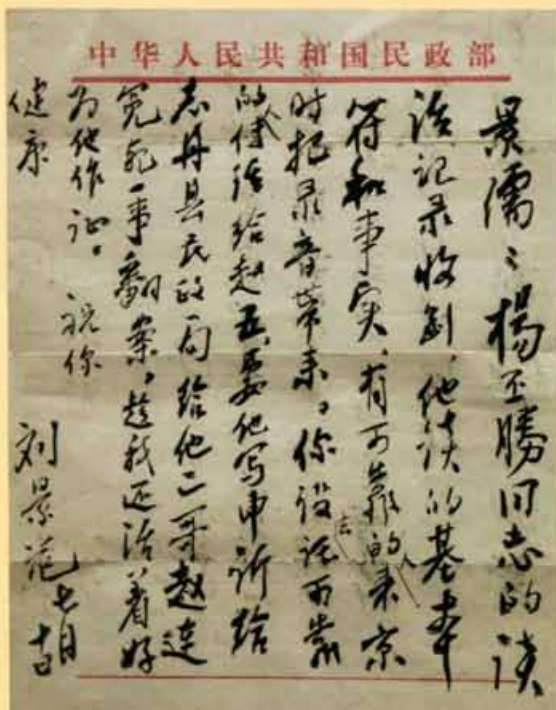
刘景儒的军大衣



《延安通讯》刊登刘志丹烈士亲属冤案平反



刘约三给刘景儒的信



刘景范给胞弟刘景儒的信

紀念三叔百年誕辰

勤奮好學多才多藝
足為後輩敬之

任文

劉力勇

壬辰
中秋

紀念三叔百年誕辰

耕讀傳家

王旭光

壬辰

壬辰秋末

清風正氣

王旭光書

紀念三叔百年誕辰

紀念三叔百年誕辰
壬辰六月廿四日
劉力勇

草創終生
風范長存

追隨兄長上南梁
騎兵團里當紅軍
一生一世跟黨走
留得紅心照後人

紀念三叔百年誕辰
八叔王旭光
壬辰年
于東安

忠烈門第
儒雅家風

劉景偉先賢百年誕辰紀念
癸巳之夏 樊高林書

序一

中共志丹县委书记 白小平

志丹，地处黄河文明发祥区域，境内龙山文化遗址众多，战国长城、秦直道、汉古堡依旧诉说着曾经的恢弘。

志丹，物华天宝，英才辈出，史不绝书，传录有序。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艰辛劳作，跃马扬戈，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举，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北宋名将范仲淹、狄青、沈括等在这块土地上开创了彪炳青史的抗敌伟业。保安出生的刘延庆、刘光世、刘绍能、刘怀忠、解元更是激荡风云，从这里出发写就了万世英名。更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志丹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中国革命的“红都”。1928年秋，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在永宁山创建了志丹县第一个党支部，从此这里成了陕甘边红色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刘志丹与战友们一起积极发动群众，努力争取和改造民团武装，创建了陕甘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南梁游击队，解放了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西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和各路红军有了结束长征的落脚点与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奠都保安，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生活战斗了7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党中央先后召开21次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

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此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此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志丹也随着第一个外国记者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而闻名于世。

新中国成立后，志丹人民在毛主席《复电》精神指引下，努力恢复战争创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曾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九五”以来，志丹人民不仅摘掉了国定贫困县的“帽子”，而且把一个西部贫困县打造成具有影响力的生态大县、文化名县、经济强县，展现在共和国的版图上，使志丹迈入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志丹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正朝着建设富裕志丹、文明志丹、幸福志丹的目标奋勇前进。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志丹人民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格，勤劳智慧、穷则思变的不懈抗争精神以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沧桑巨变，都值得我们精心挖掘，忠实记录。县政协组织编撰《志丹文史》，不仅是这一责任使然，更是推动志丹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需要。希望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都来关心、支持和参与《志丹文史》编辑，扩大文史资料工作的宣传面和影响力，使之更好地为志丹发展大局服务。同时，也希望全县广大文史工作者借助《志丹文史》这一平台，撰志修史，认真挖掘和整理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把志丹打造得更加靓丽、更加适宜人居。

2013年4月

序二

志丹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东平

志丹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唐时设永康镇。宋太平兴国二年设保安军，后改为县，成为多民族交汇之地和军事重镇。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里的人们既创造了璀璨夺目、异彩纷呈的特色文化，又造就了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格。

志丹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这里是人民革命武装、西北工农红军活动的主要地区，造就了刘志丹、马锡五、刘景范、曹力如、王子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省乃至我党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1936年，中央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志丹成为中国革命的决策地和指挥中心。在红都保安的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志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求生存、争解放、谋幸福，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志丹物华天宝，资源丰富。近年来，志丹发挥资源优势，紧

抓政策机遇，大打经济建设翻身仗，1998年摘掉了贫困县，2004年步入了“西部百强县”和“陕西十强县”行列，2008年获得“全国文明县城”和“国家卫生县城”殊荣，不断谱写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志丹人民高举“科学发展、强县富民”的旗帜，团结拼搏，锐意进取，向着全国百强县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志丹政协求真务实，艰苦努力，围绕“打造文化名县”的战略目标开展工作，组织编辑《志丹文史》，对于帮助人们学习和了解志丹历史，推动志丹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必将惠及后世。衷心希望全县广大文史工作者及各界人士，借助《志丹文史》这个平台，认真挖掘和整理出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为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幸福新志丹再立新功。

2013年4月

目 录

序一	白小平 (1)
序二	杨东平 (3)

刘景儒

家世渊源	(3)
------------	-----

甘做孺子牛 悠悠政协情

——追悼原延安市（现宝塔区）政协专职常委刘景儒

.....	宝塔区政协 (6)
-------	-----------

两军会师	刘景儒 (10)
------------	----------

忆南梁岁月	刘景儒等 (11)
-------------	-----------

回忆护送志丹灵柩	刘景儒 (13)
----------------	----------

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	刘景儒 (21)
------------------	----------

关于刘景范的革命历史片段回忆	刘景儒 (30)
----------------------	----------

《刘志丹家史》前言	刘景儒 (34)
我的八十二年	刘景儒 (37)
爱国爱家更忠党 忍辱负重为人民	
——纪念景儒同志百年诞辰	张清文 (67)
回忆陕甘红军时期的三哥刘景儒	刘景星 (70)
回忆三哥刘景儒的几件事	
——写在三哥百年诞辰之际以示深切怀念	刘玉兰 (83)
位卑未敢忘忧国	
——记三哥刘景儒进京面见胡耀邦的一段往事	
.....	张瑞文 (86)
怀念敬爱的三叔	刘米拉 刘都都 刘索拉 (90)
我的父亲	刘振凯 (95)
无私天地宽 清白留人间	
——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	刘振彪 左爱存 (99)
坚定的信念 光辉的一生	
——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刘振辉 刘振刚 (115)
怀念父亲	刘晓林 谢凤祥 (123)
我最骄傲的人	刘 宁 刘 旻 刘 雯 (131)
我爱爷爷和奶奶	刘 睿 刘 垚 刘 磊 刘 博 (134)
深切怀念三叔景儒	刘继祥 (138)
深切怀念三舅爷刘景儒	王旭光 (143)
纪念三爷刘景儒诞辰一百周年	刘宏彦 (148)
追念英雄的弟弟刘景儒	尹国安 (151)
永恒的记忆	石振华 (156)

跟上刘志丹去闹红

——刘志丹胞弟刘景儒坎坷传奇的人生

..... 姜永明 宗廷璋 (160)

刘景儒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申诉书)附记 (174)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刘志丹烈士亲属冤案平反

——《延安通讯》第一版刊登记者裔国华的报道文章

..... 裔国华 (180)

中共志丹县委文件(志发(1979)010号)

——关于面粉厂火案问题的平反决定 (183)

原陕西省农林厅厅长刘约三的信函 (186)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一) (187)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二) (189)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三) (190)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四) (191)

志丹县民政局致刘景儒同志的信函 (192)

文史拾遗

崖窑,不能忘却的传奇 崔子美 (195)

最后一支西捻军覆没的地方

——老崖窑古砦 臧光明 (200)

史话马头山 王廷洁 (209)

清同治“回乱”始末略述 同培新 (217)

“九条驴”轶事 臧光明 (224)

以英雄命名的村庄	姜永明 姜 蔚 (228)
红都境内的白色战略要塞	
——“旦八土围子”	何启华 (252)
精彩足迹	
——大学生的脚印	何启华 (258)
刘志丹是怎么牺牲的	白 黎 (263)
志丹县旅游文化发展略记	金 蔻 吴志锋 (278)
编后语	(283)

刘景儒

家世渊源

刘士杰 刘景儒的祖父。生于道光 28 年（1848 年），清朝贡生。一生主要从事民间教育事业，长期在保安县金汤镇（今志丹县金鼎镇金汤村）办义学，教书育人三十余载，因学识渊博，学生中举人、秀才者数十人，桃李满乡。期间协助乡里办义仓，用以灾年放赈济民，享有盛名。一生经历曲折，跌宕坎坷，血雨腥风，辛苦操劳，始终保持了耿直善良、勤劳节俭的习性。且为人正直厚道，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常以“耕读传家”之《家训》教育子孙，已形成刘家祖传家风。以忠厚正义行事待人，颇得乡邻村民的爱戴。娶四房妻室，仅有第二房任氏所生一子，其它均无出。民国 15 年（1926 年）病故，享年 79 岁。



任氏 刘景儒的祖母。生于 1849 年，宁夏固原人。1881 年年仅 33 虚岁亡故。生一子，名培基。



刘培基 刘景儒的父亲。字汉卿，陕西志丹县金鼎镇楼子沟人，生于光绪5年（1879年），晚清秀才。大刘氏家族第五任户长。光绪26年（1900年）21岁时，参加义和团在安边攻打杨桥畔洋教堂的暴动；1919年任保安县西上区绅士；1923年创办保安县西上区乡民自卫团，除地方匪患，保一方平安。并在

其长子刘志丹放假归来鼓动下，发动乡民举行了罢种、罢养、农具封存到县府的“交农运动”，取得斗争胜利，深得乡民的拥戴。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认为是中国当时之希望，非常赞同“三民主义”。好助人为乐、抱打不平，曾因为民请命、抗苛捐杂税而被官府通缉，在外躲藏两年之久。一生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刚正不阿，心系百姓。

1934年受其长子刘志丹、次子刘景范影响加入革命阵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曾数次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陕西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1954年当选第一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9月病逝于西安，享年76岁。

王氏 刘景儒的母亲。生于光绪5年（1879年），乳名茂女，陕西志丹县金鼎镇金汤人，出身于小手工业家庭。17岁与刘培基结为伉俪，相夫教子。自幼受家庭教育，勤劳善良，诚实豁达，聪慧贤淑，知书达理，勤俭持家，吃苦耐劳，是过日子的贤妻良母。因丈夫常年在外做事，家中缺乏劳力，上有年迈公婆，下有稚子幼女，全靠她侍奉和抚育。烧汤做饭、清扫除尘、喂猪磨面、缝衣做鞋等家务活计都由她操持。终年辛苦，任劳任怨，从而受到家人的尊敬和爱戴，贤孝之名闻于乡里。她生性刚强，

不畏困难，且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常以余粮周济乡邻。这些高尚品德都潜移默化的传给了子女。当得知长子刘志丹有远赴榆林中学求学读书的打算时，为解决学费川资，她把自己的首饰全部变卖，提前就给儿子准备和凑足了赴外求学的费用。刘志丹、刘景范、刘景儒的成长，与她的教养是分不开的。

王氏 1920 年病故，享年 42 岁。1952 年，三子刘景儒以弟兄三人（刘志丹、刘景范、刘景儒）的名义在金汤大路边为其母敬立蛟龙碑一尊，歌功颂德，以示永久纪念。

王氏生三子五女。三子：景桂（志丹）、景范、景儒；五女：桂芬、桂兰、桂菊、桂叶、桂芳。

刘素清 刘景儒的继母。生于清朝光绪 26 年（1900 年），志丹县金鼎镇冯洼人。出身于贫农家庭。民国 12 年（1923 年）与刘培基成婚。刚到刘家时，她是个年轻的继母，能与众多子女相处，实属不易。她性格开朗，待人宽厚，勤劳吃苦，勤俭持家。在长期战乱动荡生涯中，练就了坚强的性格、是非分明的立场。革命战争年代，同儿媳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和红军游击队员。在家庭多次遭受敌人摧残时，同全家人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表现出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品质。解放后，扶持丈夫、养育子女尽心尽力。“文革”中坚持实事求是，受到子女们的爱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贤妻良母。1995 年去世，享年 95 岁。



刘素清生二子四女。二子：景星、景润（德润）；四女：桂芝（刘荣）、春梅（夭折）、玉兰（刘耀）、海燕（九娃）。

甘做孺子牛 悠悠政协情

——追悼原延安市（现宝塔区）政协专职常委刘景儒

宝塔区政协

有的人活着，轻如鸿毛；有的人早已离我们远去，却刻骨铭心，值得后人缅怀惦记。他曾是一位政协工作者，是为了人民政协事业默默奉献的普通共产党员，也许后来者不曾记忆他的名字，然而，在区政协陈旧的档案里却记载着他辉煌的业绩，他就是原延安市（现宝塔区）政协五届、六届专职常委刘景儒同志。

命运多舛

命运多舛这个词用在刘景儒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刘景儒出生于1913年5月15日（农历4月10日），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34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景儒没上过学，从小受祖父的熏陶，跟着他的大哥刘志丹、二哥刘景范读会《百家姓》、《三字经》等。养成了爱百姓、察民情，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秉性。

1934年3月，21岁的他在其胞兄刘志丹、刘景范的影响下，毅然离家，参加了红军保安游击队，并参加了攻打志丹旦八寨子

等几次战斗。

1935年4月，国民党马鸿宾部35师重兵围剿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他受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的调遣回到南梁，负责保护干部家属转移至甘泉桥镇一带会合。之后，担任桥镇区助理员。

当他得知红26军的领导全被25军给逮捕了的消息后，急忙带上老人家属离开，钻梢林东躲西藏，度过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为革命事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心血和汗水，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才重见天日。他的大哥刘志丹不幸牺牲后，他亲自参与了“护送刘志丹灵柩过延安”。之后，他被任命为保安游击队中队长、新兵连连长、志丹县工商联主任等职。

1946年，刘景儒受组织委托到西川组建游击队，主要任务是在志吴交界一带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保护地方政权和百姓的安全。1947年，胡宗南兵退延安后，他从山西返陕，住在横山县付家坪村。

1951年，他全家离开镇川堡，返回延安。在延安县协助搞一些社会公益工作。1952年2月，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志丹县，他被安排在县工商科工作。1954年党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他担任县工作组小组长，负责工商业的改造工作。1965年，他被派往宜君参加社教工作队，不久又被派往河南搞外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尽了近乎灭绝人性的摧残折磨，于1968年12月正式逮捕入狱，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1972年在无法定罪的情况下，被无罪释放。出狱后，回到百货公司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至1978年6月，志丹县召开群众大会，对含冤10年、冤狱3年半的他及受他所谓“问题”株连的11人平反昭雪。时隔不久，他被县委组织部

任命为县副食公司副经理（恢复正科级）。

1979年，已68岁的他被调往延安市委（现宝塔区委）工作，时任市委书记的张士杰考虑他年龄大了，安排他到政协担任副主席职务，被他婉言谢绝。

竭忠尽智

刘景儒同志自调进市政协（现宝塔区政协）工作以来，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加强政治理论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具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头脑清楚，工作思路清晰，事业心和责任心强，抓工作力度大，作风民主，为人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原则性强，团结同志，模范遵守党纪法规，勤政廉政。尤其在分管文史资料工作和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支持编纂了近20万字的延安文史资料第一、二、三辑，添补了许多延安历史上缺少的资料，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由于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烈士的弟弟，以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护送刘志丹灵柩过延安》，情节细腻、生动感人，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誉。他还带领文史资料科的同志赴志丹、子长等地搜集、挖掘、整理刘志丹烈士生前各方面的文史资料，添补了一些史志上的空白。同时，好多学校和单位聘请他去讲红军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历史，他都不顾年迈体弱欣然前往。作为一名政协工作者、专职常委，他时刻牢记使命，认真履行政协职能，积极参与政协机关组织的调研视察活动，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利用节假日，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反馈给

政府，为化解社会矛盾、融洽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维护政治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如在五届政协全委会上提出的《关于重视统战部、政协工作的意见》、《关于采访文史资料的建议》、《关于在市场沟沟口至七里铺北新建百货商店和食堂的建议》等均被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采纳落实。由于他表现突出，连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提案人”等。

1988年，时年75岁的刘景儒离休，离开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的工作岗位，在家颐养天年。1995年1月8日，刘景儒因病逝世，享年82岁。他犹如沧海中的一滴水珠，虽微小普通，却折射出璀璨的光芒。他已离开我们18年，但作为政协人，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在人民政协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以慰藉他的在天之灵。

两军会师

刘景儒（赤卫队员）

老谢老刘闹世事，
陕甘当统帅。
两军会师力量大，
来打反动派。

1935 年 7 月

忆南梁岁月

刘景儒等^①

1935年农历2月，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甘军马步芳^②从平凉一带逼近南梁。敌人共10个团分三路向苏区进犯。一路从太阳坡、城壕一带进攻；一路从柔远东沟进攻；一路从二将川进攻。二月初，敌人占了老爷岭、盐城、柔远一线。与我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对峙了四十余天后，得知我红军主力北上安定一带，遂大举向南梁进攻。农历3月11日，是荔园堡逢集之日，赶集群众很多，马家军突然进至荔园堡，省政府^③转移至洛河川延家湾，南梁根据地被马家军所占，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每到一处就拉民夫修碉堡、挖战壕，砍伐树木、拆卸门窗，真是无恶不作。

在敌人“围剿”期间，根据地人民进行了“坚壁清野”，将

• 本文题目由编者所加。

① 陕西省委党校根据刘景儒、李兴怀、王殿斌、高生荣、贾生秀、张志富、张生金、王生金、张殿林、陈贵元、贾生旺、陈贵福等12人，于1959年4月，座谈南梁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谈话记录综合整理。

② 为宁马35师马鸿宾部。

③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粮食炊事用具埋藏起来，赶上牛羊躲藏在山林之中。敌人一到南梁，就开始搜山、烧山、炮击山林，将群众逼回家中，并严刑拷打，企图从中得知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及政府工作人员去向，但终无所获。马家军曾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贾生秀，凡抓住习仲勋赏大洋 2000 元、马 2 匹；抓住贾生秀赏大洋 1000 元、马 1 匹，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群众牛羊全被赶到庆阳三十里铺，美其名曰是“缴获”红军的“战利”品。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将南梁、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民房全部烧毁，窑洞全部破坏，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将这里的群众全部赶到白马庙川和二将川，村庄变成一片废墟。

敌人的这种暴行更加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时赤卫军转入秘密活动，他们与游击队配合，几乎每夜都骚扰敌人，敌人恐慌万状、一夜数惊。马家军在这一带住了半年之久，于当年农历九月才撤走，走时强拉壮丁 200 余名。当时根据地人民生活极端艰苦，粮食被抢光，牛羊被杀光。

在敌人退出根据地以后，陕甘省政府决定暂时成立华池战区（高生荣任主席），行使原来县政府的职权，积极领导人民拆毁碉堡，平掉战壕，重建家园，全力进行生产自救。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形势大为好转。在红军协助下，拔除了根据地外围敌人的顽固据点，如旦八寨子等，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1936 年 6 月，改战区为县政府，主席李培福，下设柔远、白马、温台 3 个区。7 月以后又增设悦乐、元成子、水泛、吴起 4 个区，乡村政权组织亦相继成立，根据地又巩固和发展起来了。^①

^① 本自然段所述事实应在 1937 年 6 月。

回忆护送志丹灵柩

刘景儒

1936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华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年代。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阴谋，党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由毛泽东同志任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任总司令、周恩来同志任后方办事处主任，率领红军1万余人，分三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当时，我敬爱的长兄刘志丹率红28军从神木山坡头村渡过黄河，英勇奋战，连克数城，迅速进逼阎锡山部占领的据点三交镇。眼看东征抗日的道路就要打通，不料在4月14日一次激战中，却发生了使人震惊的事件——刘志丹同志不幸英勇牺牲。

噩耗传来人人悲痛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36年4月22日，我正在甘泉县桥镇区忙着为前方军队搬运军需物资，突然由甘泉下寺湾的边区政府转来了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电文略称：刘志丹同志在山西三交

镇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要我立即动身去瓦窑堡参加为烈士举行的追悼会。这一惊人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我顿时浑身瘫软，感到不寒而栗，不由得痛哭失声。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误传，然而中央军委的电报，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闻讯赶来，都悲痛万分，含泪为我送行。于是，我简单地安顿了一下家属，就告别大家匆匆上了路，一路上，我悲痛交加，心急如焚，日夜兼程，仅仅三日便到了瓦窑堡。中央军委一位姓张的参谋长接待了我，给我谈了志丹牺牲经过和临时安葬的情况。因当时东北军奉蒋介石命令进犯陕甘边区，形势比较紧张，不容延缓时日，所以在24日已经开了追悼大会。会上由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介绍了烈士生平事迹；周恩来、秦邦宪等同志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致了悼词。会后，烈士遗体已在城外三里处水沟坪山脚下秘密安葬。谈完情况，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组织上考虑的十分周到，我愿一切服从领导的决定。”当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又亲自接见了我们全家。他首先关切地询问了我们全家的情况，接着便沉痛地说：“志丹是个好同志，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他是为党、为国、为广大劳动人民而光荣牺牲的。希望你们所有亲属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努力为完成志丹同志生前未竟的光荣革命事业而继续奋斗”。最后，周副主席还亲切地对我说：“如有什么困难，可以给组织上讲，组织上一定会尽力帮助解决”。周副主席的一席话，情深意切，诚挚感人，深深打动了我。从此，我决心以长兄为榜样，为革命多做工作，贡献自己的一切。三天后，我即告别了瓦窑堡，赶回甘泉县桥镇区。

子长人民公祭英灵

1940年，党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原保安县，为纪念刘志丹同志改为志丹县）修建志丹陵园。为此，专门成立陵园筹建委员会，我也被推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1943年春陵园竣工，边区政府通知我去瓦窑堡护运灵柩。我到延安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接见了，我，亲切地和我谈了话。决定由边区政府的马豫章同志等人与我同去瓦窑堡，并派了一个骑兵排作为护灵队伍。4月15日，我们从延安动身，17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瓦窑堡，住在一家叫做“振兴隆”的客栈里。晚上，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同我们一起研究了次日起灵及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宜。4月18日上午，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等人，率领警卫队战士及群众代表，和我们一同来到水沟坪山脚下，深挖5米，起出灵柩，面对大哥的遗体，我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在场的干部和群众也都十分悲痛。下午2时，我们将灵柩搬回县城，安置在灵棚里。19日，子长县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会场布置得格外庄严肃穆，灵堂前的牌楼是用50匹白布和100匹蓝布扎成的花墙构成，灵堂正中悬挂着烈士遗像，遗像两边各挂一面党旗，董必武所题“志士求仁飞渡黄河勤讨贼，丹心救国誓扫倭奴不顾身”的巨幅挽联悬挂在灵堂两侧。上午10时，公祭大会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开始，首先由中央军委代表介绍了志丹烈士生前史略。接着，由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烈士生前好友和亲属代表也分别讲了话，追悼大会直到下午2时才结束。4月24日上午，我们用两头骡子驮着内盛志丹烈士遗骨的精制柏木棺材，在骑兵排的护卫下从瓦窑堡

动身，送灵的有子长县党政代表、机关干部和市民、学生等 500 余人，一直送到了 5 里外的瓷窑沟。沿途群众焚香烧纸，跪迎道旁，悲声不绝，充分显示了子长县人民对烈士的无比怀念和一片深情，实在令人感动。在瓷窑沟举行了别灵仪式后，我们一行人开始登程。

延安万人恭迎烈士灵柩

当天晚上，我们护送烈士灵柩来到延安的蟠龙镇，将灵柩安置在当地人民早已准备好的灵棚里，整夜前来烧纸祭奠的干部和群众接连不断。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时，蟠龙镇街道两旁早已站满了送灵的群众。他们手里拿着点燃的香表，个个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沿路上每过一个村庄，都会遇到守候在路旁的干部群众，他们不约而同地焚香烧纸，洒泪送灵。当我们路过延安县川口乡时，农民们自发组织起一班吹鼓手，参加到移灵队伍里来。他们难过地说：“咱穷人过去没地种、吃不饱、穿不暖，还得受地主老财和国民党匪徒的气，全靠刘志丹领导大家起来闹革命，现在才有了吃穿、土地和牛羊，咱这辈子也忘不了老刘。”这简短、淳朴却发自内心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群众对志丹的无限爱戴和真挚感情。还有一位农民一直跟着移灵队伍，他激动万分地逢人便说：“我们翻身得解放，都是共产党和刘志丹给带来的。”下午 3 时左右，移灵队伍行抵桥儿沟，受到早已汇集在这里万余人的迎接。当白幡素幛丛中的烈士遗像及灵柩出现在延安军民面前时，人们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有的怨天恨地，有的捶胸顿足，霎时间，悲壮的哀乐伴着洪涛般的哭声直冲云霄。前来迎灵的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人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邓

发、罗迈、高岗、贾拓夫、李木庵、崔田夫、甘泗淇、刘景范、唐洪澄、张邦英、曹力如、刘约三等，看到这一场面，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们轮换扶着灵柩，捧着烈士遗像，十分小心地移上了用白布缠绕的汽车。稍停，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以及全体军民肃立默哀，向烈士灵柩行礼。接着由延安卫戍司令王震同志指挥着迎灵队伍，缓缓向延安城行进。仪仗队在前，卫戍骑兵压道，10丈长的两匹白布，一头绾在灵柩上，一头由烈士遗女刘力贞、侄子刘军牵引着。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及边区政府领导人执紼而行，我和大嫂同桂荣坐在大哥的灵柩旁边悲痛万分。车后近万人排成4路纵队，延绵数里。这时，在延安东关专员公署广场内（即解放日报社旧址）已经搭好灵棚。灵车一到，便由朱德等同志亲自将烈士灵柩抬入灵棚内安放，接着在八路军乐队、民间乐队和鲁艺学校乐队同奏的哀乐声中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和行三鞠躬礼。这时，附近的机关干部、学生、战士及街道居民，也都纷纷来到灵堂周围自行祭奠，迟迟不肯离去。

4月23日下午1时，在延安专署广场举行了各界人士近万人参加的公祭大会。大会由当时的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博古、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及中央委员们，赠送了白绸挽联。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和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张秀山、警3旅旅长吴岱峰、骑兵旅旅长康天明、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王世泰、高级法院院长马锡五、延安行署主任曹力如、边区政府总务处长刘约三等同志陪同下，由延安启程向志丹县进发。灵柩前走着八路军乐队、鲁艺乐队和民间乐队，接着是全副武装的骑兵护灵队伍，各机关领导人随着灵柩走在最后面。沿途经过的村镇，干部、群众纷纷点香烧纸争相祭奠。

志丹人民挥泪祭英杰

志丹县是刘志丹烈士的故乡，全县人民都对志丹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感情，对于他的不幸牺牲倍感悲痛。当人们听到烈士灵柩将于4月26日护送回县的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众乡亲们那日一大早就聚集在县委大门外，等候着迎灵。大家在县委书记王耀华和县长李超的率领下，徒步赶到离城10余里的进士窑，专心等待灵车的到来。上午11时前后，庞大的护灵队伍开进周河川，静候在道旁的志丹县200余名干部群众眼望灵柩，想起日夜思念的“老刘”，就如万箭穿心，无限悲痛。顷刻之间，吹鼓手饱含热泪吹起了“老刘”平时爱听的曲子，道旁群众焚香化纸大放悲声，哭声令人心碎。灵柩进入南关大街，伫立两旁的干部、学生、群众个个含泪默哀，警卫战士鸣枪致敬，随灵白幡迎风招展，乐声、哭声不绝于耳。灵柩停放在南关灵棚，四乡群众闻讯赶来焚香祭奠者络绎不绝。当天晚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即专门研究了公葬时间和举行追悼大会等有关事项。为了满足远路家门户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将公葬时间推迟到5月2日。此后，每天都有成千的人从四乡农村进入县城，特意为志丹烈士烧纸祭奠。

5月2日上午，志丹县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由高岗、林伯渠亲自执绋，张秀山、吴岱峰、康天明、刘景范、曹力如等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代表，志丹县各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代表，以及烈士家属亲友等万余人参加了公葬仪式。上午10时30分，18人抬灵柩到达志丹陵园，乐队高奏国际歌，警卫战士鸣枪致敬，悲壮肃穆的公葬大会就此开始。会上首先由高岗介绍了志丹生平

事迹，号召大家继承先烈遗志，建设边区，巩固边区，坚持抗战，夺取胜利。接着林伯渠、张秀山、吴岱峰、曹力如、王耀华等同志都在会上先后讲了话。我的二兄刘景范则代表烈士家属讲了话。他沉痛地表示：“我们所有家属一定要继承志丹烈士的遗愿，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最后，由曹力如同志宣读了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的祭文，大会乃告结束。

志丹陵园建于志丹县城北门外炮楼山下，陵园坐北向南，建筑雄伟壮观，周河绕园而过，园内树木成荫，景色秀丽。陵园以我国传统的石雕、木雕及绘画艺术，结合革命的内容构成，特别是镶嵌在墙壁上的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的题字石刻，更使整个陵园显得异常庄严肃穆。既使在战争年代，中外来宾也不断有人前来瞻仰悼念。可惜在1947年，遭到国民党胡宗南匪徒的严重破坏，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又给刘志丹妄加罪名，陵园进一步横遭摧毁。敬爱的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在1970年和1973年先后两次讲话中都曾明确指出：“刘志丹同志是值得纪念的”，“刘志丹对毛主席忠贞不二”，“陕北必须树立刘志丹”。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到1975年，志丹陵才得到重新修复。

修复后的志丹陵园，一条笔直的沥青马路顺山而上，走进第一道门，两旁柏树成荫，面前是一层层的石筑台阶，共计34层，象征着刘志丹烈士牺牲时年仅34岁（虚岁）。拾阶而上，走进第二道门，迎面是一座高大宽敞的四角主亭，亭顶中央塑着红光四射的五角星，四个角上塑有火炬，是点燃中国革命燎原烈火的象征。亭内正中矗立着毛主席的题词石碑：“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

民中间，不会磨灭的”。亭子后面是由三孔窑洞和五间厦檐组成的纪念堂，堂内悬挂着刘志丹烈士的彩色画像。

刘志丹的灵柩安放在后堂，棺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纪念堂顶上竖立着刻有“刘志丹将军之墓”的石碑。纪念堂外左侧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是由林伯渠撰文、谢觉哉手书的《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史略》，记载着刘志丹的生平事迹和不朽功绩。块青色石碑，发出感人肺腑的革命情思，令人对革命先烈肃然起敬。

安息吧！志丹同志

回忆先烈以启后人，回想志丹烈士光辉战斗的一生，我们深深感到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促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生活，激励我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干劲和热情。志丹为之奋斗一生，不惜献身的革命宏愿，终将会在神州大地上成为现实。

安息吧！敬爱的志丹同志。

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

刘景儒

首长：

您好！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每当我看到党报上充满党的政策精神的通讯报道，并联想到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时，无不感到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我万分感谢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衷心庆幸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又有了一个好领袖，好统帅。

我叫刘景儒，中共党员，现年六十四岁，家居陕西省志丹县，在志丹县副食公司工作，系“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的亲弟，全家共八口人。我同老伴张清文均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大半生均无任何严重错误，未曾受过组织上的任何处分。可是，自林彪、“四人帮”掌权以来，却祸从天降，大难临头。不仅我本人被志丹县军管组无辜关押了四十二个多月，两个儿子分别被判刑，老伴多次受到隔离审讯，就是八岁的小儿也未能幸免，遭到无理的恐吓和逼供。时至今日，我虽出狱，党籍和工作均已恢复，工资照发，然而我大儿刘建斌、四儿

刘政辉仍然判刑在押，老伴被斗致精神失常，堂弟刘景昌、外甥宗世和蒙冤受屈有待昭雪，堂弟刘景祥、刘荣昌被拷打致残不能劳动，生活无法自理，堂妹刘桂兰遭批斗关押逼成疯子，表侄王悦贤被屈致病含冤而死，堂兄刘廷华被活活逼死，我本人的工资也有九个月被无理扣发，至今不给。为此，我不得不向亲爱的党、向敬爱的首长提出申诉。

早在1966年下半年，就从上面刮来一股妖风，说什么“刘志丹是叛徒”，“要改志丹县名”，“要毁志丹陵墓”。然而志丹人民谁也不听、谁也不信。因为大家清楚地知道，如何评价刘志丹，毛主席、党中央早有定论。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亲自下令释放了被“左”倾机会主义关押在监的刘志丹，也正是他老人家在刘志丹东渡黄河前往抗日前线在山西遭阎匪阻击牺牲后亲自给我大哥写了“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原保安县改名志丹县是毛主席决定的，志丹陵墓的修建是党中央批准的。为什么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刘志丹的评价及决定会一下子全错了？这不能不引起志丹县八万人民的怀疑。许多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老贫农气愤地说：“看谁狗日的敢学胡匪的样子毁掉志丹陵墓！”正因为如此，虽然每年清明节祭扫志丹陵墓的常规被废除了，瞻仰志丹陵墓的人越来越少了，志丹陵园里的某些建筑遭个别坏蛋的破坏，但基本完好，志丹县名一直保留。

然而林彪、“四人帮”之流诬陷革命老前辈的罪恶活动并不因此而罢手。他们继而叫嚷“刘志丹全家没一个好人，刘志丹是叛徒、刘景范是三反分子、刘景儒是黑爪牙。”就是在这样一片鼓噪声中，1968年12月31日上午，志丹县军管组召开了一个所谓“批判三反分子刘景范伸向志丹的黑爪牙刘景儒大会”，将我

逮捕拘留。当时的借口是：第一，我私藏手枪一支；第二，我私藏大烟土三两。但是，这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所谓私藏手枪并非军用，而是我过去领导剧团时留下的一支演戏道具——坏折腰子手枪（废的），并不触犯法律。所谓私藏烟土，是我1949年在榆林镇川堡工作时，听从家乡志丹县来的老干部曹立如说我父亲有病，叫我回家省亲，而我父亲吃大烟是边区政府当时批准，按月供应的。当时我回家没啥可带，在曹的劝说下，我从咱边区贸易公司买了三两烟土。等回到家里，我父已前往西安，无法送到，因此我只得将其包好埋在土里（等1968年挖出时全部霉坏）。我本人既不吃也不卖。1968年10月清队时，我怀着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将以上两件事情向组织作了交待，向群众作了深刻地检查。按理说，应该得到群众的谅解和组织的宽大处理。但志丹县军管组却以此为理由将我逮捕拘留。如果这样，谁再敢向党讲真心话！谁再敢走“坦白从宽”的道路！把我抓到狱中，一连四个多月不审不问，后来猛然间向我提出了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即1967年12月火烧县办面粉加工厂之案。对此我感到十分突然，莫名其妙。然而军管组却使用了各种刑法对我进行逼供，硬要我承认火是我放的，我再三申辩，他们硬是不听，叫喊说：“不承认是刑法轻、手不狠”，直把我拷打的死去活来，身体致残。就这样把我平白无故地关押拷问了四十二个多月，最后实在查不出任何证据，才宣布将我释放，交群众继续批判教育。

为了证明我家没有一个人好人，在我进狱之前，就将我的大儿刘建斌拘捕，说他奸污了一名还在怀里抱的四岁幼女。我儿始终不承认此事，志丹县军管组便以态度蛮横、拒不交待为名从严判处十年徒刑。现在他仍在狱中受罪，妻子儿女被下放至农村。此事真情到底怎样，有头脑者不难明白。

根据同一逻辑，我四儿刘政辉（当时年仅十六岁）因枪伤一名武斗队员，也判罪十五年整。这是事实，应该受到组织处理，但是情节出入很大。第一，当时（即1968年6月27日）一派半夜打进城里，我儿猛从被窝钻出来，跑出大门外已中一枪（腿部受伤）。模糊看见离十几米远处本派一名武斗队员刘长友同贾志平（当时刘政辉未看清是贾）正在扭打，刘喊他赶快开枪。刘政辉拖着受伤的腿手脚慌乱地还了一枪，打在被抓那人贾志平（本派武斗队员）的肩上，当时刘长友正抓住贾的肩膀扭打，手指同时受伤，按理说，这一枪虽致贾受伤，但无关紧要。贾受伤蹲下后，刘长友又从背部打了一枪，穿胸而过，当即致贾毙命。这样的情况，谁是主犯，非常清楚，但志丹县军管组却说年仅十六岁的刘政辉是主犯，因为他开了第一枪，而四十余岁的成人刘长友是次犯，因他开的是第二枪。试问这合乎情理吗？第二，党的政策历来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破获这件杀人案中，军管组一直查证不清，已经以“两派夜间混战，乱枪误伤身亡”的结论结案上报了结。后来是谁协助军管组破了此案的？是刘政辉。当时军管组为了达到打击和吃掉一派，群众组织策划搞的，会就是在我家开的。为此，不仅把我关在狱中严刑逼供，把我老伴张清文，二儿刘政凯等以知情者为由隔离审查，同时也把我四儿刘政辉从插队农村调回县上办“学习班”，追问此案。我四儿刘政辉否认了火案的诬陷，但向组织第一次主动地交待了贾志平毙命一案的全部过程。军管组隔离刘长友令其交待，其拒不承认，只是在后来两相对证，无法抵赖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作了如实的交待。这不仅有口供证明，也有剖棺验尸证实。就因此事刘政辉在县干部会上与全县广播上曾受到当时的县革委主任崔少华、武装部长田久成的多次表扬，把政辉树为作案人自动坦白交

待的好典型，公开声明不影响插队接受再教育。然而到判刑时，两人的处理却完全相反，刘长友判了十年，而刘政辉反而判了十五年。难道党的政策是坦白从严、抗拒从轻？次犯从严、主犯从轻？孩子从严、成人从轻？这不能不说是我党办案史上的一件奇事！不能不被认为是对我家残酷迫害之一例。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的直系亲属八口无一人幸免，连八岁的小孩也不放过，甚至有病去趟医院也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大祸。我的老伴张清文被诬陷为火案的“知情者”，被市镇派出所隔离四十余天，白天大会斗，夜晚小会批，腿站肿了，腰弯驼了，还要经受拳打脚踢、绳捆、冷冻之苦。当时正值严冬，为了从肉体上整垮她、消灭她，有意把隔离室泼满水结成冰，不支一张床，不给一块被，让其单身站在房子里过夜，直把身体搞垮，逼得精神失常。其残忍之状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我三儿刘政彪当时下乡插队，被贫下中农选为出席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代表，正在开会之时，县上来了电话，说他家背景不好，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当场勒令退出，逼得我儿嚎啕大哭。我女儿刘小玲正值小学毕业，在校政治表现好，学习成绩好，老师夸奖，同学赞扬，就因为她姓刘，是我的孩子，中学硬是不收，被迫停学五月之久。我二儿刘政凯生病前往医院看病，路过医院外面的地道口，军管组硬说他刺探军事机密，图谋不轨。试问：这再有我家人活的路子吗？更有甚者，竟连我八岁小儿刘政刚也不放过。六九年，志丹街上发现一条反标，军管组硬说是我小儿写的，把他叫到派出所恐吓、恶骂、摸心、审问。幸而一名正直的红小兵站出来作证，证明写反标的是另一个小孩，是他亲眼看见的，才免除了一场灾祸，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永生难忘呀！

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极右路线，除了把我家搞得如此之苦、如此之惨外，还要把他们的罪恶黑手伸向我的户族人、亲戚邻居。借此机会，略举数例，即以说明。

本县纸坊公社梢沟生产队刘荣昌同志，系我家远房同族。四七年胡匪进犯边区，抓不住我家大小，迁怒于志丹灵骨。刘荣昌那时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疏散、埋藏、保护志丹灵骨。于胡匪撤退后全部交出，受到政府之嘉奖。就因此事，荣昌同志在清队之时因保护“叛徒”刘志丹灵骨之罪被斗半年之久，在百般折磨下，身体致残。

户家堂哥刘廷华、堂弟刘廷杰弟兄二人，土地革命时期保护我家眷属（其中有我父及我大嫂同桂荣等）钻梢林进深沟，避免遇害。清队时刘廷华、刘廷杰二人均被当做叛徒（指我大哥刘志丹）三反分子（指我二哥刘景范）的黑爪牙而被批斗。刘廷华浑身被打的稀烂，体无完肤，还扬言第二天要开大会算总账。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廷华堂哥被逼无奈，夜间偷偷爬上山头自缢而死。刘廷杰一气之下得了臃症，也于七一年含冤而死。然而这伙暴徒并不就此罢手，死后还在坟上插了黑牌子，上面写着“叛徒刘志丹和三反分子刘景范的黑爪牙刘廷华罪有应得”。

堂弟刘景昌、表侄王悦贤（系革命先烈王照基的儿子）、外甥宗世和（也系烈士之子）均为生产队社员，1960年我二哥刘景范回乡探亲，在以上三人家里各吃了一顿饭。就因此事，三人均遭到残酷迫害，他们指示个别坏人组织一伙人游批游斗，每日巡逻各大队接受所谓的“群众教育”——拳打脚踢、肉体摧残。其中刘景昌、宗世和比较年轻还“考验”过来了，王悦贤年龄较大，经受不住折磨，已于1976年含冤而死。

堂弟刘景祥，生产队社员，一贯忠诚老实，人品本分，县军

管组在查面粉厂火案之时，把他秘密逮捕入狱，硬逼他承认火是他亲手放的，是我用二百元人民币雇的纵火犯（又说是我用一套黄呢子衣服收买的）。景祥莫名其妙，但他坚持真理，没有承认，他们即动用刑具，大搞逼供。事实是面粉厂失火那天晚上，他根本不在县城而在远离县城一百二十华里的生产队家中为女儿订亲请客议事，这不仅有来客者证明，而且有邻居证明，到了真相大白之时，军管组无法收场，只得又将景祥秘密放回生产队。然而已经迟了，他的身体已被整垮整残，回到家里半年时间卧床不起。直到现在，也不能像一般常人一样下地劳动。

堂妹刘桂兰，因在我被捕后气愤不过，说了几句顶撞人家的话，指出“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刘志丹的老革命谁也赖不掉，地主龟儿子的天永远也翻不了。等毛主席回来看你怎么收场！”就因此便以“刘桂兰公开为叛徒、三反分子、黑爪牙辩护”为罪名，召开了规模异常浩大的批斗会而逮捕下狱。刘桂兰到狱中被打被捆，十多天不进饮食，变成疯子，直到今天还经常寻死觅活，专人看管不住，这些家伙心肠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真是世上罕见，古今少有呀！

如果以为上述不幸遭遇仅系我一家一户一姓一族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就未免太低估反革命复辟之严重性了。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死人。不管这种牺牲是由于冲锋陷阵或敌人反扑过来而作出的，两者皆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假以我家我族之牺牲能得广大贫下中农之幸福，那也值得，我心里倒也觉得舒坦。问题是志丹县广大贫下中农这几年之境遇并不比我家好多少呀，别说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冤枉了多少人，单就七三年我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全县初步估计逼死者达三十多人（而且这其中还不包括工程事故致死者），逼疯逼

残者达三百多人，被迫无奈逃往他乡者达三千多人。而志丹县仅是一个只有八万人口的小县哪！逼死逼疯逼逃者竟达这么多的人数，不能说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严重问题。多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捣毁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终止了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不然的话，这些数字怎能挡住呢！全志丹人民正盼望着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二次解放他们，救他们出水深火热之中。

在志丹县，每个长眼睛的人都看得清这样一条规律，就是谁对群众心残手狠整的凶，谁就能入党作官步步升。这些人公开讲：“死几个人有什么关系，革命岂能不死人！”

当前，志丹县的问题已成了全省全区瞩目的严重问题。延安地委第一书记冯怀亮同志亲自来志丹听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冯怀亮走后又专门派了调查组进行调查落实。然而大家心里明白：志丹县的问题不是工作中偶尔疏忽大意的问题，也不是官僚主义或方法不当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四人帮”的黑爪牙及其帮派体系掌了权的问题，专了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政的问题。从对待老贫农、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的某些迫害手段来看，何止是什么单纯的资本主义复辟呀，它甚至赶上了惨无人道的、灭绝人性的奴隶制度哪！比如在人脸上刻字，脖子上挂马灯，活活把人逼死冻死等等。像这种刑法，即使在全国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吧！正因为如此，大家仍然害怕，心里有顾虑，说不定今天说了他们几句坏话，明天就会把你整死，装在麻袋里又塞进冰窟窿里。群众不仅怕这些凶手，更怕他们的后台，因为这些后台更有经验、权势。因此要落实党的十一大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要解决几年来志丹县积存的假案冤案问题，要把八万志丹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等等，中央不着手不行，县委和各公社领导班子中的帮派人物、打砸抢分子不清除不行，省地两级中的黑后台不挖掉不行，这不仅是志丹八万人民的共同看法，也是解决志丹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殷切地期望华主席及党中央能派一个工作组来，实地调查了解，研究问题，从整顿县委领导班子入手，把多年来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块土地重新夺回到人民的怀抱。

我家只不过是八万志丹人民中的一户，我家的遭遇也不过是八万志丹人民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我一家一户的问题倒好解决，但我生在志丹，长在志丹，志丹的水土五谷养育了我，毛主席的阳光雨露沐浴了我。因此，我决不愿意忘记志丹这块宝地，不愿忘记志丹八万人民。只有志丹全县的问题解决了，我家的才能迎刃而解。若没有志丹县问题的总解决，即使我个人、我家、我族的问题解决了，也仍然会出现反复。敬爱的首长，我的看法对吗？请批评指导。

正如前面所说，志丹县的问题是一个“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掌权的问题，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与别的地方比较，相对地棘手难办。因此，必须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否则将遗下后患，危害无穷。根据同一理由，我的这份申诉书也只能由你们直接研究决定，不能层层下传下推。否则必将招致更大的祸害，连我这老骨头也难保住。

沉痛深切之申诉，诚望迅速做出处理。

申诉人：志丹县副食公司干部

刘景儒 呈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

关于刘景范的革命历史片段回忆

刘景儒

刘景范生于1910年8月，志丹县（原保安县）西北楼子沟村人。从六岁起，随祖父刘士杰白天上山放牛，晚上回家祖父给他教学识字。长到十一二岁，就认识许多字，懂好多道理，并且也做些简单农活。十三岁时娶妻宗氏梅亭，从此后他就担当做农活的任务，当时祖父年迈已七十岁，父亲在外干事情，家庭一切事务全靠他负责。当时家中用了一个帮工，他们俩搞农活，大事请示祖父，一般家中事务全靠他一人担当。

1928年在刘志丹的影响下，景范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是年秋，刘志丹领导的渭华暴动失败后，受省党委地下组织指示，刘志丹回陕北任军委书记，搞兵运工作。在永宁山景范接受志丹的指示，接待谢子长等人搞地下活动。1929年夏天，和志丹一起到张廷芝处搞兵运工作，志丹不久又到苏雨生的谷连舫部下任团长，把景范派到张廷芝部下任第四连一排排长。

1930年夏，张廷芝叛变，把刘志丹、谢子长在三道川发展的部队全部解决。刘志丹上了永宁山，借了些枪、马，直奔太白镇解决了黄团头，部队扩大到二百多人，景范受命离开了张廷芝部

带出了一个排，排长叫赵一民，跟随志丹到安塞一带打游击。冬后南下和赵连璧、同守孝、杨培胜部队会合，这时有三四百人，景范任排长，参加了和尚原战斗，队长芦仲祥被打死，当时队伍也失散了，刘景范跳崖跑回到志丹。以后在志丹县永宁附近打窖子搞了些粮食，晚上到芦保梁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小石崖罗连城那里，红军部队给罗连城送了些大烟土，罗给红军些子弹猪肉等。

省委指示让红军到织田镇和苏玉生谈判，结果刘志丹被苏扣留，枪也收了，关押于彬县监狱，后经省上南汉辰、杜斌丞相救获释，省委指示到陈国璋那里合作，没有谈好，又跑回南梁。景范又到杨赵贾部队。

这时杨赵贾（杨培胜、赵连璧、贾生才）部有三四百人，属刘志丹部队，编为第二支队，师诸杰部队为第一支队，属谢子长管。两个支队会合成立“反帝同盟军”。正遇年关，这支队伍开上三家塬，被谢子长的警卫队收了刘志丹及二支队的枪，打死赵二娃（赵连璧）等人，一支队的师诸杰带着他的部队连夜逃走投靠了杨虎城。刚成立不久的部队就这样散了。之后，刘志丹让刘景范去西安找杨晓初，经杨介绍到养蜂厂工作。1930年入党。

1932年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让刘景范找白冠五到谷连舫那里，白要下了，找张廷芝不让要。后来景范回川组织了一次交农运动，组织了一千多人上永宁山，斗争胜利了，把羊税免了。1933年听说红军到了葫芦河，景范派张万良去找刘志丹，刘让景范在当地搞游击队，找了些人搞了些土枪，还有自己家的快枪，到郭家畔开会秘密活动。1934年3月派张明科到南梁找红军，把张廷芝的梁廷栋部打垮了，几十个人编了个游击队，又接收了刘约三的游击队，景范任保安游击队长，三个大队

一马二强三会。1934年4月开展保安、靖边等地游击战争，先后打了倒庙、胡新庄、礼拜寺，打了屈子，后景范转到富县游击队。

国民党仇良民在保安一带剿共和缉拿红军家属，杀了许多人，刘志丹派景范回到保安继续打游击。景范回到保安，处处打击敌人，并派王玉海、尹云山、边金山进行小组游击，到处开展群众工作。1934年8月边区军委让景范带一百多人去陕北接谢子长到闫家洼子开会。9月在二岭湾打了好多仗，以后成立红二团，景范任团长，沉重打击了楼房坪张廷芝匪部。1935年1月收编了贾德功、梁占魁后，国民党马鸿宾部重兵围剿南梁革命根据地，红二团在边界打游击。2月边区政府放弃南梁，实行转移。

1935年4月，景范到洛河川担任陕甘边军委主席，以后打了靖边县，解放保安县（因二十五军搞极左路线，部分游击队成员哗变），从此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我红二团配合骑兵团，在吴忠打败马匪部队。

1935年9月，朱理治来陕北伙同郭洪涛等人大搞王明路线，扣押逮捕了刘志丹、刘景范等一大批26军领导人，并杀害了营级以上边区党政军干部200余人，中央红军长征来陕北后才释放了他们。景范奉中央指示来陕北特委任军事部长，负责平叛工作。打了一连串的仗，消灭了蔡丰、宗文耀、蔺士升等叛匪。1936年7月光复了志丹、吴起，接着靖边、定边、华池县全光复了，景范任赤安县委书记。当时县长不懂事，景范兼任县长和军事部长，王四海为副部长。以后毛主席到赤安，改为志丹县，属中央直属县。把陕甘改为陕甘宁，中央搬到瓦窑堡，县政府住在西阳沟，白志文任警卫团长，王四海为副团长，组织了一个围城司令部，景范兼政委。景范把曹景彬叫下寨子，由此旦八寨子不

断跑人，城围到十二月，曹俊章也跑了。以后袁万祥当了县长到巡间寺征粮，被靖边叛徒拉去杀害了。

张学良部队退走后，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李维汉当省委书记，景范是省长，住在安塞高哨。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陕甘省撤销了，开展统一战线后，国民党派县长进驻边区各县。4月景范又被任命为陕甘宁省委书记，接了李富春的职务，马锡五当省长。大部队西征接张国焘时，当地匪军四起，川里的土匪赵老五、张廷芝等也乘机捣乱。那时一个统战工作，一个剿匪工作是两个最重要工作。

之后，景范调回陕甘宁边区政府当建设厅长，教育厅长是杨明选，民政厅长是马明芳。1940年景范又到民政厅当厅长，高自立到建设厅当厅长。1946年第三届人民代表会选景范当边区政府副主席。1947年敌人进攻边区时，组织了动援会，中央决定景范当后勤司令员。1948年组织上决定景范代理边区政府主席。1949年西安解放，边区政府搬到西安。10月调景范到中央，先任内务部副部长，后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任第一副主任。1953年高岗出事，1954年景范受到牵连，降为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下半年到地质部任副部长。因《刘志丹》小说事件，1963年入党校学习。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于1968年10月被关押，1974年12月24日放出，1978年到民政部任副部长，1982年又选到政协任常委，后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

1988年

《刘志丹家史》前言

刘景儒

在陕北黄土高原洛河流域保安县的山坡、川道上，居住着自称为“大汉刘”的刘氏家族。家族又分为大大小小的许多支脉。就在杨青川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个令世人瞩目的革命家族。这个家族在过去的六七十年代里，出现过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刘志丹。刘志丹的弟妹中有很多人走上了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革命道路，二弟刘景范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刘志丹的伟大历史功勋在于创建并领导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在强敌的“围剿”下全部丧失之后，陕甘宁边区为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武装提供了立足之地，并成为民主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在此领导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刘景范从青年时期就追随大哥刘志丹参加了革命，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创建陕甘宁边区、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担任过很多重要领导职务，为中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刘志丹、刘景范的影响下，刘氏家族先后有百余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他们中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英勇杀敌、浴血沙场的革命烈士；有为革命勤劳一生，已经离退休的老红军、老干部；有仍在各级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作人员；有在各行各业为人民辛勤服务的普通劳动者；还有辛勤劳作在广大田野上的农民。

刘志丹家族之所以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和共产党的教育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族风范。刘氏家族世代务农，且有耕读传家、勤奋好学、忠厚善良、勤劳节俭、不慕荣利、不畏强暴、豁达开朗的家风相传。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虽然只是一个民间的教书先生，但博学多才，具有勤劳勇敢、刚直不阿的美德。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不仅知书达理，会农耕、会经商，管理着整个大家庭，而且是一位侠义之士，有着强烈的正义感。民国时期，曾多次与贪官污吏作过英勇斗争。刘志丹的叔祖父刘士哲及堂叔刘培业、刘培福、刘培绪都在家务农，具有勤劳、忠厚、善良的美好品德。正是在这些长辈们长期的言传身教之下，刘氏家族的后代子孙们形成了疾恶如仇的正义思想，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坚韧不拔的斗争毅力，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 and 团结一致的凝聚力。这些美德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在家庭所遭受的四次大劫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现在刘志丹家族已有数百人口，为了使优良的家风世代相传，为了使家族更加兴旺发达，由刘景儒、刘景瑞、刘景星提供材料，刘政文执笔写出这部家史。目的在于激励刘家子孙后代学习先辈的高尚品德，继承先辈的未竟事业，为国家尽大忠，为

民族尽大孝，做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

这部家史只作为家庭的内部读物，应妥善保存。望刘家子孙以更加辉煌的业绩来续写自己的家史。

无限希望寄托于子孙后代。

1993 年 1 月

我的八十二年

刘景儒

（一）变迁

陕北保安县（现名志丹县）有一个金汤镇，镇子虽不大，但因其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又是几省商队来来往往的必经要道，街面上商店客栈林立，热闹场景非其它乡镇能比。我的祖父刘士杰、父亲刘培基、母亲王氏带着大姐、二姐、三姐和大哥就生活在这里。

我的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贡生，为人正直厚道且学识渊博，常以“耕读传家”教育子孙，以忠厚正义行事待人，在镇上颇得乡邻爱戴。父亲刘培基系晚清秀才，是祖父第二房妻子任氏所生，父亲因受祖父教育，喜抱打不平，曾为抗苛捐杂税铤而走险，只身上衙门告状，状未准反被通缉，在外躲藏二年，后托人送去800元大洋了事。母亲王氏是金汤镇人，18岁娶进刘家，生得我们姐弟八人，大姐刘翠女，二姐刘进女，三姐刘转女，大哥刘景桂（字子丹），四姐刘完女，二哥刘景范（字子忠），五妹

刘桂芳，我是老三名景儒，字子珍。

当时，祖父以教学为业，收有学生 80 余人。父亲在镇上开了个骡马店，兼做一些扎纸的活计。母亲王氏在家操持家务，一家人生活虽不宽裕，但衣能遮体，食能果腹，合家欢聚，其乐融融。但好景不长，1908 年春，驻守陕西、宁夏一带的军阀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发生混战，一时土匪横行乡里，搅得各业荒废，民不聊生。为了维持生计，祖父、父亲、母亲带着未成年的三个姐姐一个哥哥，辗转迁移，回到了祖上旧居楼子沟村。

此时的楼子沟村由于年久失修，已是田园荒芜，墙倒房塌，草木丛生，一片凄凉。就在这荒芜人烟的梢沟里，我的祖父、父亲、母亲怀着渴求生存的信念，用勤劳的双手，昼夜不息，平整出土地，种上了五谷杂粮、菜蔬，修葺了残窑破房，饲养起家禽、家畜，使一家人有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我是 1903 年 4 月 10 日（农历）正当午时出生在楼子沟村的。在这兵荒马乱、饿殍遍地的饥馑之年，一家十来口的日子过的艰难，祖父、父亲仍然为我的到来高兴。一家人欢天喜地，祖父还给我起了个吉祥的乳名叫庆生子，意味着吉祥欢庆。

（二）童年

从我记事起，家中的事情都是由年过花甲的祖父和善良勤俭的母亲操持着。父亲常年在外为生计奔波，风餐露饮，仍然挣不了几个钱。家中教育小孩，里里外外的照应就落在六十多岁爷爷的肩上。爷爷在空闲时，教我们读书认字，我六、七岁时就跟着大哥、二哥他们一道念会《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字》、《朱子家训》等。爷爷不仅教我们学习知识，更教我们如何做人。

记得有一天，祖父把我的大哥刘志丹叫到跟前说：“你也长大了，应该有个打算了”。大哥问爷爷：“我能干点啥？”爷爷说：“你看见咱们门匾上的那几个字吗？”“是不是耕读传家？”“对，那就是咱家的传家真言。”爷爷看着大哥懂事的样子，解释道：“人生在世有两件大事，一是耕地种田，不管什么人都要吃饭，不种地，哪来的粮食；二是读书，不读书，不识字，不懂天下事，更不要说做官了，做为人民办事的清官，而不是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贪官污吏。所以，我想让‘耕读传家’这四个字世代相传。”爷爷的话语像一粒种子，深深扎根在大哥求知与正义的心田里，也震动了小小年纪的我。这以后，爷爷更是省吃俭用，用积攒起来的钱，陆续把大哥送到永宁山小学、榆林中学读书，实现他老人家的诺言。祖父、父亲都是清朝时期的文人，他们接受孔孟礼教最深，对子孙要求特别严格，他们经常教导我们：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坚；人将礼乐为先，树将枝叶为园，非礼者何为人也；凡家庭之事，父在前，子不言；男有三纲五常，女有三从四德。这些做人的道理，当时我虽不能理解的很清楚，但人人要学知识，懂道理，服从父母，尊敬长辈，以礼待人，以义交友，知甜知苦，善体人心等，在我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我常想，人比动物要聪明，动物尚有跪乳之恩，我一定要在外知书达礼，通晓人情礼义，在家孝敬老人，尊兄爱弟。在行动上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以下规矩：

1. 对老人兄长说话要和气，老人说的对应该照办，不对的，也不应当面顶嘴。
2. 吃饭时，不能和老人平起平坐。
3. 是长辈和客人谈话，晚辈不能插嘴。
4. 尽力侍候长辈，清晨起床，给长辈叠被子，打扫卫生，端

洗脸水，倒尿盆。

童年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每天天不亮，就跟着爷爷上山去砍柴，后来家境好了，又买了几十只羊，一头小毛驴，我就跟着别人家的大人一道上山拦驴放羊。当时家中生活还算可以，每天早上小米饭，中午吃谷面疙瘩，晚饭是小米米汤，谷面窝窝头，三天五天吃一顿荞面，十天半月的还能吃一顿白面馍馍。只是穿的比较困难，三年一件粗布衫，五年一件旧棉衣，而且往往还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衣服补丁叠补丁。我每天放羊总是穿着补丁衣服，没后跟的鞋，常常是人在后面，鞋已跑到前面去了。遇到天阴下雨，只好光着脚板放羊，漫山的狼牙刺，一不小心扎进脚里，痛得好多天拐着走路，还往往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

在我的记忆中，小的时候我有几次比较大的灾难：

记得有一次，我的父亲出门在外才返家，母亲让我到三里远的小毫子沟去提水给父亲熬米汤喝。那时正值早春，陕北虽然天气冷，但河里的冰已开始消融了，我踩着冰顺沟往里走，一不小心把冰踩破，掉进水中，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冰面，走了一个来回，把水提回家时，腿脚都冻麻木了。

还有一次，我去草圈子给驴提草，人小筐大，看不见前面的路，一不小心踏翻了木桥，掉进了几丈深的寨子沟，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后，才发现躺在自家的炕上，一家老小正围在床边着急呢。所幸的是我还小，没有落下什么残疾。

最让人难忘是我九岁那一年的冬天，有一天，我跟二哥刘景范一道上山拦羊，回家走到吕渠沟砭时，我们和邻村的几个小孩分路，为了把羊隔开，二哥让我到前面拦着，谁料山头上的羊乱跑，把磨扇大的一块石头踏了下来，紧靠我的头皮掠过，把我击倒在山沟里，顿时，我头部血流如注，人事不省。直到第二天下

午，我才清醒，问妈妈，妈妈告诉我，石头把我的头砸了一个坑，脑浆都出来了，是她和大哥把我背回来，赶快请来了医生，要不然早就没我了。妈妈哭着说：“孩子啊，你这是捡来的一条命啊。”这次要命的灾难，使我在床上躺了好长时间，至今头上还有一个深陷下去的坑。

顽皮是孩子的天性，它对每一个孩子都是公平的，我童年时期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艰辛的生活并没有压抑我的天性，我小的时候调皮也是比较出名的。记得有一次，我想了半天，用毛笔杆做成了一枝气枪，我把笔杆两端削光，把纸揉成团，蘸水后塞在笔杆两端，然后用一头较大的竹棍用力将一边的纸团顶向另一边，顶到一定程度，里面的气压迫使纸团急速冲出，又刺激又好玩。有一次，我趁姐姐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的举起气枪，射在大姐脸上，她的脸上顿时红了一片，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拼命追我，无奈她的脚小，无论如何追不上我，只好叹气作罢。

还有一次，我用红柳条弯成弓，高粱杆套上玉米芯子做成箭，见鸡射鸡，见狗射狗，玩的不亦乐乎，还自鸣得意的吹嘘自己的箭法百发百中。二哥听了，不怎么相信，就对我说：“我站在四十米远的地方，若能射中我，就算你好箭法，如果射不准，以后就不要玩这个了。”我答应了。他站到四十米远的地方，说来也真是凑巧，我那一箭不偏不歪射在了二哥的头上，他气火了，赶来折断了我的弓箭，还警告我以后不许再玩这类东西。

在家里，由于兄长的管束，不能随心所欲的玩自己想玩的东西了，但顽皮的念头一刻也没有消失过，有事没事总想寻个玩法。有一次，我们楼子沟村的小孩结伴上山放羊，远远望见对面山上来了高老湾村放羊的孩子，我们商量了一下，齐声喊道：“高老湾，崮头尖，毡匠的老婆嫁神官”，对面山上的小孩一听，

骂到他们头上了，也就大声对骂起来。高老湾人辈份高，毡匠的老婆论辈份我们叫大奶奶，对面和我们骂架的小孩也是我们叔叔辈的，但小孩玩起来就管不了这么多了，骂着骂着就扭到一起。我们人多势众，一下把高老湾的叔叔们打的落荒而逃。又有一次，我们商量着要和瓦社村的放羊小孩打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故意把羊放在瓦社村的草地上，还骂人家不懂规矩，结果是一场恶战，由于人少，被瓦社村的小孩打得满山乱跑，拦的羊、放的驴也顾不上了，结果让狼给吃了。为了交差，我们只好告诉家里大人：“瓦社村的孩子打了我们，把牲口追散了，驴也让狼吃了”。大人听后十分生气，急忙派我的二大去瓦社村讲理，要人家赔牲口，瓦社村的人听说后，为了息事宁人，杀了一只羊，请我二大吃了顿饭了事。

山里的娃娃，除了上山放羊，下地干活，还能干点什么呢？人常说无事生非，没事的时候，我们总想生出点事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把羊赶到山上，远远看见一个年青媳妇骑着小毛驴向这边走来。我们商量后，先在大路上挖个坑，上面盖上一层草，在草上再盖上一层薄薄的黄土，按上两个鞋印，然后躲在路边的草丛中看“西洋景”。不一会，小媳妇过来了，不偏不歪，毛驴踏进了土坑，小媳妇尖叫一声，被甩在路边，弄的满头满脸都是灰。等她骂骂咧咧的爬起来，我们早已跑的无影无踪了。

儿时的顽皮是欢乐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但因顽皮带来的尴尬也是时常发生的。一次，羊放到山上，我们分成两拨玩打寨子，一队守城，一队围攻，守城的站在山岭上用土块往下扔，攻寨子的头顶着衣服拿着拦羊铲子往上攻。一刹时，土块横飞，杀声震天，正玩到酣处，“守城兵士”远远看到羊群大乱，两只狼

在羊群中横冲直撞，我们立即偃旗息鼓，奔向羊群，等把狼赶跑了回来清点羊时傻眼了，羊群少了两只羊，怎么给大人交代呢？我们愁得要死，想不出主意来。后来，还是二哥年龄大点子多，他告诉父亲是因为这两只羊贪吃庄稼，离了羊群，被狼吃掉了。一顿打是免掉了，可是好长时间，我们都不敢玩这个倒霉的攻寨子游戏。

（三）丧母

我十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23年5月的一天，身怀六甲的母亲就要分娩了，是难产。从早上一直折腾到晚上十点左右，孩子生下来了，大人却因流血不止而昏迷不醒。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只能让接生婆用土办法治疗，先是将陈醋喷在烧红的铁板上，用冒上来的白烟薰病人的鼻子，后又将母亲的头发提起，用凉水浇头顶。就这样整整糊弄了三四个小时后，我的妈妈终因“血迷”而走完了她那短暂而艰辛的一生，抛下我们姐弟八人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一岁。

母亲从1882年嫁到刘家到1923年去世止，由一个豆蔻少女到八个孩子的母亲，其中经历了多少磨难，有过多少辛酸，刘家偌大一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衣食住行都要妈妈操心。在我记忆中，每天天不亮她就匆匆起床，推磨滚碾子，准备一家人一天的饭食，一家十来口穿衣穿鞋，缝新补烂，还要收拾菜园子，一天忙到晚，没有闲的时候。

母亲没有文化，目不识丁，但她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理，心地善良，任劳任怨，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其行为品德众里乡邻无不交口称赞。当年，大哥刘志丹为寻求真理，到榆林中学读

书学费不足，她卖掉了全部陪嫁首饰为大哥凑足了学费。作为母亲，她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献出了一切，包括她的生命。

母亲去世了，全家人悲痛万分，年迈的爷爷老泪纵横，好多日子听不到他老人家爽朗的笑声和油灯下娓娓动听的教书声。父亲的悲痛自不言说，最难过的恐怕要数我们弟兄姐妹几个，尤其是我和年幼的五妹。在最初的半年里，我每天除了哭，就是干活，整天没有一句话。

突然丧母带来精神上的打击，随着岁月流失逐渐平静了，但生活上的困难带来的拮据却是无人能够弥补的。妈妈去世后，我们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当时，几个姐姐已经出嫁，成了人家的人，剩下我们几个，衣服鞋子破了无人缝补，经常是冬无棉、夏无单，山区条件差，我和年幼的五妹经常是破衣烂衫，虱子、虬子滚蛋蛋。

眼看着一家人吃穿无着落，父亲只好将尚未到婚龄的二嫂接过了门。二嫂年龄虽小，却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老话，她特别能干，小小年纪就承担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从早到晚，缝新补烂，推滚碾磨，再加上门客张万银一家人的帮助，我们总算是凑合过来了。

（四）青少年时代

民国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我十五岁了。那一年闹了大灾，正到收庄稼的时候，蝗虫从天而降，所到之处，铺天盖地，庄稼一扫而空，农民辛辛苦苦劳作半年，颗粒无收。整个陕西普遍无收成，农民叫“黑籽老年成”。到了民国十八年，更是举国饥谨，饿殍遍地。

这些年，我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到开春，我们就到山上去捋榆钱、挖苦菜，除了当时拌粗粮吃之外，多余的晒干留着以后吃。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父亲打发我和大哥驮着羊皮去靖边县的宁条梁镇换粮食。快到榆林县时，我对大哥说：“你上学没学费，干脆在榆林把羊皮和驴都卖了，给你交学费。”大哥说：“父亲知道了怎么办？”我说：“你别怕，有我呢。”大哥去了榆林后，我独自一人赶往宁条梁镇和等在那里的父亲会面。父亲问我：“你们赶的驴和羊皮哪里去了？”我说：“爷爷卖了，给大哥交学费了。”父亲见说爷爷给了大哥，也就不说什么了。粮食没换成，一家人陷入了饥饿之中，从不为半升米折腰的爷爷告诉二哥：“实在不行，就去我的门徒那里借些粮食回来，凭我这老面子，他们是不会拒绝的。”二哥照爷爷说的先去塔儿湾的蔺玉文家里借了五十元大洋，然后又到爷爷的门徒那里去买粮。这一次爷爷估计错了，在这大灾荒年里，宁给穷人一块钱，不给穷人一碗米，地主老财那里虽愿意把家中的粮食卖出去，但因是自己的老师，无法卖高价。所以二哥所到之处，均说家中无粮。二哥受了委屈，咽不下这口气，看着挨饥受饿的一家老小，决定铤而走险。他回家和众人一商量，第二天就带了几个穷家小伙子赶上毛驴到野鸡山村的老财主家，一进门就说：“我们买粮来了”。“没粮，”“好，你说没粮，那我们只好自己动手了。”二哥早了解到地主家的粮食埋在后山的地窖里，他当即将人带到后山，挖出十几石粮驮到老财主家，问：“现在你们说，这究竟是不是你们的粮食，是，我给你们钱，不是，我就驮走了。”地主老财一看着急了，忙说：“是我们的，就这一点粮，你们拿一些，给我们留一点吧。”最后，二哥按一元钱一升粮的价格付给老财，去的几户穷人每人驮了一石。就这样，靠这一石粮和着野菜，一家人度

过了饥荒。但我敬爱的爷爷在这“黑底子老年成”里，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折磨，患重病不治而亡，享年七十三岁。爷爷的去世，对我们打击特别大。我们不仅失去了疼我爱我，伴我们度过一个个春夏秋冬的爷爷，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教我们做人，在危难之际给我们寻找出路的师长。父亲更是悲痛欲绝，在祖父的葬礼上，父亲重孝在身，孝衣的胸襟上写着十七个大字：哀哀我父，生我之功劳，欲报之德感天罡极。以表达对祖父的思念之情。

灾年刚过，匪祸又至。国民党陕北榆林镇守使井岳秀部团长赵立成率领的骑兵一、二两个营驻扎在陕北吴起县，整个一道川的乡亲们遭了殃。土匪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为。驻扎在金汤镇的骑兵第二营，人称“马二营”，营长姓康，下辖两个连，坏事干绝。袁石洼住了一个连，窖子湾住了一个连，他们白天回营，晚上出来放枪，霸占群众房屋，奸淫农家妇女，百姓十有九家不能安生，怨声载道。当地乡绅联名上告到井岳秀那里，井岳秀下令骑兵团长张鸿儒围剿赵立成团。当时我父亲在张鸿儒团任骑兵第四连连长，也参加了这次围剿“马二营”的战斗。这一仗虽然不是什么大的战斗，但对当地群众来说却是一件大喜事，大家奔走相告，个个喜形于色，鼓舞了战士的斗志。这一仗打的非常漂亮，天公也作美，战斗一打响，天下起了大雨，洛河水咆哮而下，将匪兵的两个连隔在两岸，张团两个连分别从两侧发起进攻。敌人为了集中兵力抢渡洛河，被水冲走大半，加上张团兵强将勇，匪兵几乎丧失殆尽，只得匆匆向东逃窜。

这些年，我也逐渐学会做庄稼活了。每天天不亮，跟着帮工张万银大叔上山干活，犁地、抓粪、锄草样样都行。记得1928年秋的一天，我在地里劳动完刚回到院子，就听见一位操着南方

口音的男子在说话，我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位身穿兰大褂的男人，头戴瓜皮帽，手提小皮箱，正笑咪咪的望着我。我说：“你是哪里人，来找谁？”他笑了一声说：“我就找你，你叫庆子。”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大哥回来了，我高兴的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往窑里拉，一边喊：“我大哥回来了！我大哥回来了！”家里人听说我大哥回来了，都从土窑洞里跑出来，拉着大哥的手问长问短。原来，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由党组织派到于右任部政治处工作。后因需要转入冯玉祥部，冯即派他到宁夏马鸿奎部任政治处处长之职。不久，国民党政府下令清党，我大哥被清出部队押往南京政府请赏。火车行至河南的驻马店停车加煤之际，他们一行三十多人趁机逃跑，找到上海党组织，由组织派往陕西渭南的许权中部，组织策反。策反失败后，这才回到家中，准备暂避一些时间。第二年六月份的一天，院外拴着的大黄狗咬的很厉害，我出去一看，见沟对面的老梨树下躺着一个人，我跑过去问他姓啥，他说：“姓李叫李秋阳，是个教书先生”。接着他又问我这儿有没有个叫刘敬恒的人，我说没有。回到家里我将此事给大哥一说，大哥二话没讲就往外跑，不一会就把那个姓李的先生请回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此人是谢子长。谢子长在我家住了近半年时间。十月间，大哥投到金佛坪张廷芝门下做张部的策反工作。张廷芝不知大哥的来意，给他封了个团副，官位仅次于张廷芝本人。虽然官位显赫但由于张部官兵大都是张家的亲戚，工作非常难做，再加上大哥平时接人待物和藹亲切，时间久了，引起了张家的怀疑，想在适当的时候拘留我大哥。有些士兵暗地里告诉了他，他只好离开了张部。1929年春，我的大哥刘志丹和谢子长一道赴宁夏，投奔苏雨生部，苏即任命大哥为一旅旅长，大哥将此职务让给谢子长并和谢一起回到陕北吴起县三道川练兵。三道川

是吴起县的一条拐川，邻近甘肃省界。刘志丹把谢子长的旅部安在三道川的水泛台村，他只身一人前往甘肃的庆阳县，在驻扎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那里，混了个骑兵第六营营长职务。不久，刘志丹召集到四五十人，十余匹马，十几支枪，他把一个营分为两个连。一连连长刘兆庆，二连连长芦仲祥，赵子实为副官。谢子长也从宜川收了土匪武装一百余人，都是好枪好马。经改编后，任周维奇为营长，住在三道川齐家桥村。刘志丹在齐家桥寨子上搞了一个兵工厂，从河南洛阳招了几个技术工人，工资靠收畜税解决，我和表哥王兆基、孙向奎负责收税。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国民党守军张廷芝大为吃惊，他趁刘志丹去陇东开会之际，千方百计拉拢周维奇。他把周维奇请到自己家里好酒好肉尽量款待，还把自己的亲妹子许给了周为妻，周经不住张的诱惑，答应为张效力。不久，张即提出向周借二十多人、马、枪，到宁夏下马关搬兵。同时，张将周诱上寨子软禁起来，并要他把枪马全部上交，否则就枪毙他。周即下令手下的士兵全部缴械，张廷芝派人搬回兵马，横扫了水泛台村，谢子长逃到楼子沟村才得以脱身。我大哥从陇东开会回来，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了永宁山，躲在曹立如、王子宜那里，转入了地下工作。

这些年里，受大哥闹红的影响，一家人也是东躲西藏，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十九岁的那一年，父亲看我已长大成人，经媒人说合，给我娶了本县旦八镇曹家河村曹士俊的女儿为妻。妻子名叫曹番兰，出身大户人家，长的清秀利落，是小家碧玉式的女子。她生性怯懦，胆小善良。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孩子长到六个月，不幸患病身亡。这时，刘志丹的部队已扩大到四、五百人，并上至甘肃的南梁、华池、合水，下至陕西的淳化、耀县、富平，形成了我党的游击区。后加上由闫红彦从山西

带来的二百多人，共六百余人，组成了抗日反帝同盟军，下设两个支队，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二支队队长由刘志丹兼任。当时这支队伍情绪很高，到处打胜仗。1932年2月6日，队伍开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家塬细嘴子村，谢子长提出要求整顿队伍，并提出要处理二支队一大队的队长赵二娃。刘志丹不同意，谢子长一意孤行，采用极不光明正大的手法，把刘志丹扣留起来。然后将队伍集合在打麦场上，谢子长一声令下，闫红彦、白锡林一起动手从背后枪杀了赵二娃、谷巨山等数人，并缴了二支队的枪。当时形势严峻，人心涣散，连谢子长本人都感到无法收拾。当晚，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带着全部人马逃离了三家塬，谢子长只好带着几个随从匆匆回到陕北。就这样，一支正在成长壮大的革命队伍葬送在自己人的手里。陕西省委知道情况后，立刻通知刘志丹前来汇报工作，工作汇报完毕，省委指示刘志丹重整旗鼓，壮大队伍。刘志丹立刻回到南梁，他的部下听到消息纷纷赶来，很快就召集起六、七百人，省委指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刘志丹任师长。四十二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在陕甘边界开展了游击战争，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到一九三四年元月份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国民党驻陕西军阀杨虎城急派部下杨子恒师长进行围剿。当时，红军在甘肃的盘克塬一带活动，因两军兵力悬殊，红军寡不敌众，只好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杨误以为红军基本消灭，遂留仇良民一个团清乡，其余撤回西安。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军在桥山一带集中一千多人，北上保安县的杨青川、刘家砭住了一晚。此地离我家只有三里路，大哥没有回家，家里人怕带来麻烦也没有去看他。我们一家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搬到高老湾村，住在一个叔叔家中。住了两天，我的孩子出生在人家的厨房里，是个女孩。这里的人讲究大，男人

一个月不能进厨房，只好由我来担水、劈柴。人多吃水多，加上水又远，我实在受不了，只好和妻子回到楼子沟，住在窖子里。因回来的路上风沙太大，加之妻子分娩不久，回来后就一病不起，每天高烧不退。过了十几天，眼看一天不如一天，我只好捎话给家里人，家里人一边给妻子的娘家捎信一边匆匆赶来，等请了医生来，人已经不行了。过了三天，我岳父母赶到，妻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妻子过世后，面对我家这样的处境，出世不久的女儿只好交给孩子的外婆带。孩子养到八岁，我的岳父母家因是个有钱人家，被红军赶的上了旦八寨子。寨子里没有一点水，就靠着窖水和雨水生活，环境恶劣，大人小孩病了几十个，我的女儿就在那次灾难中离开了我。

大哥刘志丹的队伍作战英勇、攻无不克，不断取得胜利，使仇良民匪团闻风丧胆、大为惊慌，加快了围剿的步伐。1934年4月，陇东民团团总谭世麟派出他的儿子谭杰侯，带领一队人马直奔我的家乡，刨了祖坟，捕杀了家门亲朋。一次活埋我家的亲朋就有十几个人。后来，红军枪杀了谭世麟，为陇东人民除了大害。

（五）参加游击队

我未参加游击队时，红军到底干些什么，我不太清楚，尽管大哥经常讲，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中国劳苦大众，但我真正理解还是参加红军后的事。1934年3月的一天，保安游击队来到我的家乡，在大哥的影响下我参加了游击队。刚到游击队，看到游击队员们穿的便衣破烂不堪，但是所到之处纪律非常严明。有一天，队伍开到一个村庄，正下着大雨，战士们冒

着大雨站在院子里，直到管理员把房子分好后，才按规定住进去，谁知刚住下不久，发现了敌情，又立即投入了战斗。这样，有时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那时红军处于创建时期，走到哪里，土豪劣绅要跑，老百姓也要跑。他们跑了我们的饭还是要吃的，每次队伍开拔之前，总是把院落打扫的干干净净，用过老百姓的东西也是折价算好，把钱放在锅里。时间久了，老百姓对我们有了认识，有了感情，见了我们不但不躲，而且非常热情，主动帮助我们。有一次，我在保安县北岭侦察完敌情回南梁，在吴堡川的双庙村吃过饭后，向后台走去，正走着发现山梁上有个农民连声问我是谁，我没有理他，继续往前走，突然发现那人正对着我使劲扬土，我觉得事情不妙，慌忙躲开，才发现后台上已住满敌人，后来经了解才知道那里驻扎了敌军一个营。敌人的一队人马向我刚走过的路上走来，我只好顺着山梁往上跑，敌人发现了我，不停的向我射击，我慌忙向对面山上跑去。这时天渐渐黑了，我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吐了一口血，只好原地休息，等天全黑下来了，我才摸黑向后川走去。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军民的鱼水关系。

旦八寨子是保安西区一个很险要的寨子，盘踞着大地主曹俊章，他是这一方的民团团总又是西区的区长。他独霸一方，辖二十多个村庄，几十个佃户，他对红军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经常带领民团追剿红军游击队。一九三四年八月，南梁军事委员会下令保安游击队攻打旦八寨子。在这以前，陕北游击队在刘约三的带领下，曾拿下了旦八寨子，但由于没有彻底破坏，游击队撤走不久，反动武装又驻进了寨子，加固了工事，增强了兵力，攻打寨子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一百多人由南梁动身，火速赶到樊家川的玉河村。一到目的地，我们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造了三架

云梯，连夜出发，鸡叫头遍赶到旦八寨子。先派了二十个敢死队员往上攻，云梯刚一搭上去，就被守寨的哨兵发现，惊动了正在吸食大烟的曹俊章，一场激烈地攻守交战开始了。因敌我兵力悬殊，地势险要，如果强攻，红军势必伤亡惨重，只好放弃攻打寨子，迅速撤离了旦八。

一九三五年二月，马鸿奎抽调大量的队伍进攻南梁根据地，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调我回南梁组织政府领导人的家属转移。习告诉我，边区政府向东转移大约到甘泉县的桥镇一带，我们可在那里会合。我随即组织边区政府家属约七、八十人向东转移，走到豹子川的双塔沟掌时，天黑了，我找了个烂窑照顾家属们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准备翻山向东走时，发现山岭上似有“马回回”的骑兵在来回走动，我命令家属就地休息、不要乱跑，并监视敌人的行动。一连几日，敌人还是不断巡逻，没有撤走的意思。我们带的孩子多，乱哭乱叫，很容易暴露目标，而且又驮了大量的粮食，行动十分不便，形势比较严峻。当晚我召开了干部会，对大家说：“现在看来我们是一时半会走不了，明天我们要着手处理两件事，一是明天早上吃过饭，带小孩的妇女自己找地方先隐蔽起来，如果被敌人发现，不至于大家跟着受害。二是带的粮食要尽快搬到梢林里埋起来，平时吃一顿拿一顿，不能让敌人发现，其余的人鸡叫起来吃完饭立即上山，晚上天黑尽快再回来”。第二天我们就按这个安排行动起来。谁知过了两天出了事，我们窖的粮食全被野猪吃光了，大家闻讯，哭的哭，闹的闹，乱成一堆。我劝大家：“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明天我们就去大东沟找赵老五，赵老五是我大哥的朋友，他会给我们想办法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先派一个精干的小伙子上山侦察敌情，随后我们一起直奔大东沟。当天晚上，我们在油房头川住了一晚，第二天

正准备往川里走的时候，遇见一个收木耳的，我们打听了一下前川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不能去那里了，昨天“马回回”的骑兵来把边区的医院踏了，杀了两个伤员，据说其中一个是团长。听到这种情况，我们不敢再往前走了，只好领着大伙翻八卦寺山到东梁沟找了几孔破窑暂时住下。没有粮食怎么办呢？年老的抖抖粮口袋煮点汤喝，年青的在梢沟里找一些树花、木耳充饥。凑合了几天后，人就无法行动了，有的到晚上眼睛看不见路，当地群众叫“鸡蒙眼”，大家都守在我的跟前，看我怎么办。为了度过难关，我带着张明玉从东儿沟出发，路过瓦子川，到了黄家坪村，我看那里的情况不错，老百姓都在地里劳动，便向老乡要了一点干粮，打听南梁政府的消息，老乡以为我们是敌军的探子，不肯告诉我们。我们只好告诉老乡我们是南梁政府的工作人员掉了队，并把南梁政府领导人的情况讲了一遍，他们相信了，领我们走进对面的拐沟里。刚一上山，就看见远处有一个寨子，老乡对我们讲，就在寨子里，你们去吧。我们刚走了几步就听见哨兵问：“什么人？”我赶快报上自己的姓名，哨兵认识我，我上了寨子见到了习仲勋。习一见我，先问：“干大怎么样？”（指我的父亲）我说“还不是一样受罪。”习主席马上说：“明天一大早，我就派人把你们送到洛河川苍沟马大爷那里，他和你大哥捻过香，是拜把子弟兄，为人可靠又有粮，你们暂时住在那里。”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家全部搬到了苍沟马大爷那里，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

安排好家属后，我回到了边区政府，担任桥镇区助理员。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秋，经别人说合，我娶了志丹县永宁区柳沟白家的女子白玉莲为妻，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生活，这次不幸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就结束了。

为了肃清甘泉县与保安县之间的反动武装，加强二县之间的联系，边区政府决定攻打永宁山。边区政府和甘泉县、保安县的赤卫队加起来共有一千余人，这一千多人全部被布置在永宁山的各个山头上，并且插满了红旗，永宁山寨子上驻扎着国民党高玉廷的一个连，他看到漫山的红旗吓破了胆，赶快带着他的喽罗弃山而去。我们没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打得干净利落。进到寨子后，我们吸取打旦八寨子的教训，把寨子拆的一塌糊涂，动员寨子里住的老百姓回到自己家里，从此，这里再没有驻扎国民党的部队。群众高兴极了，再不用送粮送草，交纳苛捐杂税了。

当时，我的大哥在红二十六军任军长，二哥刘景范任边区政府军委主席。这一年，红二十五军被国民党刘湘部打得站不住脚，七月份经陕西进入陕北苏区，我大哥命令习仲勋、刘景范前往迎接，行至永宁山后与红二十五军会合，遂安排驻扎在桥镇的新庄河村。我慕名前往观看，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出入都得坐着人抬轿子，这和大哥平日的作风截然不同；二是军部所在地戒备森严，官兵之间等级清楚；三是大哥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决不打骂士兵，有事在会议上解决，而红二十五军士兵稍有不对，立即拳脚相加；四是红二十六军坚持官兵一致，不搞特殊，领导碰见伤病员经常把马让给战士骑，而红二十五军领导则处处以官长自居，处处搞特殊化。这些问题我一直疑惑不解，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才使我幡然醒悟。红二十五军在桥镇住了两天后，开到延川县的永坪镇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不久，陕北的一些野心家为了夺权，无中生有，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串通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到处扬言陕甘红军走的是富农路线、梢山主义、成份不纯等等。并以西北

军委的名义，立即推行了一条肃反扩大化政策，将原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的干部统统扣留暗杀，担任过县长的也统统杀掉，地方群众中，中农被批斗、没收财产，地主、富农被封门赶上山。不久，红二十五军的西北保卫局将陕甘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习仲勋、高岗、张秀山、刘景范等全部押往瓦窑堡。同时，西北军委以调刘志丹来瓦窑堡开会为名，其实想逮捕他。我大哥走到半路，正碰上西北军委的通讯员，他把逮捕刘志丹等几名高级军官的通知给了志丹，大哥见是逮捕他的命令，立即将信交给通讯员，嘱咐他赶快送到十五军团部，自己又坦然向瓦窑堡走去。好长时间没有大哥的消息，我抽了个时间到边区政府去了解情况，去了一看，全是生面孔，而且还有西北保卫局的人穿着黑衣服，手里提着大刀，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我就感到事情不妙，恰在这时，边区政府财委的杨在权同志过来了，他一看见我，立即向我摆摆手，意思是让我快走。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有了察觉。回到家后不久，就看到我二哥的警卫班长郭子贵匆匆赶来，一进门，他就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吧，二十六军的领导都被二十五军给扣了，我和刘主席（指我二哥）到王家坪去开会，几天没见他的面，我去问人家，人家把我抓了起来，用麻绳捆着，又泼了凉水，麻绳见水紧的要命，两天两夜不给我们吃喝，第三天才放了我，你们不能在这里住了，赶快到梢林里去吧！”说完后，他就走了。这时候又发生了赤安事变，我们只好躲进山里。直到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陕北，才释放了我的大哥、二哥，我们也从梢林中走出来。中央军委任命二哥为赤安（当时的保安）、安塞、吴起三县的军事部长，由他指挥三县的武装部队，消灭叛徒武装，平息赤安事变。

(六) 长兄阵亡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华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也加紧围剿革命根据地，为了打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粉碎国民党的封锁阴谋，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总司令，周恩来同志任后方办事处主任，率领红军一万余人分三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同时，刘志丹任北路军总指挥，率领红二十八军，从陕北神木的坡头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大哥刘志丹的队伍一渡过黄河就投入战斗，一路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迅速逼近阎锡山部占领的三交镇。眼看东征抗日的道路就要打通，不料在四月十四日的一次激战中，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刘志丹将军、我敬爱的大哥不幸阵亡了。我当时在桥镇区给前方准备给养，听到消息后，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哥啊，你为革命出生入死，舍家抛口，流血流汗，受了多少委屈，赢得多少人对你的爱戴，你的英名使敌人丧胆，使奸佞小人失色，敌人害怕你，人民爱戴你，你死得伟大、死得其所，只可惜你英年早逝，怎能不让人痛断肝肠。我不断回忆着和大哥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多少日子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就这样，还得自己默默忍受，不敢告诉父亲。过了几日，马锡五通知我，让我去瓦窑堡参加大哥的追悼大会，我把家安排好，去了瓦窑堡。第一天，军委的张参谋长接待了我，第二天，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他告诉我：“因为形势紧张（当时东北军正大肆进攻边区），我们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怕坏人知道，烈士的遗体我们也偷偷埋葬了。刘志丹同志和我是黄埔军校时的战友，他的

牺牲不仅是家庭的损失，更主要是党、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我们会永远怀念他的。你是志丹同志的亲弟弟，应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他还嘱咐我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去找他。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一席话，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在以后的工作中，成为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七）风风雨雨的二十年

一九三六年六月，我把全家搬回老家楼子沟安排好后，又回到保安游击队。就在这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黄克强是游击队队长，任我为游击队中队长。七月份，刘约三领导的蒙汉骑兵团回川剿匪，新招了几十名战士，把我从游击队调去，担任新兵连连长，随即开往定边驻扎。不久，大土匪段宝山率众匪出没于宁夏盐池县的三段地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做，三边司令部下令蒙汉骑兵团立即剿匪。我骑兵团二百多人星夜出击，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敌营，打得敌人落荒而逃。这一仗，我们缴获了敌人三十多匹战马，二十多支快枪，打了一个大胜仗。

骑兵连的工作非常苦，每天除了出马操、练基本功外，还要喂马、给马洗澡、遛马等。我从小身体较弱，在这里干了一年多，就支撑不住了，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志丹县抗敌后援会工作，半年后，调县工商联任主任。在这期间，即一九三八年，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在志丹县妇女联合会工作的张清文，即我现在的妻子。她是陕北安定（子长）县人，自幼家贫受苦，早年投身革命，十四岁加入陕北红军少年先锋队。一九三五年赴西华池任青救会干事，旋又赴曲子青年训练班进修，一九三六年入延安鲁迅

师范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经组织选送到延安西北党校深造，在这期间，她多次接触我的大嫂、二哥、二嫂等，对他们有了较深的印象。一九三八年组织分配她到志丹县任妇联会主任，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发现她不仅模样俊俏，而且聪慧贤淑、刚强豁达，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女人。这些看法，在以后的几十年共同生活中，在风风雨雨的经历中得到了证实。可以说，和她结为伉俪，我今生无悔。我俩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结婚。婚后一年，就有了我们的女儿，取名叫小娥，她长的很美，人见人爱，只可惜兵荒马乱，孩子有病，无处求医问药，八个月时死于高烧。

1942年，开展了全面整风和反右斗争，当时的口号是宁左勿右，宁冤枉十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全县共有一百零六户工商业户，经过整风就发现有九十五户程度不同的存在一些问题。县委书记王耀华领导县工商联组织的这次整风运动规模很大，同时也明显带有左的倾向，特别在方法上动用了车轮战、罚站等手段，迫使一些人给自己捏造罪名，什么三青团、蓝衣社，只要能过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记得当时县委分配来一些女大学生，让她们交待问题，开始她们什么也不讲，后来工作组把她们拉到厕所里，头按在粪坑里，老半天不放上来，她们被迫“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被关了起来。我当时是街道工作组的组长，看出这里面有些问题，就劝王书记步子放稳一些，方法用妥一点。正在这时，中央发来了纠偏的文件，这才稳住了局面。这次运动过后，我们着手组建联合商店，动员有钱的商业户积极入股，发展商品交流，扩大经营收入。1944年，我的儿子出生了。为了能让孩子健康成长，我们按当地的风俗，让他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给他起了个乳名叫“百娃”。一九四六年，胡宗南率三

十万大军意欲进攻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边区政府的领导家属和一些参议员转移到志丹县境内。当时，志丹县的局势也比较紧张，所以我就将刚刚组建起的联合商店解散了，股金也全部退还了本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景膺让我去西川组建游击队，同时还让我将大哥的灵骨带到志丹县的金丁乡藏起来予以妥善保护。金丁是我的故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仅用两天时间，我不但组织起了西区游击队，而且还将大哥的灵骨托给一位可靠的家族中人秘密保存。当时游击队有四、五十人，我任游击队队长，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志丹与吴起的交界处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在那个地方我工作了有半年时间，就接到边区政府的通知，让我带着我的老人及边区政府的家属向东转移。

一九四七年七月份，我交了游击队的手续，带领着转移队伍（番号六大队）向东行进。一行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又有敌人追着，每到一地，还没休息，敌人又追了上来，一直追到横山县的青羊岔，敌人就住在离我们不久的苍房梁，下午我们赶到石湾街，找到这里的区政府，向他们讲明了情况。第二天边区政府就派人从子洲县的马蹄沟赶来，把他们的家属和我的父亲接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家属，并让我返回志丹县。后面紧追着敌人，我怎么回去呢？我只好和我的妻子带着儿子住在杨家楼对面的拐沟里，住了两天后，听不到什么动静，我只身一个人跑到马蹄沟，见到我的二哥刘景范。二哥问我家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在石湾下面的杨家楼的拐沟里，他告诉我敌人已到了青羊岔一带，我没敢歇脚，急忙赶回去把家连夜转移到马蹄沟。此后，我还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向东转移，在黄河边的席林峪住着，没有去山西。为什么没有去山西呢？当时主要考虑：一是山西使用的是西北农民银行钞票，我们没有；二是到山西后，没有正常手续吃不上公粮。

我正在考虑下一步的出路，突然敌人追到了沙坪上村，离我们住的地方只有二里多路，我顾不上考虑那么多，只有过黄河了。我们全家赶到黄河边，正好有边区政府被服厂准备好的船只，我们强行上了船，正遇黄河发大水，水大浪急，浪头铺天盖地的砸下来，惊的大人小孩哭天喊地。好不容易过了黄河，在黄河边，我见到习仲勋、贺龙，他们和我谈了志丹县的敌情，特别是听到志丹陵园的破坏情况，贺龙把敌人狠狠的骂了一通，当时敌人的飞机不断向黄河边扫射，我们只好分手了。我和家属们住在河边山上的马家山村。第二天，我找到住在山西七口镇高家坪的边区政府民政所长王子宜同志，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张条子，条子的大概意思是，我是陕西过河的脱产干部，请当地政府给予供粮。我凭此条领了五十斤粮，凑合过着。这个时期，山西正在实行土地改革，贺龙领导了这场运动，组织了贫农团，贫农团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山西地方村子比较大，一村住几百户人，就有一两家地主豪绅，村村的贫农团对本村的豪绅地主进行了残酷的斗争，烧烤吊打，致死人命无数。但山西的老百姓对我们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后来搬到小王家峪村，村里有一家开店的掌柜名叫王崇义，对我们特别照顾，山西枣树多，他就捡好吃的枣树让给我们，平常在生活上也给予一定的照顾。后来陕西的敌兵退了，我们过了黄河又回到陕西境内住在席林峪村，王崇义还专门提着枣子，过河来看我们。这时陕西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进入了土地改革运动，席林峪村的地主老财也被打的死去活来，当时的政策比较左，不少地主一旦被定为反革命就集合群众用乱石砸死，把地主老财的东西都没收到乡政府。我们过河不久，就搬到横山县的付家坪住下，我随即写信询问志丹县情况，不久，分别接到了县长赵玉文、法院院长奥海清的来信，他们劝我暂时不要

回去，因为志丹县也正在搞土改，县贫农团已将刘志丹家、王子宜家、曹力如家、赵耀先家定为四大家族，我家的人都已躲出去了。我只好把家安在付家坪，没有粮吃，借了两个驴回老家去驮，主要还想打听一下消息。回到老家，看见老百姓人心惶惶，贫农团斗争激烈，我偷偷回家驮了两口袋麦子往回赶。一路风风雨雨，吃不好，睡不好，再加上心里害怕，走到安塞的坪桥镇我就病倒了，经郎中诊断是得了重伤寒。多亏了当地的老百姓，动员担架队，一个村一个村的一直把我抬到付家坪。整整几天里我一直是昏迷不醒，到家之后，爱人的哭声才将我唤醒，这一病就是十几天。等病好了一些，我就赶到正川堡，找到了榆横指挥部的刘安堂，独二师的王四海，要求安排工作，他们把我安排在榆横指挥部搞后勤工作。在这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土改中存在着左的问题，信中指出：目前已有部分边区政府的区长和区委书记因被整被斗，携全家投向白区，如这样下去，白区的力量不断壮大，是很危险的。毛主席听取了习仲勋的建议，指示：尽快纠偏，搞错的要赔礼道歉。这样，我父亲一家才回到了延安。一九五二年二月，志丹县县长奥海清来信让我回去安排工作，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一九五三年，国家对干部实行工资制，我当时在县工商科工作，每月工资四十三元，尽管不多，但由于初次拿工资，心里也觉得非常高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也是国家干部了。

1954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我任县工作组小组长，主管工商业改造工作。当时的政策是：改造有三种方式，一是实行公私合营，采用的是定股定息赎买政策。二是实行合作经营，自负盈亏，四马分肥。三是合作小组集体领导，分散经营，自负盈亏。这个政策刚实行不

到两年，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志丹县两家公私合营达不到标准，因为志丹县还没有够得上是资本家的，当时必须满 5000 元才能达到资本家的水平，而志丹县的那两家只有 2000 元资金，因此，这两家公私合营公司改为合作商店。一九五六年，私改工作完成不久，农村实行公社化，耕地归生产队所有。后来又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平调风，农村组织小分队，监督农民劳动，组织批判农民。农民没日没夜的劳动，换来的不是粮食，而是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就这样，一个小县逼死了几十个人，逼跑了上千个人，搞得人心惶惶，私设公堂，自立刑法几十种进行逼供。公社化、一大二公，具体体现在大办食堂，生产队把所有的口粮都拿到食堂一块做着吃。刚开始吃的很好，就连走路的也有饭吃。后来吃空了，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只好集体吃糠，这时政府号召瓜菜代，瓜菜渐渐吃得也没有了，就发动老乡们出主意。我当时是住队干部，召集老乡们开会，他们说，听老人讲过，闹饥荒时，曾经吃过榆树皮、玉米芯子、洋芋蔓子、荞麦柴、芦草根、谷草杆等。我们立即上山找到这几样东西，试吃了一下，虽然苦涩难以下咽，但尚可填饱肚皮。

（八）难忘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先是面上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来进入了片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的是宜君社教团。当时志丹县去了一百多人，我被分到大石畔公社血头大队社教小组任小组长。我住的这个队百分之八十是河南山东人，当地人很少。这里地势险要，旧社会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因此，这个队中有参加过土匪组织的，也有参加过哥老会的，工作非常难做，很

多干部都存在“四不清”的问题。社教组刚一进村，队会计就上吊自尽，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又因为社教组有：一是住贫苦农民家，二是不能吃好饭，三是不能抽社员的烟，四是不能吃社员的瓜果，五是不能同妇女交往等等清规戒律，使得我们举步维艰，更谈不到和农民交朋友，工作进展缓慢。有一次，我去总队开会，讲了血头大队的具体情况，总队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也无法解决，只能在开团会时向上反映，我当即提出调换工作的想法，得到总队的支持，不久，县团就抽调我去河南省搞外调。临行前，我们二十八名干部带着二千五百多份调查材料，在宜君县学习了一个星期，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案子比较分散，河南省涉及调查的有十个地区，任务相当繁重。我们到了郑州后，二十八个干部分为三个组，除我负责四个地区外，其余的人负责三个地区，分头开展工作。我带的十个人分为四个小组，主要在洛阳、许昌、开封、安阳四个地区开展工作。河南人对工作组非常热情，但一涉及到具体情况，就闭口不语，不讲真话。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我们依靠的主要对象是贫农会主任，而这些贫农会的主任大部分在旧社会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坏事，甚至有的人本身就是地主、土匪、恶霸，只是解放后摇身一变成了好人，还有的人是因为破了产，混入了贫农区。这些人一是不敢揭发别人，二是他们本身就和被调查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调查工作非常艰难的进行着。正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始大串联。七月份红卫兵串联来到河南，虽然和我们的工作没有多大的冲突，但却影响调查工作的进度。八月份，文化革命升温，到处揪斗走资派，河南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拉出来游街示众。十一月份我们的工作基本结束，立即给总部做了汇报，总团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宜君县。十二月份，我们回到团部，县委

组织部告诉我们尽快离开，走晚了恐怕要出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上下开始批判刘少奇的桃园经验，社教工作队被认为是刘少奇的工作队。我们匆匆忙忙赶回志丹县，正赶上先期回去的工作队长正在被游斗。我虽然参加了工作队，但由于在县上只是个科长，当时未受大的冲击。

一九六八年，在经历打砸抢和持枪武斗的过程之后，北京大街上贴出“揪出叛徒刘志丹”的大字报，我的二哥刘景范（地质部副部长）被说成是“三反分子”，在接受红卫兵的批判，我的灾难就开始了。先是以我是三反分子伸向志丹县的黑爪牙，进行斗争批判，小会整、大会批，见搞不出什么名堂，又给我强加一条罪状，说我是火烧面粉厂（志丹县在文化革命中发生的一起面粉自燃案）的主谋之一。他们捏造罪名，造谣惑众，从省、地区到县一级立案，把一个本来十分明了的自燃案硬说成是阶级敌人在破坏，欲置我于死地。记得六八年十二月份，也就是我被造反派关押批斗，进行非人折磨近一年后，县军管组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逮捕入狱。直至一九七二年，在各级有关领导的重视下，我才走出囹圄，重见阳光。当时的我，已在狱中被折磨的骨瘦如柴，须发皆白。我在狱中渡过了三年零六个月，遭受的痛苦及非人的待遇是可想而知的。但我在狱外的妻儿老小所受的苦难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被捕后，我的妻子，一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就因和我划不清界限，被关押在市镇居民委员会里，遭到令人发指的折磨。当时正值寒冬腊月，陕北的天气滴水成冰，他们为了让我的妻子交待我所谓的罪行，对她进行了大会批、小会斗，也就是当时盛行的车轮战，不分白天黑夜的折磨，我的老伴并没有交待出一星半点他们需要的材料。为此，这伙衣冠禽兽恼羞成怒，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他们将她关在一间

四面徒壁的屋子里，再灌上齐脚脖的水，我的妻子整整一个晚上就站在这冻冰房里直至昏倒。关押近两个月后，他们放出了奄奄一息的老伴。出来后的老伴没有时间休息，她要出去干活，养活一家人。妻子身体瘦小，外出做工时由于我的政治背景，没人敢要，只好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到一家砖瓦厂去背砖，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胸前吊着八块土坯，整整一天下来，壮汉子都受不了，何况体重只有八十斤的她。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她只有拼命的干，苦苦等待着我的问题得到解决。

一九七二年，我出狱了，政治上的迫害仍然没有停止，他们以文化革命中的不实之词继续对我进行迫害。斗私批修会，我更是首当其冲，不然就会有帽子飞来，就连分配工作都没有人敢要。后来还是县副食公司的贺世永经理将我收留下来。贺经理安排我到延安做常驻采购，我一方面工作，另一方面也可继续向上反映我的冤情，但几年来上压下卡迟迟不能解决。有一次，国家副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到延安视察工作，我找到林佳楣同志，亲手将我的申诉状递到她的手中，她将我的状子看了一遍，告诉我说：“你放心，你的材料我一定交到李主席手中。”后来她真把状子给了李先念，李又交给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胡做了批示后由陕西省委直接进行调查处理。并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在全县大会上对我及受我株连的十一人（其中死亡二人）进行平反昭雪。

（九）我的老年时期

一九七九年，我以六十七岁的高龄调到延安市委，市委书记张士杰同志找我谈话，照顾我年纪大了，让我去市政协工作，问

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有，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张士杰又问我：“你去当个副主席如何？”，我告诉张，我年龄大了，让年轻一点的来干。后来组织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让我担任政协专职常委。

未搞政协工作以前，总认为这个工作没什么好搞的，真正做起来才感到是很不容易的。就日常工作来讲，一是要做好参政议政，政协干部要走出去、请进来，与党外民主人士加强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将他们的意见反映到行政与党务部门，做好政府的工作；二是做好政治协商工作，要和党外人士及各少数民族交朋友，让他们说心里话，“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三是做好提案审查工作，这是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四是多开常委与各小组会议，保证政策落到实处；五是加强民主监督，对政府党委工作人员的非法行为随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六是加强各小组的学习，使他们懂得党和政协的各项政策。十年来我就是按照以上要求勤勤恳恳的工作着，到一九八八离休。

一九八八年离休时，我已经七十六岁了。现在我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回顾自己在革命队伍中几十年，早年由于两位兄长参加革命，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只能靠我一个人照料。后来虽然参加了红军，仍不能一心一意，担负着照顾家庭的使命，在革命过程中并没有显赫一时。但我从参加革命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与中国革命事业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中，即使身陷囹圄，我对革命的信心从未动摇过。今天，在我耄耋之年，我愿把我这不算辉煌的历史粗略勾划出来，以启后人。

1994 年仲秋

爱国爱家更忠党 忍辱负重为人民

——纪念景儒同志百年诞辰

张清文

1995年1月8日，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凌晨5时许，与病魔抗争了近半年，带着对亲人的留恋、子女的牵挂、社会的不舍、国家和人民的情义，我的丈夫、同志、战友——刘景儒同志，最终撒手人寰，安详而带着些许的遗憾，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坎坷曲折、平凡而光辉的82年人生道路。这一刻，我的子女们突然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心疼他们、他们钟爱的父亲了，顿时嚎天哭地，泪如泉涌。女儿从深圳日夜兼程、风尘仆仆赶回时，映入眼帘的是她父亲去世的“岁数纸”已挂在了大门外随风飘逝，压抑的心情霎时一怔，悲痛的泪水随之如悬河般倾泻而下，直扑向院子里停放父亲遗体的窑洞，伏在身上嚎啕大哭。我的三子用已经沙哑的声音通过电话向远在北京、西安等地的亲人“报丧”，次子、四子、五子也陷入无比悲痛之中。

景儒生于1913年4月（农历），他的父亲和母亲生了他们兄弟姊妹8人，继母又生了四弟、五弟、六妹、七妹（夭折）、八妹、九妹6人。因此，景儒姊妹共14人，五男九女。长兄刘志丹（景桂），次兄刘景范，他在男的里排行老三。景儒自幼聪明

好学，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从小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跟着两个兄长学会读《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在我的心目中，景儒是一位“爱国爱家更忠党，忍辱负重为人民”的人。

景儒1934年3月参加陕北红军保安游击队，曾任中队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国家和人民，一切听从党安排。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他都恪尽职守、任劳任怨、脚踏实地、辛勤工作，为家乡志丹县的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工业发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他的两位兄长早年离家出走投身革命时，15岁的他义不容辞的挑起了生产劳动、照顾全家老小生活的重担；当他在兄长的影响下，21岁参加红军游击队后，适逢国民党马鸿宾部重兵围剿南梁革命根据地，受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调遣，景儒临危受命，带领政府干部家属进行转移，钻林过涧，历经劫难，后成功转移到甘泉桥镇一带；当25军来到陕北后大搞左倾路线，对刘志丹领导的26、27军领导人实行大肆逮捕和残酷杀害时，景儒又带领刘志丹家眷和其他领导人家属再次躲入深山老林避免迫害；当长兄刘志丹东征牺牲后，他牢记周恩来副主席的嘱托，一方面在游击队参加作战，另一方面承担起保护家眷安全的任务；当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围剿陕甘宁边区时，他又受命带领刘志丹家眷及边区政府干部家属百余人编成“六大队”辗转陕北千沟万壑，最后才东渡黄河，实行战略转移；当景儒在多次转移中失掉了组织关系时，他仍然不辱使命，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当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景儒担任县工作组小组长，努力工作、严格执行政策，为志丹县经济建设做出

了突出贡献；当志丹县还处在煤油灯照明的情况下，景儒积极与在北京工作的兄长刘景范联系，和县上有关领导一起从地质部属地运回支援老区的一台轮式柴油发电车，成为1958年成立的志丹县发电厂第一台发电机组，改善了机关、工厂和群众的办公、生产和生活条件，从此告别了煤油灯的历史；当贫穷落后的小县城群众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时，景儒顺应民意在县委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奔赴山西召回二十多名演员，组建了志丹县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民蒲剧团”，为志丹县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文革中被四人帮摧残诬陷，冤狱近四年释放后，中央胡耀邦同志为他平反昭雪，他仍然意志坚定、胸怀坦荡，继续努力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当他调入延安工作后，市委领导让他担任政协副主席职务时，被他婉言谢绝，仅做了专职常委，主抓文史资料征编工作，为抢救老区文史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就是我的丈夫，这就是刘志丹的胞弟景儒，这就是一位“爱国爱家更忠党，忍辱负重为人民”的人。

我今年已93岁高龄，是一位有77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和景儒同志一样，也是1934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的老红军战士，1938年曾担任志丹县妇联副主任。1953年大转移回来后，因孩子多、拖累大，就转入市镇居民区工作，一直担任市镇党委委员、镇人民代表、调解委员会主任、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等职，心甘情愿的为居民服务，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回忆陕甘红军时期的三哥刘景儒

刘景星

三哥景儒去世已经 18 年了，我时常想起小时候在家乡的情景。更让人难忘的是土地革命时期，我们一起“跑敌人”（躲避敌人），一起转移的过程。他比我大 12 岁，在家是顶梁柱，后来在南梁，一方面在部队工作，一方面照顾家庭，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事，至今都历历在目。

1934 年，蒋介石调集六个师的兵力，发动对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敌人到处找红军主力作战，红军避其锋芒搞运动战，以期达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大哥志丹决定放弃重镇，钻深山老林摆脱主力，伺机消灭敌局部。敌人找不到红军主力，狗急跳墙，拿红军家属开刀。发通告：凡捉住“匪首”刘志丹奖赏大洋伍佰，捉住刘父及男性家人赏大洋叁佰。敌人大造白色恐怖，家人的艰难日子也开始了，我们度日如年。

1934 年 4 月，大哥带队伍从杨青川进到刘砭停留。大嫂同桂荣知道后，连夜到刘砭去看大哥。大嫂告诉大哥全家人准备“跑敌人”。大哥身穿破棉袄，正在给战士们做饭。大哥告诉大嫂：“马上要打仗了，你赶快回去告诉大大（父亲），尽快到深山老林

偏僻的地方躲藏起来，等我们回来”。大嫂没有停歇，很快回到楼子沟家中，把大哥的话告诉父母。父亲说：“时局不好，先到高老湾躲躲”。

高老湾在楼子沟左侧寨子沟内约二三里地，一条羊肠小道靠牲畜踩出来，村庄住的是大刘家族人，兄弟几人除种十几亩阳地外，全靠弹毛擀毡维持生计，生活并不宽裕。全家人的到来，给主人添了很多不便。三哥景儒也从保安游击队被派回，保护一家人准备随时转移。适逢三嫂曹番兰要生小孩，难产。三哥景儒考虑怕出意外，对主人家不吉利，又将分娩几天的三嫂带回楼子沟家中。三嫂因产后出血不止，缺医少药，不幸去世，三哥非常悲痛，母亲和大嫂回家中料理后事。女婴只好送到曹家河由外婆喂养，后在战乱中不幸夭折。母亲和大嫂强忍悲痛，为逃难准备干粮，炒米、炒面、炒黄豆并蒸了些馍馍带上。在返回高老湾时，父亲告诉家人：“听说甘肃军阀杨子恒部下仇良民就要来抄家抓人，看来此处不能久留，从尔格（现在）起，我们一家人难保朝夕，也可能死无葬身之地，鞋带扎紧，各攀前程，你们都放精巴（灵活）些”。就在全家躲到高老湾不久，仇良民率部队来到附近，为保全家人性命，父母决定分两路逃走躲藏。一路由父亲带上三哥景儒和我去投亲靠友为刘家保住根苗；另一路由母亲和大儿媳同桂荣、二儿媳宗梅婷带七个娃娃进入深山老林躲藏。

父亲临走前在吕渠沟对前来帮忙的六舅刘占奎说：“他六舅，我们一家人朝不保夕，实在令人心焦，无奈何呀！我们准备上安边投靠亲友，探个实情，亲戚多消息灵通便于躲藏也许安全些。”临走时，我因年龄小，不愿意离开母亲，自己跑回楼子沟家中，父亲只好和三哥走了。母亲和嫂子们带着7个孩子（最大的8岁，小的还未满月）骑马、驴驮出发了。翻山越岭来到下罗坪族

人刘廷华哥家，在离村子不远的窖子暂避。风声很快让族人二先生（外号二回子）知道了，他是清末武秀才，脾气坏、下手狠，与民团张廷芝父子有联系，便指示其儿备好骡子，马上送楼子沟后庄的人（指我们）到金佛坪张廷芝处邀功领赏。

这事让其兄大先生知道了。大先生是清末文秀才，祖父的学生，人品好，好助人为乐。他对母亲说：“大嫂子，我看不能去，张廷芝是独霸一方的大地主、民团团总，无恶不作。志丹、景范到处抓捕张六和高慧（张廷芝的六叔和岳父），你们是死对头，去了是自投罗网。”母亲自有主张，心里明白，当然不能去。

第二天，传出二先生的女婿姚玉杰叛变了，他将游击队七八个人带出去准备投靠张廷芝，就住在罗坪村与我们藏身的窖子不远，隔河相望。母亲怕被姚发现，就和嫂子商量，决定把2岁的春梅和未满月的正娃丢弃在窖子里，等天黑三个大人背、抱、牵着五个娃娃出逃，尽快逃到后沟的山水洞里。洞内又潮湿又黑暗，洞顶不停的滴着水，让人根本无处落脚。

第三天上午，刘廷华哥上窖子看我们，看到春梅被毛绳拴在石头上，满脸泥水哭成泪人，正娃饿的睁不开眼睛，其他人都不见了。廷华哥赶紧抱起两个娃娃朝后沟山洞里找，找到我们就对母亲说：“大婶子，你们尽快走吧，小心让姓姚的发现。”母亲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又带着我们连滚带爬的出了山洞下了沟，趟过河进入山中。天下起雨，更让人心情沉重。晚上来到焦蒿梁野狸子沟山窑子的山洞里住下，白天不敢点火做饭，怕敌人发现。晚上给我们煮米汤喝，娃娃们都饿得哇哇叫，又怕敌人听见。大人们吓唬：“快住嘴，不敢哭，敌人来了！”娃娃们大概也明白敌人就是坏蛋吧，马上不敢哭了，瞪大眼睛看着大人。

没过几天，黄昏时分，刚准备烧火煮米汤，突然洞口出现两

个当兵的，扛着长枪，手提大棒，对着洞内喊“里边什么人？出来说话。”同桂荣一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骗他们说：“我们是王启斌（当地豪绅）的家眷，怕红军抓斗跑出来躲避的。”那当兵的说：“我不管你们是谁，赶快出来带路，我们要抓共军匪首刘志丹的家眷。”母亲一听不好，赶紧往洞口边走边说：“男人们都不在，你看都是婆姨娃娃，还有一个坐月子的”。二嫂宗梅婷会意，伸手在正娃的屁股上掐了一下，正娃当即哭声出来。那两个当兵的一听就不敢进洞了，怕月婆血气对男人不吉利，就举起大棒打母亲刘素琴和大嫂同桂荣，逼二人带路。婆媳见状，机灵的将小包袱扔进草丛，接着就往山上跑，想把敌人引开越远越好。因为二嫂宗梅婷的包袱里还藏着二哥景范的文件和游击队员的名单，一旦落到敌人手里就会暴露，不但全家人生命难保，而且祸及游击队家属。婆媳二人跑了没多远就被敌人抓住，押着往前走。夜幕已降临，四周漆黑一团，敌兵燃起火把，照出一线光亮。山路小道两边是陡坡，长满灌木荆棘。两个小脚妇女跌跌撞撞往前走着，心里盘算着怎样脱身，母亲突然一下抱住了同桂荣，大嫂会意，两人滚下山坡，躲藏在塆坎下。敌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人已不见了，只得朝林子里乱放了几枪，不见动静，骂了一阵子走了。母亲二人四下看了看没什么动静，就出了林子顺原路往山洞里跑，路上还捡回了扔掉的包袱。这包袱里拿的是全家人的救命钱。二嫂宗梅婷和娃娃们早已急的不知如何是好，当婆媳二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一家人悲喜交集围在一起，此时已是后半夜，母亲果断地决定此处不能久留，必须连夜走。怕夜里小孩子啼哭引来敌人，就将春梅和正娃再次留在洞里，听天由命吧。他们一路摸黑奔波，翻过三座山梁，来到一个古庄子的破窑洞里。娃娃们拿出干粮吃，大人们心急火燎的不时往外

看，惦记着两个小娃娃的性命，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后悔。

整整一天老小都没说几句话，娃娃们也似乎明白少了两个亲人很难过，都不闹了。大家眼望着对面山梁焦急的盼着天黑。就在太阳落山前，山梁上有两个人影由远处向这边移动，渐渐的她们看清楚了，是两个十六七岁的后生，背上还好像背着什么。原来是刘廷华让他的两个堂弟把两个丢在山洞里的娃娃送过来了。全家人喜出望外，一拥而上把娃娃接住。母亲问：“你们咋晓得娃娃丢在洞里？”回答说：“今天晌午我二哥让我们到山洞里看看你们怎样了，发现只有两个娃娃哭的死去活来，知道你们走了，我们背起娃娃就追，刚下过雨有脚印好认，就追上来了。”

听说姚玉杰一伙已经走了，当天晚上我们一块往罗坪走。过罗坪河时，大人娃娃争先恐后地爬在河边喝水。母亲看到眼前景象，不由一阵心酸，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再遇上敌人该如何是好？晚饭后，母亲与儿媳商量，认为还是分开走人少目标小，机动灵活也好躲藏，生的希望总是会大一些。于是分头带上口信，让亲戚来罗坪接人。同桂荣、刘力真母女由六舅刘占奎送去袁沟二姐夫刘兴汉家暂住；宗梅婷和儿女刘力群、军子、正娃由刘廷华送到杏树湾娘家躲藏；母亲带上我、娇子（刘荣）、春梅先回楼子沟暂住，等候父亲和三哥的消息。

父亲走后，母亲担心父亲和三哥景儒的安危，催促四豪沟郭大上安边寻找，一直杳无音信。母亲就要求三大刘培绪（二爷刘士哲三子）送我们一行上安边找父亲。

一天夜里，大家行至宁塞川，趁天黑过蔡家砭村时，大地主蔡疯子家的狗狂叫不止。这是去张家畔必经之地，因为红军杀过蔡家人，母亲生怕蔡家人发现报复。蔡疯子本名蔡丰，是当地大地主，又是民团团总，势力很大。这时天已黑，大家屏住气捏着

一把汗，快速悄悄的通过村子，继续上路。当晚来到歇马坡，住在刘培绪亲戚家。因为是近亲，吃过饭母亲招呼我们几个娃娃放心的睡了。第二天起来，发现带的盘缠少了几块钱，母亲十分生气，心想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啥亲戚！母亲不愿待在这里了，催促大家马上上路。天下着小雨，泥泞的小路又窄又滑，突然前边的驴一滑，六妹娇子（刘荣）连人带驴一块跌下沟底。母亲无奈的对兄弟刘培绪说：“你三大，你下去看看娃娃是死是活，记住把毛绳拿上来。”因为娇子只有四岁不会骑驴，用毛绳将她捆绑在驴鞍子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和家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六妹还开玩笑说：“妈把绳子看的比我的命还重要。”母亲说：“可不是！绳子出门时顶大用，娃娃虽然心疼，但也无良法了”）。三大下到沟里一看，娃娃还在驴背上绑着，都无大碍，赶紧把娇子解下来，把驴拉起来，一家人又继续上路。刚走到师家台，突然我也从马背上掉了下来，原来母亲骑的马，前面抱着春梅（七妹），后面坐着我，马走的摇摇晃晃，我犯困一松手就从马背上掉了下来。六妹和我都不敢骑牲口了，怕再掉下来，这样一来走得更慢了。母亲急得没办法，让三大连拉带抱，硬是让我们骑上赶快走。过了师家台后，遇上高老湾大叔金洋子，他也刚从张家畔回来，并转告父亲的话，张家畔很乱不能来，让我们回家等他们。我们一行只好在三大的护送下，经过近三天的行程，又回到楼子沟家中等候。

那时，父亲和三哥翻山越岭一路辛苦，来到张家畔城外，因不知道城里的情况，怕贸然进城让敌人认出来太危险，于是父亲让三哥在城外等候，趁天黑只身进城，边走边打听来到了亲戚家，亲戚见他大吃一惊说：“民团到处抓人，你怎敢上这来？趁天黑，你吃点饭赶快回去吧！”父亲一听情况紧急，连忙出城找

到三哥，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借宿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紧往回赶。火红的太阳当头照，又饥又渴路难行，这时突然黄土飞扬，民团的马队跑了过来，把逃难的人群冲散，一溜烟的跑了过去。父亲和三哥夹在难民中间跑，跑了一阵以后父亲见没事了，就和三哥在路边坐下来歇歇。父亲拿出烟袋准备吸一锅旱烟，却发现烟杆上的玉石烟嘴不见了，大概是在奔跑的路上丢失了，父亲念叨说：“太可惜了”，因为这个烟嘴是五姐刘桂芳给他买的礼物。父亲将就着抽了一袋烟，喘了口气，就继续往南行。在路上遇到了金洋子，就让他回去告诉家里人他们很快就回来的。

我们从乱石头川回到楼子沟，因为家已被抄，破烂的无法居住，只好先到对面吕渠沟破窑栖身。母亲无奈的说：“这真是五里沟走尽掌了，”她还担惊受怕的等着父亲和三哥的消息，随后二嫂宗梅婷和娃娃们也会合来了。白天娃娃们在树林子里玩耍，二嫂在破窑里临时支起锅做饭，母亲不时的在硷畔上放哨观望。一天，前沟忽然传来马蹄声，母亲起身准备叫家人一起跑，却听见沟里人喊：“我们是游击队，不要怕，不要跑……”母亲听出是张明科的声音，一阵激动，张明科走近前，先叫了声“干妈”，说二哥景范马上就到了。二哥回来没停歇，告诉母亲说：“我们全家人都被通缉，敌人随时会来，家里太危险，我们和仲勋同志商量过，过两天派人接你们上南梁根据地”。

两天后，二哥派了白杨树渠子三叔刘培万（外号三洋人）来接我们。三叔一家四个男孩都参加了游击队，四儿子被敌人杀害，和我们家关系非常亲密，有事尽力去做。天一黑，在三叔的带领下，全家人立即收拾东西和干粮，驴马驮着行李出发了。从吕渠沟翻山，过蛇渠岭，下芋子湾，过洛河，第二天来到瓦子川，听过路群众说国民党敌兵要来，整个村的人都跑光了。我们

进村后，就在一家无人空荡的房里做饭，走时在锅里放了一块银元，红军的纪律家属也是要遵守的。继续往前走，天亮才走出了川道，来到走马梁。

山路弯弯，好像远处在过队伍。走近才看清楚是红军少年先锋队，个个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让人感到很新奇，原来是大哥刘志丹和高岗、杨森等红军领导人带队伍转移。遇到大哥他们，家人都十分高兴，看到了希望，有了盼头。大哥问：“怎么没见父亲和三弟？”母亲说：“你大和庆生子（景儒）另一路跑敌人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景范派人来接我们去南梁的。”大哥说：“那也好，你们先去南梁，我们马上要离开这里，可能要打仗了。”当即高岗让部队同志给了我们两匹骡子，好快点赶路。分手后，我们翻山到了黑水坡，天已漆黑一团，住在拐沟内老乡家。半夜有人报信说，敌人进沟了。一家人摸黑跑到山上荞麦地里，钻进荞麦垛子里静悄悄的等待，不敢有任何动静。突然天下了雨，越下越大，衣服湿透了，一个个冷得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见无动静就返回村里，烤干衣服，吃了顿黄米捞饭。娃娃们吃得狼吞虎咽，让大人看的鼻子发酸很是难受。

经过几天的跋山涉水，到了离南梁不远的寨子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工农革命政府）主席习仲勋知道后，派张景文安排我们到礼佛寺先住下。在未到来之前，大嫂同桂荣母女已先期到达，她们住寨子湾金岔沟，还有刘约三、刘安堂、蔡子伟、张明科等同志的家属也到达根据地，我们和张明科的家属住高庄湾。

南梁根据地是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和工农民主政府。经历了一年的风餐露宿和艰苦跋涉，我们终于来到根据地，住下不久，父

亲和三哥也到了南梁。二哥也因脚部受伤回到根据地养伤，一家人能在根据地相聚实属不易，尽管生活艰苦，却格外高兴。在根据地土改中，工农政府给红军家属也分了几亩地，自力更生，减轻农民负担，空闲时帮助部队士兵拆洗被服、缝衣纳鞋。大哥当时是红26军军长、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大嫂参加了军衣会，给部队加工军服、被褥、鞋袜。二哥伤愈又上了前线，三哥参加了红军骑兵连，我上了根据地列宁小学。

鲜红的旗帜飘扬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振奋了革命同志的斗志和士气，激发了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这真是破天荒的大事，震惊大西北，震惊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1935年4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大军对陕甘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大哥为分散敌人兵力，率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此次进犯南梁根据地的是敌“野骡子”（马鸿逵）的骑兵部队，速度快、来势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政府主席习仲勋决定抽调三哥景儒带领政府干部和红军领导家属迅速转移，其中包括杨培盛、刘约三、刘安堂、张明科等人的家属约80余人。父亲让三哥和我把带不走的粮食埋藏起来，不给敌人留一粒。出了高庄湾天擦黑的时候，到了双塔河梢林里躲藏。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在石庵下集中过夜。这里阴冷潮湿根本无法睡觉，大家把石板拼在一起，挤在上面休息，怕驴发出叫声，二嫂宗梅婷用绳子把驴嘴捆住，把带的狗都勒死吃肉充饥，吃饭没有碗，就用桦树皮卷成筒子当碗，折下树枝作为筷子使用。

在山林里不仅要防范敌人，还要提防野兽的袭击，山中经常有野兽出没，有一次在沟底躲藏时，听见不远处有豹子睡觉的鼾声，我们非常害怕。山林中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母亲建议再次分开躲藏，目标小了吃饭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一些，于是大家分

散开来。一天早上太阳刚升起来，母亲听见上坡上有动静，大家顿时紧张起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水壶倒了往外淌水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自己人，我们高兴地跑在一起耍闹起来。三哥出去打探消息，听准备进山的农民说，昨晚敌人袭击了附近的红军医院，负伤的骑兵团长赵国卿和其他伤员都被敌人杀害了。三哥急忙返回，带着大家翻过几道山梁，到森林茂密的堆儿梁躲避。

一天，敌人把对面山上的树林点燃，火焰有几丈高，林子里的动物都乱飞乱跑，他们想要烧死红军家属，幸好山下有一条河把大火隔开，救了大家的命。在山林里转移、躲藏了20来天，没有粮食就吃野菜、蘑菇、木耳和树花等。树花是长在树体上的一种白色菌类，有微毒。有一天我们走的又累又渴，发现前面有一棵老梨树，三哥爬上树搜到一颗梨拿给父亲吃，父亲让娃娃们吃，大家互相推让，最后还是让春梅吃了。由于长期缺乏粮食和食盐，好多人都患上了夜盲症，天还没黑就看不见路了。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三哥拿上枪出去找吃的，打回来一头野猪，大家七手八脚架起大锅，退掉猪毛，留了一半挂在树上备用，另一半剁成肉块煮熟，大家美餐一顿，娃娃们有肉吃很是高兴。谁知挂在树上的野猪肉一夜之间被豹子吃了个精光，大家后悔还不如一次吃完算了。

为了和红军取得联系，三哥又出去找红军。费了很大周折，终于在黄家坪见到了习仲勋同志。习仲勋一见三哥，就关切的问：“干大怎么样了？”三哥说：“还好，一路非常辛苦身体吃不消，现在就在不远处的树林子里。”得知我们一家处境十分困难，习仲勋就安排我们一家去苍沟住在马大爷家。

苍沟地处甘泉和保安两县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比较安全。马大爷名叫马海旺，他是陕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积极

支持红军闹革命的民主进步人士（去世后，延安边区政府为他立碑铭记他的功德）。我们一家和马大爷家都住在苍沟他家的“窖子”上。这窖子是陕北人从远古时代延续下来的一种用于防御的居住地，是在悬崖峭壁上天然或人工开凿的窑洞和通道，外面看上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洞口，可里边却是空间较大的连环洞，可驻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也可储存粮食、财物等，进出全靠云梯或软梯才能行动。我们家人在这里先后两次住了约大半年，得到马大爷的精心招呼 and 照顾。

1936年1月，红军东征抗日，中央任命刘志丹担任东征北路军总指挥兼红28军军长，领导东征的先头部队。后来听说红28军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主要由一些新调来的游击队员和新招募的青年农民组成，缺乏正规训练，也来不及训练，更谈不上作战经验。原大哥的部队——红26军和27军，被改编成红15军团，归陈子华、徐海东领导。高岗、二哥景范被派往前线，王世泰养伤。要带好这支队伍很不容易，该做的事情太多了，且需要时间。大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却不顾被关押冤狱的事情尚未了结，坚决无私执行中央决定，与政委宋任穷一起出发了。

东征部队一路势不可挡，连续作战，所向披靡，解放了十几座县城到达山西之后，中央命令大哥志丹掩护大部队西撤。1936年4月14日，大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前观察地形时，不幸意外中弹牺牲，年仅34岁。

1936年5月的一天，有人通知三哥景儒去瓦窑堡，家人不知是什么事，都还在苍沟的窖子上。几天后三哥回来，一进窖子就钻进被子埋头痛哭。母亲吓了一跳，预感不妙，就问：“出啥事了？”三哥哽咽着说：“我大哥他…牺…牲…了…！”原来他是代

表家人给大哥送葬的。得知这个消息把全家人都惊呆了，如晴天霹雳一般，谁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但这是事实。全家人抱头痛哭，哭他太年轻就这样走了；哭他太辛苦劳累，没有歇息一天；哭他太冤枉，强扣在他头上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他永远永远的回不来了……怎叫老人不心疼，叫亲人不失声？父亲更是痛心，只是默默流泪。

1936年6月，失去儿子的父亲觉得待在这里没有意义了，“我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是如此结果啊！”他失望极了，决定全家人返回老家楼子沟。路过香柏沟王佳乐家暂住休息。王佳乐是祖父刘士杰的学生，父亲的师弟，按王家论又是父亲的晚辈，两家人也有多年的交往。这天他宰羊杀鸡、吃粽子，款待我们，才知道是端午节。自从大哥牺牲，一家人都非常痛苦，糊糊涂涂打发日子，也不关心节日、生日了。

端午节后，父亲让三哥景儒先回楼子沟家中看看。这时的家已是满目疮痍、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老鼠乱窜，墙头烧成了焦土，窑洞的门窗也烧成了黑窟窿。饱经几年战乱和生离死别的苦难，我们终于回到了家，却不能入住，全家人就先在前庄二大家暂住。人生的三大不幸都让父亲赶上了，尤其是老年丧子使他痛心疾首，身心疲惫，不堪承受。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寡语、卧炕不起。母亲生怕他有个好歹。经过家人的精心护理和劝解，他慢慢地缓过来了，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还是坚强的站立起来了。父亲对大家说：“我们要尽快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首先要解决的是吃住问题。”

在他的带领下，全家老少齐动手，清理杂物，打扫院子，修理门窗，还把当年埋在地下易发霉变质的粮食筛选、晾晒。尽管吃到嘴里有霉苦味，但总比没有吃的强，大家只好忍着吃。后来

一些亲戚朋友送来一些吃的，当地政府知道后也给了一些救济粮，但父亲不愿多要，怕增加政府的负担。父亲说，目前的这种做法不是长久之计，全家不能依赖别人救济过日子，要靠自己的努力才有出路。现在的季节还可以抢种些短期早熟的庄稼，来解决今年过冬的吃饭问题。

三哥景儒把家中的大小事情一应安顿好后，离家重返红军游击队去了。家中的我才12岁，只好把古庙岔郝生财哥、冯洼二舅、四舅叫来帮忙。于是父亲与儿女们一起动手搞生产，上山开荒，平整土地。抢种了荞麦、玉米和蔬菜瓜果。经过全家的辛勤劳动，秋天的收成还算不错，解决了全家人吃饭的燃眉之急。

冬天农闲后，父亲又开始筹划第二年的春耕生产。他凑钱买了几只羊和耕牛，让孩子们放羊。父亲自己重操旧业，上山割荆条，编制装粮的大囤及筐子、筛子，准备农具。按当时边区政府的规定，烈军属等无劳动力的家庭，由政府组织代耕。父亲不愿给政府添麻烦，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建设美好家园是父亲一生的愿望。

回忆三哥刘景儒的几件事

——写在三哥百年诞辰之际以示深切怀念

刘玉兰

三哥景儒，乳名庆生子，在五兄弟里人长的英俊，用现代话说帅气、聪明，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追求新鲜事物，年轻时喜欢张扬。记得母亲说，“你三哥天生就不是在乡下的人，不安份。”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在小县城任贸易公司经理，见有人拿照相机照相，他很想玩玩，起先借人家的玩，也玩过二哥景范的相机，以后自己也买架相机，拿回到老家给家人和乡亲们照相，一开始吓得人家不敢照，怕把人身上的血吸走，会影响人的生命，因为底片是红的。他不知在哪里搞到一辆旧的日本自行车，用心打扮了一番，花花红红的很漂亮，人们无法想象在乡间山路上如何将它骑回老家。总之他就好玩新鲜的，别人没有的。父亲是传统老人，看不惯他这样的举动，说他“不务正业”。实际上是三哥好玩的天性使然。在当时他算见多识广、爱好多的人，特别不一样，引人注目。

五十年代他在西安商业干部学校培训，每周日回来看母亲，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他非常喜欢我、九娃、德润我们三个，弟弟小老在院子里和其他小朋友玩，我和妹妹在家和他玩，有时四

哥从速成中学回来我们一起玩。他是个爱热闹的人，我们在一起玩花花牌时，他经常不时的偷牌，或者出牌时调换牌，我们不知他是怎么做的，好牌全都在他手上，于是不服气，上手抢他的牌，等妈妈做好饭，我们就休战了。记得有一次周日，他带我和九娃上街玩，给我们买水果糖、冰棍吃。在当年的平安市场内，给九娃买绒裤，他在柜台前选一条紫红色绒裤，拿在手中要量一下九娃的身子长短，他头也没抬就在旁边一个人的腿上比划上了，那人感到莫名其妙，躲了一下，三哥抬头一看不是九娃，就抱怨：“这个九娃人哪去了？”这时我才发现九娃去看其他用品去了，弄得三哥很难为情，直给人家说：“没看见，对不起。”回家后给妈妈说了，逗得全家人大笑。妈妈就数落九娃：“你三哥给你挑裤子，你胡跑啥呢？害的你三哥把别人当成你了。”这是小事，也是个小误会，看出三哥还是很喜欢和在意我们几个，他是个很有爱心的人。

六十年代我们上了大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工作忙又有了家务，各忙各的。在“文革”中，三哥一家在本县受株连，和广大革命同志一样受尽折磨。“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平反后，由志丹县调到延安政协工作，任政协常委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相对稳定安稳多了。有机会见面，他就给我们讲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经历和故事，让我有机会了解那个时期大哥、二哥及三哥的革命活动和经历，了解一家人在那个年代的苦难经历，对我写作有非常大的帮助，丰富了文章的内容，让我更详细的了解了我们的族人、家族、家庭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过程。三哥非常热爱我们这个家，才有心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料、丰富的事件和精彩的内容。我感谢我三哥。

三哥是个兴趣爱好很多样的人，心灵手巧，许多女人喜欢做

的针线活他也会，会裁剪衣裳、会缝制，曾给母亲做了件墨绿色大袄（寿衣）。能画花草画，会折纸，不是一般的折纸，用硬纸折成大小各异的片夹子，将各种零散的卡片、鞋样、花样和绣花线等等，都可以分类收纳进去，便于保存和携带。他给我折的片夹子至今仍然保存着以作纪念。有时拿出来看看，回忆当时的情景，重温兄妹情谊。

三哥 1995 年 1 月因病去世，去世时已是 82 岁高龄的老人，我当时 57 岁。岁月荏苒，我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了，三嫂张清文今年已经 93 岁仍健在，她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红军，是一个坚韧不拔、刚强贤惠的人，是一个受弟妹、子女和周围邻里尊敬和爱戴的人，我们一直相处的很好、很和谐。

人越老越爱回忆，家庭生活是主要内容，每每回忆过去都很欣慰，不愉快的事一点也不在记忆中，这样始终保持一颗愉悦的心。家庭生活平平淡淡，都是一些很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却映衬出无限亲情。让这个家庭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发展壮大起来，这也是老人们、今人们的共同愿望，内心不灭的祝福吧！

位卑未敢忘忧国

——记三哥刘景儒进京面见胡耀邦的一段往事

张瑞文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三哥刘景儒来到我家，面带笑容，十分高兴。九妹海燕急忙问道：“三哥有何喜事？”三哥较详细地讲述了前不久去北京看望被“四人帮”非法关押七年之久，刚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二哥刘景范时，见到了胡耀邦同志，并有幸与胡耀邦同志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亲切交谈，主要向全面负责全党、全国、全军“拨敌反正”、“甄别平反”、“落实政策”，全面抓经济建设的胡耀邦反映、汇报了几件大事。

为民请命留青史

三哥刘景儒说：“耀邦同志一见到我，长时间的紧握着我的双手，我们两个人都热泪盈眶。”他深情的说道：“你们刘志丹家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和许许多多的老革命一样，被‘四人帮’无情的批斗、摧残、折磨甚至投入监狱，景儒同志你也被非法送进大牢，真是让人痛心啊！”三哥刘景儒急忙回答说：“我个人的荣辱，刘志丹家族在‘文革’中受到的灾难、迫害与

党和国家遭受到的磨难相比较不是大事。陕北有相当一部分的老红军、三八式、老八路等老革命同志，多年来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不能得到合理的资助，真是让人心寒啊！”

这些老红军、三八式、老八路，还有解放战争中的老同志，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以及当时家境的实际困难离开了曾经为之奋斗、拼搏的革命队伍、战斗岗位。比如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老同志说，“毛主席，我们把你送到了北京城，送到了中南海，我们任务完成了，我们要回陕北种地去了”；有的老同志在战时负伤了，被放在老百姓家养伤，看到老百姓家实在是太困难了，不忍心离开，后来就成了这家老百姓的儿子或女婿，再没有归队；有的是在残酷的战斗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未能归队；有的是因为家中老人年迈，生活无法自理，原本在战斗部队或不同的革命工作岗位经组织同意返回老家了。凡此种种，多年来由于自然灾害或者政策不够完善，使得陕北有相当多的老红军、三八式、老八路、老革命在政治上没有得到组织上的认可，在经济上、生活水平上是很困难的，有的甚至低于当地老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

三哥认为，党和政府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这些曾经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作出过不同贡献的老同志们，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予适当的补助，让他们至少不能低于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样才能显示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让本人和亲属以及全社会的人为共产党竖起大拇指，共产党没有忘记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不同贡献的同志。

耀邦同志边听边十分赞同的不断点头称是。并说：“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看起来他们是一部分人，可是他们的身后有一大

群人啊！更多社会上的人会以此来评价我们党，我要亲自去调查这件大事。”后来胡耀邦视察陕北、内蒙、甘肃、宁夏时开了许许多多的座谈会，亲自到这类老同志家中走访，有了大量的、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按照实际情况，终于制定、出台了较为恰当合适的政策，对这些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作出过不同贡献的革命同志，在政治上予以肯定，生活上每个月的补助都有了具体规定，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对革命同志的关爱。

这件大事的圆满解决，三哥刘景儒是立了功的，人们都称赞刘景儒为老革命反映并解决了根本性的大事，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刘景儒作为老革命，办了件大事、好事。

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是《诗经》中描述的“小康社会”，这一中国民众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朴素追求。

三哥刘景儒与耀邦同志较常时间探讨了陕北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胡耀邦同志说：“我曾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对全省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有了许多的感性认识，可惜任职时间太短又调离了。不知现在陕北群众生活水平咋样？尤其是农民。”景儒哥向耀邦同志详细汇报了由于自然灾害较多，下雨就成洪灾，不下雨就闹旱灾，主要是自然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急待恢复。他说：“只要号召人们不要满山遍野开荒种地、满山遍野的粗犷放牧。让人们植树、种草、圈养牛羊，数年后自然植被恢复，生态平衡了，粮食产量上去了，经济很快就发展了”。景儒哥说：“当年我父亲就带领家人在楼子沟种树，经过几年时间几个果园果树都挂果了，经济林木也长的很好。实践证明，只

要封山育林，很快就会有粮食的大丰收。”三哥还和耀邦同志预测过，陕北一定会有大量的煤、石油资源，这些一旦被勘探、开发，陕北农业、工业会有大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真是奔向小康了。

耀邦同志在视察陕西时，到陕北实地考察，与老农亲切交谈，为规划陕北的经济发展呕心沥血。不断减免农业税，不断出台具体扶持发展农业、牧业的政策。在以后几任中央、省委领导的关心、指导下，陕西特别是陕北变化很大，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些完全印证了三哥刘景儒与胡耀邦同志所期待的“小康社会”在后来的数年中实现了。

怀念敬爱的三叔

刘米拉 刘都都 刘索拉

2013 年是三叔刘景儒诞辰 100 周年，我们怀念久别了的三叔。

记得小时候，经常听爸爸（刘景范）回忆小时候的故事。爸爸最惦记的是三叔和五姑，由于爸爸的母亲去世时两个弟弟妹妹还小，早早没了妈妈的照顾，所以爸爸不管到哪里都惦记他们。

记得爸爸讲他有一次和三叔一起在山里拦羊，那时三叔还小，不小心把头磕破了，鲜血直流，爸爸把旧棉袄撕开，将棉花掏出来，在山上找打火石打出火苗，把棉花烧成灰，急忙按到三叔头上，三叔的血才止住了。

大伯刘志丹（刘景桂）十几岁到榆林读书，参加了共产党，赴黄埔军校学习，参加北伐战争，后党组织派他回陕西工作，担任渭华暴动军委主席。渭华暴动失败后，省委安排他回陕北工作，离开家乡多年的大伯这才回到了家乡。在大哥的影响下，我父亲也参加了革命工作，三叔刘景儒也受到了革命的影响。

1929 年，刘志丹在陕北组织“军运”工作，我父亲被派往宁夏作“军运”工作。在家乡爷爷身边的男孩子中，三叔是最大

的，帮助料理家中的事务。

自1929年刘志丹回陕北工作，就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组织共产党的武装，并进行实地考察，选择根据地。经过各种挫折、磨难，到1933年秋，26军又重新建立起来，并建立了南梁根据地。1934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陕甘地区的第四次“围剿”，大伯刘志丹带领主力部队与敌人迂回作战，并派人通知家里转移；父亲刘景范受命率领保安游击支队第二大队，随红三团南下，经甘泉到富县道同去消灭道同民团。家中老小十几口人，只有三叔是个青年男子，与爷爷一起带领全家转移隐蔽。此时，三叔的妻子正怀孕在身，马上就要生产了，只好随家人一起转移。敌人已经贴出告示，悬赏500至1000大洋捉拿刘志丹的亲属。为躲避敌人，一路上饱经风霜，担惊受怕，三妈在避难中分娩了。由于天气寒冷，年轻的三妈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离开了人世，生下的女儿只好寄养在姥姥家，后来夭折了。

这次围剿中，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七位与刘志丹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志士。他们抓不到刘志丹的亲属，就到楼子沟把家烧了，还挖了老爷爷的坟。

面对疯狂的敌人，爷爷、三叔及一家人在群众的掩护下，决定分头躲避，三叔陪爷爷一直跑到北方草地。

刘景范在富县战斗结束后，率部队返回保安县，游击队员在深山密林中找到一家老小。习仲勋叔叔派人将爷爷及一家人接到南梁根据地，安排在高庄湾居住。家人安置好后，三叔返回保安游击队，参加游击战斗。

1935年4月马鸿宾的三十五师直扑陕甘边的核心荔园堡。按照刘志丹的战略部署，红军决定放弃南梁，向敌后三边一代转移。习仲勋叔叔调三叔回到南梁，让他带领红军干部家属转移到

安全地方，其中除我爷爷一家老小外，还有杨培胜家属、刘安堂家属、刘约三家属、张明科家属等，共有四、五十人。三叔带着他们翻山越岭，进入深山老林，先后躲藏在无人的古庄子双塔沟、森林茂密的堆儿梁、苍沟马大爷的山窰子居住。几十人在马大爷的窰子中住了几个月，红军粉碎了敌人“围剿”后，一行人才回到了甘泉苏区。

1935年5月9日至6月30日，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26军、27军），转战800里从东到西，陆续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六万多兵力的进攻，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此时刘景范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担任保卫陕甘边苏区的任务。

9月份，红25、26、27军在永坪会师，这时从北平和上海派来搞肃反的钦差大臣已经到了陕北。他们成立了非法的“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党中央来了后宣布他们是非法的，未经中央批准），撤销了西北工委，夺了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的领导权。

10月初，在刘志丹亲自策划、指挥的劳山战役胜利后，错误肃反开始了。肃反黑手抓捕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所有与刘志丹并肩作战的战友及连以上的干部，并秘密杀害了很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刘景范的警卫班长郭子贵匆忙找到三叔刘景儒，告诉他26军的领导都被25军逮捕了，要带上老人家属尽快离开这里。紧接着又发生了“赤安事变”，不明真相的群众反水了，造成混乱。三叔又带着领导干部的家属东躲西藏，既要躲避国民党军队，又要防备25军的暗害，日日夜夜钻到山林中。一直到中央红军到来，大伯刘志丹及父亲刘景范等所有被迫害的陕甘、陕北根据地领导于11月底先后被释放，三叔才把

家属们送回家。

1936年初，刘志丹受中央军委命令，担任新组建的28军军长，率28军渡过黄河东征，4月在山西攻打三交镇敌人时中弹身亡。当时，我父亲正在三边进行平叛战斗，没有通知他返回。爷爷岁数大了，当时没有告诉他，大妈看到运来的棺材就伤心地晕倒了，马锡五伯伯通知三叔去瓦窑堡参加大伯的追悼会。当他匆匆赶到瓦窑堡，周恩来接见他，告诉他追悼会已经提前举行了。三叔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家了，把全家老小从边区政府所在地迁回保安县楼子沟老家。

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刘志丹灵柩从瓦窑堡迁回志丹县，三叔和大妈一直守扶在灵柩旁。

1946年，胡宗南的队伍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县委让刘景儒在保安县西川组织游击队，同时要他尽快将刘志丹的遗骨收藏起来。三叔把大伯的遗骨藏起来，并组织了50人的游击队。1947年初边区政府组织疏散，三叔又带领着全家人和政府家属百十来人一起转移。

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破坏了志丹陵，砸了很多石碑。由于三叔的保护，大伯的遗骨保存了下来。

1962年，由阎红彦、康生一手策划的所谓“反党”小说案，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定成“习、贾、刘反党集团”，后又株连到马文瑞伯伯，又成为“习、马、刘反党集团”。在文革中习仲勋叔叔和我父亲都被关押多年。我父亲作为政治犯在秦城监狱关押达七年之久，贾拓夫叔叔被迫害致死。

在康生等人的统治下，长安街头贴出了“刘志丹是叛徒”的大字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

在老家志丹县，那些执行康生指示的人批斗三叔，说他是刘

景范的黑爪牙等等，甚至诬蔑三叔是纵火犯，将三叔逮捕入狱，关进大牢三年六个月。同时将身体瘦弱的三妈张清文（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在“水牢”中关押了两个月，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

“四人帮”集团粉碎后，一些老同志向中央反映了延安地区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的情况，得到了李先念（时任副主席）、胡耀邦（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关注，派人进行调查。

1978年6月，三叔才得到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回忆仁义善良的三叔，他受大哥、二哥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默默地做了很多工作，也经受了很多的挫折。希望在天堂的大伯、父亲和三叔他们可以见面，在一起好好聊聊老家的和谐温馨，聊聊这人间的沧桑。

我们永远怀念你们！

我的父亲

刘振凯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八年了，父亲的离去并未冲淡他在我心中的记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昨天一般清晰、亲切。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从小就受祖父培养，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加之聪慧勤学，年轻时就“诗琴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会。他画的上山虎、下山虎，惟妙惟肖生动逼真。我结婚时的一对大木箱上就有父亲专门为此画的红楼梦图，十分靓丽夺目。父亲有诸多爱好，他在小县城是第一个骑自行车飞驰的人，也是第一个用洋戏匣子（留声机）放音乐给大家听的人，落后封闭的小县城为此引起不小的轰动，大家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父亲心灵手巧能做一手好裁缝活，他时常用缝纫机给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做衣服，从不收钱，所以临到过年时父亲常为这些忙得不可开交。

父亲在晚年时曾亲自裁制了一件黄大衣，他很喜欢也非常爱惜，可惜的是他老人家没穿上几年就去世了，至今这件大衣仍保存着。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包括城市的集体食堂），农业生产的浮夸风泛滥。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说法，

为了讨好上级，什么怪事都有，亩产千斤、万斤，更有离奇的亩产15万斤等，这股风愈演愈烈，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害，削弱了国家和人民抗灾害能力。后来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无粮充饥，人们为了活命把野菜挖净后，发明了用农作物的根茎叶、草根树叶水煮、晒烤后磨成粉充饥的方法，好多人身体不适，开始便秘，难怪当时社会流传一句话，“路上走的些人踪，拉下来的却像驴粪”。村里听不到鸟鸣，庄子听不到狗吠，那确实是一个贼来了不怕，亲戚朋友来了就怕的年代，因为人们根本就没有可吃的东西招待客人。当时凡是能想的办法人们都用了，但仍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家也一样，过着以挖野菜、白菜根、洋槐叶子、榆树皮等充饥的日子。而父亲却被调到农村蹲点，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去了一段日子，父亲拿回来他平时吃的瓜代菜饭团让我们吃。那分明是草根磨成粉后做的饭团，非常粗糙还有一股很强烈的怪味，难以下咽。我们吃着这些东西，望着日渐消瘦的父亲泪水不由自主的在眼眶内打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老家亲戚、远近朋友来，我父亲总是叮嘱母亲想办法把饭做好，让来人吃饱，而我们仍然用野菜和能照见人影的稀米汤来充饥。那时的父亲月工资只有40多元（在当时仅能买几十斤洋芋），要养一个八口之家谈何容易。为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辍学，到养路段当了一名养路工。

父亲十多岁时就在兄长刘志丹、刘景范的教育影响下为红军站岗放哨，传递信息（鸡毛信），参加对敌斗争。1934年3月参加红军保安游击队，之后曾任过骑兵连长，游击队中队长。尤其1936年我的大伯刘志丹牺牲了，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在革命战争时期，父亲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的无限

忠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他的两位兄长——刘志丹和刘景范为榜样。

1966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代，也是一个人妖颠倒、鬼魅横行、黑白不分的年代。很多对党赤胆忠心，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游击队员和老党员被冠以各种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我的老父亲也难逃厄运，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打成了“彭、高、习”伸向志丹县的黑爪牙，遭到关押批斗，家也被抄。在这期间父亲遭受了人类社会罕见的折磨和摧残。他们用尽捆绑吊打、拳打脚踢，罚跪罚站等卑鄙手段，甚至唆使社会无业流氓把我父亲的被褥抢走，让受伤的父亲在寒冷的冬夜无法入睡。这些人简直禽兽不如，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愤恨不已。

这伙人为置父亲于死地，无中生有，污蔑我父亲是纵火犯，并诬陷一个3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时任县粮食局长的屈富宽为同案犯。可见这伙人是专冲着老革命来的，是地道的反革命报复。面对阴谋陷阱他宁死不屈，实事求是、大义凛然，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对党的坚定信念，就这样在铁窗内渡过了整整42个月。这漫长的42个月的牢狱生活是怎样渡过的，我想只有受害者才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1972年，因为实在查不到任何犯罪证据，才不得不释放了伤病一身、奄奄一息的父亲。

可令我不解的是，受此冤屈九死一生的父亲出来后竟然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对我们说：“要相信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绝不能因为个人受迫害而对党产生疑惑，迟早党会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事的。我和我的子孙们一定要跟着党义无反顾的走到底。”这让我想起了伯父刘志丹被左倾分子陷害关押几乎遭到杀身之祸，

后在党中央解救下从瓦窑堡被释放出来时，不但没有丝毫抱怨，反而力劝其他受害同志也不能对党有任何怨气。这兄弟俩竟然如出一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父亲的看法是正确的。1978年父亲的问题终于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关切过问下和其他千万受害者一样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出狱后的父亲在养好伤后，就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他还像以前那样，完成组织上分配的各项工作，尤其到政协主持文史编写工作更是积极认真负责，做出重要贡献，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父亲生活非常简朴，从不对吃穿有特别要求。亲朋好友逢年过节送给他的点心罐头，他都舍不得吃，以致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就坏了。有一年父亲从北京回来，带着习仲勋送给他的两条烟，我软磨硬泡地向父亲要烟品尝，最终他只给了我一枝。当时他也没舍得抽，说以后有重要客人来时让他们尝一尝。晚年的父亲非常期盼有一套起居方便属于自己的楼房，尤其在其行走困难时，但因我们家经济条件差而未能如愿，现在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都无法平静下来。

1994年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父亲怀着无限的留恋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守候他老人家身旁多日的亲人，走完他那酸甜苦辣的一生。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有十八年了，但他的点点滴滴依然鲜活地留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要继承父亲的优良品德，教育我们的后代，要像他那样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勤劳务实，学习他对党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无限怀念父亲，愿敬爱慈祥的父亲在天堂幸福快乐。

无私天地宽 清白留人间

——纪念父亲诞辰 100 周年

刘振彪 左爱存

父亲刘景儒，字子珍，乳名庆生，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生于1913年5月15日（农历4月10日），1934年3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离休老干部。卒于1995年1月8日（农历94年腊月初8），享年82岁。

我的父亲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参加革命很早却没有担任过要职，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平凡的革命事业中，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他为国家和人民忍辱负重、意志坚定，他的赤胆忠心体现了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步入老年后，住在窑洞里的他体弱多病，期待能住上一套起居方便的楼房，终因经济条件所限而未能如愿，这成为我们的终生憾事。随着文革的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位战争年代与敌人进行艰苦斗争，和平时期为国家建设努力工作做出重要贡献，遭歹人诬陷被关入共产党大牢的世纪老人，本该多享享清福，多让子女尽尽孝的父亲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内心感到一些苦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一生清白，他平凡而光辉的人生经

历，证明他是一位“无私天地宽，清白留人间”的人。

父亲出生在陕西省志丹县金鼎镇楼子沟村，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青年初期。他的祖父刘士杰（1850—1929），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贡生，一生主要从事民间教育工作，长期在保安县金汤镇办小学，期间协助乡里办义仓，用以灾年放赈济民，享有盛名。且为人正直厚道，刚正不阿，学识渊博，经常以“耕读传家”教育子孙，以忠厚正义行事待人，颇得乡邻村民的爱戴。他的父亲刘培基，字汉卿，是晚清延安府应试头名秀才，点名为“拔贡”，大刘氏家族第五任户长。好助人为乐、抱打不平，曾因为民请命抗苛捐杂税而被官府通缉，在外躲藏两年之久。为除地方匪患，保一方百姓平安，1926年创建保安县西上区民团，深得乡民拥戴。母亲王氏，是不远处金汤镇大户人家王怀亮之女，聪慧贤淑，知书达理，勤俭持家，吃苦耐劳，是过日子的贤妻良母。

父亲没有上过学，从小在家劳动，祖父在空闲时间教他们弟兄三人识字，六七岁时就跟着大哥、二哥一道读会《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字》、《朱子家训》等。祖父、父亲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什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坚”、“人将礼乐为先，树将枝叶为园，非礼者何为人耶”，“父在前，子不言”，“男有三纲五常，女有三从四德”等。父亲从小就知书达理，通晓人情礼仪，孝敬老人，尊兄爱弟。体民情、解人意、爱百姓、识大体，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由于其大哥刘景桂（刘志丹）、二哥刘景范先后离家闹革命，组建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无及顾家。1933年前，父亲一直在家随祖父务农，种地放羊、操持家务，也帮助红军搞一些革命活动。10多岁就为红军领导人在

家乡秘密活动而站岗放哨、传递情报。1929年春，刘志丹在陕北吴起镇三道川齐家桥寨子上搞起了红军兵工厂，兵工厂聘来的技术工人的报酬，就由父亲和他的表哥王兆基、孙向奎收畜税来解决。6月遵照大哥吩咐，接待谢子长在家休养半年之久。

1934年3月，21岁的父亲在其胞兄的影响下，打听到保安游击队从南梁返回在家乡一带活动，就安顿好家中老小毅然离家，参加了红军保安游击队，并参加了攻打旦八寨子等几次战斗。不久，国民党甘肃军阀谭世麟派儿子谭杰侯、敌军团长仇良民率兵进入保安县，到处捉拿、杀害红军家属。父亲一家人刚离开楼子沟转移到高楼湾几天，敌人就冲进楼子沟，抢走刘家羊子一百多只，又将刘家财物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了刘家房屋、窑洞、马棚、羊圈，最后还丧尽天良的去挖了刘家祖坟，焚尸扬骨。刘景儒奉命返回到高楼湾，保护家眷安全转移。

1935年4月，国民党马鸿宾部35师重兵围剿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父亲在南梁受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的派遣，负责保护政府干部家属转移，政府机关也要分头转移，在甘泉桥镇一带会合。父亲领着七八十人翻山越岭、钻沟走林，躲开马匪的围追堵截，经过好几天的跋涉与敌人艰苦周旋，终于安全的抵达会合点，见到习仲勋同志，并把转移出来的家属妥善安顿，习让父亲把全家老少安排到洛河川苍沟马大爷家。随后返回边区政府，担任桥镇区助理员。

1935年7月，父亲看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26、27军统一接受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领导，为鼓舞士气，以赤卫队员的名义写了题为《两军会师》的一首诗：“老刘老谢闹世事，陕甘当统帅。两军会师力量大，来打反动派。”在红军部队广为流传。这期间，边区政府决定攻打盘踞在永宁山寨子上的国民党高

玉亭的一个连，政府和甘泉县、保安（志丹）县的赤卫队加起来共有一千多人，布置在各个山头上插满红旗，父亲也参加了这次攻寨战斗。高匪一看这个阵势吓破了胆，弃寨纷逃，红军没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解放了永宁山寨子，解救了老百姓。

1935年8月，在鄂豫皖根据地内大搞残酷“肃反”、外受到国民党军队围剿的红25军，因无法立足而丧失根据地进入陕西，又将我党优秀而杰出的地下党员——杨虎城部警备旅长张汉民杀害。跑到陕甘边根据地后，受到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并给予武器、装备、医药、粮食、衣物等方面的无偿供给和大力支持。当时身在桥富峪、桥镇工作的父亲看到红25军和陕北红26军有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出入都得坐人抬的轿子，这和大哥刘志丹平日的作风截然不同；二是军部所在地戒备森严，官兵之间等级分明，这和26军官兵同吃同住同战斗区别明显；三是25军士兵稍有不对就拳脚相加、鞭抽棒打，这和26军官兵平等，有错采取批评教育帮助的方式格格不入；四是25军领导人处处以长官自居，搞特殊化，这和陕北红军领导人经常把马让给普通士兵伤病员骑，坚持官兵一致如同南辕北辙；五是独断专行，盛气凌人，这和陕北红军发扬民主，通过会议解决分歧，统一思想和行动（当然不包括“三甲塬事变”）有着天壤之别。

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两支部队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红军，差异竟然这样大？后来通过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特别是1935年10月发生的陕北“肃反”，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父亲才明白这是两支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部队。一个是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毒害太深，擅长内部斗争，爱搞“窝里

斗”，自觉或不自觉的帮了敌人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另一个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无私奉献，和劳苦大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忠诚于党的事业。

1935年9月中旬，25军在甘泉桥镇新庄河村经过20余天的休整后，开赴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紧接着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自封为“中央代表团”的三人小组，就紧锣密鼓的策划和实施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肃反”，撤销了西北工委，夺了西北军委的领导权。

父亲好长时间没有大哥刘志丹、二哥刘景范的消息，很是着急，就跑到边区政府了解情况，看到西北保卫局的人身穿黑衣服，手提大刀，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就感到事情不妙。这时边区政府财委的杨在权一看到父亲就摆手让他快走，父亲回到家人身边，刘景范的警卫班长郭子贵匆匆赶来告诉父亲，26军的领导全被25军给逮捕了，要父亲赶快带上老人家属离开这里。紧接着发生了“赤安事变”，父亲就一直带着领导干部家属东躲西藏，既躲国民党部队的追杀又防25军的暗害，多少个日日夜夜钻在山沟和梢林里，为革命事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心血和汗水。直到11月底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大哥、二哥他们获释出狱，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6年刘志丹受党中央之命，担任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周恩来）、红28军军长、抗日东征北路军总指挥，率28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攻克敌军数道防线，眼看抗日通道就要打通，不幸于四月十四日在三交镇前沿阵地观察敌火力点时中弹身亡，壮烈牺牲。噩耗传来，父亲悲痛欲绝。几天后接到边区政府马锡五的通知，要父亲去瓦窑堡参加刘志丹追悼会。

父亲把家安顿好就匆忙赶往瓦窑堡，得到军委张参谋长的接待。第二天，军委副主席、西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了父亲，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对父亲说：“景儒同志，刘志丹同志和我是黄埔军校的战友，他的牺牲是你们家庭的不幸，更是党和国家、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会永远怀念他的。因为形势紧张（当时东北军正集结大举进攻边区），追悼会已提前举行了，为防止敌人破坏已将烈士遗体秘密安葬。你二哥景范也在“三边”率领部队忙于平叛，你是志丹、景范同志的亲弟弟，安抚照顾好家庭也是革命工作。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以后有什么事、遇到大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一席话，对父亲启发教育很大，乃至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成为父亲自强不息、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1936年6月，父亲遵照周副主席“安抚照顾好家庭也是革命工作任务”的指示，把全家老小从边区政府所在地迁回老家金鼎区楼子沟，安排就绪后又返回保安游击队。经过多次战斗和磨难，父亲已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成长为英勇的红军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游击队中的一名共产党员。当时担任游击分队长的黄克强，根据父亲的能力和表现，任命他为中队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引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遵循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指示，仍然置“倭寇”而不顾，继续加紧对红军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围剿。这时，刘约三率领的蒙汉骑兵团回川剿匪，新招了几十名战士，就把父亲从游击队调去，任新兵连连长，开往定边驻扎。由于段宝山土匪在宁夏盐池县三段地一带骚扰百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三边司令部下令骑兵团立即剿匪。200余人星夜出发，在匪徒毫无

防备的情况下，打得敌人落荒而逃，缴获战马 30 多匹、武器 20 余支，为地方百姓解除了祸害。

1937 年秋，父亲由于从小身体瘦弱，加之长期劳途奔波，在骑兵连干了一年多后，被三边政府抽调回地方工作。在志丹县抗敌后援会工作半年又调往县工商界联合会，担任工商联主任。

1938 年 5 月，经朋友介绍，父亲认识了在志丹县委妇联工作的我的母亲张清文，经过一年的相处了解后结为伉俪。母亲当时担任妇联主任，她是陕北安定县（子长县）人，1920 年 9 月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14 岁就参加了陕北红军少年先锋队。1935 年被派往甘肃西华池任青救会干事，不久又赴环县曲子青年训练班进修。1936 年入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被组织选送到延安西北党校深造，期间认识和多次接触了父亲的大嫂、二哥和二嫂，对刘家的人有了较深的印象。学习期满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志丹县妇联担任领导工作。母亲聪慧贤淑、刚强豁达、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从小穷苦又有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经历，练就了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毅力和英姿大气、胸怀坦荡、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和风范。父亲自始至终对和母亲的婚姻无怨无悔，幸福美满，生了我们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

1939 年清明节，父亲一行赴子长县瓦窑堡水沟坪，为 1936 年 4 月牺牲已经三年的胞兄刘志丹扫墓。当他踏进野草丛生、一片荒凉的墓园，看到亲人的坟冢被风吹雨淋，想到大哥为国为民征战沙场却英年早逝，如今这般凄惨，不觉潸然泪下。顿生将胞兄迁回家乡魂归故里的念头。上坟归来谈及此事，当地干部、群众、亲戚、战友无不群情激奋，他们派代表和父亲一起向志丹县政府强烈请求将刘志丹烈士迁回安葬。10 月 21 日，志丹县县长

赵耀先顺应民意呈文陕甘宁边区政府，10月28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下达照准命令，并同时上报党中央，中央指示边区中央局和边区政府成立建陵委员会，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作为永久纪念。在父亲的参与奔走下，建陵工作拉开了序幕。

1942年，党开展了全面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提出的口号是宁左勿右，宁可冤枉十人绝不放走一个坏人。当时志丹县共有106户工商业户，经过整风就认为95户存在所谓的一些问题。县委书记王耀华领导工商联组的整风运动，父亲为街道工作组组长，对整风中出现的偏激和过头行为，如“车轮战”、“罚站”、“头按在粪坑”、“强迫给自己捏造罪名过关”等做法很是看不惯，就谏言县委王书记“步子要稳一点，方法要妥一点”，县委采纳了父亲的意见。不久中央下发纠偏文件，制止了左倾扩大化。为了发展经济，父亲着手组建联合商店，实行商户入股，扩大商品交流。

1943年4月中旬，父亲接到边区政府通知急赴延安，林伯渠主席亲自接见他，告诉他边区政府已决定延属专署专员曹力如、副专员马豫章全面负责刘志丹灵柩迁葬工作，马豫章任移灵专员，让父亲和大嫂同桂荣一起随马豫章去瓦窑堡移灵，并派一个骑兵排护灵。18日上午，在水沟坪墓地举行破土仪式，当坟冢深挖5米起出灵柩后，面对长兄忠骨，父亲心如刀绞，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悲痛落泪。4月20日，志丹灵柩从瓦窑堡动身，于4月26日到达志丹县城，一路上自发赶来路祭、跪拜的老百姓络绎不绝，父亲和他的大嫂始终守扶在大哥的灵柩旁。

1946年，胡宗南率3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边区政府部分领导家属和参议员被转移到志丹县，志丹县的

局势也有些紧张，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景膺让父亲到西川组建游击队，同时要尽快把刘志丹遗骨藏起来，防止敌人破坏。父亲带着遗骨和县委发给的6支枪，来到志丹县西川的金鼎乡。金鼎是父亲的老家，群众基础好，只用两天时间就建起了50多人的游击队，父亲担任游击队长，并很快把遗骨藏在可靠的人家中。游击队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志吴交界一带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保护地方政权和百姓的安全。半年后，父亲接到边区政府的通知，要他带领家中老人家眷和边区政府家属向东转移。

1947年7月，父亲告别游击队的战友，带领着一百多人的转移队伍（番号六大队）向东行进，行至横山县的青阳岔，敌人就追到了离他们不远的仓房梁，情况很危急。父亲当天下午赶到石湾街找到区政府，汇报了转移的紧急情况，第二天边区政府派人从子洲县的马蹄沟赶了过来，把他的父亲和政府家属接走了。父亲和母亲带着孩子继续转移到黄河边的西林峪，乘边区被服厂的船过了黄河。在黄河边见到了习仲勋、贺龙，贺龙对敌人破坏志丹陵园的情况很是气愤，狠狠的骂了一通，由于敌机不断向黄河边轰炸扫射，他们只好很快分手，在马家山村暂时住下。第二天在山西七口镇高家坪的边区政府，父亲找到民政所长王子宜，王给父亲出具了“从陕西转移过河的脱产干部，请当地政府给予供粮”的证明，才得以安家立身（适时山西正在贺龙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左得厉害，打死逼死的人无数）。后来胡宗南兵退延安，父亲他们才从山西返回陕西境内，住在横山县的付家坪村。

1949年，山西土地改革极左的那一套已波及陕西，父亲接到志丹县县长赵玉文、法院院长奥海清的来信，劝父亲暂时不要返回，志丹县正在搞土改，贫农团已将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

赵耀先四家定为“四大家族”，搞得很凶，家人皆已回避。当时住在付家坪吃粮都很困难，父亲就向老乡借了两头毛驴回家去驮粮，主要想打探一下消息。回到家乡看到老百姓人心惶惶，贫农团到处搞批斗，斗争很是激烈，父亲悄悄溜回家驮了两口袋麦子，急忙往驻地返，由于着急吃不好睡不好，返回途中在安塞的坪桥就病倒了，得了重伤寒。当地老百姓组成担架队一个村接一个村的把昏迷不醒的父亲一直抬到付家坪，这次病了半个多月才痊愈。

是年秋，父亲按照组织的意见到镇川堡，找到榆横指挥部的刘安堂、独立师的王四海，被安排在榆横指挥部后勤处工作。母亲带着5岁的我的二哥（二哥1944年生于老家，为了让他健康平安，父母亲给他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并取名“百娃”，之前生了一个女儿叫小娥，由于兵荒马乱，得病发高烧，无处求医问药，8个月就夭折了），在镇上协助搞妇女工作，并被民主选举为镇人民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次年即1950年1月，母亲生下了我，由于缺奶加之工作繁忙，把我托付给镇上刘家湾刘姓善良人家抚养，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因此给我取乳名“援援”。

1951年，父母亲带着二哥和我，告别恋恋不舍的乡亲们，离开镇川堡，返回延安。在延安县协助搞一些社会公益工作，母亲又被选为县人民代表。这一年是中苏建交和平友好年，我的弟弟出生了，为纪念中苏友好，起名叫“友友”。

1952年2月，中央根据习仲勋的建议，纠正了土改中极左倾向，这时父亲接到志丹县奥海清县长的信，要他即刻返回志丹县工作，父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志丹县。父亲被安排在县工商科工作，母亲因孩子多年龄小拖累大，没有

回到县委部门，在市镇搞居民区工作，担任市镇党委委员、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居民调解委员会主任。1953年，国家实行了干部工资制，父亲每月43元，养活一家几口人，生活很是拮据。

1954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父亲担任县工作组小组长，负责工商业改造工作。改造的政策有三种方式：一是实行公私合营，采用定股定息赎买方式。二是实行合作经营，自负盈亏，四马分肥。三是合作小组集体领导，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在父亲的努力工作、严格执行政策下，将先期成立的两家达不到资本家标准的公私合营公司改为合作商店。1956年私改工作完成以后，农村开始实行公社化，一切耕地归生产队所有，后来刮起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一大二公。1958年大跃进，动员家家户户把自家的做饭锅砸碎交给国家炼钢，到处是土法上马的炼钢小高炉，结果把好铁全部炼成废铁。实行食堂化，不准家中生火做饭（其实做饭的锅都砸碎上交了也无法做饭），把自家的粮都要交到食堂在食堂集体用餐，吃到最后无粮可吃，只得吞糠咽菜。即使如此到处还是批斗会不断，行刑逼供随处可见，搞得人心惶惶（饿的惶、斗的惶）。在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浑浊年代里，固然有“其乐无穷”的人，但我的父亲怎么也“乐”不起来，更多的是“担忧”。担忧世事的变幻、人性的扭曲，担忧老百姓的生活竟然不如20年前陕甘边根据地人民的水准。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二哥协助母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1962年，为减轻父母亲的负担，二哥刚读完初中就中途辍学，在养路段当了一名养路工。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次年父亲被派往宜君参加社教工作队，不久又被团部派往河南搞外调，他们28名脱产干部带着2500多份调查材料，分为三个组。父亲带着一个组10

人在洛阳、许昌、开封、安阳四个地区分头开展工作，正当调查工作艰难进行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66年七八月，红卫兵串联来到河南，紧接着开始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影响了调查工作的进度。12月调查工作基本结束返回宜君，县委组织部通知父亲他们尽快离开此地，原因是全国批判刘少奇的桃园经验，社教工作队被认为是刘少奇的工作队。回去就见到先期回去的社教工作队队长正被带着高帽子游街批斗，父亲在县上是个科级干部，在工作队只是个小组长，幸免于这次的游街批斗。

1968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打砸抢和持枪武斗的过程后，北京街头贴出了“刘志丹是大叛徒”的大字报（有人传出是阎红彦、郭洪涛一伙人搞的鬼，意在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父亲的二哥刘景范（国家地质部副部长）因反对康生的政治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遭批斗身陷囹圄，从此父亲的灾难和厄运也就降临了。

父亲成为“三反分子”刘景范伸向志丹地区的黑爪牙，被“四人帮”的徒子徒孙进行隔离审查、大会批斗、小会行刑逼供等各种人格侮辱和摧残折磨，因无有收获，便以志丹县城面粉厂发生的一起面粉自燃案，诬陷父亲为纵火案主谋之一，欲置他于死地。1968年12月，经关押批斗折磨一年后，被正式逮捕入狱，狱中遭受的非人待遇罄竹难书，直至1972年在无任何证据无法定罪的情况下，不得不无罪释放。狱中艰难度过的三年六个月，把父亲折磨得骨瘦如柴，鬓发全白。其时我的母亲——一个老共产党员，被关押在市镇公社的机关里，逼其交代父亲的所谓“问题”无果后，便在关押的房间地上注满一尺深的水，正值陕北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时节，身体瘦弱的母亲赤脚站在水里直至昏倒在地。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令人毛骨悚然。母亲遭关押批斗两

个月后放出时已经奄奄一息。身体稍微恢复后，就去建筑工地、砖瓦厂等处做苦力打工，以瘦弱的身体，付出全身力气，获取微薄的工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们弟兄姊妹亦受株连无一幸免，二哥被隔离审查批斗，我和弟弟直接从学校下放到艰苦的农村插队改造，妹妹（54年出生，自幼活波可爱，取名小玲，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在上初中）被勒令退学，小弟（生于59年，聪明伶俐，取名小刚，在上小学）也受到百般刁难和诬陷。

父亲出狱后回到百货公司，仍然受到“四人帮”的走卒们不公正的待遇，流毒不肃清，迫害在继续。县副食公司的贺世永经理（转业军人，府谷人）非常同情父亲的遭遇，主动提出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得到组织部批准。为了让父亲脱离处境，便于向上反映冤情，贺经理安排父亲到延安做常驻采购工作，由于工作非常出色，得到单位、社会和百姓的高度评价。但父亲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省地县的解决，申诉被阻挠封锁，反映不到中央。1978年的4月，李先念夫人林佳媚来延安视察工作，约见了父亲，父亲亲手将申诉状交到林佳媚手中，林看了诉状非常重视，告诉父亲说：“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很快把你反映的材料交到李副主席手中。”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看到李先念副主席转来的材料后，亲自批给陕西省委调查处理。1978年6月，志丹县召开群众大会，对含冤10年、冤狱三年半的父亲及受父亲所谓“问题”株连的11人（其中被整死2人）平反昭雪，父亲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心灵得到了抚慰。时隔不久，父亲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县副食公司副经理（恢复正科级）。

1979年，67岁的父亲被调往延安市委工作，市委书记张士杰考虑父亲年龄大了，安排父亲到政协担任副主席职务，被父亲谢绝。任命为政协专职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父亲在

政协工作十余年中，仍然一如既往，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得到市委、政府和政协领导及同事们的好评，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刘老”。同时，好多学校 and 单位聘请他讲过去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都不顾年迈体弱义不容辞的欣然答应。

1988年，父亲76岁时，离开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的的工作岗位，子孙满堂、四代同堂的老父亲陪伴我的母亲在家颐养天年。1995年1月8日父亲逝世，终年82岁。我的母亲现已93岁高龄，仍健在。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55年，早年由于他的大哥、二哥离家在外组建红军、创造革命根据地，家中全靠他照料，后来参加了红军还担负着照顾家庭的使命。父亲虽然在革命过程中没有显赫一时，但从参加革命起，就紧紧地把自己的一切和革命事业连在了一起，无论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中，还是身陷囹圄处于艰难中，革命的志向和信心从未动摇过。

父亲对子女管教特别严格，小时候我们都很怕他，但他内心非常慈善，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分别工作以后常回家去看他和母亲，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想对我们讲，关心我们的身体、生活、工作。他经常用“言、行、礼、义、诚、德”教育我们：言不伤人，行为端正，礼貌在先，义显风范，诚信为上，德能立身。父在前，子不言，尊兄长，爱弟妹。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上甜。父母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上要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三样东西不能被夺走。一是对生活的信念，二是做人的尊严，三是求知的欲望。正如古人所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正是父亲母亲这谆谆教导，使我们懂得了做人就要正直、坦荡，给了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动力，生活和前进的勇气。在父母的抚育

培养下，我们都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我们努力做正确的事、正确的做事，尽管无高官厚禄，也觉得很充实和满足，因为我们懂得，奉献就是快乐、平淡就是幸福。

父亲是一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他见不得阴奉阳违的小人，对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恶人深恶痛绝，对身边的人总是以诚相待。在工作中是非分明，在交往中助人为乐。记得父亲1972年出狱后，在文革中整他最凶残的十几个人，时间不长都相继去世了，有的得了瘫痪，有的得了绝症，有的突然就莫名其妙的死亡了。父亲说，凡是害人的人终究没有好下场，人在做天在看，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我家经常有客人来，父母非常好客，特别是农村来的亲戚和老百姓，都要挽留在家中吃饭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父亲天性聪颖，对新生事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他从没上过学，却写的一手好字、好文章，而且善裁剪、能绘画。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不去商店买成衣，大部分都是由父亲亲手做给我们穿。父亲绘画最擅长的就是老虎、山水风景、竹子和万字不断头。他对新生事物总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志丹街上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父亲从外地买回来骑的，还有留声机（过去叫洋戏匣子）、八音闹钟、电视机等等，在当时大家看来很神奇的东西，他都是最早用的，尽管生活拮据，他也要节衣缩食先用为快，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父亲对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工作脚踏实地、认真负责，从不好高骛远。他在基层工作多年，一直是个科级干部，一些老首长、老战友多次提出要提拔他担任高一层的领导职务，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常说一个真正干事业的人，是不分职务高低贵贱的，只要心系群众、一心为民、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一个好党员、好

干部、好领导。

父亲是一个非常孝顺老人、尊长爱幼的人。我的祖父先后娶了两房妻子，生育子女14个（5男9女）。祖母生了8个：长子刘志丹、次子刘景范、三子刘景儒（父亲），长女刘桂芬、次女刘桂兰、三女刘桂菊、四女刘桂叶、五女刘桂芳；继祖母生了6个：四子刘景星、五子刘德润、六女刘桂芝（又名刘荣）、七女刘春梅（11岁夭折）、八女刘玉兰（又名刘耀）、九女刘海燕（又名九娃）。祖母在父亲9岁时就去世了，后来父亲以他们弟兄三人的名义在金汤镇大路边为其生母立了蛟龙碑歌功颂德，以示纪念。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经常抽出时间去西安看望他的父亲、继母、大嫂和几个弟妹，当时交通极不方便，坐车到铜川再买火车票到西安得两天时间，父亲有个打猎的爱好，利用休息日把打下的山鸡、野兔不是托人捎去就是亲自送去，给老人们改善生活。

坚定的信念 光辉的一生

——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刘振辉 刘振刚

岁月流逝，光阴荏苒，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每逢闲暇之余，父亲的音容笑貌每每在眼前浮现。一位心灵手巧善良正直的老人，用他一生的心血抚育了我们姊妹六人，在正当好日子来临的时候却离开了我们，我们不仅为他老人家感到深深的遗憾，还心生出许许多多无法弥补的愧疚。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亲就是我们那座小小县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早在五十年代，小县城还没有通电，人们出行靠的是三四匹马拉着两个胶皮轮子的马车，走一趟延安来回至少得用四天，偶尔来一辆汽车，会在全城引起惊涛骇浪般的轰动。然而，父亲竟然鬼使神差般的弄回来了全县第一辆自行车和第一部留声机，让全城人大开眼界，也使我幼小的心灵感到无限风光。特别是在那没有一点文化生活的贫穷年代，父亲受县领导的委托，用很短的时间，只是在山西转了一大圈，就招回数十人，组建起了县城有史以来第一个剧团，隔三差五在点着两盏气灯的舞台上演戏，让全城百姓惊喜不已。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老大哥”的抛弃，更由于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

“三面红旗”运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使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国民经济更加千疮百孔，大面积的饥荒遍布全国，就连我曾经号称“山保安，米粮川”的家乡，人们也是只能用一锅老菜叶子熬上数得见的几颗小米粒充饥度日，就这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面对着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我们姊妹六人，选择了经常下乡的工作，为的是节省下他那有限的口粮供养我们。每逢休息，父亲就和母亲一起，扛起镢头在家里后院子和县城的小山沟里挖地，种上玉米、豆角、洋芋、白菜、还有黄瓜、西红柿，母亲还喂起了猪，每年到了收获的季节或者是杀猪的时候，那是我幼年记忆中最欢乐的时刻。不仅有平时吃不上煮玉米、熬豆角，还有鲜嫩的黄瓜、酸甜的西红柿，当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还是那香喷喷的猪肉，真是吃在嘴里，香在心里。几十年后的现在，我想方设法也没有找回那个时代的感觉。说心里话，我们那个时代虽然生活的很苦，然而有父亲在，我们的欢乐也不少。每当父亲和母亲种菜的时候，我们会帮着撒肥、点种；浇地的时候，我们会帮着提水；喂猪的时候，我们会帮着拔草，但是最难忘的还是跟着父亲去打猎。那个年代，平时能吃上一点肉是最奢侈的渴望。每年的冬天，父亲总是喜欢带上二伯送给他的一支单管猎枪，去乡下打猎，自幼好动的我就成了他最好的助手。每当发现野鸡或者兔子，曾经是游击队中队长和骑兵连连长的父亲总是以标准的军人姿势或跪在土丘后，或卧在草丛里，或站在树干旁端枪瞄准，这时的我也学着父亲的动作，紧紧依偎在他的身旁，任凭心脏怦怦直跳，双眼紧紧盯着猎物。就在枪声响起的一瞬间，我会遵照父亲的嘱咐一跃而起，直奔猎物，为的是防止猎物在挣扎中掉下悬崖或者山洞。每次当我提着收获的猎物回到父亲身旁的时候，父亲总是抚摸着我的头，亲昵的夸我是他的“小猎犬”。而我不

仅在尽情享受父爱的愉悦，更享受着回家后品尝野味的暗喜。就这样，我们姊妹几个在父母亲费尽心血的关照下，艰苦而快乐的慢慢长大。

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打破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学校突然停课，初中生一律放假，而我作为初中每个班两名学生代表之一，被编入高中班，留校参加所谓的“教师集训会”。自此，一场历经十年的民族浩劫开始了。先是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后是破旧立新、打砸烧抢，先是群众斗领导，后是群众斗群众，先是口诛笔伐、拳脚相加，后是文攻武卫、枪炮齐鸣，乌云笼罩了九州大地，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而伴随着国家厄运的降临，父亲也经受了一生最严重的政治打击和最残酷的精神摧残。一九六六年底，正在外地搞社教的父亲接到组织通知：立即回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到县城，父亲看到的是昔日的领导、同事眨眼间一个个就变成了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也许你昨天还是斗志昂扬的造反派，今天你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坏分子。就连父亲这样一位一九三四年就参加革命，一生对党无限忠诚的老党员也被列入了隔离审查的范围。这一切，让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他隐约感觉到一九三六年左倾机会主义对陕甘根据地领导人的残杀迫害的悲剧又要上演了。在那次“肃反”中，他的大哥刘志丹，二哥刘景范及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都差点被迫害致死。父亲在无奈中沉思，在忍耐中等待，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凭着对共产党的无比忠诚，他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他盼望着乌云散去阳光重现的那天早日到来。然而事与愿违，形势愈演愈烈，斗争不断升级。一九六八年，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父亲一生最大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北京城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贴出

了大字报，揭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为挽救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我的大伯刘志丹是“叛徒”，我的二伯，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西北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时任国家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景范亦因反抗康生等人的政治迫害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关进了监狱。在那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年代，父亲很快被冠以“三反分子刘景范伸向志丹的黑爪牙”而被揪斗。一时间，父亲取代了全县城的“地富反坏右”而成为全县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重点。一群跳梁小丑们全然不顾父亲早年参加革命，为人民解放浴血奋战，解放后为志丹经济和文化发展做过大量工作的事实，采取大会批、小会斗，棒打绳拴，拳脚相加，大有置父亲于死地而后快之势。其中不乏有曾被共产党镇压过的地富反坏家属，他们把对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通过共产党自己提供的平台，合法的宣泄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身上，那是再好理解不过的事情了。有这样两个人，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人。孙某，一个凶狠残暴的家伙，他是父亲的同事，只因为父亲曾为工作问题批评过他，就借此机会充当了迫害父亲的打手，每次批斗会他都会用他那罪恶的双手，狠抽父亲的脸颊，并数次把父亲从数米高的舞台上打落在地，摔得父亲鼻口喷血，让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有机会遇上他，我一定会杀了他。另一个是王某，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解放前从米脂逃荒要饭来到我的老家金汤镇，好心的爷爷看其略能识文断字，便收留在家看护店铺，此人靠着手勤腿勤，再加上嘴甜，颇得爷爷好感而视为家人，分给两眼窑洞帮其安家，资助一切生活费用，让他在志丹扎下了根。几十年来，其一直视我刘家为恩人，称爷爷为干大，叫父亲为三哥，常来常往。然而当父亲遭到迫害后，他竟然

落井下石，在批斗父亲的全县大会上对着喇叭嚎啕大哭，声泪俱下地揭发爷爷和父亲欺负压迫他的罪行，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几年后我还常常在想，畜生尚知反哺，何况人乎，只好把他不做人类看待。好在老天有眼，拨乱反正后，那些采取非常手段残害过父亲的人都先后蹬腿闭眼，让志丹县的天空清明了许多。这伙人对父亲摧残折磨数月一无所获，便在当时的省革委会一名负责人的授意下，以“面粉厂纵火案主犯”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将父亲逮捕入狱。三年半的牢狱囚禁，非人的生活待遇让父亲骨瘦如柴，须发全白，但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在父亲遭受迫害的同时，我们全家和亲属也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就在父亲被逮捕不几天，我的母亲，一位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十六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和人民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共产党员，随即就被隔离关押。一间小小的隔离室，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再在地上倒上凉水，不一会就形成了冰层，那些灭绝人性的人渣，竟然逼着母亲脱掉鞋子站在冰上，活生生的勾画出了一幅国民党反动派行刑逼供共产党人的真实画面。我可怜的母亲几次晕倒在冰上，但她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甚至做好了和父亲共赴刑场的准备（父亲曾被报过死刑）。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对逆境、大义凛然的崇高品质。我的二哥被隔离审查，没有行动自由，还要三天两头的批斗审讯，好在二哥年轻力壮，巧言善辩，所受伤害不是很大。三哥插队农村后不仅被剥夺了应征报名的资格，就在被推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大会时，被当场宣布除名，含泪退出会场。我的妹妹，一名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只因为在个人日记里流露了对家庭遭遇的不理解，立即被勒令退学。就连我不满十岁的小弟弟，也被人举报说辱骂毛主席而被罚站在凳子上，接受一群

大人的批斗，真是一个天理不在，道德何存的罪恶世道。我的一位姑姑刘桂兰，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就因为父亲的堂妹，在父母亲被逮捕关押之后，亦被列入批斗行列。他们不仅对姑姑肆意打骂、羞辱她的生理缺陷，还当众脱掉她的裤子。胆小善良的姑姑经不起这伙暴徒的羞辱折磨，被逼成精神分裂患者，这伙肆虐成性的狂徒方才罢手。我的堂叔刘景祥，因有在解放前后跟随二伯刘景范和父亲一块工作的经历，也被这伙人从家里揪到公社关押批斗，并施以拳脚威逼其交代二伯和父亲的反革命罪行，不惜将其手指折断致残，最后关进了监狱。我的另一个堂叔刘廷华，为人忠厚老实，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曾在战争年代为保护大伯刘志丹的尸骨和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刘志丹家属，受苦受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也被作为父亲的反革命同伙遭受批斗，百般折磨中，他们竟然惨无人道的将堂叔的下身打的肿胀溃烂，连路也不能行走，最终含羞含冤上吊自尽，成了众多冤魂之一。志丹县原粮食局局长屈富宽叔叔，是一位三十年代参加游击队的老革命，也是父亲的挚友。父亲被关押后，叔叔也被隔离审查，他们严刑拷打，威逼叔叔交代揭发父亲策划“火烧面粉厂”的罪行，诚实耿直的叔叔坚持实事求是，被打的遍体鳞伤，直至死亡。至今人们还不知道屈富宽叔叔的死亡真相，到底是毒打致死还是真的上吊自尽死亡，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众所周知，刘志丹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追求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富强，英勇奋斗，不屈不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点鲜血。而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创造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挽救中国革命，夺取抗战胜利，直至解放全中国发挥了决定性的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的

二伯刘景范十八岁追随长兄参加革命，共同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他胆大灵活，作战英勇，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游击队员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历任游击队长、反帝同盟军大队长、红二十六军团长、陕甘边区军委主席、陕甘宁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等职，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边区政府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及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解放后历任国家政务院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为奠定新中国监察事业，勘查国家地质资源和发展人民民政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难能可贵的是和大伯刘志丹一样，二伯同样是一个为民族解放大业而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坚持真理，百折不回的民族英雄。在二伯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无数次遭到来自“党内高层”和“身边同事”的诬陷迫害，但他始终为革命事业而坚持团结，甚至冒着被杀头活埋的危险，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铮铮铁骨。我的父亲一九一三年出生在一个以“耕读传家”为家训的农民家庭，从小在家务农，至今头上还有小时候放羊时被悬崖上掉落的石头砸伤所留下的伤疤。他天资聪慧，虽然只在六七岁时跟着两个哥哥读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但却能写出一手像模像样的字。特别是在曾祖父和爷爷刚正不阿性格的熏陶下，从小就知善恶、明事理。早在少年时代就多次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大伯站岗放哨，送信送饭。一九三四年，二十一岁的父亲在征得爷爷的同意后，毅然追随大伯和二伯，参加了保安游击队，从此开始了他艰辛曲折的革命生涯。这样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家族，这样一批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竟然遭此巨大磨难，很容易让我想起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对革命的仇恨，而对我们

全家实行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围捕追杀。但是乌云终究不会永远遮住太阳，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在打倒“四人帮”后，实行拨乱反正，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人民的危害，父亲得以彻底平反。平反后的父亲，和大伯二伯一样，怀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抛弃心中的委屈，不顾年老体弱，很快投入到改革开放，发展国家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先后担任志丹县副食公司副经理，延安市政协专职常委等职。以他有生之年，继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余热，直至以七十六岁高龄才离休在家。

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敬爱的父亲因病久治不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艰难坎坷而不失精彩的光辉一生，终年八十二岁。面对静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望着他那苍白而又憔悴的面容，我心如刀绞嚎啕大哭。我可怜的父亲，为抚养我们姊妹六人长大成人，一生操劳受尽磨难，为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理想，一生英勇奋斗百折不回。而在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正该他老人家逸享清福安度晚年的时候，却静静地离开了我们。作为儿子虽觉天道不公，却为有这样伟大的父亲倍感自豪。

怀念父亲

刘晓林 谢凤祥

一个世纪前的农历四月初十，父亲出生在陕北保安县金鼎镇楼子沟村一个殷实的家庭里，八十二年后走完了他坎坷、艰难、而又不失精彩的一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转瞬间，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我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如昨天。

一九九五年一月八日是个黑色的日子，也是让人铭刻在心的日子，这一天父亲离开了我们。

当我得到父亲病重的消息，风尘仆仆，昼行夜赶，从千里迢迢的广东来到门前的小巷，那熟悉的院落，灰色的大门和病榻上盼儿归望眼欲穿重病中的老父亲，促使我加快了脚步。悚然，一束挂在墙角的白麻纸映入我的眼中，我惊呆了，我不相信，不能相信善良的父亲会让我伤心。木讷讷走进院门，竟不知道悲伤，当对着迎面而来亲人们憔悴的面容和红肿的双眼，我才恍如梦醒，扑倒在父亲身边。他静静的躺在铺着干草的地板上，慈祥温善的面容，微微闭着的双眼，花白的头发纤丝不乱，我仿佛看到他的笑容，听到他的呼吸，但他嘴角口含钱的红吊绳分明告诉

我，我们已是阴阳两隔，从此这人世间再没有疼我爱我的父亲了！

作为父亲身边唯一的女儿，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没有守在身边，伴他渡过艰苦的生死关口，我抱憾终身。妈妈告诉我，临终前一天，他已不时陷入昏迷，偶尔清醒时，妈妈问他：“想不想玲娃？”“想。”张不开的嘴巴里挤出这个清晰的字，又含糊不清的反问：“你不想？”妈妈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告诉爸爸，“玲娃要回来了”。爸爸就是带着这种信念坚持着，挣扎着，等待着，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钟在兄弟们玲玲可能明天才能回来的对话中彻底失望了，挣扎的心崩溃了，不甘心的闭上了双眼。一个多小时后我赶回家中，眼前的情景是常人难以接受的。我抚摸着父亲冰冷的手放声大哭，用绝望的哭声恣意宣泻着对父亲的满腔思念。

女儿性情乖张，从小到大时常在爸爸跟前顶嘴撒娇，甚至蛮不讲理，我知道，爸爸也知道，好像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长大了，懂得心疼爸爸了，总是以自己微薄之力全力帮助经济尚很拮据的家，这也是真的。少小出门，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温暖的家，特别是慈祥的爸爸和把全部心血给了我们的妈妈，在外的几十年里，每当夜深人静，思绪往往似开闸的水畅流不已，想的最多的仍然是爸爸。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对我讲这样一件事：我之前，父母身边全是男孩，爸爸特别想要个女孩，妈妈怀孕了，快生了，爸爸笑着对妈妈说，生了男孩不要叫他（那时爸爸住机关），没几天我出生了，妈妈让邻居赵婶婶去找爸爸，“生了，是个女孩。”爸爸半信半疑对赵婶婶讲“我忙，回不去。”其实是心里没底。下班后忐忑不安回到家，见到我才踏实了。所以，在我们兄妹几人中，爸爸是最疼我的。

父亲有一双灵巧的大手，不但写一手好字，而且裁剪缝纫，描龙画凤样样可以，他画的上山虎，虎虎生威，画的牡丹芍药风姿绰约，记得二哥结婚时的木箱子爸爸也画了一组《红楼梦》人物故事图，箱边用金粉描画万字不断头，箱面上宝黛钗各式人物栩栩如生生活灵活现。我小的时候，爸爸只要一有空，就把我打扮的花枝招展，他会梳很多种发型，今天梳一条大辫子，扎着蝴蝶结。明天就会盘两个发髻，插一圈小花。只要到外地出差，他舍不得给自己和家里买一点东西，却给我买时髦的小裙子（那时叫布拉吉），长筒袜子和呢子外套。清新俏丽的发式和不同于当地孩子的打扮常常让玩伴们艳羡不已。时至今日，那粉红底白菊花的小裙子，明黄色镶咖啡边的小呢子外套还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

那时人们的生活普遍困难，我们一家七八口住着两间土坯房，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每到雨季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妈妈把所有的盆盆罐罐用来接水，连买一卷油毡盖房顶的钱都没有。所幸我们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从我记事起，感到妈妈整天起早睡晚，整天忙完外边（那时妈妈担任街道党支部书记）忙家里，而爸爸下班后，带着几个哥哥帮妈妈在自家的院子里种地，施肥、浇水，那时院子里有黄瓜、茄子、西红柿、韭菜、大葱等时令菜，还有杏、苹果、葡萄等，爸爸还在一进院子的园子里栽上芍药牡丹等草木花草，每到春夏季，满院姹紫嫣红，秋季又是硕果累累，每每这个时候，全家围坐在一起，听爸爸拉着二胡，吃着井水泡过的果蔬，生活虽然贫困但也其乐融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粮食欠收，饿殍遍地，本就贫困的日子雪上加霜，为了填饱肚子，妈妈是煮一锅莲花白撒一把小米让我们吃，又酸又涩的菜米汤让我们叫苦连天，那时爸爸经常下乡，与老百姓

姓吃住在一起，一次回来，他带着一块糠窝窝让我们吃，不知所以的我们拿着就吃，竟难以下咽，爸爸告诉我们，农民连这样的窝窝头都舍不得吃，是给他们下乡干部的。听着父亲的教诲，我们体会到世事的艰难和人生的不易。为了填饱全家老小的肚皮，爸爸和家乡所有的干部一样，利用业余时间，顶着日晒雨淋和妈妈一道在山边地角开荒种地，夏收小麦，秋收糜子、谷子、玉米和绿豆，东西虽然不多，也可以添补我们饥饿的肚皮。一直以来父母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山，艰难困苦的时候会为你遮风挡雨，让你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而父亲的儒雅，笑面人生的生活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父亲对我比较娇惯，我在他跟前也是任性淘气，但内心对他还是敬畏的。文革初期，爸爸因参加社教工作队停职检查，平日乐观的父亲变得少言寡语，看着大街上带帽游街的“走资派”，面对着深思苦想的父亲，我变得乖巧了，悄悄的做自己该做的事，生怕因自己做错事惹爸爸生气。记得有一天学校组织到西阳沟砍冬天生火炉的木柴，那时我们兄妹几个正是成长的年龄，尽管妈妈点灯熬油整天给我们做衣做鞋，我们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那天我就穿了一双底子开洞的鞋去的，面对着满山的狼牙刺，我不幸中招，脚后跟扎了一根很粗的刺，想自己拔出来又没有勇气，只好忍着痛一瘸一拐回到家中，爸爸正在炕桌上写材料，为了不打扰他，我悄悄爬上炕，躺在他的身后，不一会就睡着了。睡梦中，被一阵刺痛惊醒，睁眼看去，见爸爸戴着老花镜，一手攥着我的脚，一手拿着针，正慢慢往外挑刺呢。看着爸爸此刻慈祥的面容，聚精会神的表情，委屈与疼痛让我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滚落在枕头上，爸爸抚摸着我的头说“玲娃，不怕，挑出来就不疼了。”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发现我异样的举动，又

怎样不动声色的等我睡着，只是感到父亲在儿女跟前那种入微的体贴到了忘我的境地，这种温情让我受用一生，也是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善待万事万物的根源。

生活的贫苦不可怕，因为可以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去面对，用勤劳的双手去改变。但人为的伤害是致命的，带给我们全家困顿，带给父亲致命打击的日子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他早年参加革命，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在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中认真负责，尽心竭力，是对党无限忠诚的模范共产党员。但文革中仅仅因为是刘志丹、刘景范的胞弟，就被冠以“三反分子刘景范的黑爪牙”，大会批，小会斗，恶意攻击，人身伤害，无所不用其极。还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某位领导的授意下于六八年底被捕入狱长达三年六个月。漫长的一千二百七十八天，恶劣的生活条件，无休无止的审讯逼供，对自身信仰的拷问，对一家老小的牵挂，让父亲心力憔悴，骨瘦如柴，满头白发。我的学校紧邻关押爸爸的监狱，每次上学我都会有意识站在学校大门前的高坡上往监狱方向张望，直到铃声响起。终于有一次我看到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满头白发的爸爸往审讯室走去，我久久凝视着爸爸瘦骨嶙峋的背影，飘动的白发，五脏俱焚，泪如雨下。后来爸爸告诉我，在狱中他也是通过一天两次的广播知道外边的情况，对我的了解就是通过学校的高音喇叭播放的运动会的点名知道的，每当听到我的名字，他知道我还在学校上学，觉得自己的心能宽慰一点。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关心过问下，他们释放了查不出任何问题的爸爸。

在爸爸被隔离审查直至被捕期间，妈妈也遭受非人折磨。他们把妈妈关押在市镇办公院内让揭发爸爸所谓的问题，白天聚众

批斗，侮辱谩骂，弯腰罚站。晚上将妈妈关押在灌满齐脚腕水的房间里，房里无床无凳，妈妈只能靠墙而立，陕北的隆冬滴水成冰，满地的水转眼结成了冰，饥饿劳累了一天的妈妈经常晕倒在冰地上。妈妈十三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十八岁任志丹县妇联会副主任，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练就了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精神。在残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后她仍然不肯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父亲身上。见没有任何收获，才放了满身病痛的妈妈。那时家里一片凄凉，二哥被隔离审查，二嫂带着幼小的孩子回了乡下的娘家，三哥四哥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家中只有被勒令退学的我和年幼的弟弟，经过几次抄家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为了养活我和弟弟，妈妈拖着瘦弱的身体四处揽工，她在工地提泥包，打土坯，在砖瓦厂起窑背砖，四五十斤的砖头压在不到八十斤的身体上，至今想起都会让人心碎。三哥在农村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土豆、酸菜、小米、豆子隔三差五送回来，六十多里的山路崎岖不平，瘦小的三哥背着沉重的筐，从日出走到日落，常常是脚底起泡，脊梁血肉模糊。

善良的爸爸妈妈好助人为乐，经常从自己微薄的收入里，从并不宽裕的口粮里省出一些，帮助乡里乡亲，妈妈常常对我们说：“该吃稠的，多倒一马勺水，吃稀一点没啥大不了的，剩下的送给揭不开锅的人，能救命的。”好人有好报，在父亲身陷囹圄艰难的日子里，总有街坊邻居默默的帮助我们，爸爸被捕的第一年春节，家里真是连买一斤肉的钱都没有，当妈妈束手无策，看着我们伤心落泪的时候，邻居马连海给妈妈送了五元钱，他们家在当地也是数一数二的困难户，全家七八口就靠他织毛口袋生活，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又经常有病，妈妈实在不忍心拿他的钱，可他执意要妈妈收下，就靠这五元钱我们过了年。

受二伯和父亲的牵连，家乡的家门、亲戚朋友被审查批斗的成百上千，一时间人人自危，互相不敢往来，在那样的形势下，我远在西安的奶奶（父亲的继母）指示我的四叔给我家捎钱捎物。大约是六九年的夏季，我四婶因公受伤（双手严重烧伤，生活不能自理），单位同意回家乡养伤，路过县城不敢去我家，打发她的娘家侄子叫我妈妈去车站，说想见妈妈一面，在车站对面的菜地边，双手缠满绷带的四婶和妈妈相对而立，说起家中的情况，两人眼泪汪汪，车要开了，四婶塞给妈妈十五块钱，含泪告别。我的大伯（爸爸的堂弟）刘景秀，当时在宁夏物资局工作，一次路过，看到妈妈正砍柴回家，心中十分不忍，回去后托司机捎来几百斤煤和一袋子大米。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就是靠着妈妈的拼命，家人和乡亲的资助，才度过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

我在工宣队师傅的帮助下，在复课闹革命的政策下，回到了学校，我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真读书，直到一九七二年爸爸出狱，我也面临着高中毕业。在八姑、八姑父的帮助下，我转学到商县。在西安奶奶家休养的父亲亲自将我送到商县，临别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学习，听姑姑姑父的话，那种不舍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在姑姑姑父身边我读完高二的后半学期，毕业了，并在姑姑姑父的努力下，我顺利的有了工作。一九八八年，我应聘到深圳特区工作，年迈的父亲母亲赶到西安为我送行。纵观我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亲人的关怀和鼎力相助，特别是爸爸对我的支持。

1991年4月，爸爸妈妈在四哥的陪伴下来到深圳，正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叔叔将我们接到深圳迎宾馆，并在他下榻的兰园门口亲自迎接，一见面，两位经过文革磨难，九死一生的老人双手紧紧的握在一起，眼中泪光闪现。谈话中，习叔叔不时回忆战争

年代他们的生死之交，特别是负伤后在我的老家楼子沟养伤，受到干大干妈（我的祖父祖母）的精心照料的情景，还风趣的对爸爸说，咱俩是同一年，是两头牛，你四月，我八月，你还是我的三哥哩！在深圳的一个多月时间，习叔叔经常打发秘书给爸爸送来应时水果，还委托齐心阿姨多次到我们住的地方看望。九八年是习叔叔八十五岁寿辰，单位派我和党委书记参加老人的生日宴会，席间，习叔叔拉着我的手问起爸爸过世后家里的方方面面，久久不愿松开。

记得妈妈七十五岁那一年，也就是爸爸去世的前一年，那时爸爸的身体被病痛折磨的非常孱弱了，八月的一天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大意是说，妈妈跟了他一辈子，过去家里贫困，没过一天好日子，也从来没为妈妈办过一件事，现在他身体不好，总想在有生之年为妈妈做一件事，今年妈妈正好七十五岁，一辈子也没为自己过生日，所以就想给妈妈过个像样的生日。爸爸的提议我举双手赞成，立即向单位请了假赶回家中。我们兄妹几人立即着手准备，订饭店，发请柬，布置会场。爸爸是总指挥，每天拖着虚弱的身体，亲力亲为。还亲手剪了松、鹤和蝙蝠贴在大红寿字上。寿宴隆重得体，亲戚朋友来了很多，大家围坐一起，叙旧论今，爸爸脸上露出少有的满足感。事情办完后我带着女儿就要回单位了，临行前的早晨，爸爸挣扎着起了床（从给妈妈办完寿宴，爸爸基本是卧床不起了），柱着拐杖，颤巍巍走到葡萄树下，剪了几串还没有成熟的青葡萄让我带上给孩子吃。临走时又挣扎着把我们娘俩送到大门口，我强忍着没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上了车，摇下车窗，再次向爸爸挥手告别，却见爸爸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关上车窗我放声大哭，我做梦都不曾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

我最骄傲的人

刘 宁 刘 旻 刘 雯

我的爷爷是令我非常敬佩、值得我骄傲一生的人。

很多人对我家的红色家史很好奇，大多都很有兴致的问关于我大爷爷刘志丹的一些事情，在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同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爷爷，他就是刘志丹的三弟——刘景儒。

每当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儿时和爷爷在一起的一幕幕就浮现在眼前，他的一句句谆谆教诲也在心底响起，泪水禁不住地润湿了眼睛，陷入了对爷爷的无限思念。

大爷刘志丹我没有见过，二爷刘景范也仅仅见过一面，关于他们的许多革命经历，我大多是从我的爷爷那儿知道的。晚年的爷爷经常在许多学校、单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当然，对于子孙辈的家史、革命史教育他更是尽心尽责。很早我们就知道这个家庭是个特殊的家庭，别人经常在关注着我们，我们一定不能给自己的几位爷爷丢人抹黑。长大后，我们养成的严格自律，做人、做事从不马虎的习惯，与我爷爷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爷爷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投身革命，为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使兄长安心革命工

作和全力投入革命斗争，尽量减少后顾之忧，他竭尽全力担负起保护全家老小几十口子亲人的重任。面对残酷的斗争环境，面对挚爱的兄长英年早逝，面对革命家属的生存安危，爷爷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英勇和无畏。和平年代，面对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莫须有”的罪名，爷爷身陷囹圄仍然坚信党、坚信人民，体现了一个革命同志的执着和信念。

爷爷的一生就象他的名字一样，继承了刘家“景”字辈的强胜果敢，又兼有“儒”字所赋予的温文尔雅。他是个非常帅气的男人，气质非凡，才华横溢，自幼没有上过学，但他一辈子都在学习在创作。他的字写的飘逸俊秀，他画的牡丹和老虎是我见过最美的手工画，他喜欢写作，写的革命回忆录在多处报刊发表。他会裁剪缝制衣服，上至百岁我的老太下至孙子孙女都穿过他亲手裁剪缝制的衣服，比买的好看又新潮。他心灵手巧，给自己做的躺椅舒适漂亮，也是我们几个小孩子最渴望的享受。爷爷在院子种的葡萄、黄瓜、西红柿是我们最好的牙祭，葡萄架下，他躺在躺椅上，我们围在他身边听他讲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是我一生中最温馨、最幸福、最美好的回忆。

爷爷一辈子历经磨难，受过那么多罪、吃过那么多苦，却从没有埋怨更没有仇恨。相反，他的善良是那样的充满魅力，吸引着家人朋友喜欢他、爱着他。子孙们都秉承了他的善良和宽容，到现在我们胞弟、胞妹十几人，没有一个在社会上和人家会吵嘴打架，没有一个有什么不良嗜好，都是善良宽让、尊重生活的人。

爷爷对儿子媳妇是那样的爱护，对孙子孙女更是疼爱有加，从没有高声说一句重话。我是长孙女，因此我享受他的关爱更多一点。我记得我高考失败后，情绪非常不好，爷爷是当时唯一懂

的安慰我的人，帮我重新树立信心，走出困境，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好好孝顺他。爷爷在文革挨整时落下了偏头疼，我只要空闲就给他揉揉头，他画画写文章累了，我就放下手中的事情陪他下跳棋，但他没有等到我有能力孝顺时候就走了，没有穿过我给他买的新衣服，没有吃过我给他买的好东西，这成为我一生最痛的事。

很多年来我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一直坚信踏实做人、认真做事，以自己的真诚善良对待周围的人，就是对爷爷最大的回报。

爷爷的人生是丰富的、厚重的，爷爷的胸襟是宽广的、开阔的，爷爷的做人是尽职尽责的，爷爷的形象风采永远铭刻在我们的

我爱爷爷和奶奶

刘 睿 刘 垚 刘 磊 刘 博

记得小时候，爷爷和奶奶很爱我们，经常逗我们玩。爷爷和奶奶爱我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爷爷严厉，奶奶慈祥。我们兄弟三人，弟弟刘垚、刘磊是双胞胎，我比他俩大一岁。我们三个基本长的一般高，都很淘气，常一起联手“对付”爷爷，因此爷爷给我们弟兄每人起了一个非常好听、雅俗共赏的绰号“大瓜、二愣、三千脑”。后来五爸的儿子刘博稍大一点，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爷爷毫不留情的给他追加了一个绰号“四训”。这样，只要我们四人在一起，爷爷就象将军点兵一样，喊叫我们“大瓜、二愣、三千脑、四训”。

在家中属于爷爷的东西，是不允许我们胡动乱摸的。记得有一次，家中窗台上摆十来个啤酒瓶，我偷偷的拿了两个卖给了收破烂的，将所得收入4角钱，我们几个买了零食吃。此事不知谁告的密，让爷爷知道了，要惩戒我。奶奶怕我挨打，让我快跑，吓得我跑出家门钻到延河旁的一个涵洞里，才躲过了爷爷的追打。听爸爸经常讲，我们家在五六十年代生活很是困难，爷爷一个月四十元的工资，要负担一家10余口人的生活，实属不易。

奶奶是个十分刚强、能吃苦的人，尽管经济拮据，但在奶奶的操持下生活仍然安排的井井有序，全家人过着开心快乐的穷日子。正是因为这样，在爷爷奶奶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的爸爸妈妈，包括我们，都很注重勤俭节约，珍惜东西，从不大吃二喝、铺张浪费。从小养成了良好的热爱生活、吃苦耐劳、不搞歪门邪道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

爷爷和奶奶在1934年先后参加革命，爷爷在家乡保安（志丹）县参加了红军保安游击队，奶奶在家乡安定（子长）县参加了红军少年先锋队。说来也巧，奶奶于1937年被组织派往延安西北党校学习期满后，1938年分配到志丹县委妇联工作，担任妇联主任职务，认识了在志丹县抗敌后援会工作的爷爷，一见钟情。于1939年喜结伉俪。听八姑奶说，爷爷当时一表人才，聪明帅气，有周恩来总理的模样和风度。奶奶小巧秀气，聪慧贤淑，刚强豁达。他们是一对天配地就的革命伴侣。爷爷和奶奶赤胆忠心干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让我们后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常想，没有爷爷、奶奶他们老一辈人出生入死、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经历，哪有今天幸福美好的时光？因此，激励我要努力工作、乐于奉献，继续他们未尽的事业。

爷爷和奶奶亲身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赢得了新中国的建立。那时他们所遭受的磨难和艰苦，是心甘情愿，苦中有乐。最可恨的是那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那时我还未出生，但父亲经常讲起那段经受残酷迫害的经历，使我深恶痛绝。爷爷因为是刘志丹、刘景范的胞弟，以“三反分子刘景范伸向志丹地区的黑爪牙”，冠以莫须有的现行罪名，锒铛入狱。三年零六个月冤狱生活，使得爷爷饱经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

残。在爷爷被批斗和关押期间，我敬爱的奶奶以“包庇罪”被隔离批斗，在陕北零下30度的寒冬里，让她站在一尺深的结冰的冷水里交代所谓“问题”。残酷至极的迫害，未能动摇他们忠于人民爱国家的坚强意志。我的父亲、伯父、叔父、姑姑同时都受到株连迫害。当奶奶被解除隔离后，那被折磨的瘦小的身体，带着伤病还要强挣扎四处打工，维持一家人生计。爷爷被释放后，回到家简直不敢相认，骨瘦如柴，鬓须雪白。但他们复出后，仍然不计前嫌，继续在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任劳任怨，这种无私忘我的精神境界体现了老党员、老革命家忠于人民、爱国爱党、一片赤胆忠心的博大胸怀，令后人十分敬佩。

我长大后，有一次问爷爷：“听说您受了那么大的折磨和迫害，为什么还要这么认真负责的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爷爷说：“咱家是忠烈之门。你高祖刘士杰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贡生，为人厚道，刚直不阿，学识渊博，经常以‘耕读传家’教育子孙。你的曾祖刘培基，是晚清秀才，好助人为乐、抱打不平。你大爷刘志丹、二爷刘景范早年革命，为劳苦大众打天下，创建了陕甘边西北革命根据地，却被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诬陷入狱，差点被杀头。获释后，背负所谓的罪名，你大爷即率领部队东征，打通抗日通道，不幸牺牲在山西省三交镇，年仅33岁。你二爷去三边‘平叛’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年又被奸人陷害遭受批斗，直至文化革命因反对党内奸贼康生迫害老干部、祸国殃民，被逮捕坐牢七年之久。平反后仍一如既往的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为国家的建设兢兢业业努力工作。这是为什么？你看过历史吗？宋朝的杨家将、岳飞被奸贼那样陷害，仍然保家卫国驰骋沙场，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精忠报国忘我无私的胸怀，忠烈之心啊！”爷爷的一席话，使我明白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人的道理。

1992年，我已经在志丹电力局工作了，我一心也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人。爷爷因为工作调动到延安市政协工作，早于1979年就 and 奶奶、伯父、叔父迁到延安居住。爸爸和妈妈仍在志丹工作，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工作后不久，弟弟刘垚考入陕西省农电技工学校，刘磊考入延安卫校。毕业后分别都走上了工作岗位。每逢过年或者放假，爸爸和妈妈都带着我们去延安看望爷爷和奶奶，和他们团聚。我们一去，他们特别高兴。爷爷嘱咐我们弟兄几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断进步，多为国家建设出点力。奶奶总是担心我们吃不好、穿不暖，关怀备至。

1995年1月，爱我们我们爱的、我敬爱的爷爷逝世了。他老人家走过了82年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奶奶今年已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我们经常有空就去看望奶奶，她仍然还是那样，一见面就问寒问暖，拉住我们的手不想放开，总想多絮叨絮叨，非常亲切。我们也很想多聆听她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做人的道理，使我们受益匪浅。

深切怀念三叔景儒

刘继祥

适值三叔百年诞辰，转眼间他离开我们已十八年，他的人格品德、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再次勾起我无尽的怀念与敬意。

三叔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落后、闭塞的年代，好在祖父是民间少有的读书人，为清代拔贡生。祖父遭遇饥荒战乱，全家外逃，世事平定后，陕北已是十室九空，满目疮痍。祖父两兄弟九死一生，躲过一劫，幸存返回故里，余者罹难他乡，兄弟俩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面对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他们发愤图强，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以儒家文化治家教子，形成自己独特的家风家传。又远见卓识的教子女读书识字，白天田间劳作，晚上在老麻油灯下苦教苦读，农家小院充满读书气息，可谓耕读之家，三叔便是其中一位优秀学子。

那时学校太少，经济上并不宽裕，老太爷、老爷子铆足劲，倾其所能，供刘志丹进学校读书，他的书读的太好了，每每考试名列前茅，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自然而然成为学生领袖，他的才学令全校师生折服。

大革命时期，举国有多少优秀学子慕名报考黄埔军校，大伯

刘志丹经过层层遴选，一举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接受正规军事科目学习与训练，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创始人。

二叔景范，三叔景儒，四叔景星都是在楼子沟农家小院最早接触书、文字，接受文化教育。家庭教育培养了他们，提高了他们，儿时贪玩，有背不出书，写不好字，达不到要求，要自省、受责罚。

年龄稍长，要承担繁重的田间耕作、放牧活，即便再忙读书识字是不能间断荒废的，他们离家进入革命队伍前，各自都具有了相当的文化。

在延安时，逢星期天警卫员刘景祥就将自己首长刘景范锁在房子里，谢绝会客，专心读书。没有纸，将报纸折成方格格，练书法。二叔三叔的书法、绘画是一流的。他们深厚的文学功底，渊博的学识令我们读过书的人望尘莫及、感叹不已。

在楼子沟，刘家是一个勤于耕作，善于理财之家，他们披星戴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耕耘、收获。

夏日夜鸡叫头遍就起床上山，五黄六月抢时间种荞麦，换牛不换人，打前后晌耕种，有些地块远，就带干粮不回家，在山上歇晌午，可谓苦极了。男人们春种夏锄秋收，冬季要背来年的烧火柴，修理农具绳索，媳妇们团结分工，忙家务活。炎炎夏日，天不明烧火做饭、担水、田间送饭，喂猪喂狗。农历九月伊始，女眷们要加劲喂壮猪，想方设法育肥，用伏天自己采好的酒麴酿造黄酒、糖酒。楼子沟的家造酒醇香浓烈，远近闻名。漫漫冬夜，女眷们在老麻油灯下忙针线活，满天星斗，在碾磨道煨一堆柴火，套上毛驴，加工来年口粮，碾米、拉荞麦粃子，拉牛料，提前给耕牛加料，所谓早喂腿晚喂嘴。

几经艰苦创业，勤劳致富且精细算计，三叔家已成为四乡八邻富裕人家。但他们仍然低调做人，勤俭持家，从不奢侈浪费。

楼子沟是一个孝悌闻名之家，三叔的祖父、父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将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家庭，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兄、为人弟是有规矩的。有客来访，三叔弟兄必须热情迎送，牵牲口，接挽手（马鞭、打狗棍），卸马鞍，喂牲口；晚上陪客人拉话，老人、客人坐炕，晚辈一溜长板凳坐地；老人、客人拉话，晚辈是不能插嘴的，有不同看法只能笑笑而已。来了客人，苦了女眷，半夜还得伺候客人酒菜茶饭，家内一应事由婆婆做主，婆婆不在由嫂子做主，他们家文明礼让，谦恭和谐，深深影响乡邻，令人起敬。

三叔对父母孝，对兄嫂有礼有节，对妹妹弟弟仁慈宽容，对世人厚道，我想就是在这个良好地家风家教中形成的。

父亲一家在楼子沟算是宽容厚道、乐善好施之家，雇请的帮工，在活路、吃饭、工钱上总是宽容的。别人家帮工全年二十七八个银元，他们家一年开三十个银元。帮工们正月上工，十月结账走人，但有的帮工家有急用，总是提前支付些，帮工同主人吃一锅饭，每五天晚上犒劳帮工一顿，老烧酒、肥猪肉、炒鸡蛋、油烙饼。大家开怀酣饮，吃个痛快。

遇到年荒，对于上门求救的乡邻，不等多少，总要给些粮食，总之不能让人空手回去，民国十八年饿死人的大灾年，他们帮扶救济过无数人家渡过难关。

我大哥二哥八九岁放牛，地广人稀狼多，父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父亲路过楼子沟住了一晚上，他们闻听后，老奶奶二话没说，天不明，烧了一马勺滚水，烫了一疙瘩荞面，烙了几张饼，打发父亲牵着一半大黑狗回家，大哥二哥安全了，大人

才放心了。

母亲九十五岁高龄仍在念叨，对于这件事她是刻骨铭心的，直至生命最后一年，也没有忘记这条狗，这件事。

抗战时期，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我大哥在延安边区政府当通讯员，二叔用仅有的一点津贴买一个饼，不忘给大哥掰一半，一个煮鸡蛋用线绳锯一半给大哥，今天人们很难相信，很难理解，但在那个小米饭吃不饱要吃马料的年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听母亲讲，三叔进入革命队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卸不掉的农家生产重担，老父母、小弟妹一大家子张口要吃饭。大叔、二叔又都远离家投身革命，全家生活重担就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三叔的肩上，但他受大叔刘志丹、二叔刘景范的影响，为国为民矢志不渝，仍然选择舍小家顾大家，毅然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三叔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活下来了。

战争年代的事，我因年岁小并不知道，二哥刘随志给我讲了三叔四叔在1947年转移保存刘志丹烈士灵骨的事。

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三叔父母及全家老幼，移居今纸坊乡高粱行政村郭畔村屈家居住，眼看敌人来了，三叔受县委秘密指示，和四叔等人将刘志丹烈士灵骨从县城陵园悄悄运出转移，头一天刘素清奶奶叮咛要准备红线绳，将灵骨按原顺序穿起，不要倒错。女眷们包括小姑娘玉兰，七脚八手搓捻棉线绳，用洋红染了一下。

我二哥清楚记得，那是古历二月的一天，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二十几步开外看不清人。下午三叔四叔各牵一匹马，驮着捎旌回到郭畔村，存在底沟串洞，晚上人在暗处守候，怕有个差

错，直到天上三星偏西，三叔说：“不要紧了，咱们回吧。”第二天我二哥和聚财子（两人都是通讯员）下到沟底往回背，沟底有滴梢（瀑布）路段，暗冰多，两人互相搀扶，背到庄子，秘密送到纸坊乡梢沟塔刘荣昌处寄存。棺内衣物、党旗由我父亲寄存在金丁镇下罗坪万寨沟串洞。

时隔不久，胡匪进入县城，将陵园石碑砸了，墓毁了，侵害的一塌糊涂，真是有惊无险，三叔四叔冒死安全保护了烈士灵骨，为人民立了大功。

建国后，我懂事了，三叔总喜欢到我家，他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商贸经济工作，那时布匹十分紧缺。一般生活用品，包括火柴、纸张、墨水、针线等等极其短缺，靠毛驴从外面往回驮。三叔负责调运，还有羊绒毛、皮张等土产品销售外运。他是很忙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骑毛驴，长年奔波往返于延安志丹，同脚夫睡一盘炕，吃一锅饭，十分辛苦。我上延安中学，一次巧遇，我们歇在一个骡马店——郝岔村，我和三叔都很累，但我们很高兴，三叔给我买了一个玉米，我感到无比亲切。他为志丹经济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几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叔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三年之久，遭受了非人的毒打侮辱，但他始终不讲假话，不屈服，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彻底平反，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吃苦耐劳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从楼子沟走出的人身上，氤氲着智慧文明的气息，厚道和善的气息，我想那一定是从那位有远见的老太爷严谨的家风，严格的家规熏陶延续下来的必然结果。

从这个耕读之家、家庭教育基地先后走出五位省军级以上、三位厅局级、九位县处级领导，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深切怀念三舅爷刘景儒

王旭光

我老太（曾祖父）王丕章的三妹生育三个儿子，是我爷爷王兆吉的姑舅（表）兄弟。所以是我的姑舅爷（简称舅爷）。大舅爷我没见过面，二舅爷因在北京工作，我也只见过二十几次，唯与三舅爷从小就很熟悉。因他与我爸王悦贤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他经常来我家，我与他见面不计其数，而且在五十年代初，一起吃住一年左右。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舅爷诞辰百年之际，更是引起我对他的回忆和怀念，有许多方面，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小时候听说有一种“洋戏匣子”会唱戏，有一种“铁驴”骑上跑的很快，感到很稀奇，梦想有一天能看到它有多好啊！我问舅爷：“你住在大城市（当时认为县城就是大城市），见过吗？”他给我详细进行回答，可是我就是想象不来“洋戏匣子”和“铁驴”是什么模样，是咋回事。他答应我以后买到就带来给我看。过了不久，舅爷首先带到我家来的是“洋戏匣子（留声机）”，又过了不长时间，骑来“铁驴（自行车）”，并表演给我们看，他还教会我爸骑自行车。这两件稀罕物在当地引起很大轰

动，来我家看稀奇的人络绎不绝，使我们大开眼界，我很感激舅爷对我们的关怀。

三舅爷受两位哥哥的影响，在父亲的支持下，在三十年代初就参加红军部队，曾当过骑兵，担任过部队基层领导。全国解放前根据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他到地方工作，岗位多次变换，均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处理问题公平正义，与下级关系融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老革命，是有职有权的“官”。我与他虽然很熟悉，但1956年以前没去过他家，后来到志丹县城上中学时才经常去，看到他家远近亲戚、家门（家族）经常有人来。舅奶和他不厌其烦的热情接待，一点也不摆架子。可见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他重亲情、重友情。相比现在有些城镇住的干部，舅爷的品德显得更为高尚。

他保持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德，不谋私利，不争权夺利。舅爷也是老革命，和他熟悉且关系好的高级干部很多，可他不眼红，从不想找关系谋个职位高的工作。我曾和他谈过这方面的事，他说职位高低都一样，都是为党为民做事的，任何工作都需要人去做，如果干部都想当大官，社会就乱了，人民就会遭殃，那还是共产党吗？那我们就白革命了，只有认真负责，尽心做好组织分配给你的工作，才是最好的。当时我年少，并不理解他的话。直到工作后才逐步明白一个老革命、老党员的高尚品德。

官大不一定人品好，钱多不一定德性好。人的一生最为重要的是品德。因此他几十年默默无闻，在基层工作，岗位多次变化都能认真做好自己那份工作。真是“共产党员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相比现在一些党的干部，更突显他高贵的人生观。他

从不在领导面前阿谀奉承，1958年夏季，有一次晚饭后，我跟他志在丹街道散步，迎面走来的县委书记主动向他打招呼，他如同遇上一般的熟人一样，点头而过，我说他：“你怎么不热情一点，上去说说话”，他说都是逛街，县城就这么大，遇到的熟人太多，都说话那咱们就走不动了。可见他对领导和老百姓是一视同仁的。

我偶尔也听到过别人对他的非议和意见，我当面提醒他，他不生气，总是笑眯眯的给我解释。我觉得舅爷的涵养性很好，与他相处几十年，没见过他发过怒，他总是那么和善、慈祥。

在我的印象中，三舅爷是位大孝子。记得在1952年，他以三兄弟的名义给他们的母亲立了一座蛟龙碑。他与他父亲商议后，立碑的事至始至终都由他来筹办，从取石料到往碑上写字、画图案、雕刻，我都亲眼所见，因为这项工作都是在志丹金汤进行的，有关人员的吃喝住宿都是在我们家，由我奶奶和我妈负责，我爸负责施工现场，我有时给跑个腿，看个新奇，以前我见过很多碑，但不知道是怎么制作的。这座碑是由很多部件组合而成的，且有三层阶梯石头底座，大小尺寸我不清楚，总的感觉是，比我所见过的其它墓碑要高、要宽，给人的感觉庄重、大气，造型美观、做工精细、图案新颖、字迹秀丽。所有的大小字均是我大舅爷（我四姑老太的长子）韩光涛书写的，他的字在当时洛河川志、吴两县是最好的，图案是三舅爷亲自画的，他的绘画水平相当高，尤其是画老虎上山，很逼真。在两侧挽联周围画了笔、书与飘带缠绕。石工是绥米脂有名的老工匠冯生奎。碑上挽联的上联是：生前典型留于世，下联是：歿后模范在人间，横批是：流芳百世。这些字是用行书写的，每一笔都雕成弧形，有立体感，碑文是用楷书写的小字文言文，其原文我记不清了，但

大意是褒奖他母亲孝敬公婆，尊老爱幼，精心抚养教育子女，言传身教影响孩子，希望子女成人后品德好，有能力。她勤俭持家、吃苦耐劳，是操持家务的能手，推滚碾磨、穿针引线、洗衣做饭，样样精明能干，与左邻右舍关系和睦，她的为人处世受到众人的高度赞赏。最后告慰母亲，子女们都成家立业，没有辜负她的期望，请她安息。落款是“立碑人：刘景桂（志丹）、刘景范、刘景儒。石工：冯生奎。监制：王悦贤。”

我所见过的碑都是立在亡者坟墓前，可我姑老太的碑却是立在我家祖坟（高祖王怀亮、曾祖王丕章）前的路边上，位置是在金汤南门外路北的南寺台。对此我问三舅爷：“姑老太的坟在楼子沟，为什么碑立在这里”，他说：“你姑老太去世早，在楼子沟山上没有亲人陪伴，很孤单，碑立在这里，让她的灵魂和她的父母、哥嫂在一起。另一方面，你们家四代单传，到你们这一代兄弟多了，这里是交通要道，你们弟兄来往走的多，让他看到娘家后代兴旺一定很高兴，再者立在路边上，让众人知道你老太的功德，向她学习。”

这座碑从立项、选址、设计、工艺和碑文都包含了舅爷们对母亲的孝顺、崇敬、感恩和怀念之心。

立这座碑对后代、对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竖立不到二十年就消失了，在文革期间，1968年前后（具体日期无从考证），四人帮的追随者伙同别有用心的坏人指使受蒙蔽的红卫兵将碑砸成碎石，深埋地下，我家的祖坟后来也被铲平了。他们砸的是碑、平的是坟，实质上毁的是人类的精神文明。

我家的祖坟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弟兄们又给恢复了，以便后人祭奠。但愿我姑老太原碑的遗址处能立一尊说明牌，以作永久纪念。

我的继姑老太（三舅爷继母）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过，三舅爷很孝顺。在国家食品短缺的那几年，他经常打些野鸡、鸽子、野兔等，自家舍不得吃，给她从志丹送到西安来。

我舅爷三兄弟家有什么大事，都请我们家人参与，虽然我们是晚辈，但注重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大舅爷的陵园落成祭奠，请我爸参加，以后的几次纪念活动都请我家人去了，二舅爷在北京逝世，及时的通知我，并通过办公厅给我发来讣告，三舅爷的寿材制作和他的后事安排，都征求过我五弟王旭昆的意见……

请母亲娘家人，不仅仅是出于亲情关系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对自己母亲的尊重、对母亲的孝心。

舅爷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传统留给我们，我们要认真的传承。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纪念三爷刘景儒诞辰一百周年

刘宏彦

志吴大刘氏是一个知书达礼，英才辈出的名门望族，也是为中国革命做出突出贡献和付出巨大牺牲的家族。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名景桂）将军为代表的刘门子嗣，踊跃加入中国共产党，纷纷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先后有其胞弟刘景范、刘景儒，堂弟刘景明、刘景瑞、刘景祥、刘景光，族弟刘景全、刘景恩等加入革命队伍，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将军及其堂弟刘景祥、刘景光，血洒疆场，马革裹尸，可歌可泣，气贯长虹。

2013年4月10日（古历），是三爷刘景儒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为缅怀先辈的亮节高风，仁德鸿范，继承先辈革命遗志，启迪后世族人更好地为国家，为民族的繁盛而努力，故撰文以示纪念。

第一次见三爷是1992年的冬季，在延安开会的间隙，我专程拜谒了三爷三奶奶。时值下午，家里气氛融洽，温馨洁雅，三奶奶出门迎接，我自我介绍说：“我是刘景祥的长孙”，二老听后，百感交集，顿时深陷对往事的回忆，声音有些哽咽，此时的

空气仿佛凝固了。沉默片刻，三奶奶赶紧沏茶让坐，我的不安和局促瞬间荡然无存。那时我正值而立之年，初谙人事。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及族中长辈经常讲刘志丹将军闹革命的故事，也讲二爷刘景范、三爷刘景儒及诸姑伯叔的事。所以三爷及三奶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早已形成定格。果不其然，三爷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但其英姿焕发，精神矍铄，言语和蔼可亲，言谈中更多的是鼓励我这个族孙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要为先烈增光，绝不能为他们抹黑，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默默之中我感受到了三爷的殷切期望，聆听着他谆谆教诲，受益良多。热情好客的三奶奶忙前忙后，为我张罗可口的饭菜。对三奶奶的了解多是母亲讲给我听的，我知道三奶奶在家族中的口碑极佳，扶弱济困，善待邻里，孝敬公婆，操持有方，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伟大女性。看到三奶奶慈祥可敬的面孔，我眼前模糊了，联想起自己的家世，爷爷牺牲时父亲仅三岁，奶奶后来改嫁，在我呀呀学语中就没有爷爷奶奶这个词汇，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

第二次拜见三爷三奶奶是我同五爷刘景鄂一同去的，看到老家来人了，二老非常高兴，嘘寒问暖，叙说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三爷谈兴正浓，我洗耳恭听，生怕有人打断他的话题。这是我见三爷的最后一面，随后闻知三爷已去世，因外出学习，未能有三爷送终，实为不孝。

三爷幼承庭训，受晚清贡生的祖父刘士杰的点染，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蒙学经典，遍涉四书五经，虽未入校求学，却对传统儒学思想颇有心得，忠孝仁爱，豁达大度。在乃兄刘志丹、刘景范领导西北革命斗争，建立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岁月里，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家庭重

任，起早贪黑，扶老挈幼，耕种收获，劈柴挑水，从无怨言。同时他又作为刘志丹的秘密交通员，传送情报，宣传革命思想，动员进步青年积极参加陕北红军，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36年乃兄刘志丹将军在东征前线壮烈殉国，他悲痛欲绝，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抚孤育幼的家庭重担，尽一个胞弟应尽的责任。

全国解放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闲暇之际，义务担任革命传统教育的辅导员，讲革命道理，传爱国思想。教育子嗣后昆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又是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人，他是一个具有高尚情操的共产党人，他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

三爷刘景儒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情怀毋庸置疑，他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着亲情的人，家族中的子侄孙辈他常常挂在嘴边，堂叔姊妹弟兄铭记心上。晚年之际，他不顾体弱多病，在子女的陪同下，走村过乡看望姊妹兄弟，白杨树嘴、火烧嘴、楼子沟、西沟塔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他收入虽然不高，却给每个老姊妹兄弟都要做上一套崭新的衣服，传递着浓浓的亲情和爱心。这些往事回想起来，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追念英雄的弟弟刘景儒

尹国安

这个老人逝世的时候，我去吊唁了。今年五月，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是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纪念，提醒我应该写篇文章纪念他。

八十年代初在延安政协工作不久，我与他相识。我俩在一起工作六年。刘老年长我三十岁，所以我和大家都亲切的称他为刘老。刘老是刘志丹的三弟刘景儒。

刘老任政协常委时主要分管文史资料工作，在挖掘、抢救、整理等方面征辑大量的素材，深受社会好评。如《移灵》一文，那是1939年4月5日清明节，刘志丹胞弟刘景儒携家人亲戚于刘志丹逝世三周年之际，赴瓦窑堡祭奠亲人。

刘景儒一行山环水绕，风尘仆仆前往瓦窑堡城南三里处的水沟坪上坟。

光阴荏苒，匆匆已过三年，刘景儒等拿着香裋、奠酒、祭食、素果、纸钱踏进野草丛生、四野谧寂的坟冢，由于雨洒风耗，野兔、瞎烩掘行，坟地一片荒芜，草没腰际，坟土多有洞穴、塌陷。遥想亲人平生厥功伟业，惹人分外伤心……

由于边区日安战事渐远，刘志丹亲人祭坟归去时，渐渐萌生了将家兄迁回志丹，让亲人魂归故里的念头。

刘老说：“我那时年青和大家一合计就为移灵之事竭力奔走、呼号，之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21日，志丹县政府县长赵耀先顺乎民意，率先上书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高岗二主席，正式要求将刘志丹将军迁回家乡安葬。”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抗字第二九二号批复：

呈悉，查迎葬先烈刘志丹灵柩一节，应予照鉴，本府已责成教（育）、建（设）两厅设计办理中，仰即转施，故照！

此令

主席：林伯渠、高岗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兴建刘志丹烈士陵园。

1943年4月上旬，边区政府和志丹县政府共同召开“志丹陵落成典礼”。

1943年中旬，延安专区专员曹力如、副专员马豫章奉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负责刘志丹灵柩回故乡安葬工作。刘志丹胞弟刘景儒接到边区政府通知，急赴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接见他，让他随马豫章等一同赴瓦窑堡迁灵，并特派一个骑兵排作为护灵队伍。4月18日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一千人等，率领警卫队战士及群众代表和边区政府的迁灵人员，一同来到水沟坪山麓举行了600余人参加的破土仪式，深挖5米左右，起出灵柩。面对志丹遗体，胞弟刘景儒心如刀绞，黯然泪下，在场的干部和群众都非常悲痛。

4月19日，子长县在中心大操场举行“公祭刘志丹烈士大

会”。4月21日延安县在李渠镇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

4月22日下午1时，边区政府和延安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万余人聚集桥儿沟，列队迎灵，下午4时，志丹灵柩到达东关广场时，又由朱德、任弼时、高岗、林伯渠等人将灵柩抬入灵堂。

4月23日下午两点半在延安专署广场举行了15000人参加的公祭大会，由延安卫戍司令王震担任大会指挥。

5月2日，志丹县万人公葬革命先烈刘志丹。

刘老在文史资料整理中还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木一春”、“生老病死，原本是自然规律。”老人已是古稀高寿，也是寿终正寝，功德圆满。他走的时候，想必是心怀坦然，无悔无怨。

认识刘老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生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禀性耿直，刚正不阿，是他那一代人中，德高望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朴素真实，质朴无华，是地地道道的革命老区成长起来的人民公仆。

一次我们闲谈，刘老说中国人讲忠孝，大哥、二哥当兵走了，丢下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总得有人照看，所以我就不能远离家乡了。这句大实话道出了中国传统道德中貌似浅显，其实十分深刻的美德风范。包含着宽广胸襟和无私奉献精神。刘氏家庭的兴旺发达依然饱含着那位已经过世经年老人的心血和汗水，浸润着那位默默奉献、热心、诚恳、睿智老人的一片深情。

刘老为了敬孝养家，未能远离家乡，追随部队。但他1934年就参加革命，在地方做了大量的地方工作和支前工作。所以在陕北人民的心目中，他也是功勋卓著的老革命。他从小就受大哥刘志丹、二哥刘景范的熏陶，同时他是谢子长、习仲勋很要好而

且十分器重的革命战友。习仲勋和刘景儒是同龄人所以谈的更多，常常开玩笑说“咱俩谁是黄牛、谁是水牛。”习仲勋说“我看你是一头黄牛，一条能革命、会工作、又顾家的黄牛。”

那是1983年清明节前的一天，我们政协的全体干部去宝塔山下植树，我们植的松树苗子很大，植完树后，大家在食堂里吃了饭，花销三百多元，刘老说我们算一算帐，我们栽的每棵松树都价值二十多元钱了，可见刘老对干部和自己工作生活上的严格要求。但在政协会上，刘老总是要求后勤人员把灶办好，把伙食标准提高，让各民主党派委员安下心开好会。刘老说这叫内外有别，政协工作就是党的统战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宣传，执行就要靠我们政协干部执行。从个人交往来讲，我们相处很好。他对我很信任，我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就找他谈。当时政协有正副主席六人，只有一辆小车，派车、用车特别是安排司机的问题，领导意见不统一，使我左右为难，刘老主动出面调解，说你们两个主席意见不统一，难为国安具体办事人，这是不应该的，一个小车两个司机，谁上车、谁不上车你们要拿出统一的意见，不能推给办公室。刘老就是这样急人所难，助人所困的人。闲暇时我们总爱让刘老讲讲过去的故事，他常说我们不要搞政治说教，不要突出个人，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相比，个人又有多大的历史功劳？有什么值得标榜，值得宣扬的呢？我们有些同志为此吃过大亏，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将来还要吃大亏！刘老言语不多，但他那语重心长的话语，简约深邃，动情透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次强烈的感召和震撼，对于我，更是深切地体会了情真意切，胸怀坦荡和虚怀若谷这样一些成语的真正含义。

1985年政府要求单位包村包户扶贫下乡。政协包的是柳林乡

四十铺村，我主动报名下乡蹲点，临别时刘老说：“就是要提倡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现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我们就是靠宣传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取得政权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在蹲点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心中总是翻腾着那句话“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格言，也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职业革命家留给晚辈的临别赠言。刘老有意无意间给予我的教诲是丰富而令人终生难忘的，它将永远鼓励和鞭策着我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努力实现党的宗旨，顽强攀登完善的人生境界。

永恒的记忆

石振华

光阴荏苒，弹指瞬间。2013年是西北红军缔造者、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全国著名的36位军事家之一刘志丹将军的胞弟刘景儒老前辈的百年诞辰。我与刘老前辈相识在20多年前，虽然跨越了历史的时空，但对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永远不能忘却，成为我脑海中的永恒的记忆。

1992年我去延安上技工学校，受爷爷石有贵的重托利用节假日去看望和他一块生活过、战斗过现在延离职休养的刘景儒、黄克强、申易等老前辈。这年9月我携两袋家乡特产——荞面，前往位于延安南桥白坪市场后院350号两层楼房的刘爷爷住所。那年他年近八旬，满头银发，大白脸、高个子，身着黄呢子军便装，胸前佩戴一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一派英武之气。我终于见到爷爷朝思暮想的刘景儒老前辈了！我告诉自己的身份及来意后，他显得十分热情与高兴，亲自倒水沏茶、问长问短。

这是我与他第一次见面，他给我讲了以下几件事情：

1. 我六老太爷叫石炳堂，自幼习武，曾于1930年随刘志丹参加著名的“太白收枪”。后由于作战勇敢，英勇牺牲。我们这

才知道他这段鲜为人知的英雄事迹。

2. 刘景范被执行“左”倾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关押刚出狱后，在赤安县被不明真相的同志以右派第二次被关押，但是他忍辱负重、历经艰险，仅用三个月时间率领平叛部队依靠陕甘人民群众的支持，平息“赤安事变”，七战七捷，消灭了叛匪，把赤安、靖边、定边、华池根据地完全恢复，为党中央定都保安奠定坚实的基础，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3. 1935年9月红25军来陕北后，他在甘泉下寺湾王家坪红15军团部去见徐海东和程子华两位领导时，发现该军团部大门站着双岗，战士背着盒子枪和鬼头刀。有一名战士由于没有将机枪擦亮，被另外的殴打一顿。当时自己不明白红军有铁的纪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只能进行批评教育，为什么这支队伍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4. 在位于下寺湾义子沟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他看到除了主管经济工作的耀县籍杨在泉和穿着黑军装、背着盒子枪、拿着大刀的红25军战士，其他的干部均不在政府。杨在泉吓的悄悄的用关中话对他说：“好娃了，你来干什么？日他妈，已经杀了两个人，都是下寺湾的干部”。随后他骑着毛驴赶快往家里走，路上碰见了安塞籍的郭子贵，他也惊讶地说：“你们还在这住？刘志丹主席在军委开会扣了起来，问什么原因人家不说。”之后他就带着家属东躲西藏，直到党中央、毛主席上来后，事态平稳才出来。

5. 20世纪70年代末，刘老前辈去北京见到了胡耀邦同志，在他的关心过问下，自己的冤案被平反，所谓的“问题”得到解决。

谈完以上这些事后，天将暮色。刘老前辈又不顾年老体弱，

又带着我去当时的县级延安市医院看望正在那里治疗养病的黄克强老前辈。黄老前辈系陕西商洛山阳县人，年幼时由于支付不了过河坐船的钱，曾经从虎尾春冰的渭河冰面爬了过来。一生经历了渭北武字区、照金薛家寨、华池南梁三个时期的陕甘革命斗争，直至解放全中国。他头上、脸上、身上刀痕累累。我曾于1991年清明节在志丹陵刘志丹雕像揭幕仪式上见过他及张策、刘懋功、李赤然和王四海等老革命。黄爷爷谈1935年所谓的陕北肃反时深恶痛绝，神情激动，并说自己曾到北京看望了习仲勋、张秀山、张策、张邦英、李建彤等老同志，并和自己某位老战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还说自己携带着王四海写给延安地区党史办关于西北红军斗争真相的一封信，却遭到了一位姓刘的冷落。

1993年2月我爷爷因病在原籍志丹县石沟老家去逝，中、省、市、县领导及曾和他一块生活战斗过的老同志都从祖国各地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深切悼念和慰问。我于当年4月份再次来延探望刘爷爷。他对我爷爷的逝世再次表示哀悼。又给我讲了和帮助做了以下几件事。

1. 给我讲述他春节去深圳市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习仲勋老前辈，拿出来他们俩人的合影让我看，并且告诉我深圳市迎宾馆南园家中的电话，我至今保存在笔记本里。他说习仲勋老前辈虽然身在南国异乡仍然关注着延安的发展与建设。

2. 我弟弟石振中在甘肃省金昌市武警支队机动中队服役，刘老前辈得知后当即写信给在甘肃具有崇高威望的原省人大主任王世泰让他予以关照。

今天虽然刘景儒老前辈已经辞世近二十年了，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现在我们来纪念

他，就是要学习他身处逆境而忠于党忠于人民，学习他屡遭坎坷仍然胸怀坦荡，学习他忍辱负重却能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我作为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革命后代来纪念老前辈，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大力弘扬刘志丹、刘景范、刘景儒等刘氏兄弟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继往开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刘景儒老前辈永远活在陕甘人民群众的心中！

跟上刘志丹去闹红

——刘志丹胞弟刘景儒坎坷人生

姜永明 宗廷璋

兄长闹红我看家

1913年5月15日（农历4月10日），陕西保安县金鼎乡楼子沟村的一户耕读之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爷爷给他起名刘景儒，字子珍，乳名庆生。因此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一生拥有无数人的羡慕、爱慕的荣耀，也有超过常人的坎坷、艰辛的人生。

他的大哥就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缔造者，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年长他10岁，二哥刘景范，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共和国的部级干部。年长他3岁，此外，他还有刘桂芬、刘桂兰、刘桂菊、刘桂叶、刘桂芳4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他从记事起就发现，父亲刘培基长年在外奔波谋生，家中大小事情都由爷爷和母亲操持。由于时逢兵荒马乱，饥谨不断的年代，家里又有大小十余口，日子过的也非常艰辛。

当他长到六七岁时就跟着大哥、二哥读书认字，渐渐也读熟了《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字》、《朱子家训》等启蒙教材。记得一次爷爷将他们叫到面前，对大哥志丹说：你也长大了，应该有个打算。大哥问：我能干点啥？爷爷说：你看见咱们门匾上的那几个字了吗？“——是不是耕读传家”“对，那就是咱家的传家真言”，爷爷解释道：“人生在世有两件大事，一是耕地种田，不管什么人都要吃饭，不种地，那来的粮食；二是读书，不读书，不认字，不懂天下事，更不要说做官了，有知识，懂道理，做官要为人民办事的清官，而不是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贪官污吏，所以，我想让‘耕读传家’这四个字世代相传。”爷爷的一席家训，可以说震动了在场的每个孩子，也影响了刘志丹姊妹们的一生。大哥刘志丹在家人的支持下从1919年起先去永宁山，后去榆中，再去广州黄埔去求学，越走离家越远，后来便杳无音信……他跟着二哥刘景范揽羊务农干家务，过早地体会到生命的艰辛，当然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他也感受到亲情的温暖，童真的乐趣。

1923年5月，他10岁时，母亲因分娩时难产，出现“血迷”（即大出血）撒手人世，抛下了他们嗷嗷待哺，大大小小的姊妹8人，因为母亲的辞世，让他更多地体会到生活的困顿，也经历了灾荒、饥馑、匪患，爷爷逝去的悲伤。在苦难的发月中渐渐长高长大。他也熟稔了许多农活、犁地、抓粪、锄草、打场样样都行。

1928年秋，刘志丹渭华暴动失败后秘密潜回家乡兄弟相逢喜极而泣，互诉着离别之苦，也将家中的诸多变故告诉兄长。刘志丹还家后渐渐向弟妹灌输革命道理，并将他们全部领上革命道路，也使他家成为陕甘重要的红色据点。1929年6月1日，院外

拴的大黄狗咬的厉害，他出门一看，见沟对面老梨树下躺着一个人，他跑至身旁问他姓啥，他说姓李，叫李秋阳，是个教书先生。接着又问他这儿有没有个叫刘敬恒的人，他说没有。回家后，他将此事告诉了刘志丹，大哥二话没说，拔腿就往外跑，不一会就将那李先生请回家中，后来，他才得知，李先生就是陕北鼎鼎大名的谢子长。谢子长在他家一住半年多，他时常与谢子长作伴、拉话。

不久，大哥刘志丹和谢子长就拉开了“三道川起义”的帷幕。刘志丹去庆阳谭世麟部进行兵运活动，谢子长从宜川收编百余人驻扎三道川齐家桥准备相机起事。刘景儒和表哥王兆基、孙向奎在三道川齐家桥寨子上帮他们征收畜税，不久，洛河川的土豪张廷芝害怕刘志丹、谢子长的力量不断壮大，因此，先用金钱美色瓦解刘谢的队伍后又对三道川进行血腥屠杀，刘志丹、谢子长侥幸脱身离开保安。刘景儒也在“三道川失败后返回家中，焦急地打听刘志丹，谢子长他们的生死下落。”

在刘志丹闹红的日子里，刘景儒和家人也遭到敌人的仇恨报复，一家人时常东躲西藏，整日无法安生，家中永远失去了过去的安稳和平静。此后，刘志丹在陕甘边闹红岁月中，又最先取得永宁山改选团总的胜利，又进行太白缴枪，打响陕甘边公开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组建南梁游击队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召开陕甘党史上的遵义会议“包家寨会议”，历尽七十多次的起义失败，最后胜利开辟南梁根据地，建立红 26 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二哥刘景范也将家务托付他于 1928 年秋开始投身革命，1930 年入党，毅然离家追随大哥参加南梁游击队，进行了陕甘根据地的浴血斗争。他一人带着家中十余口男女老幼艰辛地熬时度日，同时还要躲避国民党军队，反动民团的骚扰、侵害。

习仲勋接他家上南梁

1934年刘志丹和他的战友浴血奋战终于在南梁建立陕甘地红色政权，国民党非常仇恨，调大军进行残酷“围剿”，刘志丹采取迂回战术与敌人进行周旋，同时，派人去楼子沟送信，让刘景儒招呼家人进山躲避。他们接到刘志丹的口信后连夜动身，向楼子沟东高楼湾行进，投奔本家族人，由于他们人多家大，在族人家住了几日就不好意思再住，加之他的妻子临盆后，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他又不能让妻子死在别人家中，只好再回楼子沟。回家没几日，妻子病逝，所生女孩只好让岳母带走，后8岁时死于战乱。这时敌人到处张贴告示凡捉住刘志丹父亲和其兄弟一人者，赏银子500两，敌人四处搜捕刘家人，他与父亲只好带着家人再踏上逃难之路，历尽艰难。

1934年4月，甘肃军阀谭世麟派儿子谭杰侯，敌军团长仇良民率兵进入保安县，在金汤镇镇王四麻子和赵石洼王八带领下，在冯家洼抓了刘志丹的六舅刘占魁，在小庄科抓了刘志丹的堂叔刘月祯，然后冲进楼子沟。抢走刘家羊子一百多只，又将刘家财物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了刘家房屋、窑洞、马棚、羊圈。最后还丧尽天良，专程去吕渠沟挖了刘家祖坟，挫骨扬灰，拉屎拉尿……同时，另一股敌军在李鸿轩带领下，在任家沟抓住刘志丹的大舅王永庆，在芋子湾抓住刘志丹的表兄王兆吉及儿子王悦贤，夜晚哨兵怜其年幼私自将王悦贤放走。第二日，王永庆、王兆吉、刘占魁、刘月祯等7人在金汤被杀害，稍后刘志丹的二宗友仁也被杀害。

1935年，敌人在永宁山将年仅17岁的刘志丹堂弟

刀铡死，不久又杀害了另一位堂弟刘景光。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刘志丹的家人刘景儒他们在乡亲的掩护下，在深山躲藏了大半年。刘景儒领着父亲曾流浪三边直至内蒙草地。直到后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获悉刘志丹家中遭受的劫难后，立即派人去敌军占领区寻找刘志丹家人，于1934年7月终于找到刘景儒他们，并巧妙地避开敌人的严厉盘查、搜捕，安全地将他们送进陕甘根据地。

南梁会议结束后，刘志丹准备动身赴各处巡视工作，摸清情况，全面筹划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这时，习仲勋笑哈哈地跑过来说：“老刘，先别忙着走，快回家看看吧！”刘志丹不解地说：“不回去了，家早被仇良民和谭世麟抄了，还有什么看的！”习仲勋说：“刘家伯父和刘嫂都到了南梁，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去见面。”

刘志丹闻讯后立即去高庄湾与父亲、弟妹、妻子、女儿相见，一家人劫后重逢，悲喜交集。刘志丹还将女儿贞娃抱在怀中亲了又亲……。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一再当面向习仲勋道谢，感谢习仲勋救了他们全家。

周恩来瓦窑堡劝慰他

他早在1934年3月就受兄长刘志丹、刘景范影响参加了保安游击队，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不久在保安北岭的吴堡川遇险，幸亏一位村民报信才避过敌人，被敌人追得跑了几道梁，恰遇天黑，敌人收兵驻扎，他才脱身累得吐了一口血，始保全性命。7月将刘志丹父亲、继母、妻女、子女一行十余人带入陕甘南梁与刘志丹相逢。8月，他随保安游击队攻打旦八寨子，未克

死伤惨重，游击队只得放弃计划。

1935年2月，国民党三十五师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向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围剿。这时，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下令调他回南梁组织政府领导人的家属转移。

习仲勋告诉他，边区政府向东转移，大约到甘泉的桥镇一带，我们可以在那儿汇合。他受命组织了边区政府家属约七、八十人的转移队伍，扶老携幼，婆姨娃娃一大群踏上了迁移之路。第一天从南梁出发，翻山过沟，天黑行至豹子川的双塔沟掌，他找见一孔废窑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准备翻山东行时，有人发现对面山岭上好像有敌人骑兵在来回搜寻，他急忙命令队伍就地休息，不得乱跑，等待敌人撤退。一连数日，敌人盘桓不退。入夜，他组织召开掩护干部会。会上，他说看情形敌人一时半会没有离去的意思。明天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吃过早饭后，带小孩的妇女自行找地方隐蔽，这样做目标小，一家出事，不会连累大家；二是将携带的粮食就地掩藏，吃一顿取一顿，不能让敌人发现。第二天，大家按他的命令行动，鸡叫吃过饭匿居梢山，天黑再悄悄潜回。谁知几天后出事了。他们藏匿的粮食被梢林中一群野猪吃光，大家闻讯后，又哭又闹，乱成一团。他一面怪自己虑事不周，一面安慰大家明天另想他方。第二天，他派一小伙侦察完敌情后，他带大伙直奔大东沟，夜宿油房头川。天亮后准备下前川，路遇一个收木耳的人，闻知敌人骑兵把边区医院踏了，杀掉两个伤员，据说一个还是红军团长。这样一来，他当即改变路线，带大伙翻过八卦寺山，到东梁沟找了几孔破窑栖身。但缺粮的问题却依然威胁着大伙，大家不愿等死就纷纷想办法，摘树花，挖野菜，采木耳，抖粮袋来充饥。不久因营养不良，出现夜盲眼，有人晚上看不见路，他赶紧决定迅速去找红军。他带人过

瓦子川，到黄家坪，从村民那里获得一些粮食，当村民得知他是刘志丹弟弟后，特地送到一处秘密山寨，他终于又见到习仲勋。习仲勋忙问志丹父母及家人情况，他将一路情况和已断粮食数日的困境告知习仲勋，习仲勋当即说：明天一大早，就派人把你们送到洛河川苍沟马海旺大爷家里，他是刘志丹的把兄弟，为人可靠，你们可以安心地住在那里。

第二天，他带人将家属队伍在苍沟安排好后，又匆匆返回边区政府，担任桥镇区助理员，还参加了攻克永宁山的战斗。见到了徐海东和他的队伍。不久发生了震惊西北的肃反事件，他的大哥刘志丹、二哥刘景范都先后身陷囹圄，差点丧命。他闻讯后，赶紧带家人又一次匿居深山老林中，直到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从狱中将他大哥、二哥放出并恢复职务后，他与家人才又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1936年，刘志丹率红28军渡黄河进行东征，连克数城，迅速进逼三交镇，4月14日在攻克三交的战斗中，不幸中弹殒命。

刘景儒几十年都无法忘记。1936年4月22日，他正在甘泉县桥镇区忙着为前方军队搬运军需物资，突然由驻甘泉下寺湾的边区政府马锡五转来中央军委的急电，电文为：刘志丹同志在山西三交镇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要他立即动身去瓦窑堡参加为烈士举行的追悼会。这一惊人噩耗，犹如晴天霹靂，使他顿时感到浑身瘫软，不寒而栗，不由得痛哭失声。他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误传啊，然而中央军委的电报，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闻讯赶来，都悲痛万分，含泪为他送行。于是，他简单地安顿了一下家属，并暂时向他们隐瞒真情，就告别大家匆匆上了路。一路上，他悲痛交加，心急如焚，日夜兼程，匆忙赶路，仅仅三日便到了瓦窑堡。中央军委张

云逸参谋长接待了刘景儒，给他谈了志丹牺牲经过和临时安葬的情况。因当时东北军奉蒋介石命令进犯陕甘边区，形势比较紧张，不容延缓时日，所以在24日已经开了追悼大会。会上由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介绍了烈士生平事迹；周恩来、秦邦宪等同志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致了悼词。会后，烈士遗体已在城外三里处水沟坪山脚下秘密安葬。谈完情况，张云逸问他有什么意见，刘景儒说：“组织上考虑的十分周到，我愿一切服从领导的决定”。当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又亲自接见了刘景儒。他首先关切地询问了刘志丹全家的情况，接着便沉痛地说：“志丹是个好同志，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他是为党、为国、为广大劳动人民而光荣牺牲的。希望你们所有亲属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努力为完成志丹同志生前未竟的光荣革命事业而继续奋斗。”最后，周副主席还亲切地对刘景儒说，如有什么困难，可以给组织上讲，组织上一定会尽力帮助解决。周副主席的一席话，情深意切，诚挚感人，深深打动了。从此，刘景儒决心以长兄为榜样，为革命多做工作，贡献自己的一切。三天后，他即告别了瓦窑堡，赶回甘泉县桥镇区。

4月26日，《红色中华》第二版以《壮烈的追悼会》为题进行报道：

刘志丹同志的遗体于23日运到瓦瑶（窑）堡市，驻瓦瑶（窑）堡市的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于24日在南门戏台举行（行）壮烈的追悼大会，到会者有二、三千人。在广大的人群心里沸腾着刘志丹复仇的决心。首由后方政治部袁主任宣布开会默念志哀，继由郭洪涛同志报告刘志丹史略后，由军委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中央政府办事处主席博古同志致词，致词完毕后，即

举行送葬刘志丹同志的遗体，埋葬于瓦窑（窑）堡南门城外二、三里处。

刘志丹同志的牺牲是伟大的，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为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我们对刘志丹同志的死，表示无限哀悼和敬意，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迹前进！打倒卖国贼，驱逐日本出中国，才能完成他的遗志啊！

1936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永远纪念人民英雄刘志丹，边区党委的提议，决定将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成中共中央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县。

他是返回桥镇后，才看到了《红色中华》上关于他大哥安葬的追悼会情况。后来，他与嫂子同桂荣重逢，从另一个侧面得知大哥去世的一些情况。

同桂荣说，刘志丹去世时，她在瓦窑堡医院卧病在床，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人到医院看望她时亲口告诉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刘志丹下葬时，她坚决要求参加，经周恩来同意，派人用担架抬着她参加了整个葬礼。她带着女儿到水沟坪后，准备下葬时，她要求开棺再见一面刘志丹，但周恩来亲自搀扶她，劝慰她，并没有满足她的要求。6月初，毛泽东东征返回瓦窑堡后，与贺子珍一块专门请她和女儿吃了一顿饭，劝慰她节哀，保重身体。毛泽东对刘志丹评价甚高，并对刘志丹的牺牲表示深深惋惜。

1939年4月5日清明，刘景儒携家人于刘志丹逝世三周年赴瓦窑堡祭奠长兄。上坟时，他目睹了刘志丹坟地一片荒芜，土塌窟陷，倍感伤情，祭坟归来后，他与刘志丹的亲戚，战友奔走呼号，要求将刘志丹灵柩迁回志丹家乡安葬。

1939年10月21日，志丹县政府县长赵耀先顺乎民意率先向边区政府上书，提出迁灵动议。这份珍贵文献中写道：

据志丹县群众刘景儒声称：我前去安定望瑶堡（瓦窑堡）拜谒家兄陵墓，不料今年风雨过大，坟墓竟被雨水冲开，无人照管，使人目睹心伤，但是欲回迎葬，限于经济，现在请求政府给以帮助等情。10月30日，边区政府指令抗争第二九二号予以批复，同意迁灵。

1940年，党中央指示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志丹陵园。为此专门成立陵园筹建委员会，刘景儒也被推荐为委员会成员之一。

1943年春，志丹陵园竣工后，边区政府通知他去瓦窑堡护运刘志丹灵柩。他赴延安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接见了，与他进行亲切谈话，并决定由边区政府的马豫章等人同他同去瓦窑堡，并派一个骑兵排作为护灵队伍。4月15日动身，17日抵达瓦窑堡，4月18日上午从水沟坪山麓挖出志丹灵柩。19日10时在瓦窑堡举行公祭大会，开始向志丹县迁行，夜宿盘龙镇。22日抵延安桥儿沟，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邓发、罗迈、高岗等数十位中央党政军领导人迎接灵柩亲自执绋。23日下午1时，延安专署广场举行万人公祭大会，由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博古、林伯渠等人讲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均送了挽联，26日抵达志丹。5月2日，志丹县举行隆重的公葬仪式，由高岗、林伯渠亲自执绋，万人参加。刘景儒身为死者亲属亲自参加了这次规模浩大的迎灵安葬活动。许多年后，曾亲撰《回忆护送志丹灵柩》一文，详尽记述了这场活动始末，资料十分珍贵。

李先念、胡耀邦为他平反昭雪

1936年6月，他将家人送回老家楼子沟，并返回保安游击

队，曾任中队长。7月被调到刘约三的蒙汉骑兵团，任新兵连长，参与了歼灭宁夏盐洲三段地大土匪段宝山团匪的战斗，并获大胜。不久因身体原因复员到志丹县抗敌后援会工作。半年后，调任县工商联主任。1938年经人介绍与安定人志丹县妇联主任张清文结为连理。

1942年，他目睹志丹县在整风运动中的极左行为。例如全县106家工商户，就发现有95家有问题高达90%，而且县委书记王耀华等在整风中大用车轮战，罚站，身体惩罚，随意捏造罪名，还将新分来的一名女大学生，拉到厕所，头按进粪坑，老半天不放出来，逼她交代罪行。他对许多行为提出不同看法，招致县委领导的反感。后来中央发文纠编方才结束。

1946年胡宗南欲进攻延安，刘景儒受命去西川组建游击队，并将刘志丹遗骨秘密转移，确保安全。他将遗骨悄悄安放在一位族人村中。7月边区政府习仲勋又让他带着边区政府的家属一百余人（号称六大队）向东转移，转移途中历经艰险，时常被敌人追得落荒而逃，不得安生和休息，直到横山青阳岔。后在子州县马蹄沟才由边区政府将这些家属接走，他才算完成了任务。后来，随边区机关渡过黄河，行至山西。他在山西，向习仲勋、贺龙汇报了志丹陵园遭劫情况，亲眼目睹了山西土改的过火行为。后曾潜回志丹县西川运粮，打探消息一次，中途病倒于安塞坪桥，被乡亲们一村接一村的送到横山付家坪。病愈后，参加榆横指挥部后勤工作。

1952年他才迟迟地返回志丹县成为县工商科干部月薪43元。1954年曾任县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工作组组长。1964年参加了宜君社教团，同去的约百余人，在宜君大石畔公社血头大队进行社教，任小组长。不久，县社教团抽他与2名

干部带 2500 多份调查材料去河南省十余个地区进行外调。

由于他二嫂李建彤创作了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刘志丹》，在康生等人的挑拨下，被毛泽东在 1962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为“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从此，刘家再罹危难。先是他二哥刘景范被列入“习、贾、刘”反党集团成员之一，接着二嫂李建彤也遭到隔离审查，给李建彤提供资料的所有老干部，老红军，老革命，甚至普通带过路、招待过李建彤的村民都遭到牵连和迫害，受株连者达万余人。那么，身为刘志丹的胞弟刘景儒自然难逃厄运。

文革开始使这种厄运进一步升级。北京大街红卫兵贴出了“揪出叛徒刘志丹”的大纸报，刘景范又被定为三反分子押入秦城监狱，志丹县也查封了刘志丹陵园，并打算改换志丹县名，刘景儒自然成为三反分子伸向志丹县的黑爪牙，进行残酷的斗争批判，小会整，大会批，并给他强加上“火烧面粉厂”的主谋罪名，使他的案子不断升级，成为省、地区到县一级的大案，予以立案严处。1968 年 12 月，被造反派关押审查，欲致于死地一年后，由县军管组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笔者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次审判会的情景，那是在志丹县旧戏台（今天饿人巷）召开的，笔者身为小学生与全校学生在场受教育。审判会先将他与一千人押上戏台，由县军管组领导宣读了他的反革命罪行，然后由中队一名姓党的外地军人用拇指粗的细手绳将他五花大绑。那位军人非常残忍将他捆住后，又用自己的膝盖从背后用力猛垫，然后将他提在空中，再用力摔至地上，他面部正面触地，当场被磕掉 4 颗门牙，血流满面，鼻口血液喷涌。刘景儒被捆成了一个粽子昏死过去，在场的孩子一阵惊恐、胆颤，人人都不忍目睹，直至笔者与全校师生离开现场，刘景儒也没有苏醒过来。这是笔者

一生所见的最血腥场面，至今想来都觉胆战心惊。

她的妻子，一位1936年入党，14岁就投身革命，有三十四年党龄的妻子，在市镇居民委员会也遭到非人的折磨。寒冬腊月，对她不分大小会进行连续批斗，让她交待反党罪行，还白天黑夜进行车轮战。她拒绝交待后，被造反派关在一间空屋子里，并将凉水灌至脚脖，让她整晚都站在寒冷瘆人的冰水中，直冻至昏倒在地，关押整整两月才将奄奄一息的她放出。不久，她强拖着病体又去一家砖厂背砖，一次八九块，为了养活孩子，顽强而屈辱地苟活着……

1972年，刘景儒在狱中渡过三个半冬春后，终于拖着骨瘦如柴、须发全白的残躯走出监狱。但他的问题并没有完结，他仍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连分配工作全县各单位都没人敢要。直到文革结束后，在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的关怀下，经过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的联合调查，证明“反党小说《刘志丹》案”纯属康生、阎红彦等人制造的冤案，所谓“习、贾、刘反党集团”和“彭、高、习”反党集团也是康生等人捏造出来的，胡耀邦在调查报告上批了“当代最大文字狱”几个字。中共中央1979年和1980年专门发文件给小说《刘志丹》和“习、贾、刘反党集团”平反，推翻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使受迫害的人员陆续恢复自由，对被迫害致死者全部予以昭雪。到此，这场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当代最大的文字狱才算结束。

那场劫难的受害者之一刘景儒的平反过程还颇具传奇色彩。1977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到延安视察工作，刘景儒辗转找到她后，亲手将自己的申诉材料递到她手中。林佳楣将他的材料看了一遍后，告诉他，你放心，你的材料我一定交到李副主席手中。后来，她真的将材料送至李先念的案

头，李看后又郑重地交给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亲自审阅后并认真进行批示，责令陕西省委直接进行调查处理。1978年6月，中共志丹县在全县群众大会上给刘景儒及受他株连的11人（其中2人已死亡）进行平反昭雪。

1979年他调至延安，曾任市政协驻会专职常委、文史委主任。1988年离休。1995年1月因疾而终，享年82岁。

刘景儒写给中央有关 领导的信（申诉书）附记

刘景儒 1968 年 9 月被志丹县追随“四人帮”的一伙人打成刘景范“三反分子”的“黑爪牙”后，同时受株连的有 11 人。他（她）们是：张清文、王悦贤、宗世和、刘廷华、刘廷杰、刘景祥、刘景昌、刘桂兰、刘振辉、刘振凯、刘荣昌。

这些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张清文 女，陕西子长人，刘景儒夫人。生于 1920 年，现年 93 岁。1934 年参加陕北红军游击队，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任志丹县委妇联副主任。1947 年国民党胡宗南匪军进攻边区随边区政府干部及家属实行战略转移返回后，因孩子多拖累大经组织建议转搞市镇居民区工作，先后任市镇公社党委委员，调解委员会主任，居委党支部书记、主任，人民代表等职，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包庇“三反分子黑爪牙”之罪名，被志丹县“四人帮”一伙批斗、隔审、刑逼、打倒，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被诬陷为“纵火案”的“知情者”，在市镇公社派出所隔离四十余天，白天大会斗，夜晚小会批，腿站肿了，腰弯驼了，还要经受拳打脚踢、绳捆、冷冻之苦。当时正值严冬，为了从肉

体上整垮她，消灭她，有意把隔离室泼满水结成冰，不支一张床，不给一块被，让其单身站在房子里过夜，直把身体搞垮，逼得精神失常。其残忍之状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1978年平反昭雪。一生刚强豁达、坚强不屈，为人耿直善良。是我党现今在世为数不多的有着78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王悦贤 男，是革命烈士王兆（肇）基（吉）的独生子，刘志丹的表侄。1915年9月9日，生于保安县（志丹县）金汤镇。小学毕业后在家放羊，其父1934年5月牺牲后，次月他参加了陕北红军游击队，任连队文书，三个月后任连队指导员，1936年任赤安第三支队支队长，据刘景范同志说他作战很勇敢，支队长任期不久，由于1934年被当地民团头王启斌勾结国民党部队仇良明团抓捕，严刑拷打致腰部受伤后遗症，行军作战不便。之后（抗战时期），组织安排他到当地区政府下的贸易公司工作（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给八路军做些后勤工作）。

解放以后在乡政府工作几年，后到延安行署工作至1958年，因神经性头疼而辞职。回乡后被本县聘为洛惠渠水利建设工程总指挥。

王悦贤曾多次当选各级人民代表。1951年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在天安门上观看了庆典阅兵；受到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请；毛主席亲自陪同，请他们观看了梅兰芳的京剧表演。

1961年，李建彤为写《刘志丹》小说，回革命老根据地采访。王悦贤陪同其表婶（李建彤）走了南梁等地。“文革”开始后不久，“四人帮”的追随者伙同个别坏人给他扣上了刘景范“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的帽子，进而多次批斗进行迫害，于1975年12月17日含冤致死（《工人日报》、《解放军报》、《法制

杂志》等曾有报道)。1978年平反昭雪。

宗世和 男，吴起县宗圪堵村白沟洼人。革命干部，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宗有仁的儿子，刘志丹的外甥。生于1928年8月，歿于1982年8月，享年55岁。

因家庭贫寒，他的童年多在其外家楼子沟度过。本人自幼聪慧好学，在其舅父刘景儒的启蒙教诲下，识字读书、坚持写画，长大后练就了一手好字，并能写出一些好的文章。由于他从小经受过战争岁月的艰辛磨练，也接受过进步思想的感染和启迪，他对共产党存有深厚的情感，对人民有着无比的爱，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

1950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吴起县合作部、县医院、蔡砭区、志丹县吴起镇公社及管理区等地工作。历任干事，筹建县医院总管，蔡砭区委委员兼区委秘书，公社党委委员兼工业部长、武装部长、管理区书记等职。本人一贯工作踏实认真，吃苦耐劳，工作能力强，质量高，团结同志，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曾多次被评为县、社先进工作者，也受到过上级领导的好评和奖励。

1961年秋，一场致命的灾难无情地落在他的头上。吴起县原副县长慕金廉带的工作检查组一行数人，因对他的工作汇报挑剔而发生争执，利用手中权力让组织部门解除了他的公职。在这期间，他当了生产队长，后又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文革”中受株连被批判斗争，批他是舅舅“三反分子”刘景范的黑爪牙，批了好长时间，并撤销了他的党支部书记职务，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因被刘景范株连而平反，但公职仍未恢复。1982年含冤患病而逝。

刘廷华 男，刘志丹族弟。1906年6月17日出生于志丹县金鼎乡下罗坪村，歿于1968年12月5日，享年63岁。

早年接受刘志丹革命思想，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刘志丹革命活动做过很多工作，1933年曾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后勤机关印刷厂工作，不久因病回乡，为家庭生活拖累，离队务农一生，上世纪30年代，曾帮助陕北红军在敌封锁区买子弹，多次保护刘志丹家眷免遭白匪、民团捉拿迫害。文革期间被诬陷为“三反分子”刘景范的黑爪牙，遭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含冤致死。

同为“三反分子”刘景范黑爪牙的刘志丹胞弟刘景儒，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摧残和迫害，冤狱获释后，向党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写申诉信，李先念批给中组部长胡耀邦，胡耀邦向陕西省委作出批示，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责成省、地法院，省、地、县公安局联合组成专案组迅速查证落实。

1979年5月15日，志丹县公安局、志丹县金丁人民公社党委召开为刘廷华冤案平反大会，予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刘廷杰 男，刘廷华胞弟，1914年出生于金鼎乡下罗坪村，歿于1972年，享年69岁，一生务农。

早年接受刘志丹革命思想，积极支持红军闹革命，和兄长帮助刘志丹家眷避开敌人捉拿迫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造反派残酷批斗，无情打击，棒打绳拴，无所不用其极，晕倒会场，泼凉水救醒再批，致一病不起，于1972年无法医治含冤身亡。

文革结束后，1978年刘景儒先后向陕西省委、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信，中组部长胡耀邦、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分别作批示，省、地法院，省、地、县公安局组成联合工作组，查清冤案。

1979年5月15日志丹县公安局、志丹县金鼎人民公社党委为刘廷杰召开平反大会，予以恢复名誉，昭雪平反。

刘景祥 男，刘志丹族弟，金鼎乡老庄塔人，生产队社员。一贯忠诚老实，人品本分。生于1921年，含冤歿于2012年8月，享年92岁。红军时期积极支持革命，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曾当过政府代主席刘景范的勤务兵，胡匪进攻边区时跟随刘景儒参加“六大队”保护干部家属实行战略转移，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文革受株连，县军管组在查面粉厂火案之时，把他秘密逮捕入狱，硬逼他承认火是他亲手放的。景祥莫名其妙，但他坚持真理，没有承认，他们即动用刑具，大搞逼供，拷打致残。获释后回到家里半年时间卧床不起。1978年平反昭雪。

刘景昌 男，刘志丹堂弟，金鼎乡楼子沟人。1960年刘景范回乡探亲，作为堂弟的他热情接待，因此而被志丹县“四人帮”一伙诬陷为“黑爪牙”组织社员进行批斗。1978年平反昭雪。

刘桂兰 女，刘志丹族妹，市镇公社居民。文革中因其兄刘景儒被捕之后气愤不过，说了几句顶撞“四人帮”一伙的话，指出“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刘志丹的老革命谁也赖不掉，地主龟儿子的天永远也翻不了。等毛主席回来看你怎么收场！”就因此便以“刘桂兰公开为叛徒、三反分子、黑爪牙辩护”为罪名，召开了规模异常浩大的批斗会而逮捕下狱。刘到狱中被打被捆，十多天不思饮食，变成疯子，释放后经常寻死觅活，专人看管不住。1978年平反昭雪。

刘振辉 男，刘景儒四子。因在文革中被志丹县“四人帮”一伙诬陷为“面粉厂火案”知情者而从插队点上抓回，予以隔离审讯。无果后又以刘振辉（年仅16岁）在1968年6月某天凌晨被对方武斗派攻城时枪伤腿部，在受伤恐惧慌乱的紧急情况下，开枪误伤一名本派武斗队员之事，被重判冤狱十五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平反昭雪。

刘振凯：男，刘景儒次子。仅仅因为是刘景儒的儿子，在没有任何事实和理由的情况下，在文革中被志丹县“四人帮”一伙限制人身自由，强行隔离关押，强迫交代其父亲的反党及火烧面粉厂的罪行。1978年平反昭雪。

刘荣昌 男，纸坊乡梢沟塔人，生于1912年，歿于1992年，享年80岁。土地革命时期积极支持革命，曾参加红军担架队。1946年胡宗南军队进攻边区政府前，为保护刘志丹烈士遗骨，刘景儒将遗骨秘密转移在梢沟塔，就由刘荣昌看管保存。刘荣昌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疏散、埋藏、保护志丹灵骨，于胡匪撤退后全部交出，受到政府之嘉奖。就因此事，荣昌同志在清队时因保护“叛徒”刘志丹灵骨之罪被斗半年之久，在百般折磨下，身体致残。解放后曾担任生产队长，是对革命有突出贡献的人。1978年平反昭雪。

1978年12月2日（农历11月3日）星期六《延安通讯》
第一版刊登记者裔国华的报道文章：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刘志丹烈士亲属冤案平反

裔国华

刘志丹烈士亲属惨遭迫害案，已全部昭雪平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夺领导权，刮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曾在我省把持很大权力，终于投靠“四人帮”的那个人，积极推行这条路线。在这股反动思潮影响下，他们诬蔑毛主席亲自题词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烈士为“叛徒”，并叫嚷“要改志丹县名”。刘志丹烈士的二弟刘景范副部长（民政部）被打成所谓的“三反分子”。在志丹县，对刘景儒同志（刘志丹弟弟）的全家和户族、亲戚也进行了残酷的打击迫害，受株连的达十一人之多。

一九六八年九月清理阶级队伍时，刘景儒同志被扣上“三反分子黑爪牙”的帽子，打成黑线人物，隔离审查。后以所谓私藏枪支、对抗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罪名将其非法拘留。在关押期间，又将刘景儒同志列入所谓“火烧面粉厂”的主要成

员，对其进行审查。后因查无实据，宣布教育释放，前后共关押了三年六个月之久。刘景儒同志的堂妹刘桂兰，因在一九七〇年参加庆祝“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突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美帝苏修”等口号，即以破坏会场，散布反动言论等罪名关押，致使精神失常。刘景儒同志的堂兄刘廷华、刘廷杰，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跟随刘志丹闹革命，后又多次保护刘志丹烈士家属和烈士的灵骨及复盖的党旗。就是这样两位衷心拥护革命的群众，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以“三反分子黑爪牙”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会上借刘廷华（六十三岁）所谓欺负寡妇的问题，将他捆倒在地，乱踢乱打，刘廷华疼痛难熬，惨叫不绝。由于受不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当晚爬上山坡，在羊圈内上吊自尽。以后，又召开了批尸大会，宣布了“四不准”：不准家属哭丧，不准戴孝，不准亲友送葬，不准举行埋葬仪式，并让其儿子扛着“黑爪牙、叛徒刘廷华”的牌子插到坟上达四年之久。几年来，家属也遭到残酷打击，多方刁难，连小孩上学都受歧视。刘廷杰也同样被捆绑，当场昏倒在地，浑身冒汗，后又强令其喝冷水，致使刘廷杰久病不愈，直至死亡。其他人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审查、批斗。

对于上述冤案，刘景儒同志先后向陕西省委和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诉。中央组织部胡耀邦同志对此作了重要批示。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同志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也作了批示，要求省法院、省公安局，“认真查清，迅速处理，并报省委”。根据领导指示精神，省地法院和省地县公安局组成了专案组，在省委志丹县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现已全部查清事实真相：受株连的十一人全属冤案。

最近，志丹县公安局和市镇公社联合召开平反大会。金鼎公社也召开了平反大会。会上宣读了对十一人的平反决定。受害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会上发了言，衷心感谢党为他们平了反。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认真落实政策，落实中央首长对志丹县问题的批示精神，把革命先烈刘志丹的故乡建设好。

中共志丹县委文件

志发（1979）010号

——关于面粉厂火案问题的平反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三时许，我县面粉厂发生着火，烧毁该厂库房和柴油机、面粉机、炸油机等，损失价值达一万五千余元。该案发生后，当时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政组织不能进行正常工作。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党委的领导下，责成公安军管组对这个火案开始进行侦破。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二年五月，经过三年半的时间，案情还未查清，而且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错拘，隔离审查、逼供、诱供等不少严重错误，造成了不应有的后果。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长期调查了解，这个案件，属于错案。

在破案过程中，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先后错拘冤押了原面粉厂厂长常绍祖、工人高立成，干部党申、刘景儒、金鼎公社社员刘景祥等五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先后对电厂副厂长冉永秋、工人杨国玺、粮食局局长屈富宽、粮站干部马华堂、电影管理站干部张文

智、农业局干部王艾叶、中学教师孙群才、贺金玉、市镇居民张清文、刘白娃以及社员张明英、王淑玲等人错误地进行了隔离审查。并对城关粮站主任张树才同志，令其停职检查。还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先后传讯了张义中，高峥嵘，孙洋，杨彦国，屈安民，刘政辉等人，错误地限制了这些同志的人身自由。在审讯、审查以及谈话过程中，曾发生过捆绑、恐吓、指名问供等违犯政策的错误做法，致使原粮食局局长屈富宽同志含冤逝世，高立成同志神经失常。

以上这些同志与面粉厂火案是无关的。我们在办案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非常深刻，确实令人痛心，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人民民主权利，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而且给错拘、隔审等受整的同志造成了精神和生活上的痛苦。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虽曾对常绍祖，党申，高立成，刘景儒等同志作过审查结论，先后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给屈富宽同志作了纠错的结论，但平反不够彻底。为了贯彻落实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新的、伟大的历史任务面前，进一步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拨乱反正，分清是非，实事求是地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对面粉厂火案中被错拘，隔审的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特作如下决定：

一、在火案侦破中先后对常绍祖、高立成、党申、刘景儒、刘景祥、冉永秋、杨国玺、王艾叶、张文智、刘政辉、张树才、马华堂、屈富宽、孙群才、贺金玉、张清文、刘百娃、张明英、王淑珍、张义忠、孙洋、高峥嵘、杨彦国、屈安民、尚文明等同

志进行拘留、隔审、停职检查和传讯审查、限制自由都是错误的，他们是无故受害者，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二、撤销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开除屈富宽同志党籍的处分决定，并召开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做好抚恤，善后等工作。

三、高立成同志受整致病，应由原单位负责积极给予以治疗，治疗期间的工资照发，其他待遇应同在职职工一样。

四、错拘、隔离审查期间，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的工资一律补发，非脱产人员发给适当的误工补贴。

五、对所有因面粉厂火案无辜牵连受整的同志，公开表示赔礼道歉，今后在使用、提拔、调整、奖励等问题上，不应因此而受歧视。他们的家属子女亦不能因此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受到影响。

六、对于错拘、隔离审查形成的有关材料，该退本人的退本人，该销毁的销毁。凡装入个档案中的一切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材料予以一律销毁。

中共志丹县委（印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报：中共延安地委

送：县委各党委

中共志丹县委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印

原陕西省农林厅厅长 刘约三的信函

关于刘景儒同志参加革命斗争的证明：

远于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由反动的张匪廷芝勾结靖边龙州集反动封建武装李维俊团匪，共为 300——400 反动武装，西南进南渡洛河，窜犯我南梁老根据地。我蒙汉骑兵团奉命围歼进犯老根据地的惯匪中，行动在洛河发源地及南梁二将川一带时扩大了 20 多名新战士，其中有从保安游击队来的刘景儒同志。继因三七年剿匪完毕，我即奉命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大队四队上学了。该刘景儒参加骑兵部队半年之久，先当兵后提拔为新兵连长。乃我奉命回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上学受训，特此证明。

祝全家安好！

此致

敬礼

前蒙汉骑兵团团长刘约三 证明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于西安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一）

景儒弟：

你好，我遵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的改革政策，已申请退到第二线工作，现在有时间写上回忆录了，最近想写一下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和《三家塬事件》的经过，这件事已经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的不像样子了，他们专拿这件事诬蔑刘志丹和与刘志丹一起工作的同志。我是这事的当事人之一，也是受害者，我不说清楚对不起那些受害者，也对不起党和人民，但事隔多年，有些我记的不大清楚了。那时的受害者和当事人现在活着的还有杨培胜。请你抽时间去他家询问一次，问如下的问题：

1. 他是什么地方人，家庭成份，本人出身？

2. 什么时候到二家川，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他是怎么搞起部队的，有人说他是靠某同志给他一支枪搞起来的，这件事有没有？

3. 他什么时候与刘志丹认识，当时他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

4. 在反帝同盟军成立前，他的部队打了哪些仗，缴获了敌人多少枪？

5. 他在二家川打张廷芝骑兵连是同哪些部队配合的?
6. 反帝同盟军成立时他有多少人和枪?
7. 三家塬谢子长交了二支队枪以后,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8. 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他什么时候又到陕甘游击队, 担任什么职务。
9. 陕甘游击队谁派他去庆阳的, 去干什么, 怎么被敌人抓住的?
10. 三家塬交枪时除打死赵二娃外, 还打死一个中队长, 他叫什么名?
11. 他什么时候认识贾生财的, 贾生财是什么地方人, 家庭成份和他本人出身?
12. 贾生财民国十九年搞起部队, 是怎样搞起来的, 他同你谈过没有?

我要他回忆这段历史是为了把历史上一些是非问题澄清, 好教育后代。请把我的意见给杨培胜同志讲清楚, 要他解除顾虑, 实事求是的把他知道的问题都谈出来, 这是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杨同志年纪大了, 可能一下记不起这么多, 你要多去几次, 每次只谈两三个问题。你把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随时寄来。事关重要, 望你抓紧办理一下为盼。

祝你健康合家吉庆! 你替我问杨培胜同志好!

刘景范
五月十一日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二）

景儒：

你的信和杨培胜同志谈话材料都收到了，他谈的很好，是很宝贵的历史资料。他谈话的记录和录音带，你负责保存，将来很有用处。你还和他商量一下，如果他愿公开发表的话，再补充一些具体的材料，请人帮他整理成一篇回忆文章，在政协办的革命史资料上发表。

另外，你设法告诉赵五，他二哥赵连璧（二娃）的冤案，应该昭雪。他可以向志丹县委申诉，要他们调查得出结论。现在还有些知情人活着容易搞清楚，如果知情人都死了，那赵连璧的反革命帽子就永远摘不掉了。黄克强同志的申诉，他可以直接给张策同志去信催促。

望你保重身体

刘景范
五月三十一日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三）

景儒：

杨培胜同志的谈话记录收到，他谈的基本符合事实，有可靠的人来京时，把录音带来。你设法托可靠的人传话给赵五，要他写申诉给志丹县民政局，给他二哥赵连璧冤死一事翻案，趁我还活着好为他作证。

祝你健康

刘景范
七月十日

刘景范写给胞弟的信函（四）

景儒弟：

小刚带来的小米、荞面均收到了，延安如果能买到沙蒿买点捎来。关于延川高士杰的材料我看了，他说的情况我都不知道，无法给他作证。请你告诉他，还是找当时和他在一道工作的作证，才好解决问题。

另外，你想写点东西，这种精神很好，但要写家史我认为没有写的必要，祖宗三代，亲戚关系，有什么好写的呢？出力不讨好，写出也没人看。

祝你全家安好！

刘景范
七月十一日

志丹县民政局致刘景儒同志的信函

刘景儒同志：

您好！

最近接省民政厅（85）陕民函字 081 号通知：根据省委负责同志指示精神，为安葬好刘志丹烈士遗棺，拨来专项经费八千元。

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特来信征求您的意见，请将这项工程的设想、设计、规模、要求等方面提出您的意向，供我们在施工时选用。

请在百忙中早日复信，使其工程早日动工。

此致

敬礼

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

文史拾遗

崖窑，不能忘却的传奇

崔子美

山腰之上是茂盛的林草或满坡的庄稼，山腰之下则裸露着峭拔的红石崖，朝夕之间恍若一大片又一大片灿亮的红霞，火焰一样热烈了梁峁沟川。就在高高的红石崖上，凌空奇险的窑洞接二连三，犹如一块块旧疮疤，显眼地贴在山的肌肤上；又似没有瞳孔的眼睛，失神地守望着岁月。

来过志丹的异乡人，惊奇于这些悬崖上的窑洞，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谜，不亚于看到了长江流域神秘的悬棺，甚而探询这是不是未知的古文化石窟？陕北这块地方，志丹的山最为独特，只有志丹有着红石崖地貌，也唯有志丹的红石崖上存在着崖窑。

凝望这些崖窑，你可以轻易地找寻出岁月的古老。风雨沧桑，使开凿的痕迹不再清晰；风沙打磨，使本该分明的棱角变得光滑；霜雪锈蚀，让它的色泽愈加深沉。有的窑口长出了胳膊粗的山桃树，有的窑面滑塌无形，许多的崖窑没有了曾经的镌痕，似乎无情的光阴把它的细节全部删除。借助风的诉说，似乎可以聆听它的过去，或是在大山根下，抬头仰望它血色的苍凉；或是密林里，遥看它的古旧。经常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崖窑就出现

了，昆虫的鸣叫会让你以为那是它生命的响动，仿佛还有人住在里面，你会由不得喊叫：“哎，有人吗？”“你说话呀？”“把你的传奇告诉我好吗？”

四周寂静，旷野无语。崖窑的声音只有历史可以听懂，那也是志丹人的智慧和勇敢，那是志丹人的苦难和无奈，那是志丹人的抗争和生存。

自宋朝开始，志丹成为边关重地。西夏攻伐，套虏强夺，山川间狼烟烽火，战事不断。加之流寇袭扰，土匪绑票，义军起义，当地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到明成化年间，边地出现暂短的安定，延绥巡抚余子俊率兵民，筑边墙，固城池，建寨堡，以防内外之患，且号召民间广凿崖窑。有红石岩的绝壁上，就有男儿腰系绳索，手持锤鏊，叮叮笃笃地对着石壁一寸一寸地开凿，忘却晨昏，不惜血汗，最终出现了方圆不一，形态各异的崖窑，竟然达到八百余处。这些未雨绸缪的崖窑，曾让志丹人脸上露出了无虞的笑容，给崖窑安装门窗，甚而贴上窗花，将这个半崖上阴暗潮湿、逼窄险峻的窑洞当做第二个家，就此楔入摆桩，铺了悬空的木板，与外界相连。尽管上有绝壁、下临深壑，每一次出入都心惊胆战，可是别无选择。太平时崖窑是仓库，危难时就是藏身之地。试想，匪寇突杀而来，村民惊慌奔逃，白天尚能踩稳摆桩上的木板潜入崖窑。夜半三更呢，慌乱中失足跌下高崖的老少就难以计数，那是一种悲苦的生存呵！

许多次，我行走在家乡的群山之间，面对燃烧的红石崖，心底有一种难言的忧伤。在中国的五湖四海，还没有一个地方以这样众多的人造居所应证和记录几百年民众的苦难，或者说还没有一个地方的百姓能像志丹人一样坚定地恋守着故土去顽强地迎接光明的到来。

在洛河畔一个大转弯的地方，有一面高百余米、宽约四百米的凹形红崖绝壁，绝壁上被当地人开凿成了二十多孔大小不一的石窑，这个地方就是老崖窑。向老崖窑攀爬，走在一尺宽的石梯阶路上，心惊胆战，内侧是冷硬的石头，外侧就是空空的深壑，劲风袭来，脚下趑趄，心上一阵阵眩晕，恐惧自己会像鸿毛一样飘落。在石梯子路的转弯处，就猛然挺来一堵石墙，如若一支铁矛从石墙的方形洞里刺出，来者只能被捅下悬崖。老崖窑是活着的历史，一痕一迹都在述说着过去，一处处破损的大土炕还卧在角落，残破的柳条囤儿歪斜在黄尘堆里，窑顶被炊燃的烟火熏出了一层厚厚的黑皮。向下俯瞰，田畴连片，洛水如线，人小如蚁。在这里生存确实需要直面生死的勇气。

翻开史志，无不惊心。清同治六年，回民起义军在甘陇举旗，杀入志丹。民众仓皇逃入崖窑避乱，回民义军就断其水道，或堆积柴薪借风熏烤，崖窑内火焰弥漫，无路可逃，遇难者众多，义军随将所遇崖窑一一攻破，哀号四起，血流成河，县境内死难者多达两万人众，战乱结束后县内仅存百余人。老崖窑天险本该安然无恙，在被义军围困半月后，存水殆尽，尿溲度日，便有贪生者下山投降，老崖窑不攻自破，生还者寥寥。又有记载，同治七年，西捻军在黄河岸边大败，突出重围，将领袁大魁带残部进入永宁林区，据守老崖窑。围剿而来的清军数十次强攻不下，官府便以重金招募大批勇士，从山崖顶用绳索悬吊而下，向崖窑里投掷火弹焚烧，经过惨烈的激战，最后一支西捻军在此全部遇难。

经屡次战乱，志丹境内唯有永宁山崖窑没有失守，傲视过所有危难。这座县境内最大的崖窑，峭立洛河水道，兀然孤挺，裸崖上分布上中下三层窑洞，内有石阶相连，上可踞山顶望四方，

下有石井通洛河取水，有数百人常年居住。永宁山不是普通的山，在二十世纪初期那波澜壮阔的解放斗争中，它是一座红色的航标。民族英雄刘志丹在永宁山崖窑里和当地共产党人一起秘密成立了永宁山党支部，点燃了陕甘边革命的燎原之火，发动群众抗粮抗税，奇袭太白镇民团，创建红色武装，与国民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斗争，南北征战，建立了红彤彤的陕甘边红色政权，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给逆境中的长征工农红军提供了落脚地。

经历了腥风血雨的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的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满怀喜悦地选择志丹奠都，把这里确立为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红色首都。县城东山下长长的红石岩上错落了大小不同的崖窑，有的是百姓用于居住，有的是用于避难。中央各机关单位就选择了这些崖窑起居办公，中国领袖们在这些崖窑里运筹帷幄、决胜未来，先后召开了 21 次政治局会议；指挥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胜利大会师；召开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毛泽东为奔赴前线的丁玲女士写下了《临江仙》一词；党中央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成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

当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志丹采访，看到高悬在红石崖上的红军大学校舍，十分感慨，他说这样的学府恐怕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家。是的，红军大学的几孔教室高悬在半崖上，那教室原来就是大户人家藏身避祸的崖窑，经过学员清理，放置了石头桌凳，泥土糊了黑板，就此开学听课。寒凉的崖窑里荡漾着学员们的歌声和书声，他们学习军事思想，又把国家的未来畅想，每天在崖窑下平阔的台地上朝气蓬勃地出操演练。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上课的崖窑里讲课，对学员们说：“虽然你们过得是石器时代的生活，

却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离开崖窑上的红军，回到抗日前线叱咤风云，先后有38名学员成为了共和国的将军。

志丹的崖窑，经受过杀戮和血染，那是社会离乱的不幸；但是，在中国革命解放事业轰轰烈烈的进程中，却有幸为红色政权提供了最简陋的居住场所，让红旗高高飘扬，志丹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策源地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出发地。经常有探询者，长久地面对崖窑静静地聆听，我相信他或者他们一定能听出历史对今天发出的爽朗的笑声。他们在穿行过山城平阔的大道、林立的楼群之后，感受着百姓安居，社会康宁。看看城南城北的红石崖上，被智慧的志丹人大气地凿筑了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崖窑，一层又一层一排又一排，窑面上贴了白净的瓷片，新灿灿亮锃锃地成了志丹又一道夺目的风景。恍然那一孔孔齐整的窑洞，就是大山歌唱的喉嗓，正对着新时代发出大音无声的咏叹。

最后一支西捻军覆没的地方

——老崖窑古砦

臧光明

我是老崖窑本村人。还是在孩提时代，就听爷爷奶奶们及曾祖父曾祖母讲袁长毛（袁大魁）血洗老崖窑及与清军顽强斗争、血战到底直至全军覆没的故事。说这一小小的地方先后死了二千多人，河滩及沿河两岸尸体遍野，洛河水变红……。人们谈“崖”色变，老崖窑底部有一上下川必经的“脚窝”石路（俗称石挖挖），每逢晌午或夜间无人通过，怕“屈死鬼勾魂”。早在我与同伴们到永宁镇上完小，遇到晌午或傍晚，我们宁可翻山走砭，多走七八里山路也不敢走这一“捷径”。这一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老崖窑古砦的形成，得从元末明初说起。

元末明初，中华大地硝烟四起，战火连连。十六年的持续战乱，使整个中原大地、大江南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田野荒芜，道路阻塞；哀鸿遍野，白骨堆山，人们有田不能耕，有家不能归，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陕北这一块长期以来形成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结合地，不再是“净土”，不再是“三不管”，成了汉民族与其它少数民族必争之地，兵匪肆虐，民不聊

生。当地百姓为躲避匪患，走到处筑寨堡、凿崖窑、打窖子。本文介绍的老崖窑古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利用这里视野开阔，奇险兼备，汲水方便，进退灵活的地理环境以弯就势开凿而成。

老崖窑砦子，位于志丹县西南方洛河之滨，坐西向东，背依连绵青山，面眺洛河上下及两岸崇山峻岭，兼有横档洛水之势，在较松软的红砂岩上开凿而成。砦子建在崖顶下十多米处，悬崖峭壁，无攀无援，总高度约一百五十米。窖子依山就势，呈西东走向，长约八十米，分上下两层，由二十五个单体组成，窑与窑，洞与洞相互连接贯通。内有土炕、灶台、碾磨、仓库、水井、牲畜棚圈等，生活设施及必需品一应俱全，应有尽有。出入窖子靠一人工开凿的石阶路和宽不足一米的石路通行，门口有唯一悬空吊桥，吊桥头凿一类似现代门房的监控室，设有“猫眼”，以操纵吊桥起降，监视“来犯之敌”。来敌强行进入可通过“猫眼”用长矛或强弩射杀。老崖窑窖子是一开凿在悬崖上的大型崖洞群，最多可容千人临时居住，算得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防御功能齐备，易守难攻的寨堡。

说起老崖窑砦子，不能不陈述这一宏大工程的建造者——卢十万。

相传，明朝中叶，这里住一卢姓员外，家大富豪，身缠万贯，骡马牛羊、驴豕犬禽都以万计，工人伙计不计其数，能人异士应有尽有，人们送一雅号——“卢十万”。卢十万（名字没有流传）发迹之后，总结元末明初国内长期战乱和兵匪时不时地骚扰百姓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在老崖窑崖顶约二公顷平坦地上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方面招聘武功高强、骁勇壮士组建护院家丁，操练武艺；又一方面组织百十来号能人异士在悬崖上凿石建砦，“光黄米就吃了一十五石”（一石相当于一千市

斤)，历时两年多，完成了这一集防御、居住、仓储为一体的伟大工程。这里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可证实老崖窑崖顶上确有较排场建筑。

相传，卢十万将上下两处工程完成后，飘飘然起来，整天怀抱水烟瓶东游西逛，见了熟人就夸夸其谈其工程何等壮观、绚丽，特别是崖顶住宅可与王侯府第比美。一年大旱，当地百姓抬几副神楼子祈雨，希望老天爷怜悯，喜降甘霖。百姓抬神楼子祈雨举动被卢十万撞见，卢说：“你们抬那个木壳榔有屁用，还不如把我抬上。天旱三年，我羊蹄蹄也够啃三年”。卢十万欺天之说，惹怒了上苍。不多一时，在卢刚刚回到家，当天升起一块乌云，瞬间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洛河水暴涨，将卢十万八道台（也有十道台之说）牲畜推了个一扫净光。卢十万站到老崖窑窑畔，看到这一情景后，自言自语说：“推，推走我浮财有底财”。卢话音刚落，洛河水上出现了两只绵羊圪鞑（公羊）头对头抵架，洛河水不再下流，而是抵一头水涨一丈，抵一头水涨一丈，大水一直涨到老崖窑崖顶，将其三层木楼及附属物连根端起，推至料沟门楼还未倒塌，只听卢十万大声呼救“谁要能救下我卢十万，万贯家财分一半”。终因洪水太大，无人搭救，到了川口周河洪水一顶楼才倒塌。卢十万命丧大水之中。

老崖窑砦子的建成，为此后的匪患防御、流寇骚扰以及藏身避难起到了积极作用和带头作用（洛河川上下纷纷效仿，几乎家家户户就近建造私家砦子），成为当地及周边寻常百姓人家遇到大一点的兵匪躲藏的据点和靠山。卢十万成了方圆周围的“群众首领”。西捻军正是看准了老崖窑的地理环境和防御功能及生活条件，不惜血本，不顾捻军《行军条例》律条和义军群众纪律，大开杀戒，强抢强占，在这里安营扎寨，与清廷抗衡、奋战，坚

持斗争，最后“全军覆没”，这是后话。

清同治年初，由于长期以来满清统治者奉行“以汉制回”、“护汉抑回”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致使回汉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后来的“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错误主张被广泛应用后，回汉矛盾到了顶峰，直至白热化程度。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陕西同州（今大荔）等处发生多起回汉流血事件，清政府置民族大义而不顾，继续奉行“护汉抑回”，进而迫使陕甘等地回民起义，到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陕、甘、宁义军联合会师于甘肃董志塬，“由西向东，蔓延千里，聚十万之众”，进而形成我国历史上中国北方“同治年回乱”。捻军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振奋，决定与西北回民起义军“捻回合势”，联手反清。

捻军，起初叫捻子（捻党），是从捻绳的原理而得名，意思是几股绳子合为一股，团结就有力量。清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1—1850年）年间，我国北方就有捻子（捻党）活动，以护私盐等小股行动为主，常与清廷官府、衙门发生摩擦和冲突。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淮北涡阳、蒙城、亳县一带大旱，入捻农民大增，捻军势力壮大。是年，亳县捻子杨增等十八人去河南永城“打梢”，被官军逮捕入狱，亳县捻军首领张乐行率一万多捻子劫狱营救，军威大振，各路捻子纷纷要求加入与之联合。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7、8月间，张乐行在雉河集召集各路捻子会盟，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宣布信条，制定《行军条例》，按“黄、白、黑、红、蓝”分设“五色旗”。“五色旗”各设总旗头，称“大趟主”。总旗之下又设“大旗”、“小旗”。每一大旗下辖五十小旗，每一小旗统众五百（分十馆，每馆五十人）。“五色旗”组成捻军的基本军事单位，成为我国北方

反清武装主力。就是从这时起，宣布捻军正式大规模起义。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3月19日，雒河集失陷，张乐行殉难。张乐行牺牲后，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等捻军将领，继续高举捻军大旗，转战湖南、湖北等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残部入捻。同年十二月，捻军与西北太平军余部于河南南部整顿改编，结为一体，组成新捻军。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春，赖文光率军入山东，于五月十八日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歼灭清军万余，同治帝“震悼，辍朝三日”，“京师惊疑”。十月中旬，捻军返回河南陈留、中牟休整，认为长此以往恐“独立难持，孤军难立”。12月24日，“五色旗”大趋主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东路军，史称“东捻军”，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自中牟转战山东，联络“天下英雄”；西路军，史称“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率领，自中牟转战陕甘，“连结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10月，张宗禹率六万大军一路西进。入陕于临潼灞桥十里坡歼灭留陕帮办刘蓉部主力，取得入陕首战大捷，军心振奋。围攻西安不克，沿渭水南岸西行，从郿县西部过渭水，与陕甘回民起义军联络，拟定联合作战细则，联手围攻西安、大荔、旬邑受阻，计划落空。五月，张宗禹捻军在大荔北徐庄与清军遭遇未胜，西进至武功普集镇南渡渭水，再攻西安未克退临潼。后复折西行至周至，由周至转战渭北三原、富平、蒲城一带，进而北进与西北回民起义军“捻回合势”，联手反清。

西捻军入陕转而北进，未与回军“捻回合势”，就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清政府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8月，也就是在西捻军入陕前两个月，任命曾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左宗棠为剿灭陕甘乃至西北回民起义军总督。左宗棠赴任后认真

分析敌情，制定了“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剿匪方略，以对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实施各个击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为了粉碎左宗棠把捻军围剿在渭北之图谋，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10月下旬，由陕西白水北上，意欲攻克鄜州，进逼陕北，遭到刘厚基部拦截，后转战陕北。12月27日，与回民起义军会合，联手攻克绥德县城，绥德失陷后，左宗棠急调刘厚基部和刘松山、郝宝昌部分别由延川、清涧和宜川两路增援绥德。就在此时，张宗禹接到东捻军赖文光求援信，张决定“放弃绥德，挥师东援”。张宗禹率部到黄河边恰逢严冬，黄河结冰，顺利突围东渡黄河，转战冀鲁豫，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8月被清军剿灭。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的东捻军于同治七年1月5日，在苏北扬州东北的运河渡口弯头瓦窑铺，也就是说在西捻军刚渡黄河，未到达增援地之前的战斗中被清军剿灭，任化邦战死，赖文光负伤被俘遇害。

张宗禹率大队顺利东渡，留袁大魁（袁长毛）部断后掩护，因清军阻截，东渡未果，返回西捻军曾经安营扎寨的宜川云岩，重振旗鼓，修筑工事。不久，遭遇清军包剿和重火力袭击。冲出重围，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正月，率残部到保安（今志丹）金鼎寨落脚，招兵买马，扩大武装，队伍由离开云岩时百十来号人扩大到二千多人，但是，由于回乱和连年自然灾害，洛河两岸“十村九空”，义军供给十分艰难。袁大魁出于伺机“渡河东归”之念，又于同年四月率部日夜兼程二次重返宜川云岩，“意图久居，藉以窥伺山西，抢渡合队”。宜川知县用重金请来刘厚基部清兵三营，携火炮等重武器围攻，袁据险坚守，苦战半月未克。五月三十日，清军用火炮攻克，袁率残部百十来人乘夜突围至安塞桥坪，与当地李长新农民军会合，队伍扩至千余人。刘

厚基部跟踪追击，副将孙天喜阵亡，队伍溃散，袁仅带十多人脱险，于七月底经肤施、安塞等地重返保安金鼎山，队伍发展至千人后迁永宁镇老崖窑。

前文说过，老崖窑是一座险砦，易守难攻，“民藉以避兵，且侮贼”。袁大魁于九月初抵达老崖窑。当时，老崖窑已聚集洛河川难民数百人，骁勇之士百十来号，袁“断其汲道，积薪熏灼，山骨具热，有焦烂，无逃门”，“俯首乞降，以救残喘”（《保安县志略》），强行霸占。“袁长毛（大魁）据之，蹂躏山川，人天戮”（《保安县志略》）。在袁大魁争夺老崖窑砦子中，骁勇之士与之长时间搏斗，“袁长毛（大魁）湮其汲道，围困二十余日，砦民至饮牛羊血及人溲溺，无降意，死亡略尽，碎为贼破”（《保安县志略》）。袁大魁及千余兵丁占据老崖窑后，为了生存和备战，与回民起义军联合，大开杀戮，走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掠抢，整村整户屠杀，将洛河川吕家砦、象咀、槐树庄、小崖窑、阳坪、碾沟、碾子坪、料沟门、川口、羊角城、胡家洼窖子尽数打开，血洗白沙川商铺，无数平民百姓无端被害，洛河川上下村邑“十之九空”，村舍废弃，良田荒芜，洛河水常常被鲜血染红。《保安县志略》记载，袁大魁在抢占老崖窑砦子和开洛河川窖子中，无数平民百姓被杀，他们当中有的“不屈受害”，有的“凌迟处死”，有的被乱石砸死，有的“不辱，投岩自尽”，有的“被贼烙毙”，光有记载和清政府予以褒奖的“英烈”多达二十九人，还不包括血洗白沙川商铺。

袁大魁在老崖窑有了根基后，一方面继续与董福祥领导的回民起义军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到处招抚难民强行充军，扩大武装，操练兵马；休养生息，鼓舞士气，以东山再起。半年多的休整，队伍有所扩大，并按“五色旗”建制重新做了整编。内勤、

外勤、边防哨卡职责进一步明确和制度化,《行军条例》得到了修订和重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初,陕、甘总督左宗棠接到西捻军残部非但未被剿灭,反在保安县老崖窑扎寨,与回军联合,扩大武装,操练兵马,煞风肃纪,整编待发的“敌情”后,即命刘厚基部火速剿灭之。四月初五,刘厚基(当地人称刘三大人)部魏光焘、刘瑞冕两部清军受命联手北进。清军到马蹄沟与义军遭遇,义军头领李夺魁被杀,数百义军战死;清军乘胜追击,夺取设在头道川全部营寨,四百多义军阵亡。四月初六,陈家纸坊义军营寨被夺,五百多兵丁殉难。清军刘厚基部在扫清前进障碍后,分别由魏光焘、刘瑞冕、甘大有、俞金魁率部四路围剿老崖窑。按当地人流传,刘三大人(厚基)把老崖窑砦子“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湮汲道,列炮石”,“积柴薪与山齐,因风纵火,聚而燔之”。流传,刘三大人对坚守在老崖窑的袁长毛部用辣椒面借风势炆、用油浸火把射入烧、用火烤、用石头砸、用炮轰。袁大魁据险死守,十多天后弹尽粮绝,断水断炊,烟熏火燎,砦子内兵丁实在扛不住了,组成敢死队分两路由栈道和绳索下吊突围,希望杀开一条血路。就这样,捻军最后一支队伍一批又一批在突围中不是被石头砸死,就是被强弩射杀,或活捉杀害,两三天时间,一千多人全部葬身洛河,无一人幸免,洛河水染红。

老崖窑这一剿灭最后一支西捻军战斗结束后,清军将一千多具捻军尸体架火焚烧,挫骨扬灰,未尽尸骨丢入洛河。十多天后,河滩仍积有淤血和零散尸骨,臭气熏天,腥臭无比,难闻至极,恐惧至极,直到两个多月后一场山洪才冲洗干净。

附件：

老崖窑古砦

洛河之滨一崖窟，
悬崖峭壁显风流。
坐西向东拦洛水，
山川尽揽一眼收。

窑砦双层分上下，
洞府贯通便易行。
生活必须有尽有，
饮食起居在其中。

昔日兵匪乱天下，
“十村九空”没有人。
东藏西躲“救残喘”，
桑园良田不农耕。

清家皇室负万民，
官逼民反回乱生。
捻回合势据险守，
血染洛水青史留。

壬辰年仲夏于延安

史话马头山

王廷洁

马头山位于古保安——今志丹县东南方，距县城约九十华里。其地处于所称艾蒿岭的南端，与子午岭北端以北洛河相界，同安塞、甘泉二县地相融而交。秦汉时，这里尚属黄土高原平连之区，但也出现像今仓沟一样下隰地的分割，形成较大而如同马头的一区，故被称为马头山。

秦时，这里属于上郡高奴县的西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大将蒙恬受秦始皇之命，率所部三十万大军开筑直道，北起九原（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林光宫（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堑山堙谷，千八百里”。这条“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的秦直道，在今志丹（古保安）县境越浑州川（杏子河），沿艾蒿岭南下，直穿马头山今之土门、曹家坪、牛棚圪崂、马湾子、安条、任窑子、项渠、松树坪等地约达二十公里。据实地考察，蒙恬曾于任窑子村西二百米直道东五米处，还修筑了一座高大的斥堠，以侦察，“检行险阻，伺候盗贼”。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一代始皇帝嬴政，于出

巡途中染疾，病死在河北广宗的沙丘宫。赵高、李斯为扶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对屯军北地的太子扶苏、大将蒙恬封锁消息，对外秘不发丧，却把始皇嬴政的躯载体载于辒辌车中，由广宗沙丘宫急急转入直道南返咸阳。为掩视听，赵高与李斯密议，买得两车死鱼尾随辒辌车南行。这时马头山直道两侧，碧草茵茵，松柏森森，给赵高、李斯、胡亥一行丝丝凉意。马头山上这座斥堠也成了赵高、李斯、胡亥一行夜宿之所。辒辌车与所载死鱼均安置于斥堠之内，赵高、李斯与胡亥等，照例为辒辌车中始皇的僵体请安、进膳。叹为憾事的是，堪称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生前未能亲眼一睹这条亘古未有的宽宏大道，死后却这样经马头山沿直道返归咸阳。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初期，北方的匈奴屡屡南下侵扰、掠夺。汉文帝刘恒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居黄河以南地区，进而攻掠上郡。其时，马头山属上郡高奴县所辖。汉文帝为巩固北方边防，遣派丞相灌婴率骑兵八万五千到高奴击败右贤王，右贤王带着匈奴人逃走出塞。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汉文帝采纳了太子家令晁错之言，遂募民迁徙到塞地，随之于所说的艾蒿岭南端置苑养马。自此，这里也就成为其后所称的“卧马草地”。马头山之名当始于这一时期，不唯此地此时形类马头，也与这里置苑养马有其关联。

依据考究，马头山上秦所筑斥堠——有考其为行宫（夯筑高台遗址尚可见），乃为汉管理苑马官员的署地。经对其所修葺与增筑。苑马牧放的区域，并未囿于马头山及其缘边草场，而近栲栳城南之地，也属苑马的牧放之处。直道遗址边的东马湾子、西马湾子（已误称麻湾），就是因在此牧放苑马而得名。就是栲栳城南今称的麻子沟，曾被命为“马仔沟”、“崽马沟”，乃为专饲

养小马驹之处。

汉景帝刘启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南下进入雁门，直至武泉，进而入上郡掠取苑马。这时，被誉为“飞将军”的李广就任上郡太守，遂率所部兵马拦道截击，直杀得匈奴人惊恐脱逃，从而保护了汉王朝这一马苑。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七月，刚刚即皇帝位的汉武帝刘彻下诏罢马苑，以落实其父汉景帝诏劝农桑旨意，将苑马分赐于实边的贫民。虽说此地当时人口尚少，马头山及其相毗连地为所置约三十年的马苑之马，也随之分赐于民。马头山上遂有实边之民居住而垦种，直道沿边也有人家繁衍生息，也有为旅商歇足进食的小店。但斥堠犹存，仍驻扎着军卒，于侦察敌情的同时，维护直道的畅通与安全。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夏，匈奴人入侵汉地代郡、定襄、上郡。同年，汉王朝任命卫青为帅，率汉军十万北击匈奴，控制了河南地区。北上途中，卫青所率十万大军曾在马头山上立帐宿营。号角声声，篝火闪闪，林草丰茂的马头山间展现出一派威严、壮观景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十月，汉武帝刘彻为举行封禅，召集各部将军，并调集十八万人马北巡边关，以震慑匈奴。汉武帝从云阳林光宫（今淳化县梁武帝村）起行，大军沿直道北进。行至马头山的当晚，汉武帝以直道边斥堠为“行宫”驻蹕，大军遂排列四野立帐安营。汉武帝北出长城，大军直抵匈奴边关，匈奴人逃遁不战。为赶封禅日期，汉武帝于返京途中再驻蹕于马头山“行宫”。在夕阳返照中，这位雄才大略的汉天子兴致勃勃地登上斥堠，望四野，观苍翠林草山色，且啧啧默赞：好一处卧马草地。翌日，汉武帝从马头山起驾，涉越北洛河方离直道趋往鄜州、坊州。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就随帝驾由此

道北行南返。在侍驾登上斥堠远望之际，不仅领略到马头山的雄姿与风光，也为蒙恬通直道而赞叹。他在《史记·蒙恬传》中就写道：“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向汉求亲，被毛延寿构陷贬入冷宫的王昭君自愿请行，远嫁于匈奴。自长安出发，直道北行，夜宿在马头山斥堠内。尽管脱离了清苦的汉宫，却以离国去乡的心绪弹动琵琶，倾诉着哀怨别愁。

东汉初，马头山之地归于并州刺史部所辖，仍属上郡高奴县西部一域。其林木森森，碧草茵茵，依然呈现着卧马草地的旖旎风光。当年汉武帝虽下诏罢掉上郡曾置的马苑，但在马头山分赐实边贫民苑马时，却漏跑了一些大小马匹。直到东汉末年，马头山所置苑的牧马区域内，就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野马群”。汉安帝刘祜延光三年（公元124年），京师洛阳及其诸国发生大地震，今称的永宁山、三台山上覆盖的黄土震落，始见红崖赤壁，讹称的“马怀义”村落前因地震、连雨而形成了堰塞湖。自此，一群群“野马”就不时地跑到这里争饮湖中清水，故时人遂称这一堰塞湖为“马湖”。

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于弹汗山立庭后的鲜卑族檀石槐，从所占匈奴故地直犯并州辖境的西部地域。时任并州刺史的丁原遂命义子吕布率军西行抗击，且巡查边患。吕布就驻军于今杏子河尾近直道人称“龙窝”处，《志》称吕布窑。吕布生性喜爱养马，听说马头山一带多有“野马”，乃亲自率众沿着直道南行，且立帐于马头山上寻捕野马。经连日窥探，发现野马群中有一匹毛色恰似火炭，光焰耀目，身高约为七尺，体长一丈有余的骏马。其奔驰如飞，疾速似箭，哐哐嘶鸣犹胜金石之音。吕

布喜出望外，急命众朝夕围追堵截，终于在马湖近边今双河乡麻子沟（马仔沟）北的马鞍壕，收降了这匹“野马”。吕布兴奋不已，遂以红毛兔之瑞征命其马名，乃称赤兔马。尔后，世间方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

东汉末年，大文学家、大书法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于社会的激烈动荡中被南匈奴所掳，在万般凄楚中沿直道，经马头山北行，嫁给了南匈奴左贤王为阏氏。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于官渡打败势力强大的袁绍，逐步统一北方后，遂派使者周近携带黄金千两，白璧一双，赴南匈奴赎蔡文姬归汉。身在南匈奴生活十二年且与左贤王生得二子的蔡文姬，于此“回归故土”之喜与“弃夫离子”之悲的复杂心情中，恍恍惚惚地登车随来使由直道返归。风清月朗，山野寂静，夜宿旧有亭障中的蔡文姬想前思后，情不自禁地吹奏起《胡茄十八拍》：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

“雁南征兮欲寄边心，雁北归兮为得汉音。雁飞高兮邈难寻，空肠断兮思愔愔……”

“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

“东风应律兮暖气多，汉家天子兮布阳和。羌胡踏舞兮共讴歌，两国交欢兮罢兵戈。忽逢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二子兮会无因……”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与儿兮各一方。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对萱草兮徒想忧忘，弹鸣琴兮情何伤。今别

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

就是这样，如哭如诉的哀声，交伴着胡茄之音久久地萦绕在马头山上。

十六国时期，匈奴族铁弗部的赫连勃勃，在北方少数民族你争他夺的战争中，由后秦而拥兵自立，自称大夏天王，筑都城为统万（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占据了这一地域。东晋攻灭后秦后，乘刘裕还军仅留其子守城之机，欲发兵南下，遂对秦直道破败处进行抢修补筑。一时之间，今志丹县境艾蒿岭上这段直道，也开始紧张地补修加固。南端的马头山上下遂有兵民列帐，日夜施工。尔后，赫连氏所辖区域这条直道经补修而被称“圣人条”（胡语），今称的周条、何条、新胜条即由此而有名。赫连勃勃率领大军经马头山南下，攻取关中之地，于灊上称帝。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朔方人，时任鹰扬郎将的梁师都起兵反隋，攻占雕阴、弘化、延安等郡，自称皇帝，数引突厥南略。于马山破伐林木为炊。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派其姊丈柴绍统大军沿直道北上，攻伐梁师都大梁。也列帐夜宿马头山上，同样伐木为薪，连串的火堆长达数里，夜空通明。

唐灭梁师都之后，即于这一地域设苑养马。看苑果毅将军杨依仁选择了羊角城（今杨城）为其屯驻之处。马头山上的林木虽遭到滥伐，但牧草更显得异常丰茂，加之有直道之便，这里也就再次成为李唐王朝苑马牧放之区。经对在马头山上旧有亭障遗痕增补修筑，不仅成为牧放之人的住处，也为马头山增添了生机。岁月苍茫，苑马拦圈的直道西北侧，敕建起玄元皇帝庙，且由坐庙道士供起了道教之祖李耳神位。庙侧曾立撰文石碑一通，不仅记述立庙时间、地点，也涉及直道的开通，汉唐置苑养马之事。

极为遗憾的是，这块碑石却已杳然无踪，只能在耆老们的序代相传中略知其事。

随着人口渐增，贞观盛世年间，马头山上方展现出一派热闹景象。旧有亭障之处开有客栈、饭馆及杂货店。直道上人来客往，车马相向不绝。人们在此日食夜宿。入玄帝庙的虔诚者，问卜许愿，香烟袅袅缭绕不断。古三月二十八为庙会之日，四邻八乡的男女老幼纷纷赶来焚香祈福。自此，马头山更为出名，不仅成为道教的一处圣地，也成了来往客旅歇脚、食宿的驿站。安史之乱，及之五代时期，这里也遭劫罹难，苑马被掠，客旅骤减，但玄元皇帝庙中香火不断。

宋真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保安军于栲栳城立治，处于南部的马头山一域，人口继日增多，马头山直道上的马走车行络绎不绝。玄元皇帝庙的香火随之兴旺。但因避宋太祖“玄”之讳，乃称庙为元帝宫，故《保安县志》中载有：“九十里马头山有元帝宫”。此时，元帝宫住着一位颇有声望的道士和一个精明的道童。除焚香与人占卜外，时不时地于原畔山间寻采药材，且为山民释其药名。一时之间，采药之人大增，马头山也被称之为“药山”。

金王朝统治保安（今志丹）县城时期，马头山乃成猛安谋克占据之处，直道上人马往来交织，原岭边缘则立帐放牧。金王朝下诏少数民族学农耕稼，这里乃成为金王朝在保安一处屯耕之地。完颜国家奴亲临此处督耕，在侦知元木华黎南下失败，经石辘台北返，即于此集中兵力埋伏于石辘台山左右，打败了元军。

蒙古元统一中国后，保安之地人口大减，行政区划上虽以里社之制辖民，但地大而人稀，未能整齐划一，马头山一域为蒙古族民所游牧，此地遂命靖边旗。由于崇道祈仙的习俗，使这里的

元帝宫得以修葺，香火倒也旺盛。为保安全，元朝还在邻近地区分驻探马赤军。

明王朝统治保安时代，蒙古等少数民族纷纷北迁。明王朝自洪武时就极力募民实边，以发展农业生产，巩固边防。其时，广袤而处处沃野的保安县境内，遂出现招募农民垦田种地的民屯、商屯。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王朝在国内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为加强对北方鞑靼侵扰的防御，乃于保安县所属靖边里（今永宁镇地域）增置靖边守御千户所，进行军屯。

清同治“回乱”始末略述

同培新

由于写家谱，家族的一段历史涉及到同治年间的“回乱”。于是我走访了知道“回乱”事件的老年人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发生在清同治年间的“回乱”有了印象，现就其始末作以略述。

发生在清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人们称之为“回乱”，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这次“回乱”主要发生在陕北，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我国西北地区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事件距今已七、八代人了，但当年兵燹遗迹依然存在。那种残忍的烧杀，疯狂的劫掠，断壁残垣的堡寨，百孔千疮的崖窖，以及户绝人稀的荒凉村子和磷火遍野的沟壑，悉数可指，历历在目，这些都是从老一辈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这些惊心动魄的传说，既动听又令人毛骨悚然。

说起清同治年间的“回乱”是有其很深的历史根源。在清以前在我们陕西关中渭河两岸就杂居着回、汉民族。长期以来由于回汉民之间因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积年累月难免产生一些纠纷和隔阂。到清朝后期表现的较为突出。回汉民争讼，清政府官吏偏袒汉民抑制回民。汉族地主和地方恶势也仗势

期辱回民。由于回汉之间发生的普通矛盾得不到合理解决，遂上升为仇恨。清王朝官吏也采取“以汉制回”手段，使矛盾进一步尖锐、扩大进而恶化，直至举行武装暴动。

同治元年（1862年）渭南仓渡清真寺阿訇任武、郝明堂聚众三千回民举行武装起义。任武自称元帅，率回军进攻朝邑、大荔，并迅速攻占了华州城，同时在华州各地攻寨克堡，所到堡寨、村庄汉民百姓尽遭屠杀，房屋全被焚毁。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威震陕南、关中地区。与此同时泾阳阿訇杨文治，武进士白彦龙、白彦虎也拉起数千回民和任武汇合。同年十月回军战领礼泉、乾州等乡镇。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清政府多隆阿来陕“剿回”。多隆阿部装备洋枪洋炮，武器精良，回军在临潼、三原、泾阳、凤翔等地相继失守，回军四万多人在清军多方全力的围攻下在关中战败。于是向甘肃庆阳董志塬一带撤退与清军周旋。

同年十一月宁夏阿訇马化龙在金积堡举行反清起义。马化龙祖籍灵州（今灵武）金积堡，其父为西北回教白山派教主。马化龙在金积堡起事后，迅速联络各地起义队伍，占领了银川以南各县，自称“总理宁都两河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简称“两河大总戎”。

同时甘肃河州（今临夏）马悟真、马占鳌，肃州（今酒泉）马文禄，青海马文义、马桂源也举行了反清大旗。他们聚积数万回民策应渭南、金积堡河州、肃州及西宁等地回民起义军前往甘肃庆阳董志塬汇合。

同治四年（1865年）春，陕、甘、宁、青四军已达三十余万人，汇集董志塬整编为十八大营。杨文治、马正和被推为大营头目。这时清政府因忙于镇压太平天军，无力回顾，对西北回民

军只采取“以堵防为主”的“先抚后剿”的既定方针。此时回军大营既向陕北进攻。

回军进入陕北后，为发泄往日积怨、仇恨和私愤到处攻城破寨，大肆烧杀掳掠，百姓难于幸免，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同治六年（1867年）秋，回军自董志塬由安化（今华池县）窜入保安。回民起义军穆三穆四、马蜡子部攻入保安县西川双庙（今吴堡川双庙）等地，把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产生的仇恨交积于民族仇杀之中，所到之处，滥杀无辜直至毁庄灭户，奸淫妇女，焚烧村庄。因此也激起广大汉民的强烈愤怒，纷纷组织起来奋力抵抗，直至同归于尽。

同治六年（1867年）秋，回军杀到吴堡川南沟，同广、同贵两兄弟掩护家人及庄民进行躲藏，一百多口人中有老有少，年轻力壮的还要招呼孩子和老人，致使撤离缓慢，加之回兵众多，一百多人十有八九被回兵杀了，只有少数人逃进老林。同广、同贵等人有一身的武功，他们弟兄俩与回兵展开了殊死搏斗，几十名回兵也奈何不了他们俩。同广带领弟兄正欲撤离忽见院内众回兵扯抢一“哈拉褂子”。此物系他老母珍藏多年一直舍不得穿的衣物。同广见此景不禁怒火冲顶，打回院内夺取褂子。回兵大怒，纷纷举枪使刀向同广扑来。同广握一“等身棍”和同贵一同再次力斗群凶，从院内到院外，一直打到沟底。同广正欲将夺回的“哈拉”褂子穿在身上，此时众回兵蜂拥而上，用矛将同广刺于胸部而倒入血泊中。同贵见大哥被回兵戳死，一时慌了手脚，忘记举棍套路和回兵乱打成一团。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回兵捉住，并从树上拽出三哥同德顺，拉回窑内见回兵头目。开门时忽从门后掉下一把四弦，头目问同贵，“此物叫啥，会拉否？”同贵

本擅长拉四弦，因愤故说不会，头目即令拉出门杀了。又问同德顺，你会拉否？德顺见此情况只好忍泪含悲为回兵拉至深夜。回兵且歌且舞至筋疲力乏，方将德顺反绑在窑内。德顺深知现在绑的这个窑和另一个窑腿子很薄，稍挖就能逃生，于是他磨断绑他的绳子，找到了面刀，挖通窑腿从另一窑最终逃生。第二天在死人堆里找到了未死的老母和在山洞里躲藏的小弟，踏上了乞讨要饭，流落他乡的尘途。

同治六年回军进入西川九嘴坡。据保安县志略（光绪本）记载：“民人同锡光，西川九嘴坡人，家故富饶，贼执去，拷索窖藏，无所得，以火烙之遍体焦黑，卒不屈，贼执其手足悬诸空室而死。”据老家人相传，回军进入九嘴坡，同家组织家丁和轻壮男人抵挡，因回军人多，抵挡不住，一百多人被回军捉住杀害，只有两人逃脱。掌柜同锡光被回军绑在马棚上索要银两，同锡光一口咬定一两都没有，回军挖地三尺院内院外挖了个遍，也未找到，回军把铁钹烧红，把锡光衣服脱光，在脊背上去烙。同锡光大骂说：“老子有十八缸银子，是给我子孙的，你老母猪下的鬼孙子是拿不走的”。于是回军将其和弟弟同锡瑞活活烙死。

同年回军扫荡了永宁白沙川。本村居民四百多人被捉，集体押到村北台地上，将数人一组押到拐沟内全部屠杀，人尸体堆积数丈高，人血顺水沟流淌，一直流到小河里。仅有十来个人逃生，其余全部被屠杀。屠杀后回军搜掠了全街所有地方，钱财一空又将庙宇商铺、店面、居室和牲畜圈舍付之一炬，白沙川顷刻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回军又到永宁洛河川老崖窑，百姓居集在崖砦上，回军到不了砦上，于是回军塞流断汲，而久围岩砦，直使砦民干渴难忍，出现了人喝人尿的情景。砦不攻而自开，放出的民众抢饮河水，胀死无数。剩余男人被杀，妇女则被一丝不挂驱

赶到槐树庄，后全部被杀。

同治六年秋回军进入保安县城，城内空无一人，回军进城后，将粮食货物掳掠一空。并烧毁多处房舍店铺。

同治七年（1868年）春，马腊子率回军进入杏河川活动，逢庄抢掠，见人就杀，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局面。当年曾属昌茂繁荣的要冲地闯城山，在马腊子这支回民军的指挥下，在城内外肆意抢掠财物，并把城内的所有百姓赶到城东门口恣意妄加屠杀。

“回乱”告急，清庭震惊。同治六年（1867年）春，清庭急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赴陕“剿回”。同年八月左宗棠亲率湘军十二万，兵分三路向陕进发。左宗棠入陕后，制定了“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先抚后剿，以回制回”的战略方针。一面派兵追剿，一面饬令各府、州、县集中地方驻军团练以及动员地方绅民组成防御体系，以堵回军，这样形成了进攻与群防、对抗与仇杀的残酷局面。

保安地百姓在清军的支持与配合下也进行了有力的抵抗。回军进入保安县城，县令刘某先赴省城西安，某营官带护粮防勇及民团驻守县城与回军交战于西阳沟口，回军失利西去。

相传回军到西川金汤，石沟有九个弟兄，个个都会举棍，武功极好，号称“九条棍”，使用棍棒等民间武器驱赶回军，最后都壮烈牺牲。

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西捻军袁大魁驻扎洛河川老崖窑自任元帅，凭险修筑。同年十二月清军招募敢死队，掷火弹焚烧，崖窑攻克，回捻军全部遇难。同治八年四月清军配合地方民团在洛河川马蹄沟和回军激战。清军副将王正和胥玉元率部猛攻。回军指挥官李夺魁战死。清军乖胜围追，回军又死伤四百余人，指挥官张洪太、余天贵、张复盛、何文彪被俘。此后回军陆

续退出保安县境。

兵匪祸乱，血雨腥风。四年“回乱”保安回兵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土地荒芜，蒿蓬丛生，路无行人，野狼成群，遍地尸枕籍垒，秽气熏天，瘟疫流行，十村九空，几道川成了无人区，所剩无几的人，便合伙逃亡。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喻秉章奉命调任保安知县，在乱后近三年，该县才有地方官。但县境内却无民可治。于是县府出榜招人。一年内共招回一百七十余。到光绪六年（1880年）才增至三千人。

回军在陕北战败，损兵折将，撤至甘肃、宁夏。原进攻陕北时有三十多万人，现已锐减到不足十万。于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左右，回军从陕北各个战场先后撤离。回军退出陕北但左宗棠领导的清军大兵穷追不放。

同治八年八月，左宗棠大兵进逼宁夏武忠，攻打马化龙金积堡。在清军长期围困下，金积堡内粮食断绝，堡内军民煮吃草根、麦秸甚至死尸，在金积堡陷于孤堡被困无奈情况下，马化龙为保全堡内军民性命，向左宗棠提出求和投降，与儿子马耀邦开门献城。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左宗棠将马化龙父子及其一千八百多军民全部残忍杀害。

左宗棠杀害马化龙等人后，又进攻河州（今甘肃临夏），驻守河州的马正和、马占鳌在洮河两岸筑工事和清军决战。决战中回军首领马正和战死。马占鳌提出求和请降，降清后马占鳌被左任命统领头街，反过来又开始镇压回军，甘肃战事结束。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左宗棠进驻西宁。回军头目马桂源与白彦虎联合与清军作战，激战七十多日，清军大胜，回军大部被降。同治十二年（1873年）白彦虎退至肃州（今酒泉），二月马桂源被俘，押至兰州处死。

西宁城破时城内回民百姓共计两万余人，被押赴平凉、清水一带择地安插。

同治十二年八月，左宗棠大兵围困肃州（今酒泉）城内粮草断绝，驻城首领马文禄，十一月向清军投降，清军入城后，将城内三千回民连同马文禄残酷屠杀。

肃州城陷后，只有白彦虎率余部退新疆与清军周旋一段时间，于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退到新疆喀什西南俄国边境上。这时前面是高山峻岭，异国他乡，后边又是穷追不舍的大兵。白彦虎想过降清，但金积堡马化龙和肃州马文禄被处绝的教训，他又不敢。最后白彦虎决定派人带金赴俄买路求生。腊月十三，白彦虎率部翻越恰克马克山，腊月二十八到了俄国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掘窑而居，并向当地政府缴了械为民。沙皇政府许诺四十年不向他们征税征兵，并称其为“东干人”，1991年10月第一个东干族代表团访问了陕西，他们就是当年陕甘起义回军的后裔。

历史已远去，残酷的现实令人不堪回首。当年发生“回乱”的根本原因是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和在民族之间的挑拨离间、怂恿偏袒，致使兄弟民族同室操戈，血肉相残。我们要“以史为鉴”，汲取历史的教训，增强民族团结，构造和谐社会，永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

“九条驴”轶事

臧光明

还是在我刚踏进志丹中学大门的时候，就听说过“九条驴”抗击“回乱”的英雄故事。最近，我有幸找到其曾孙——志丹县邮政局退休干部石有甫先生，听他讲了曾祖父“九条驴”抗击“回乱”，保一方平安的点滴流传。

“九条驴”弟兄八人，志丹县金丁镇石沟村石姓，“官名”不详，乳名分别叫“大愚子”、“二愚子”，一直到“八愚子”。人们串音叫成“驴子”，加上在抗击回乱中被“斗惊”的一条瞎骡子乱咬乱绊，构成流传中的“九条驴”。石沟石姓，祖辈酷爱中国武术，舞枪弄棒，人人都会两手。到“海”字辈，即“愚子”弟兄辈，家境尚好，请一武教师长年传授武艺。“愚子”弟兄从能拿起棍棒开始就练功习武，进入青年时代，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尤其是“铁链架”使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到了壮年时代，名声远播，威震一方。据传，弟兄八人，个个武功了得，多年存放食盐的草囤（已卤成块）伸手即到肩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在金汤镇建起没有字号、没有通过官府申请登记的石家“镖号”，承揽方圆周围保镖事宜。有

一年，一愚子兄弟奉命给保安县义正樊川“曹八缸”保镖，骡队（12条骡子）到铜川“金锁关”被一百十来号“悍匪”窥视，认定“货物”颇丰，是一块送上门来的“肥肉”。夜间，将其住店包围，声言留下骡队及银两、货物，“可饶尔等身家性命”。保镖的石某，看到这一情况后，不慌不忙，搬来一大青石条踏在脚下，酒足饭饱，“洋烟瘾”过后，虚张声势，问掌柜：“师傅，你上还是我上？”说话间将脚下的大青石条踏的粉碎，众匪见之，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闲话不叙，转入正题。

清同治初年，满清政府为“江山永固”，长期实行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奉行“以汉制回”，“护汉抑回”政策，致使回汉矛盾日趋严重。特别是“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错误主张被广泛应用后，回汉矛盾凸显，到了一触即发、白热化程度。同治元年（1862），陕西同州等地，发生多起回汉械斗直至流血事件，仍未引起满清政府的重视。“坐山观虎斗”，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继续奉行“护汉抑回”，视民族大义而不顾的错误政策，回汉矛盾由起初的民间寻仇衅斗到大规模的聚众到官府衙门闹事“讨说法”，到引发陕甘乃至宁夏等地回民起义。同治5年（1866），回民起义军由西到东，蔓延千里，聚数十万之众，进而形成我国历史上中国北方“同治年回乱”。同治6年（1867），数万回军从甘肃董志塬一带缔集出发，由陇东翻越子午岭进入陕西。对延安以南及关中地区实行“大扫荡”；马化龙、董福祥领导的另一股回军在攻击陕甘交界的安化县（今甘肃华池县）后，缔集体整，从安化出发，翻越子午岭直驱保安，转战陕北。回军在血洗白沙川、老崖窑、旦八、金鼎等重要集镇和砦堡后，顺洛河北上，直逼金汤古镇。沿途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整

村整户屠杀汉民，洛河川“十村九空”。据《保安县志略》记载，回军所到之处，“搜刮一空，无所得食”。“每遇洞寨，断其汲道，列炮石环攻，其不降者，积薪木与山齐，因风纵火，聚而燔之，使无唯类，其凶残暴酷，视回逆尤惨”。保安全境，同治6年（1867）乱后，初次招抚仅一百七十余。回军占领金汤古镇后，看到周围一些小村庄家家户户“铁将军把门”，人去屋空。经盘查，方得一部分人“远走他乡”、“投亲靠友”；一部分人到石沟村逃灾避难，暂躲一时。同时，得知石家的链架威震一方，闻名陕甘与“草地”（内蒙地区），决定精选二百骁勇杀之。

石沟村座落在金汤古镇南2公里，洛河东岸的拐沟口（今石沟水库），沟口狭隘，沟内宽阔。村庄座北向南，群山环绕，绿山碧水，“卧虎阳湾”，环境幽美，风景宜人。村庄后一公里处的东沟（又叫和尚沟）的悬崖上有一人开凿的“石家窖子”，呈西东走向，“口小肚大”，可容百十来号人暂居。出入窖子靠一“软梯”通行（石家老少妇孺均略懂拳脚功夫），易守难攻。遇一般枪炮攻击，可用新沙毡（山羊毛制品，可做铺垫，有驱寒、防潮、挡水、挡子弹之效）挡之。回军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决定夜间包剿偷袭，“一举歼灭”。石家弟兄探得回军已将金鼎、金汤等砦堡占领的消息后，将家小及前来躲难的亲朋邻舍一百多号人送上窖子，认真分析“敌情”，研究御敌对策，演绎阵法，准备破敌。那一天，夜半二更，回军二百骁勇在一武功较高强的小头目带领下抵达石沟，将村庄包围叫阵。“愚子”八兄弟，人人手持“铁链架”，威风凛凛站在阵前，话不投机，说话间与众兵卒展开激战，边打边走，把“敌人”诓至空旷的练武场，与埋伏在此的众弟子会合，摆开“一字长蛇”等阵势，人随阵走，阵随人愿，人动阵变，阵变人变，刁钻诡秘，变化无穷。“敌军”哪见

过这种打法，处处被动，时时挨打，喊爹叫娘，阵脚大乱，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竟死伤大半。与此同时，石家饲养一条体魄魁梧、膘满肉肥的独眼骡子，被双方打斗“斗惊”，挣断缰绳，进入“敌群”，左冲右绊，前踏后踢，咬绊结合，横冲直撞，咬住敌人如甩皮球一样一甩一、二丈，有的被咬死，有的被摔死，有的被甩的半死不活，还有的被踩死、绊死、踢死。“敌人”一直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如此疯狂，如此厉害，“莫非是妖魔鬼怪作祟”？直到天明，才看清楚原来是一条骡子，用长矛戳杀，但四、五十条回军士兵的性命丢在了“瞎骡子”周围。石家八兄弟连同“瞎骡子”“九条驴”打的回军四散溃逃，二百骁勇回大营不足六十人。

“九条驴”一仗威慑回军，使之闻风丧胆，没有人再敢带头攻击，近距离作战。一连几天，用土枪土炮射杀，终因窖子口太小和用纱毡挡之无功而返，弃之远离，向保安县城进发。

“九条驴”的壮举，保住了一百多号人的性命，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盛传于洛河川乃至陕甘“草地”的“民族英雄”。

以英雄命名的村庄

姜永明 姜 蔚

在中国西北角，分布着一片地球上最大的黄土高原。逶迤起伏的高原深腹，有一座历史悠久，偏远闭狭的山城，古称保安。素有高原要塞之称，它唐时设镇，宋设军，金设州，元降为县，绵绵延延，已逾千年。在县治的西北部，洛河上游，宋代古城金汤虚落，公元1903年10月出生了毛泽东称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因此，1936年，刘志丹东征抗日牺牲后，党中央于5月下旬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县。志丹自古以来就是民风刚烈、英雄辈出的地方，在刘志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红色根据的艰苦岁月中，在志丹县的山崩沟壑间，还有一镇两区两乡用浴血疆场的英雄名字命名，至今在历史岁月的湮漫中已湮没无闻。

(1) 兴明镇与郝兴明

刘约三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回忆》第九章“党中央毛主席来到陕北前后”第1小节中回忆：“在劳山战役胜利后，将所俘获

的一百余匹战马全部分给红色骑兵团，为了给战马配备行装，购买草料，刘志丹派骑兵团参谋长刘约三带一个班战士，骑着百余匹空马赴三边购买鞍辔。在靖边宁条梁完成任务归返途中，于保安县兴（新）民镇宿营时巧遇毛泽东、彭德怀、李德等人，并在此及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与26军的基本情况和陕北肃反的恶果，毛泽东在兴民镇安抚刘约三他们：“刘志丹和陕甘的党政军干部马上就会放出来”，那么兴明镇在那里呢？

据资料得知：兴明镇就是今天距志丹县城5.2公里的新凤村，原名进土窑村。相传崇祯11年（公元1636年），村里有一书生考中进士，震动四乡，故得名“进士窑”村。如今在城镇现代化的建设中古村已渐消亡，田野、村庄、变成了现代通衢大道。

1935年4月，党和人民政府为纪念在双河芦草沟攻打窖子战斗中牺牲的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五支队指导员郝兴明，将进士窑村改为“兴明镇”。

郝兴明，又名史法直，陕西子长县瓦窑堡水沟坪人，1908年生，西北著名革命烈士。1930年随谢子长投身兵运，曾任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五支队指导员。1935年1月在攻打保安县芦草沟崖窑时牺牲。

郝兴明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兄弟七人，排行第六。父亲本姓史，后过继给郝家，遂姓郝。生有七子，按陕北“借子还孙”的风俗，由老五、老六、老七复了本姓。所以，郝兴明又叫史法直，有的书上写成郝新民、郝醒民。

郝兴明少年时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陕北传播。安定县是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1924年寒假期间，绥德四师学生，青年团员赵通儒就在瓦窑堡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各

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加上谢子长同志的革命活动，使得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郝兴明在瓦窑堡二高读书期间，就与同学杨彩霖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都参加了党组织。

1930年初，由于陕西省委屡遭敌人破坏，陕北特委书记焦维炽先后去了西安，很长时间没有消息；特委代理书记兼军委书记杨国栋因后九天起义失败而消极，脱离了工作岗位；特委秘密机关已无法存在，陕北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存亡关头。为挽救革命，特委组织部长白明善，特委常委、清涧县委书记孙兰馥与谢子长在枣树坪谢子长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白明善代替杨国栋担任特委书记；由赵通儒去北京寻找北方局，恢复北方局与特委的关系；发挥谢子长、刘志丹在西北的威望与作用，准备开展武装活动。

会后，谢子长带强龙光西去，在甘肃军阀苏雨生部活动到11旅旅长的头衔。陕北特委决定动员党团员参加谢子长部队，开展武装斗争。安定县先后去了30多名党团员与进步青年，如贺晋年、路文昌、李仲英、杨林、赵仰轨等。郝兴明也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毅然投军。他们到达宁夏平罗窑全堡，找到了谢子长。不料，未等11旅组建起来，苏雨生就奉命率部离开宁夏。谢子长便和榆中老同学、8旅15团团团长王子元商量，决定把这批党团员青年组成一个学兵队，暂时编入15团序列。学兵队队长是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的张东蛟，高岗任分队长。从此，郝兴明便在这个学兵队里，正式扛起了枪杆子，一面学武，一面做党的工作。以后，15团被甘肃军阀雷中田收编，先驻扎在兰州飞机场旁，后移防定西，开始了正规训练。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军事知识，为以后从事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0年底，学兵队毕业。郝兴明和贺晋年决定返回陕北找谢子长，用学到的本领为党工作。队里还有一名学兵康明礼也决定回陕北，三人结伴同行。他们从定西动身，经过静宁县城，于腊月十七日（1931年2月4日）走到一个叫乱柴堡的村子时，遇到一股乱兵，三人被洗劫一空，回不了陕北。经过平凉时，找到了我党派在这里担任陈璋部教导团政治教官的地下党员刘国梁。经刘国梁介绍，三人留在教导团当兵，郝兴明不久就当上了班长。1931年6月，刘国梁身份暴露，被捕牺牲，三人被迫逃离平凉。贺晋年返回静宁，继续从事兵运工作。郝兴明则返回陕北。

1931年秋，阎红彦、杨仲远、吴岱峰率领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陕北特委动员了一大批党团员参加游击队。郝兴明与二哥郝子元也在此时参加了游击队，随军转战。1932年2月，西北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高举红旗，转战在陕甘高原。1932年6月23日，陕甘游击队在韩城象山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郝子元不幸中弹身亡。

郝子元又叫郝兴善，当年也是瓦窑堡一带的著名人物，好朋友，社会关系极多，与谢子长、杨庚午、呼成章、梁青田等十分要好。1920年前后，田维勤驻军瓦窑堡时，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谁能招来人马，就给谁官做。郝子元与大哥郝炳善号召了一帮子人投了军，后随军到河南，编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在郑思在部下当过连长，国民二军失败后返回陕北。杨庚午在上后九天之前，回到瓦窑堡时，因家在城内，不敢回家，就住在郝子元家里，后来才上了后九天。晋西游击队到陕北后，郝子元与六弟郝兴明一起参军，后在陕甘游击队任供给员。文革期间，正在河南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吴岱峰给子长县写回材料，证明了郝子元革命烈士的身份。

二哥牺牲后，郝兴明把痛苦埋在心底，决心继承二哥未竟的革命事业，继续东征西杀。

1932年10月初，郝兴明从陕甘游击队回到瓦窑堡，准备结婚，并带回来一支手枪。就在他结婚那天，榆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中哗变出来几个人，来到瓦窑堡和共产党方面接头，听说水沟坪的郝兴明是共产党，就找到郝兴明家里。郝兴明正做新郎官，抽不开身，就安排五哥郝根宝先把来人领到白家枣林村。郝根宝把来人送下，安顿好，赶紧往回走。走到河滩时，远远看见瓦窑堡方向跑过来几个骑马的士兵。他看见情况不对，赶紧从大路下来，在路畔下找了一个串洞，躲藏起来。敌骑兵跑过来后，议论说：“日怪！明明看见大路上有个人，一转眼就不见了？敢是红军探子吧？”郝根宝听见马蹄声呼啸而过，以为没事了，就从串洞里出来。不料，敌骑兵正好调转马头，看见河滩里突然冒出一个人，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郝根宝一个马趴，倒在地上。敌骑兵扬长而去。村里人听见枪声，出来一看，认得是郝根宝，于是赶紧跑去水沟坪报信。正在忙忙乱乱过喜事的一大家人，赶紧上去救人，发现子弹从肚子进去，后琵琶骨出来。七手八脚把人抬下来，过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些骑兵是驻延安的敌旅长高双城带到瓦窑堡准备镇压革命的。反革命的残暴行径，更增添了郝兴明对敌人的仇恨。

不久，正在准备组织陕北游击队的高朗亭找到郝兴明，动员他参加游击队。郝兴明立即答应，并把带回的手枪交给高朗亭。1932年10月20日，陕北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在延川县高家圪塔正式成立。陕北特委军委员毕维周代表特委授旗、发印，宣布九支队成立。高朗亭任队长，艾龙飞任政委，郝兴明与马万里、栾新春、贺吉祥、高嘉德

等二十余人参加了成立仪式。

九支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活动，打土豪筹款。12月9日，九支队在清涧抓了大地主白明扬。游击队把白明扬带到延川县禹家圪崂的崖窑里，关押了一个月，由栾新春、贺吉祥等人负责看守。这是最为艰苦的一段生活，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吃过菜，没有洗过脸，也没有理过发，只能在每天晚上自做一点小米饭吃。后来，白家同意交款赎人。为了防止敌人的阴谋诡计，在白家来人交款的时候，郝兴明奉命在暗中掩护，保证了筹款任务的圆满完成。白家送来3400元银洋和部分衣物及一支短枪后，九支队释放了白明扬。游击队把大部分钱给了陕北特委，留下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这笔巨款解决了陕北特委的燃眉之急。

这年年底，游击队同意队员们回家过年，郝兴明便回到家里。此时，安定西区民间好汉白德胜手里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党组织为了开展武装斗争，正在想方设法搜集民间的武器。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和白德胜去洽谈。特委委员毕维周和安定县委负责人赵福祥，在郝兴明保护下来到枣树坪村，通过谢子长的大哥谢德惠的关系，找到白德胜，做通了白德胜的工作。白德胜同意，等他的枪回来，就和游击队一起干。

1933年2月初，正在小学任教的杨彩霖到安定县参加考试时，无意中碰见了郝兴明。老同学见面，欣喜万分。郝兴明告诉杨彩霖，自己是从南梁回来的，要在县上开展游击活动。这些消息，让杨彩霖受到很大鼓舞。

正月底，强世清也奉命从陕甘游击队回到家乡，开展武装斗争。走到安边时，遇见了盟兄、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舟和陕北红军游击队九支队队员高嘉德，三人结伴回安定，随身带着当时最

为珍贵的武器——三支盒子枪，一支冲锋机关枪。正月二十七日（1933年2月21日），他们回到了强家湾，隐蔽在强世清的三叔强焕娃家里。

几天后，赵福祥送来情报，说安定县长刘墅明要去瓦窑堡。毕维周和强世清商量，决定在半路伏击，打掉刘墅明。他们觉得人手不够，就把郝兴明从家里叫来。

二月初一（2月24日）上午，刘墅明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两名护兵，一个背着短枪在前面牵着马，一个背着步枪跟在后面，从安定出发去瓦窑堡，十点左右过了栾家坪。强焕娃探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给强世清四人。他们赶紧出发，抄近路赶到刘墅明前面，埋伏在河滩里一座便桥旁边的大石头下。刘墅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刚上桥头，强世清撩起长袍，端起冲锋机关枪，一个梭子子弹射出，刘墅明一个倒栽葱倒在冰滩上，挣扎着往起爬，毕维周用手枪在脑袋上补了一枪，刘墅明一命呜呼。

牵马的护兵看见打死了县长，骑上马向瓦窑堡狂奔。后面的护兵扭头就跑，被郝兴明一把扭住，缴了枪。他们把尸体扔进冰窟窿，然后把事先写好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九支队的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和栾家坪显眼的地方。一切布置妥当后，四个人爬上山头，只见瓦窑堡开来敌人一个骑兵排，二十多人马，向栾家坪疾驰而来。四人立刻转移，强世清和毕维周去安定西区隐蔽，高嘉德回清涧，郝兴明潜回瓦窑堡。

打死安定县长一事震动陕北。敌人疯狂报复，派兵三路出城搜捕红军。形势越来越紧张，郝兴明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瓦窑堡，到处躲藏。1933年农历11月，他听说学兵队的老友贺晋年正在安边一带教书，辗转来到安边，找到贺晋年。贺晋年是在甘肃搞兵运失败后，辗转来到离安边四十多里破堡子，通

过社会关系，找到一份教书的临时工作，暂时安身。郝兴明找到贺晋年时，赵福祥也正在那里，比他早来几天。他们三人在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中，认识到一个共同的革命真理，那就是必须掌握枪杆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枪。赵福祥来这里之前，正值强世清率领一支队攻打枣树坪失利，他去找陕北特委，讨论游击队干部问题。返回途中，于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在杨家园则被民团抓住，打得两腿流血。第二天被押到瓦窑堡，在区公署又被吊起，打的死去活来，小腿肿得比大腿还粗。敌人没有得到口供，下午把他绑送到安定县城。到安定县城已是晚上，城门封锁，进不了城，得等明天再进，于是，又将他送回高家沟住宿。半夜里，赵福祥从高家沟逃出，跑到玉家湾辛胜坪庙沟的天窑里住了几天，养伤二十几天。由于在当地已无法工作，到农历十一月，县委负责人景方和一支队队长白德胜决定，派他去安边谷莲舫部做兵运工作。临走前，把自己带的一支枪交给了景方。郝兴明听说他把枪留在安定，觉得十分可惜。

此时，三边一带驻扎的敌军是杨虎城的骑兵旅，旅长谷莲舫，下辖三个团，一团段佑庵驻定边，二团张庭芝驻安边，三团张庭祥驻靖边柠条梁。陕北许多在家乡不能存身的党团员，都来到这里，从事兵运工作。仅安定人就有杨彩霖、薛毓瑞、张宗孝、薛振昌等十几名同志，都在张庭祥团。郝兴明、贺晋年、赵福祥三人商量，决定赵福祥在周围打零工，贺晋年把郝兴明介绍到张庭芝团当兵。当时，这个团里还有谢子长的外甥、原陕甘游击队、陕北一支队的姬振元等人。安顿下来后，赵福祥给陕北特委捎信，汇报了情况，让特委派人来三边领导兵运工作。特委接信后，派团特委书记马文瑞来安边领导兵运工作。

1934年初，马文瑞来到三边，找到了同志们，成立了党支

部，指定由神木来的王治岐负责一团的工作。马文瑞曾经在安定担任过县委书记，在郝兴明家里住过好多次，对他非常熟悉。这次又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密切。他们在部队中秘密开展活动，发展力量，准备一等时机成熟，就举行兵变。这年夏天，杨虎城调骑兵旅开到西安进行整顿。部队走到庆阳后，马文瑞指示郝兴明举行兵变。当晚，郝兴明拉出一个排 20 多人，十几支步枪。他们按照预定计划，从庆阳城墙上用绳子把人一个一个吊下去。郝兴明带着兵变队伍开到南梁根据地时，保存下来 13 人枪。在西北革命过程中，我党领导的兵运工作绝大部分都失败了。郝兴明领导的这次兵变，最终保住了 13 人 13 支枪的成果，在西北兵运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刘志丹见郝兴明带来这么多人枪，非常高兴。从此，郝兴明又在刘志丹领导下南征北战，成为刘志丹同志十分信任和喜爱的一员战将。

就在郝兴明来南梁之前不久，安塞洛河川府君店民团团丁王世民等 7 人，在地下党员康全民策动下哗变，带出来 12 支长枪，1 支花筒机枪，成立了游击队。同时向上级汇报，要求派人来加强领导。刘志丹知道这个情况后，考虑到民团成分复杂，必须进行改造，需要配备军事政治都过硬的干部前去领导。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派郝兴明去领导这支游击队。郝兴明带着拉出来的部队，赶到洛河川，与王世民等会合。8 月，在洛河川孟家洼召开群众大会，正式组建了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五支队（又称安塞游击支队），队长王世昌，副队长王世民，指导员郝兴明。五支队成立时，虽然只有 30 多人，但枪支不少，在当时各地的游击队中，算得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五支队在郝兴明等领导下，以洛河上川为据点，积极活动在洛河川、高桥川上下，转战在安塞、保安、甘泉、富县、延安数

县范围内，打击地主土豪，没收他们的粮食、牛羊，分配给贫苦百姓，收缴地主武装的枪支，扩大游击队，保卫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为洛河川苏区的开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4年9月，五支队攻克了高桥川敌人民团盘踞的沟槽渠寨子，自己无一伤亡，20余名团丁全被缴械，枪毙了民愤极大的团总。接着又打下龚圪堵等寨子，五支队迅速扩大到一百多人，下设了三个大队，成为威震洛河川的一支红色武装。以后，五支队又两次攻打安塞县李家塌寨子，均未成功。这个寨子当时是安塞境内敌人最顽固的一个堡垒，直到1935年6月，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经过数日血战才打下来。不久，五支队会合六支队一起发动了对合水县城的攻击，也未成功。五支队又挥师东进，一度攻进敌人重兵把守的甘泉县城，发现国民党在县城内又增加了两个正规连，身经百战的郝兴明当机立断，立即率部撤出。转眼间就进入了1935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红色区域继续扩大，红军游击队力量不断壮大，地主豪绅和民团只能龟缩在一些寨子和崖窑里，苟延残喘，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为了巩固根据地，彻底肃清敌人的残余势力，五支队决定攻打这些最后的据点，首战目标选定为保安县周河川团总路五盘踞的芦草沟崖窑。1935年1月24日，郝兴明带领五支队80多人来到芦草沟崖窑下的河滩里。这个崖窑凿在一个极为陡峭的石壁上，离地面有十多米高，易守难攻，形势非常险要。大家看了一会，觉得无法下手，要攻下崖窑，必须有人冒险爬上去。但往上爬本就不易，更不要说崖窑里面还有人拿着枪弹守着。郝兴明奋勇当先，他让队员们埋伏好，自己手脚并用，麻利地爬上去。游击队员们在下面仰头看见指导员身手这样敏捷，禁不住暗暗赞叹。郝兴明爬上崖窑口，看见门户紧闭。他轻轻一推，发现里面关得很紧。他

想，只能埋伏在门后，等敌人开门后再突然往进冲。守在崖窑里的路五是个惯匪，警觉性很高，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他端起枪，一把推开门，立即开枪。郝兴明身手不凡，躲过了射出的子弹，跃起正要往进冲。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子弹没有直接打中郝兴明，而是打在石壁上，弹回来后，正好击中他的下巴。郝兴明猝不及防，一头栽下悬崖。正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大地冻得像石头一样。郝兴明从十几米高的悬崖栽到地上，当即壮烈牺牲。这时，崖窑里的敌人乘机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游击队只好撤退。战士们匆匆在河滩里挖了一个坑，掩埋了郝兴明。为了以后好寻找遗体，掩埋时专门将头朝下。

当天，据守保安县城的国民党 86 师团长张杰得到五支队攻打芦草沟的消息，立即派副官王振玺、连长焦世兴带两排敌军和 20 名团丁，兼程追赶五支队。追到离安塞县西 60 里的杨募圪塔时，发现游击队已经离开，往东南方向走了。敌人又追到安塞县西南 80 里的槐树沟，追上了五支队。五支队从芦草沟撤出后，还不知道保安敌军已经追来，当晚宿营在槐树沟。敌人乘夜包围了五支队，游击队奋起抵抗，血战两个多小时，损失惨重，刘忠义、黄万英、郑发旺 3 名小队长和 24 名战士壮烈牺牲，6 名战士被俘，失去长枪 21 支，短枪 1 支，五支队的关防也落到敌人手里。幸存的战士钻入梢林，分散突围。残忍的敌人割下了 9 名牺牲的游击队员的头颅，又割掉耳朵，吊在马脖子上游村示众。

郝兴明的牺牲和五支队的暂时失败，使洛河川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反革命则欣喜若狂。战后，团长张杰很快给米脂高双城旅长报告了消息，高双城立即转报井岳秀。2 月 18 日，井岳秀得意地给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去电邀功请赏。电文说：

杨主任虎城兄、邵主席力子兄勋鉴：贻密。顷据米脂高旅长双城转据保安张团长杰报称，上月敬日探闻，匪共80余人由安塞县南距县城百余里之洛河川，窜入保安县南30里之芦草沟，抢劫拉票。当派副官王振玺、连长焦世率兵2排，并带团丁20人，兼程追击至安塞县西60里之杨募圪崂。匪复向东南窜去，遂又跟踪追至安塞县西南80里之槐树沟。据闻匪宿该处，确有50余人。乃乘匪不备有勇猛击，约2时许，将匪完全歼灭。计毙伪第二大队第五支队指挥郝兴明一名，伪队长忠义、黄万英、郑发旺等三名，毙匪24名，生擒6名，其余受伤之匪均窜入口林，并夺获长枪21支，短枪1支，伪第五支队关防1颗，马2匹，驴骡4头，帐簿、书籍多件等情。除指令嘉奖及分报外谨电报间。井岳秀叩，巧。

井岳秀的美梦没有持续多久。很快，陕甘红军42师2团在刘景范团长率领下开进洛河川，稳定了革命形势。他派人找到郝兴明的尸体，送回瓦窑堡。

这时，瓦窑堡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红白双方严重对立。国民党高桂滋84师500团团团长李绍棠率重兵驻扎瓦窑堡，白色恐怖极其严重。郝兴明家里和我党方面都无法安葬烈士，只好把棺材寄放在枣林村山神庙里。直到大半年以后的1935年10月3日，赵通儒领导地方武装，经过长期围困，迫使李绍棠狼狈逃出瓦窑堡，陕北重镇瓦窑堡终于迎来解放。

瓦窑堡城开后，瓦窑堡市委和苏维埃政府隆重安葬了郝兴明，丧事前后共办了四天。许多老战友和西北工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葬礼。当人们按照当地风俗打开棺材给烈士穿丧衣时，发现尸体早已腐烂，根本无法穿衣，便把打土豪得来的许多绫罗绸缎衣服，一件一件放在棺材里。郝兴明同志牺牲后，他们一家人

从事的革命事业并没有结束。瓦窑堡解放后，郝兴明的堂妹郝明珠担任了瓦窑堡市妇女部长。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刚刚从狱中走出的习仲勋同志，在瓦窑堡完成了他的终身大事，与郝明珠同志结为夫妻。蜜月尚未度完，习仲勋就接受了新的任务，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1936年2月，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找习仲勋与张仲良谈话，习仲勋带着新婚妻子，离开瓦窑堡，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郝兴明的四哥郝宝善也早就参加了革命，瓦窑堡解放后担任过瓦窑堡市城区区委书记。党中央撤出瓦窑堡后，郝宝善奉命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东北军进驻瓦窑堡后，敌人反攻倒算，郝兴明一家自然成为敌人打击的重点。敌人到水沟坪抓住了郝兴明的大哥郝炳善、三哥郝明善，押到邻村张李子沟。全村的男女老少跪下一地，保释郝家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把人保回来，还没进家门，住在瓦窑堡城里的老四郝宝善又被敌人抓走了。兄弟两个赶紧就追，一夜马不停蹄，赶天明追到青化砭时，郝宝善已被敌人枪杀了。敌人又欠下了郝家的一笔血债。

1945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西北红军演变而来的八路军警备三旅驻扎在郝兴明当年战斗过的定边县。在郝兴明的战友贺晋年旅长的主持下，兴建了定边县烈士陵园，以告慰牺牲的革命烈士。毛泽东激情豪迈地为烈士题词：“死的安息吧，生的继续战斗，新中国是我们的。”朱德总司令题词：“保卫三边，为人民服务，烈士英名真不朽。”在陵园内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上，镌刻了544名西北革命史上重要烈士的英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著名战将郝兴明同志自然名列其中。

(2) 满朝区与贺满朝

距志丹县纸坊乡驻地西部约3公里处有个小山村叫高老庄，据传清光绪30年（公元1904年）因高氏人家居住于此村落而得名。1936年7月为纪念在“三边事件”中惨遭杀害的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秘书贺满朝，将高老庄区改名为满朝区。

贺满朝，又名年成，1897年出生于吴旗县一个雇农家庭，祖孙三代给地主打工，受尽了剥削压迫。贺满朝从8岁开始，就给刘财主干活。13岁还没穿上裤子，光着屁股上山给地主家放牛拦羊。父亲贺明义天天给地主家没日没夜的做工，母亲徐氏也给地主家做零活，一家人辛勤劳动，却换不来一顿饱饭。穷人的苦和泪，在贺满朝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阶级仇恨的根苗。贺满朝17岁时，得到一个私塾先生的帮助，利用晚上时间念书识字。

有一天，贺满朝的二弟贺满富给地主家上山放羊，一头牛突然掉下山崖摔死了，地主就要撵贺满朝全家离开刘家砭。贺明义再三乞求，还是无济于事。贺满朝劝父亲说：“地主的心狠，求也没用。我们穷人四方为家，离了刘家砭，难道死了不成？”就这样，全家人逃难到了郭家畔。

1928年7月，贺满朝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郭家畔周围帮群众写信、读信，办红、白喜事，利用这些场合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地发展农会会员。到1931年春季，农会会员发展到40余人。

王圪沟有个秦木匠，在贺满朝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农会。秦木匠家里有个土窑洞，内有地道，出口在庄子下边的沟渠里。贺满朝组织的第1个王圪沟农会就在这里成立。他们经常在这里

召开农协会会员会议，安置疗养伤病员。

1929年春，灾荒严重，贫苦农户都少吃没穿。贺满朝就在礼拜寺和农会成员张俊德、宗满有、季占祥等人组织领导了20多户贫苦农民，向地富们提出不交租不纳税的口号。土豪劣绅一看穷人成群结队，便施出奸计说：“不交粮税，只要领头人出来说话就可以。”这时，贺满朝挺身而出，和土豪劣绅讲道理。地富们不容分辨，就把他抓走了。农会把贫苦百姓都召集起来和他们斗，地富们怕把事情闹大，才把贺满朝放了回来。抗粮、抗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秋天，贺满朝又在侯家沟办起了农协会。有一天，在侯家沟会员刘培义家里开会时，被蔡丰民团抓走，经受各种严刑拷打，贺满朝镇定地说：“我是向刘培义要糜子帐的（刘培义确实借了贺满朝3斗糜子），再无别的事”。团匪把他拉到侯家沟，质问刘培义。刘也说了同样的话，贺满朝才脱了险。

1933年，贺满朝担任任新庄农协会主席。一天，礼拜寺大地主王占魁，带领着骡马队到任新庄、千湫沟要地租。贺满朝和宗满有带领任新庄农会会员，把王占魁拉到千湫沟进行了批斗。广大贫苦百姓的口号声、呼喊声吓得王占魁颤颤兢兢，口里直告饶，表示再也不敢剥削农民，并答应把自己的粮食给穷人。由于农会的公开斗争，地主、土豪劣绅士们不敢再向贫苦百姓收租了，团匪们也不敢轻易出来抢人要款了。

同年，贺满朝调任高老庄区（赤安2区）区长。国民党反动派指派金佛坪的反动地主武装头子张廷芝勾结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1个营，镇压农民运动。上级党组织指示地方各区和各个农会组织，要组织武装力量打击敌人，也要采取各种办法深入敌人内部，做好分化瓦解工作。于是贺满朝就派人到陈家砭深入敌人

营垒里活动。经过秘密工作，计划在1934年3月举行起义。但是起义行动泄密，只有一部分同志连夜跑到了香柏沟参加了游击队，另一部分同志被敌人杀害，这次起义虽没有成功，但分化了敌人，敌营长十分惊慌，很快带部队离开了陈家砭，撤退到安边去了。

贺满朝组织农会，斗争地主、豪绅，分田分粮，分化瓦解敌军的活动，使敌人恨之入骨，各处团匪派出密探，悬赏捉拿贺满朝。团匪蔡丰带兵到贺满朝家里抢走所有牲畜和被褥衣物，还放火烧了窑门。10月间，秋粮刚打完，金佛坪的团匪张七（张廷芝七叔父）又带兵来抄贺满朝的家，毒打贺满朝的老母亲，捆绑了贺满朝三弟贺满录。敌人两次抄家，使家中一贫如洗，亲人也东奔西散。家里人见到他哭诉，贺满朝说：“不要怕穷、怕苦，咱家自古是穷人，现在为了所有的穷人将来过好日子，受穷没有啥，也不要怕团匪，人民一定会消灭他们的”。

1935年年三十晚，贺满朝带领区游击队到宁塞川蔡砭包围了蔡丰团匪。这时，蔡丰和匪兵们正在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游击队突然袭击，团匪措手不及，当场被活捉9人，缴枪8支。1935年2月间，贺满朝带领游击队配合刘景范的游击队在吴旗川的窑子上活捉了张杰儒（张廷芝六叔父），缴枪7支，缴获银元300多块，元宝60多个，给贫苦百姓们除了害。3月初，贺满朝带领游击队在三道川赶走反动地主民团蔺士升，分了蔺家的钱和粮。6月间金鼎山团匪曹俊章惊慌万状，偷偷从寨墙上吊下两人，跑到环县搬兵。第二天马步芳的骑兵赶到金丁山救援，我游击队迅速撤离。这次战斗，虽然没有打下寨子，但对当地的穷苦人民影响很大，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

起。一日，贺满朝赶到吴起镇的刘渠子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说：“满朝同志，中央红军来到了苏区，急需的是粮食。”贺满朝向周副主席保证说：“粮食我们有办法，我回去发动群众立刻送来。”

贺满朝回到高老庄，发动群众筹钱捐物，组织了运粮队，不分昼夜，把粮食送到吴起镇、刘渠子、李洼子等地，解决了中央红军的吃粮问题。当时，中央红军给高老庄区游击队赠送了一批枪支弹药，给贺满朝赠送了1支盒子枪。

1935年11月，贺满朝担任了赤安县政府秘书。12月初，赤安县的几个区发生了叛变事件，县政府四面受敌，急需转移隐蔽。当他们转移到蔡家山时遭到旦八团匪曹继芝的袭击。在这次战斗中，贺满朝为掩护机关干部撤退，不幸身负重伤，被敌人抓住杀害，时年40岁。

贺满朝牺牲后，敌人下令不准埋葬，不准给他解绑，匪连长王一元还带兵抄了他的家，把贺满录（贺满朝三弟）、贺志春（贺满朝的大儿子）捆绑起来，准备斩草除根。幸亏有人帮助，他们才连夜逃出虎口。

1936年5月，赤安县的党政军组织基本恢复，为了纪念贺满朝，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赤安县城召开群众大会，由刘景范亲自主持，深切悼念“三边事件”牺牲的同志。同时宣布恢复高老庄区政府，命名为“满朝区”。

1937年志丹县调整区的设置，将原10个区划分为8个区，满朝区为6区。1943年5月志丹县8个区缩为6个区，满朝区撤销。1944年9月，志丹县委决定恢复高老庄的6区设置，仍称满朝区。1949年5月，满朝区再度撤销。

1987年3月，吴旗县委为贺满朝烈士立起了烈士碑，中顾委

委员张策、刘景范在烈士碑上题了字：“贺满朝烈士之墓”，“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生”。

(3) 子良区与董子良

志丹县旦八镇墩湾行政村有一个沟梢渠村，位于镇驻地左部均 11.4 公里处。清宣统二年（1910 年）因该村深居沟渠内，且沟内原生长着大片天然次生林故名之。

1935 年 1 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在沟梢渠成立了第七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董子良。3 月，董子良不幸牺牲，为了纪念他特将该区命名为子良区。

董子良，1906 年春出生于甘肃省西峰地区董家源子村一户富农家中，董子良 9 岁开始上学，中学毕业后立志报效国家，父亲送他到国民党马鸿奎部从军，董子良年轻有文化，参军后志向很大，肯上进，很快被委任中队长之职。担任中队长后，董子良有了与国民党中层官员接触的机会，渐渐地了解到国民党内部相互勾心斗角、残害百姓，官员们一个个贪赃枉法、腐败无能的现状，他也清楚的看到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社会仍然一片黑暗，实现民富国强无望，有志热血男儿报国无门。因此，他毅然决定弃暗投明。1933 年 12 月，董子良只身到南梁投奔刘志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董子良参加革命以后，在刘志丹的指导下，学到许多革命的道理，进步很快，到 1934 年，经张策介绍，董子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党组织指派他以教书先生为名，打入旦八寨子国民党地方民团内部，开展地下工作，不久被人告密，在组织帮助下，董子良及时从寨子上撤离脱险。离开旦八寨子后，董

子良协助张策开展群众工作。他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曹塔、沟梢渠、朱家沟、徐家湾一片。董子良年轻有为，革命热情又高，他不畏艰苦，不分昼夜，走村串户，向老百姓宣讲革命道理，介绍刘志丹革命活动的事迹和故事。用笤帚蘸上白土子水在村子路边的墙壁上刷写宣传标语，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党团员，组织建立农民民主政权。在董子良的辛勤努力下，这一片的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了，老百姓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1935年1月，在沟梢渠成立了赤安县第七区苏维埃政府，董子良任第七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3月8日，董子良随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秘书张策等人在柳沟、高家沟口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召开群众大会纪念“三八”妇女节。宣传教育人们再不要给孩子缠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解放妇女。鼓励年轻女子自己放脚，号召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不料这次行动被旦八寨子团头曹俊章的耳探得知，报告了曹俊章，曹立即派出30多名团丁，连夜偷袭了高家沟口。董子良为了保护张策、王荣贵、张怀富等人，自己只带了两名随从，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他的掩护下，张策等人迅速安全转移。后终因敌众我寡，董子良不幸身负重伤，被敌人带回旦八寨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董子良面不改色，痛斥了敌人残害百姓的丑恶行径。经过30多个小时疯狂地拷问和残酷地折磨，敌人没有从董子良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1935年3月10日午时，董子良在旦八寨子西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9岁。为了纪念烈士不畏牺牲、赤胆忠心的革命精神，赤安县苏维埃政府将他领导的第七区更名为子良区。下辖曹塔、沟梢渠、白山、李渠、朱豪沟、许家湾等5个乡苏维埃政府。1937

年7月因区域调整，子良区撤销。

(4) 云仙乡与贺云仙

1936年5月，为纪念在“三边事件”中牺牲的高老庄区白银子河乡苏维埃主席县委执行委员贺云仙，将白银子河乡改称为云仙乡。

白银子河位于志丹县纸坊乡驻地西部稍偏南约10公里处，是白银河村委会驻地，清光绪八年（1882年），因村中建有白银寺而得名。

贺云仙，字光荣，1913年农历4月10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纸坊乡白银子河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贺士杰，生两男，云仙为长子，次子云升。贺士杰虽是农民出身，但在社会上办事公道，为人正派，方圆三十里以内享有崇高威信。

贺云仙在其父的教育下，十四岁进入金鼎小学念书，1929年冬毕业回家。他回家后，一边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一边抓紧学习知识，在金鼎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刘约三同志的影响下，他开始对当时社会制度有所认识，对人生价值有了正确的判断，为人公道正直，乐于帮助贫穷的受苦人。1930年冬，父亲贺士杰为他娶了妻子，名叫生兰，贺云仙成家后，就为父亲分担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同时也与父亲一块参与社会交往，生活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1929年春，刘志丹回保安搞“兵运”工作，中共永宁山党支部组织全县劳苦群众同国民党县政府进行抗粮抗税的斗争，这对贺云仙同志也有影响，为什么富人要剥削穷人？为什么有钱的

人要欺压穷人呢？1933年12月间，刘约三、王英领导的保安游击队从靖边的杜元崑返回南梁政府，路经白银子河时，贺云仙第一次见到了红军游击队，他接受了刘约三的指引投身革命，暗地组织赤卫队，开始秘密活动。刘约三走后，贺云仙同志就在前后川、南北山岭周围亲友中宣传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并秘密发展赤卫队。1934年7月间，贺云仙在木渠子村召开了贫农、雇农、赤卫队员会议，石有贵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贺云仙同志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和保安地区革命形势，石有贵同志听后，回去就在金汤一带组织了一个杀狗队（指杀土豪劣绅），开始革命活动。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工作，贺云仙同志由保安游击队的樊文有、黄克强二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贺云仙入党后，工作更为积极，四处奔走宣传革命，发展农村赤卫队组织，建立红色政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5年春天，赤安苏维埃县政府决定建立高老庄苏维埃政府（称十区），贺云仙同志在县政府和县秘书张策的领导下带领全区劳苦群众及赤卫队、区警卫连开展对敌斗争，他和一区民团头领高景山（党的地下工作者）同志经常秘密联系，采取不同方式，打击保安驻军张志英团。张团6月初9仓惶逃走，保安县宣告解放，高景山同志虽被敌团裹胁，还派人送信给贺云仙同志说：“在原敌营驻房坑洞里藏下五支步枪及子弹请找”，贺云仙派人找回这些武器后，武装了十区警卫连。

贺云仙同志党性强，纪律观念好，工作认真，踏实肯干，团结同志，从而受到上级的信任，1935年9月，贺云仙被调回县上担任中共赤安工委组建委员（县执委）。贺云仙同志担任县执委后，认真执行县工委和县政府的指示，带领工作组深入农村，发

动群众打富济贫，群众都称赞贺执委办事公道，对事不对人，真是个好干部。

1935年秋，在刘志丹的领导下，陕北、陕甘两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形势发展迅速，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率中央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得以纠正，革命形势越来越好……

在这大好形势之下，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混入西靖边苏维埃县政府保卫大队的一连长金林、二连长宗文耀等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早已和国民党杂牌军（挺进军）张廷芝团、三边段保山匪首及靖边县民团头子田继林等人勾结，假借开会为名，带叛匪四百多人于初六侵犯赤安县城保安镇，当即杀死我独立营一连指导员李炳义等同志，7日在王崋偷袭了我县政府工作人员，未遂。之后活动于周河上下川一带，与赤安县（今志丹）的一些不法地富分子策划颠覆我地方政权，组织反动民团，开展反革命破坏，发生了震惊一时的赤安事件。事件中，十区区长张克俭叛变革命，借支援我游击队、赤卫队攻打旦八寨为名，伙同十区赤卫大队长沙彦堂将赤安县委书记任文明、边区巡视员冯世祥同志绑架，送上旦八寨子被曹俊章团头下令杀害。叛徒张克俭为曹俊章当了狗头军师，并兼四中队长。这伙叛匪到处捉杀我地方干部和红军伤病员，进行反革命活动，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赤安县。身为中共赤安工委组建委员的贺云仙同志，因下乡工作，一时和县政府失掉联系，他为了和反革命分子张克俭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护苏区人民生命财产，亲自跑到金汤区所辖三道川给保安独立营营长马福吉和张明科营支部书记汇报情况，取得马福吉和张明科的同意，即时返回高咀子区，领导组织游击队，发动赤卫队开展对敌斗争。叛徒张克俭闻知贺

云仙回到高咀子区和高老庄一带活动，指令出兵捉拿共产党员贺云仙，贺云仙和游击队长柴荣秀同志在农历11月下旬到小蒜川一带侦察敌情，张克俭带叛徒到小蒜川骚扰群众，群众将这一匪情报告贺云仙、柴荣秀二同志，他们立即返回白银子河村，敌人同时追赶，贺、柴二同志离开白银子河，上到薛庄脑畔山时，被敌兵万树民、高明顺等人发现，叛匪向贺云仙、柴荣秀喊话劝降，贺云仙站住痛骂张克俭的叛徒行径，被万树民开枪，打中下腿部。贺云仙负伤后下令说：“柴队长你快走，不要管我了，我死后，你们要为我报仇……”，柴荣秀同志因单枪匹马，力不敌众，只好从命，脱险后返回郝贫沟向组织报告了贺云仙遇险的情况……

贺云仙被万树民等人上山捉住拉回薛庄严刑拷打，贺面不变色，并说：“你们今日要想叫我投降，这是你们的痴心妄想，我是共产党员。我给张克俭写一封信，你们送给他”。万树民派人将他写下的信送到刘庄张克俭手上，张看后大怒，破口大骂：“这共匪不想活了”，随后指令说：“你们立即回去，拿上一把菜刀，将他拉在门槛上，给我杀掉……”。万树民等人得令后，立即返回薛庄，把贺云仙拉在薛生堂家门槛上杀害。坚贞不屈的贺云仙同志视死如归，开口大骂叛匪：“老子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死是光荣的，你们是党的叛徒，将来人民会消灭你们，你们是万恶的，要受历史的审判”。贺云仙光荣就义，时年二十二岁。

(5) 占奎乡与刘占奎

1935年9月下旬，赤安县政府为纪念烈士刘占奎，将芋子湾改名为占奎乡。

芋子湾位于志丹县金丁镇驻地西北方约9.5公里处，金汤村委会驻地。清乾隆四年（1739年）因广植草本植物芋子，且位于川的湾部而得名。

刘占奎现存资料比较少，仅知道他是金丁人，1929年在刘志丹和中共永宁山党支部的领导下，率领保安乡民在永宁山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过抗粮斗争。这一行为引起国民政府对他的注意。1935年4月，被金佛坪民团张廷芝部杀害，时年三十多岁。

红都境内的白色战略要塞

——“旦八土围子”

何启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中写到：“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红都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即刘志丹将军故里），离保安县城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占据的土围子。那时党中央所在地就在保安，红都的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敢了’。土围子才被解放了，自此才实现了保安山河一片红”。

毛泽东所讲的那个“土围子”就是指位于保安县城西北部四十五公里处，旦八镇境内，洛河畔上的白色战略要塞，如今的“旦八古寨”，又名“旦八土围子”。

旦八镇源于宋朝，当年为北宋时期的“金汤城”的屯粮基地。传说在“石洼庄”石崖上修建三孔一丈宽、一丈高、八丈深的军用粮仓时，工人光食盐就吃了一石八斗，因此取名“石八”，演变为“旦八”。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军事要塞，商贸集镇，洛河中上流文化、政治中心，“旦八”这个地名亦从此被载入史册。

“旦八土围子”位于旦八镇对面的“石洼庄”山上。东临洛河，南靠樊川河，与坐落在樊川的寨子洼山寨隔河相望，连线与樊川河形成45度犄角，北邻吴堡川并与崇山峻岭相连，地形极为险要。西通茂密的原始森林白沙川，与陕甘苏区的红色堡垒——南梁根据地相连。举目远眺，水连着山，山连着天，山岚缭绕，炊烟袅袅。山岚和炊烟浑然形成一体，为古寨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好像永远都没有炊烟，而又被锁在烟雾中。真正是：“山上有‘奇寨’，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争战露峥嵘”。东控洛河川，西御樊川之敌，西北有森严壁垒的吴堡为依托。由于三面临河，形成天然护城河，其险峻真是一人守寨，千军难开。“守撤总相宜，战和随心所欲”。守可消灭敌人保护自己，消耗强敌力量，保证顺利转移，撤则保存了自己人力财力，可以诱敌深入，消灭更多的强敌。

“旦八古寨”南与永宁古寨，北与金鼎古寨连成一线，与闻名遐迩的城台山狄青寨（德靖寨）隔河相望相互依托。在宋代与金汤城、德靖寨（宋时名将狄青镇守的边关要塞狄青寨）、永宁山、金鼎山一样都是防御西夏进犯中原的战略要塞。有趣的是永宁古寨是刘志丹将军“闹红”的“红色要塞”。金鼎古寨盘踞的国民党民团，在毛泽东1935年到达金鼎时，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自动撤离了金鼎寨子。而“旦八寨子”上的二百余户当地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团总率领的百余人，长期盘据该寨，成为红区的白色要塞。1934年8月为扩大和巩固陕甘边苏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令合水游击支队队长刘约三带领合水游击队，深夜冒雨奔袭旦八土围子顽匪。刘约三和他的战友们趁着夜深雨大架起云梯，猛打猛攻，一举攻破了这个苏区内最反动、最顽固、最险要的反革命据点，歼

敌几十人，恶霸地主搜刮人民群众的大量粮食、财物、牛羊和百余匹骡马，全被合水游击队缴获分给了老百姓。但遗憾的是狡猾的团总曹俊章率领残部逃窜了，之后他们又凭借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回到了旦八土围子，更加猖獗的进行反革命活动。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从保安县的吴起镇沿洛河南下，前往陕甘苏区政府甘泉县境内的下寺湾，沿途的金佛坪豹子梁寨子、金鼎山寨子都被红军攻克，路经旦八寨子，毛泽东下令解决“旦八土围子”，经过激烈交战，国民党团总以老百姓为人墙拼死抵抗，所以未能攻克“旦八土围子”。而且牺牲了两名英勇善战的老红军战士。当时刘志丹红军的侦察员何占江是我的爷爷，带着我的父亲何立玉（当时六岁），为红军从王咀子向旦八带路，亲眼看到了那场攻打“旦八土围子”的战斗。其中一名四川口音的长征老红军身负重伤被背下来后，痛苦的喊道：“娘那个×的吆，参加红军十几年，南征北战，打过无数次仗，都没有死，这回毕了，这些土匪真可恨啊，同志们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吆，彻底消灭敌人，为我报仇啊”。喊着喊着，痛苦的留下了几滴干涩的眼泪，头一偏牺牲在了战友的怀里。我爷爷他们还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这次战斗中有三名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牺牲在“土围子”之下，毛泽东担心伤害寨子上老百姓所以下令撤离。保安红军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埋葬在旦八，解放后志丹县在旦八为他们建立了“长征红军烈士陵园”，如今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八月陕甘游击队在刘景范的带领下曾多次攻打旦八土围子，虽未能攻克，但给其沉重的打击。爷爷和父亲常常用夹生的四川口音给我们学那段四川籍红军战士英勇悲壮的遗言。

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1936年7月3日进驻志丹之

后，志丹成为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红都保安”。“旦八土围子”成为了红色保安境内的唯一一个白色据点，在红色根据地内散发着白色恐怖。中央红军多次派兵围攻也未能打下，于是，国民党民团总总凭借天然屏障，便不把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而且更加猖獗，经常对红军进行骚扰。

一九三六年八月，军委决定组织一支专门打“旦八土围子”的部队，红29军3团再次攻打“旦八土围子”。中央决定命江华任政委、中央警卫团团长白志文将军为司令员负责攻打“旦八土围子”主力部队。刘景范、王荣贵领导的赤安县游击队第4支队，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配合攻打“旦八土围子”。刘、白、江接受任务后，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还专程到周恩来那里求借望远镜。周恩来听说是为了打“旦八土围子”，便慷慨相借。并亲自参与制定攻打方案。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范率领三边游击队，江华政委与司令员白志文率队前往旦八寨子对面山头侦察。国民党团总得知红军又来攻打，便命令急急地关了寨门。红军还没接近旦八寨子，敌人的枪弹就从“土围子”的枪眼里扫射出来。部队从南面、北面、东面多次进攻都无法攻克。

刘景范、白志文、江华让部队迅速隐蔽，并借着一块高地用从周总理那里借来的望远镜观察。他发现这个寨子建在一个山坡上，背后是数十丈高的悬崖，寨前有洛河，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面对易守难攻的寨子，刘景范、白志文觉得倘若强攻，将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与白志文商议后，决定以火力控制寨门，不让敌人出来取水。一旦断水，敌人就会不击自溃。一段时间之后，寨子内的敌人扛不住了，曹俊章派人与红军交涉，愿以自己的儿子作人质，来换几桶水。1936年8月10日，国民党团总向我方提出和谈，并指名要赤安县游击队第4支队长他的外孙子王荣贵一

同来谈。我政府为了解放旦八，减少损失，刘景范、白志文、江华同意了和敌人谈判。趁此机会白志文带王荣贵与警卫员进了旦八土围子”，因为团总儿子在红军手里，面对白志文他们，不仅不敢动武，还得客客气气，假惺惺的招待白志文他们吃饭。白志文三人借机与低层群众和小头目接触，争取寨内基本群众，瓦解寨内敌军。但最后团总以与外孙子王荣贵拉话为名，软硬兼施留下了王荣贵，待白志文下山后对王荣贵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之后残酷的杀害了王荣贵烈士。国民党团总在红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深感他对红军犯下了累累罪恶，红军肯定无法饶恕他。当晚，趁着月黑风高，带着少数人马偷偷地溜出红军的包围圈，向原始森林逃跑了，被打死在白沙川森林，结束了他那威风八面、最后狼狈逃窜的一生。

旦八寨子获得解放。刘景范、白志文、江华率红军打“旦八土围子”的事，在红军部队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毛泽东作出了著名的论断：“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一实践经验成为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狠抓阶级斗争的座右铭。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在“左倾思潮”猖獗的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击所谓的“右倾翻案风”，错误批判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时候。那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一个个常常摆出一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架势，动不动就高喊：“发扬攻克‘旦八土围子’的彻底革命精神，‘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拿下‘土围子’誓不罢休。”经常把所谓的“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发扬攻克“旦八

土围子”革命精神的年代里，用攻克“土围子”的精神砍掉了无数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旦八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全国人民都是民不聊生。

可敬的是七十年代，旦八人民发扬攻克“旦八土围子”的革命精神，“女石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全国党代表牛景玲与她的战友们战天斗地，建起了“旦八水电站”，从此旦八镇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从此步入了“电气化”时代。

更让红都人民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延长油田西区采油厂基地建于旦八镇。旦八镇借助原油开采机遇，狠抓小城镇建设，全面完成了街道延伸硬化、排洪设施配套、机关整修改造、电力、电讯线路改造。兴建变电所、自来水厂、农贸市场，文化广场，过境公路。修葺“旦八土围子”、“旦八石宫寺”古迹等工程建设，使小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日臻完善。成为洛河中上游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交通要道和商贸集散地。如今的旦八镇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文明村镇荣誉称号。成为红都保安，魅力志丹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如今的“旦八土围子”没有了昔日的厮杀、战争的硝烟，已成为一座集旅游、革命传统教育的新型堡垒，当你走进“旦八土围子”，洛河美景尽收眼底，洛河文化一览无余。慕名来考察学习的、旅游的、摄影的、经商的人们络绎不绝，也带动了旦八经济的快速发展。

精彩足迹——大学生的脚印

何启华

在志丹，“大学生”这个词在人民心中是一个神圣的名词。大学生是智慧的化身，是文化和科技的象征，被称为社会的宠儿，天之骄子。让儿女考上大学是志丹人民的希望和永远的追求。

在五六十年代，志丹人把学生统称“洋学生”。可想而知，那时候考大学对志丹人来讲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只能是望“大学”兴叹。一九五九年志丹县金鼎人民公社木渠子村十九岁的有志青年刘志政，从当时延安地区唯一的高级中学——延安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北大学，成为志丹县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那时刘志政的名字，志丹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村庄到机关，从街头到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大学生。那时文化落后的志丹人深信：“人出在门，出官靠埋好坟”，有的人跑去刘家看他们家的门是如何安的，有的风水先生则跑去木渠子看刘家祖坟埋在了什么风水宝地。学生娃娃们则在想象大学生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有的说身高丈二，有的说膀宽八尺，有的说头大有宝，脑袋一定有斗大，总之每个孩子都在自己的心中刻画出了

“大学生”最美好的形象。都盼望着哪一天有幸，能一睹大学生的尊容。我在志丹中学任教时一次谈起考大学趣闻，保卫科朱治仓讲到：“一九五九年，他们村人听说农历八月十五哪天刚考入大学的刘志政要从他们村山梁上走过，全村人清早没来得及吃饭就跑到山上等候看大学生，直到中午才看到了大学生的面容。看后有的叹口气说“原来大学生长得和咱们差球不多，只是比咱们穿的洋气点”。有的老人则羡慕不已，仿佛大学生就是唐僧转世，文曲星下凡，有的学生则佩服得五体投地，为多看一眼大学生，追随了四五里地才恋恋不舍的返回村里，有的青春少女偷偷地用手度量了大学生脚印尺寸，偷偷地给大学生做了一双明知道永远也送不出的千层底布鞋和绣花鞋垫，绣有鸳鸯戏水的枕头顶子。希望自己的儿女长大穿上能走出大学生精彩的足迹。也就是那一年志丹中学设立了高中班，成为完全中学。从此志丹儿女志存高远，发愤学习，盼望金榜题名。遗憾的是六二届毕业生没有一个考入大学，六三、六四届也各考了两名大学生还都不是志丹户籍的学生。

一九六五年志丹县十四名高中生参加高考竟有八名考入了大学，创造了志丹教育史的第一次辉煌，因故未能参加高考的贾治邦同学后来也当了陕西省省长。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高校即停止了招生。此后，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1972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六年之后，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称为工农兵学员，其工作分配原则是社来社去”，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

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只要成分好不管有没有文化，也不管认识多少字就可能上大学。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各地的招生工作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走后门”的现象，志丹出现了把古月胡写为月古的错字先生，把“人民日报”读为“人民日板”的白字先生也被推荐上了大学，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所以那时“大学生”成为“文盲”“无知”的代名词。人们提到大学生就摇头。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但“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追溯到一九七七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之后，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它是“文革”后恢复和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的开端。那年十一月份全国高、初六六届到高七七届，十二届高、初中毕业生，走进了大、中专招生考试的考场，志丹县一千二百多名考生仅仅考上了二十九名大中专学生，他们跳出了农门，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统招统分的大中专学生，那时大中专学生更是社会的宠儿，天之骄子。走到哪里。只要说是大学生。别人都会高看你一眼，谁家考上个大、中专学生，家人都觉得腰板直了，真正是光宗耀祖，名垂家史。

“当时的社会特别缺人才，大学生出现供不应求的场面，常

常出现用人单位到学校来要人却发现下手晚了，大学生都被分配完了，有的甚至提前一年就到学校打招呼，让学校给留两个人。”尽管那个年代的学生不用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心，却也因为一切都是分配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个时候是没有选择！一心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都愉快”。大学生是香饽饽的美好局面一直维持到上世纪末。

但我县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陕西社会经济发展十佳县，西部百强县，中专生截止 2004 年前全部分配工作，大专和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到 2006 年前全部由县政府人事局分配工作，本科毕业生到 2010 年全部由人事局分配工作。而且高中教育也迅速的发展，2005 年实行了初高中剥离，新建了志丹县高级中学，2006 年起实行了高中免费教育。加之大学的扩招考入大学的比例连年攀升，仅志丹县高级中学 2006 年高考二本以上上线 47 人，三本上线人数为 307 人。2007 年本科上线人数为 350 人，高职（专科）上线人数为 813 人。2008 年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首次突破百名大关，其中一本上线 16 人，二本以上上线 127 人，2009 年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达 136 人。2010 年二本上线突破 150 名大关，人数跃升到 153 人。全校本科上线人数达 481 名，本科上线率达 36.5%。高职专科以上上线人数达 850 人。高职专科上线率达 64.5%。2011 年高考成绩在 2010 年的基础上再创新高，二本上线人数突破 200 名大关，人数达 216 名（其中一本 21 人，较去年净增 12 人；二本 216 人，较去年净增 63 人），三本以上上线人数达 556 人，本科上线率达 44.5%。高职专科以上上线人数达 912 人，上线率达 73%。2012 年高考二本以上上线人数达 228 名，高职专科以上上线人数达 1280 名，在外就读考入大学的达 618 名，全县共有 1898 名学生考入了大学。

如今大学生供大于求，出现了就业危机，实行考试招聘制录取工作人员，鼓励大学生自主择业，国家采取政策引路，资金扶持，技术指导的措施鼓励大学生创业，并在全中国推行招考大学生村官，为农村注入活力。现在上至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各事业单位，下至建筑工地、宾馆酒店、工厂、田间地头、农贸市场，家政服务到处布满了大学生的脚印，青春少女量大学生脚印的现象已成为笑谈。

那个时候和如今的大学生属于两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时代背景将决定大学生走向不同的生命轨迹，但只要你用心去欣赏沿途的风景，大学生的足迹永远都是最精彩的足迹，大学生的生活永远都是阳光灿烂的。

刘志丹是怎么牺牲的

白 黎

很早以前，陕北群众中有一种私下传闻，说刘志丹不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是被自己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群众的言论，不再抓辫子，戴帽子。所以，这种传闻由私下变为公开，而且添枝加叶，越传越神。经常有人问我：“你是研究刘志丹的专家，又是《刘志丹传》的作者，刘志丹是怎样牺牲的，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回答说：“当然知道，《刘志丹传》上写的清清楚楚。”

他们说：“你写的不对，是毛泽东派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

我非常惊讶，问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派人从背后打死刘志丹呢？”

他们说：“因为毛泽东害怕刘志丹的地方势力，怕中央在陕北站不住脚，所以就把刘志丹暗害了。毛泽东的这一手很厉害，在井冈山时期就把袁文才和王佐杀害了。”

我问他们：“有根据吗？”

他们回答：“没有根据，是听人说的。”

我找到给他们说的人，那人也是听人说的，也没有根据。他

们都是人传人说的，谁也拿不出根据来。

我说：“这是胡说八道，纯属造谣。”

一、毛泽东救了刘志丹

刘志丹领导陕甘军民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长期征战没有立足之地，于9月间，又发动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中国红军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正当刘志丹领导陕甘军民积极粉碎敌人“围剿”的时候，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到达陕北。在此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垮台。”就在蒋介石的10万“围剿”大军压境，中国红军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处在十分危险的时候，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二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高抬高自己的企图，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倒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判断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由于刘志丹在陕甘人民和红军中，享有极高威望，受到人民和红军

的一致拥护和爱戴。左倾机会主义者慑于刘志丹在人民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敢下手时，红25军经过艰苦转战，到达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时机已到，在三军会师的第二天，朱理治、聂鸿钧等以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的名义，主持召开了“永坪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并任命肃反能手戴季英为政治保卫局局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鸿钧取代刘志丹任主席。决定将红25军、红26军、红27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执行左倾路线的那几个人，采取了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的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排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担任要职。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并没有为自己表白和申辩，而是一如既往，竭尽全力协同徐海东和程子华一起，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而运筹着。

反“围剿”战斗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那几个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认为打击刘志丹抬高自己的时机已到，便支持在鄂豫皖就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的戴季英照抄照搬张国焘的《肃反手册》，开始了在陕甘的错误肃反。他们先在后方抓了一些人，进行严刑逼供，要这些人诬陷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首领”，妄图以此作为置刘志丹于死地的口实。但是这些被严刑逼供的人，宁死也不诬陷刘志丹。

那几个推行左倾路线的人，为了达到打击刘志丹抬高自己的企图，进一步将错误肃反扩大化，凡是原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严刑逼

供，指名要他们招供刘志丹是反革命的头子。许多跟着刘志丹出生入死执行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杀头，被活埋，造成了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在这紧急关头，刘志丹怀着对党的无限信赖和忠诚，坚持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惊人的冷静态度，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这时，从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甘宁。刘志丹非常激动，立即向徐海东建议，红15军团应马上西出庆阳、环县一带，迎接中央红军早日到来。徐海东很同意刘志丹的建议，并立即请求省委。但省委紧急来信指示，严令不准西出庆环，并要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解放后，聂鸿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说：“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们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后来，那几个推行左倾路线的人，又采取了将刘志丹和高岗分开，以急调刘志丹回后方主持军事工作的名义，将刘志丹和高岗分开，在前方逮捕高岗，在后方逮捕刘志丹。

刘志丹接到调令，就去省委驻地瓦窑堡报到。当他走到安塞县高桥川时，一匹战马迎面飞奔而来，到了跟前，骑者见是刘志丹，赶忙下马将一封信递给刘志丹。刘志丹接过信一看，原来是保卫局决定逮捕他的命令和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他。刘志丹先是一惊，随即就冷静下来，将信和名单塞进信封，递回送信的同志，勉强笑着说：“这是给军团部的急件，你就送到军团部，我到瓦窑堡去了。”

送信人策马而去，通讯员看着刘志丹紧皱的眉头和那犀利的

目光，知道情况有了变化，就说：“军长，别去瓦窑堡了，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再说吧！”

1970年3月，周恩来谈到这件事时说：“逮捕刘志丹的信，落到刘志丹的手里，刘志丹看了以后，泰然自若，说你送吧，我就去。如果他回来商量一下，局势会有变化。但是他单枪匹马到了瓦窑堡，表现了他对毛主席忠贞不二。”周恩来说的“局势会有变化”，是指当时陕甘苏区内部的局势，由于推行左倾路线的那几个人，借助不明真相的红25军的力量，将“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从地方到军队抓了许多人，激起了整个根据地人民的不满，许多人怀疑25军是不是红军，那几个推行左倾路线的人不是共产党。红26军的广大指战员，愤怒万分，纷纷要求要把25军赶走。当时刘志丹如果回去商量一下，形势一定会起变化，完全可以避免被捕。但是刘志丹为了红军的团结，为了保住陕甘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他单枪匹马去了瓦窑堡，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对党的赤胆忠心。

刘志丹到了瓦窑堡，就立即被捕，戴上了镣铐，打入大牢，严刑逼供，准备杀害。

正在这危险时刻，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了吴起镇。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听到群众反映刘志丹被扣押的情况，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马上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同志，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传达中央要保障刘志丹等同志安全的指示，并由王首道接管被左倾分子控制的保卫局。消息马上飞传陕甘苏区，人们就高兴地说：“党中央一来，形势马上就变好了！”

毛泽东在吴起镇指挥中央红军打垮了尾追来的敌军后，就南

下到甘泉和15军团会师。在下寺湾召开了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下令停止错误的肃反，立即释放刘志丹和其他受迫害的同志。干部会后，毛泽东又一次派人去瓦窑堡，指示释放刘志丹等同志。

毛泽东指挥会师大军，在“打胜仗向陕北人民献礼”和“打胜仗迎接党中央”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在富县直罗镇全歼了国民党的109师和106师一部，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歼灭战结束后，毛泽东就到了瓦窑堡，和周恩来一块听取了王首道关于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要立即恢复他们的领导工作。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戴季英狡辩，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块亲切接见了刘志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说：“党中央很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点，不然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落脚哩。”

刘志丹说：“主席，多亏党中央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块根据地也可能丧失了，是党中央和主席救了我们和根据地。”

二、杀害袁、王与毛泽东无关

“毛泽东当年上了井冈山，刚站住脚，就把袁文才和王佐杀

了，到了陕北以后，刚站住脚，又把刘志丹杀了。”

我1996年5月，到井冈山采访时，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看到一些有关史料，并听了几位老红军讲述了袁文才和王佐被杀的经过，现叙述如下：

1929年元旦刚过，蒋介石就电令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湖南省主席何键调集2万5千多兵力，分为五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当时红军的总兵力约有5千多人。由于敌人的长期封锁，根据地的经济极端困难，红军的生活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商议对策，毛泽东说：“我军的兵力和装备远不及敌人，若死守井冈山，必不能持久。我们不如仿效古人‘围魏救赵’的方法，将红军一部分转移到赣南敌后，使进攻井冈山之敌回救，以解井冈山之围。再则赣南有九连山、大庾岭，山间又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盆地，河流贯穿其间，地形复杂，物产比井冈山丰富得多。同时，这里紧靠湖南、广东、福建边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薄弱，是一块比较理想的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召开了井冈山军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突围下山。

毛泽东和朱德等率领红四军突围下山后，吸引了敌人五路兵力的两路去追赶。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经过转战，进入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南山区，创建了后来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彭德怀指挥红五军，严守在进入井冈山的各个哨口上，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每当敌人攻到半山坡上时，红军便从山上放下滚木巨石，轰隆隆作响，如同山崩地塌，砸得敌人呼天号

地，人仰马翻，死伤一片又一片。

敌人用多于红军几十倍的兵力，经过几天的轮番进攻，都被红军一次次打退。此时，正是井冈山上的严寒季节，北风呼号，风雪漫天。红军忍饥受寒，依靠井冈山天险，使敌人无法攻上山来。

一天，敌人用几百块银元，收买了一个挖药材的农民，给敢死队带路，从黄洋界侧面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上悄悄地爬上黄洋界后山。在敌人出其不意的两面夹击下，黄洋界哨口失守，敌人占领了井冈山。彭德怀带领红五军，冒着漫天风雪，冲破了敌人的层层包围，也向赣南转战而去。

这井冈山不仅山高林深，而且奇险异常，只有七条羊肠小道通向山上，这些小道隐约在悬崖之间，最狭处只容一人通过。最险要的黄洋界、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和八面山等地，都是一夫把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是逃犯避难之所，兵匪窟宅之所。

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残部到井冈山时，山上有两股土匪，头目分别是袁文才和王佐。他们各有三百多人马。王佐驻扎在井冈山中心地区的茨坪，袁文才驻扎在山脚下的茅坪，山上山下互相呼应，成为犄角之势，他俩结为兄弟，唇齿相依。袁文才，宁冈人，读过中学，38岁，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王佐，遂川人，裁缝出身，没有文化，与袁文才同庚。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以后，他们都参加了红军，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袁文才是红四军参谋长，王佐留在井冈山，随红五军行动。据彭德怀回忆，王佐还是表现好的，袁文才跟随毛泽东到了吉安东固时，听到井冈山失守的消息，担心家乡的亲属和部下的安危，就开了小差跑回了井冈山，

躲在王佐家里，心里又后悔又害怕。王佐和袁文才虽是结拜弟兄，但他已是共产党员了，他还是把袁文才开小差回来报告给了党代表何长工，何长工对袁文才进行了批评教育后，就安排到宁冈县委担任副书记。

彭德怀带领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于1929年4月在赣南瑞金和红四军会合。彭德怀对于丢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心里深感不服。于是要求重返井冈山，与湘赣边界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一起，恢复失地，重建政权。红四军军委同意了彭德怀的建议。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井冈山地区。湘赣两省的“围剿”军占领井冈山后，不久由于蒋、桂战争爆发，在井冈山的两省敌军就全部撤走了。在撤走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烧光、抢光、屠杀也很惨。此时，疟疾流行，无药无医，没有食盐，没有生活用品，幸存下来的群众，像野人一样钻进了深山老林。他们听说红军又回来了，纷纷走出深山老林欢迎亲人。这时，袁文才也躲在山上，他不敢来见彭德怀。他除了因为开小差跑回来的原因外，还有一件事就像千斤巨石一样压在心上，使他经常不安，非常害怕。这就是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上的一段话：“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铲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使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六大”文件到达井冈山时，毛泽东对这段极左的话，没有

向下传达，但袁文才风闻到这段话的大体内容，他设法弄到文件，看了这段话，并告诉了王佐，两人都很害怕，感慨地说：“我们再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当时，就有人主张杀袁、王，说是执行“六大”的决议。毛泽东坚决反对，并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如今毛泽东远在赣南，湘赣特委就有主张杀害他们的人，所以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大祸临头。

袁文才和王佐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30年2月11日，袁文才、王佐带领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这罗克绍手下有个兵工厂，能造枪支弹药，他们早就想把兵工厂搞过来。这天，他们侦察到罗克绍正在情妇家中，就连夜出发，黎明时辰将罗克绍抓住了，把罗克绍押回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以酒肉招待，目的是想和罗克绍拉上关系，要他去长沙弄钢铁、洋硝等造枪弹的原料，给红军造枪弹，取得对他们的信任。

消息很快传到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朵，说袁、王跟土豪一起喝酒，勾勾搭搭。朱昌楷原来就和袁、王有矛盾，得知消息后，连夜去向彭德怀报告，说袁、王要叛变。经过研究，决定两头行动，一头派出队伍拆除禾河上的浮桥，防止袁文才、王佐重上井冈山，一头由朱昌楷亲自带队，直奔袁、王住地。次日拂晓前包围了袁、王住所，朱昌楷第一个冲进袁文才房间，一枪就将睡在床上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响，带上警卫员急忙逃跑。他欲渡过禾河回井冈山，但见浮桥已拆，只好涉水过河，由于不会游泳，淹死在河里。

袁文才、王佐一死，其老部下马上反戈，投奔国民党部队去了。井冈山的群众，大都跟袁文才、王佐及其部下有种种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根据地根基从此动摇，红军再无法在井冈山立足，彭德怀只得带着红军离开了井冈

山。

毛泽东得知袁文才、王佐被杀，连连顿足：“杀错了！杀错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亲切地接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表达他的深深怀念。

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地耸立在井冈山上。

三、刘志丹牺牲经过

毛泽东对刘志丹是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刘志丹获释后，就被任命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的警备司令，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等职，在中央军委工作。他的身体虽然很不好，却日夜在工作，忙着组编红28军，准备东征抗日。

1936年2月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东征宣言》，并将红军主力改编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下辖1军团、15军团、28军、30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按照中央计划，1军团和15军团，由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从清涧一带渡河，刘志丹率领28军北上神府，从佳县以北渡河，楔入晋西北，牵制和打击敌人。

红28军渡过黄河以后，就向兴县、康宁镇一带横扫过去，一路上所向披靡，打的阎锡山匪军狼狈逃窜，红军声威大震，长期在阎锡山黑暗统治下的山西穷苦人民，含着喜悦的眼泪，欢迎红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红军，使红军在战斗得到了扩大。红28军接二连三的大胜仗，牵制和调动了大量敌人，有力的配合了毛泽东率领的1军团、15军团，直打到太原附近的晋祠。从而，阎锡山在山西闭关自守，连铁路也是窄轨，吹嘘不论

是谁也进不来的“铁山西”，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

在东征中，刘志丹给大家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每当说到毛泽东时，他那饱经战争风霜的脸上，出现了那样动人的笑容。他常对大家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有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能胜利！”

一天早晨，机要员送来一份中央军委来的急电，电文说：“为了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陕甘老苏区，命令 28 军即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趁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立即率领红 28 军向离石以南进发，他说越向南走离毛主席越近了，一定要打好攻占三交镇这一仗，向毛主席献礼。部队接近三交镇那天，刚到宿营地，刘志丹就带着参谋人员到山上观察地形去了。在往山上爬时，他又一次对同志们说：“我们越往南走，离毛主席越近了，一定要打好攻占三交镇这一仗，向毛主席献礼！”

4 月 13 日晚上，攻占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同志们都叫刘志丹休息一会，但他却说：“我有一个老习惯，枪声一响，马上就没了困意。”说着，又拿起了铅笔，一会儿在地图上标着记号，一会儿在地上来回走动，一会儿侧耳听听枪声，仿佛要从枪声中听出战斗进展的情况，就这样，他又是一夜没有合一眼。

第二天早晨——1936 年 4 月 14 日，当朝霞染红了三交镇周围的山头时，红军已经占领了三交镇周围的大部分阵地。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时，苟延残喘的敌人，集中了力量，拼死困守着东北面的一座主要山头，进行顽抗。

为了拿下山头，迅速结束战斗。刘志丹拿着望远镜，走出指挥部，向前沿阵地的山头上走去。由于敌人集中了火力，战斗进

行得非常激烈，子弹像小鸟似的，在头顶上“啾啾”地飞叫，打得地上的黄土直冒烟，这是敌人的一挺机枪打过来的子弹。刘志丹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似的，边走边风趣地说：“等会儿把那挺机枪缴过来，带给陕北游击队，作个礼物。”他一口气爬上了山顶，这个山头正和敌人困守的那个山头相对着，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小河和黄河的汇合处就是三交镇。

看着刘志丹气势轩昂的表情，真像恨不得要一口把敌人吞下去似的。就在刘志丹亲自指挥部队最后解决苟延残喘的敌人时，突然，敌人的那挺机枪射来一串罪恶的子弹，刘志丹摇晃着身子要跌倒下去，但他踉跄着步子，很快地又站住了，咬牙怒视着对面的敌人。和刘志丹一块的有特派员裴周玉、警卫员谢文祥，惊呼一声，扑了上去，忙把刘志丹扶住，裴周玉赶快叫人去请医生。

刘志丹回过头，看着快要冲上山头的红军战士，脸上出现了满意的笑容。这时，殷红的鲜血已渗出了他的棉衣。

子弹是从刘志丹的左胸部穿进去的，伤了心脏，伤口处流血不多，可能血流进了肚里，刘志丹的脸慢慢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过了一会儿，他的神态有些清醒，微微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赶快消灭敌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向毛主席献礼！”说着，嘴唇慢慢地合在一起，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好像熟睡过去一样。当医生气喘吁吁地赶到时，刘志丹同志已经停止了呼吸。

裴周玉写文章回忆说：“就在刘志丹同志指挥着红军战士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又是那挺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串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我们亲爱的军长的生命。当时我曾几次拉过刘志丹同志的衣服，让他姿势低一点，防止危险。谁知就在我最后一次拉他时，见他两只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

不禁惊呼一声，上前忙把他抱住，同时急喊警卫员去叫医生。子弹是从刘志丹同志左胸穿过去的，很可能是伤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但他的面色迅速地变得蜡黄。当我抱着他下到山包后边时，他已昏迷过去，呼吸极度微弱。停一下，他神志有些清醒了，他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还想为党为人民作更多事情的精神，似乎一下子全都迸发出来，用劲挣扎着，低声告诉我：‘让宋任穷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

谢文祥写文章回忆说：“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突然用那挺机枪向我们猛烈扫射，我赶忙把志丹往下拉，由于他两手正在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没来得及爬下去，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我把他赶快背到隐蔽的地方，他刚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不要管我……赶快请宋任穷政委来指挥部队……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几十年来，我为了写作《刘志丹传》，采访过千余名刘志丹的老部下、老同事，没有一人对刘志丹的牺牲提出质疑，倒是那些对刘志丹革命经历一无所知的人，却津津乐道地传播着刘志丹不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是自己人从背后开枪打死的，好像他们就在现场一样。就这件事，我曾几次和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交谈过。刘景范说：“这是刘志丹牺牲后，敌人为了挑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关系而编造的谣言。我记得当时还追查过，追来查去，都说是听人说的，结果也没有追查出造谣的敌人。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传播敌人编造的谣言，实在可笑。”

刘志丹牺牲时只有34岁，但他却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曲折，进行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建立了那么多的功勋。

毛泽东得到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非常悲痛，无限深情地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

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

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5月，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1943年，在刘志丹陵园落成时，毛泽东又挥笔为刘志丹题了“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道：“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道：“红军模范”。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题词，对刘志丹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人民英雄刘志丹是受之无愧的。

1982年7月16日初稿于志丹

2012年7月15日改于延安

志丹县旅游文化发展略记

金 蔻 吴志锋

志丹是陕甘宁边区创立者刘志丹将军的故乡，是继瑞金之后中国革命第二个红色首都，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和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从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党中央在志丹召开21次政治局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一系列重要决定，为第二次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奠基作用。光辉灿烂的革命历史为志丹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现存有保安革命旧址、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刘志丹烈士陵园、金汤刘志丹出生地、芦子沟刘志丹故居，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心义正南梁堡子、中央党校、志丹第一个党支部、团支部诞生地永宁山革命遗址等20多处，革命历史文物120多件，革命历史文献230余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维汉、林伯渠、杨尚昆、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志丹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刘志丹、马锡武、刘景范、曹力如、王子宜等一批志丹优秀儿女谱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劳苦大众求生存、争解放、谋幸福的历史华章；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我党和军队领导，著成

《西行漫记》，使西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使志丹闻名于世。这里还是由丁玲发起经中央批准“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地。

志丹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发现志丹文化遗址288处，这些文化遗址中，以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遗存占大多数，新发现的15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遍布志丹的河谷山岭，证明最晚五六千年前，志丹大地就有了原始人类生息繁衍。古保安“治时虽为闲壤、战时即为要径”（光绪本《志丹县志略》）。古之志丹在北宋时即为西北边陲，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志丹的历史文化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境内有战国时期秦昭王长城遗址，中国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纵穿永宁、双河、侯市、杏河等乡镇境内，全长105公里，路面最宽达到60米，两侧烽燧密布，兵站列列，遗迹十分丰富。在宋夏、夏金对峙相争的近二百年间，境内的洛河、杏子河河谷是征战双方用兵的军事通道，特别是宋夏时期，志丹境内设保安军，成为北宋防线的指挥部，金汤，顺宁两寨更是战争前沿和桥头堡，也留下了顺宁寨娼优老妇骂敌保城的趣闻。在缓和时期又是两国的通商“口岸”，明朝早中期，洛河川，杏河川又是蒙古鞑靼南犯延安关中的必经之路，河岸堡寨高筑，大小崖窑密布成为战争造成当时民不聊生的真实纪录。其中永宁境内洛河峡谷的老崖窑崖居曾经被西捻军余部袁大魁部据守，并最终成为近千名义军殉难之地，更为平奇的志丹崖居文化平添了一抹悲壮色彩。而永宁山寨崖居群，在清末至民国初期，又一度成为保安县衙署驻地，凸显出其防御避乱功能。志丹历史人文荟萃，秦始皇命大将蒙恬在艾蒿岭修筑了秦直道。三国时吕布在这里巡过边防，北宋名将范仲淹、沈括、狄青等在这块

土地上开创了彪炳史册的抗敌伟业。保安出生的刘延庆、刘光世、刘绍能、刘怀忠、解元等从这里写就了万世英名。除古文化遗址外，志丹已查明的还有古建筑 77 处，古墓葬 34 处，石窟寺及石刻 174 处，县文物管理所收藏各类文物 500 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 件，二级文物 16 件，三级文物 109 件。

近年来，志丹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创造性地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中德合作造林、三北防护林、城区山体绿化、“两线三点”绿化等林业生态建设工程，志丹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转变，至 2012 年底全县拥有各种林地 434.9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32%，林草覆盖率达到 70% 以上，森林资源在延安北部独有。志丹特有的红沙岩地貌在洛河水千万年来的反复冲刷下形成了雄奇壮美的峡谷风貌，也是志丹特有的自然景观。

宗教文化繁荣，石窟寺、摩崖造像龛众多，是志丹历史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现查明县境内有北朝晚期到明清造像龛和石窟寺近 50 处。从残存的碑记上看，我县的太平山太白观及九吾山，宋明时一度成为西北地区的道教胜地，近年在九吾山上发现的 400 多年前道教真人羽化泥塑像，经专家考究为“陕西无双、全国罕见”，为这块昔日的道教胜地平添了几分神秘。义正石湾塔群是陕西省目前保存最完好、最大的塔群（九塔）。这些石窟寺、摩崖造像、道观寺院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于我国宗教文化的传播，对志丹古代历史、民族、文化、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长期的各民族共存共荣，融合成志丹独具特色地域历史文化。有农牧结合的农耕文化，有节俭与豪迈结合的饮食文化，也有人与自然相适应的生态文化（居住）。延安五鼓之一的志丹扇

鼓被列为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俗、婚庆都具有地方特色；陕北民歌、酒曲、说书、大秧歌、剪纸、刺绣等民族技艺都有很好的传承。

海拔高、光照充分、昼夜温差大等特殊地理环境的作用，志丹的杂粮具有很好的品质优势，由杂粮制作的特色小吃种类繁多，深受消费者亲睐，志丹羊肉味道鲜美，无膻味，志丹炖羊肉已成一张响亮的名片，志丹黄酒已走出延安，畅销全国；志丹地处世界优质苹果最佳适生带，山地苹果具有皮薄色佳味美、维生素含量高、营养价值高的优秀品质，市场前景初好。

2006年以来，志丹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打造“文化名县，旅游大县”战略目标，以主打“两个品牌”（打响叫亮“刘志丹将军故里”和“中国革命红都”两个特色文化品牌）、倡导“一种精神”（刘志丹革命精神）、营造“一种氛围”（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同等用力的工作氛围）为基本格局，按照“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发展理念，编制了《志丹县红色旅游总体规划》，明确了文化旅游业发展方向和重点。紧紧抓住延安大红色旅游圈规划建设机遇，加快推进景区和景点的建设。累计投入2亿多元完成了县城水景观一期工程、太白山生态园一期工程、九吾山景区基础建设工程；整修了刘志丹烈士陵园、红都保安纪念馆、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刘志丹将军故居一批红色景点；启动了红都保安纪念馆工程、太白山生态园景观建设工程。开辟了追寻志丹和体验红都两条旅游主题线路。2011年6月，九吾山景区通过国家AAA级景区评审。

2006年以来，先后建成延志吴二级公路，启动实施了延志吴高速公路，改造了县城南北出口道路，完成了乡乡（镇）通三级公路、村村通油路工程，形成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打通了志丹

的出境通道，提高了景区、景点的可进入条件。在抓景区和景点建设的同时，还不断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在延安高速出口、机场出口、枣园路、303省道沿线设立了志丹旅游宣传广告牌和标志牌；坚持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旅游交易展示会；在《中国红色旅游季》、陕西电视台、延安电视台等省内外媒体对志丹旅游进行宣传；建立志丹县旅游门户网站进行网络宣传；在全县20多家宾馆饭店摆放《志丹旅游宣传册》，邀请省内外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来志采风，拍摄影视片；拍摄《志丹旅游》专题片，在志丹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编排《挂红灯》、《兰花花》等舞台节目赴省进京演出。

近年来，我县大力实施县城“两山”生态景观林、303省道百里绿色长廊、延志吴高速公路直观坡面绿化等一批重点绿化工程，林草覆盖率达到70%以上，志丹大地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和“省级园林县城”荣誉称号。同时深入开展县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退去脏、乱、差旧面貌，展现清、秀、净新容颜，生活环境得以改善，居民素质得到提高，环境意识明显增强，荣获“国家卫生县城”和“全国文明县城”，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仅2012年全县接待旅客就达30万人次，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超亿元，志丹县的旅游业已经步入了快车道，正在以强劲的势头快速发展。

编 后 语

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志丹文史》在不断探索中又添新篇。志丹县政协出版《志丹文史》,旨在挖掘整理我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影响和带动广大文史工作者及社会各界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更好地展示我县丰富灿烂的历史和地域文化,激励人们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努力创造美好未来。

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广大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提供了大量史料,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讹误之处,敬请读者及各界人士指正。

编 者

二〇一三年四月

志丹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志丹县委员会

主编：边志银

787×1092 毫米 1/16 开本

印张 18.25 插页 8 字数 180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责任编辑：杨世贵
封面设计：见 航
封面题字：边志银

